

華族生命論

逸民題



卷頭語

環境限人，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定律。在二十四年七月本書剛纔脫稿的時候，個人便離開了成都。過後一年期間，個人因環境關係，演變成了一個農夫，終日勞作田野，奔走廛市，便莫有時間來將脫下的稿加池一番整理了。二十五年六月，重到成都作客，費時一月，始得到一番詞句上的修理。工作完畢，弁於簡端，剛欲付印，忽又轉歸田里。實因個人自身的資財缺乏，外圍情勢的屬性不許，思想不能違反物質的一個事例。至今又拖延一年零六個月了，自蘆溝橋事變以來，華北地盤已失去了三分之二，情事演變，與書中所指，月異而歲有不同。哈！哈！今天再來舊事重提，這個付印的實現是可靠的嗎。在未來敵機威脅之下，還是以蕉覆鹿，將真實之幻為虛妄呢。

民國二六、十、於成都客邸

（注意）本書讀法排書殼後方

華族生命論

弁言

自九一八日本佔領瀋陽以後，內訌政府倚仗國聯不事抵抗對策的錯誤，外觀日本氣燄高張實行北進政策的迫切，反觀國聯不肯負責推諉調查處理的無力，便知我們的國難格外來得深刻，華族以後的生命，能否繼續，大有研究的必要。最怕的是民族將要陷入不可拯救的深坑，一般人猶狃於舊習，龐然自大，仗恃我族人口衆多，以爲千萬不至於滅亡。燕雀處堂，臨禍不懼。這種民族幼稚狀態，比如一個無知的孺子，不知虎力之猛，牙能噬人，而欲相與玩翫，鮮有不被其搏噬的。這樣一來，民族前途真有不可救治的危險了。於是發憤而爲此論，思及日本未能將我土地人民全部吞滅以前，提醒我們將入虎口的同胞，促其離開虎穴避其搏噬，或持挺大呼以相追逐，在一個拚死以相爭鬥的條件底下以求不死，使黃帝子孫不絕迹於地球表面，赤縣神州不致供後人的憑弔。

現刻要來提醒我們的同胞，便對於這個禍難的起因，就不能不加以分析，窮源竟委的，無所諱飾的，坦白直陳的，使同胞們明瞭這國難的深度，懼而知戒，力求自振，這是自救救人的一種辦法。我國自辛亥革命以後，北洋軍閥當權，連年內戰，耗損國力。至十七年北伐成功，依然丟不掉一套排除異己的把戲。這是當權者的認識錯誤，以一身利害為民族國家的利害，利害深中於心，便內懷機巧，權詐百出，縱外矢精誠，而人不相信，馴至舟中之人皆敵國，對於民族生命的前途，豈是一個些小的關係嗎。這不知若干次的內戰，便從這個條件底下導演出來。譬如一個人的身體，元氣虧損以後，風寒自然是要侵進來的，孟子說：「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日本不過因勢乘便，來作個「取亂侮亡」的工作罷了。這樣說來，是侮我者日本，而啓日本以侮我者，是我們內政的不修。人心散佚的一個內在條件。說到內政不修，這當然是要政府負責任的，我們但希望政府將失之東隅者收之桑榆，以慰人民的願望，但此是將來的一段工作，我們姑且保留，以待證驗。現刻所要提出的，就是將從前召禍的事實，重行檢

討，指陳得失，以增加同胞們對於國難的認識，對於政府拯救國難的前途加以考慮。使同胞們對於自身的生死存亡，確然有以自信，以激發其愛國和保種的一種情緒。此種思想和工作，固是純粹根據先總理民族主義而來。但對於政府前此設施，不免多所指陳，而又不能作一種不忠實的回護。惟幸政府自二十二年十月威電拍發後，政治日進開明，言論力求解放。昔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焉。」竊以為九一八事變，乃政府前者日月之蝕，何損於明，明既不損，是暗者亦可無庸諱飾。原來瑕瑜之形，本不相掩，以瑜掩瑕，不可謂忠。在君子本無文過之心，作者站在普通公民的立場，豈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而曲意爲之掩飾，以竊比於阿附者作導諛貢諂的過舉嗎。

中國目前危急的情勢，受日本侵略之外，還有列強勢力的對立，視中國爲螟蛉之子，日托捏之以各求相似。現在德謨克拉西的英美，法西斯蒂的德意，鮑爾希維克的蘇聯。牠們都想把牠們的政治溶液，注射到我們四萬萬同胞的腦海中來，分裂我們整個民族。

的精神，使相互對立，造成內亂，演自相屠殺的慘劇。——現在的西班牙便是我們的借鑒。——這種危殆的形勢，應該急謀解救，不過這三種政治路線，究竟應該走那一條，才是民族生存的正常出路呢。自然是要看當前牠們應用的效率，及世界經濟環境所造成的青年思潮的趨向，與我國居次殖民地地位所需要的生存條件，尤其重要的是要在民族歷史上與三民主義的涵義當中，去找與這幾種思想中之任一種近似的根柢，求思想與歷史精神的契合，務使對立統一，來奠定息滅內爭的基礎。

本書成於民國二十四年夏間，當時因環境關係，未能遽然付印，且以爲人之好善，誰不如我，書中所陳，他人固有先我而善之者。是書之成，不過自抒所見，留供後人酒餘茶罷之談助，原是不必自我公於世的。頃見華北情勢日增嚴重，內部團結未臻密切，竊疑國人雖醒恐猶未能澈悟。個人根於保種救國的一種概念，勃然興奮，不容自己，始欲將原書提出付印，倉皇之際，並未計及文字的加工，言語的規則與否。所自信者，作者的思想，是在非田制度與共產主義的中間實現真實的三民主義爲新舊兩種觀念間的鴻

溝，造了一道橋梁，使國人彼此間的思想愈益接近內部密切團結。猥不自揣，欲粗具二十世紀東方思想的雛形。一知畫虎不成，貽笑大方。然拋磚或可引玉，果能由一雛形更得許多才智之士相與研究，以進於光大，對於民族前途，豈不大有裨益嗎。又何必自回其短，不提出與國人共同商討呢。

或有謂：作者書中指陳時政的地方，恐觸當權者的忌諱。作者應聲曰：是不妨。作者身居田野，介然一夫，既未有武力以爲之背景，亦未有則身政治的企圖，第以不甘受異族人的奴役，憤而爲此。言雖切直，其情獨不可以原諒嗎。倘或政府與國人，因我之一提而猛然省悟，翻然改圖，力矯前此蹈楊朱爲我之失。知中國這樣瀕於枯渴的經濟，非相煦以沫，民族生命快要斷絕，懇摯底以民族的生存爲自身的生存。使我或我的子女託庇於一個強固政府的下面，抵抗異族而受其羽翼，其爲代價不超出我一人的生命千萬倍了嗎。墨翟之於大者取之，雖摩頂放踵而必爲。孟子說：『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口垂涕談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

我本介於儒以致用於墨者，政府者吾人之政府，休戚原本相關，明其失本在冀其改，盼望之情殷，故不覺其言之切直。切直與訐私原是二樣，心之根源上是大有區別的，這是豈能互相蒙混的嗎。作者甚盼望國人將成於愛國的情緒，作切中事理的語言，對政府作忠實的諫諍，不再口是心非作虛偽的陳述好了吧。

目錄

第一編 緒論

- 第一章 個人求生慾的衝動
- 第二章 個人與民族
- 第三章 民族的形成
- 第四章 民族盛衰的原理
- 第五章 民族學術與民族生命
- 第六章 民族須有強固組織的國家
- 第七章 民族須有人民愛戴的領袖
- 第八章 人民須有民族歷史的認識
- 第九章 人民須有世界大勢的認識

目錄

目錄

- 第十章 民族須具歷史學術的精神對抗世界
- 第十一章 華族政治歷史的分期
- 第十二章 華族在現世界的地位

第二編 本論一 華族的發展

- 第一章 華族的由來
- 第二章 文化的演進
- 第三章 政治的演進
- 第四章 前期敦龐渾厚的風俗
- 第五章 學術的演進
- 第六章 華族在三大河流的發展
- 第七章 周末初秦時代學術的反應

第三編 本論二 衰弱的種因

第八章 殷周由質趨文之漸

第九章 周公注重文治

第十章 孔孟表彰文治的儒學

第十一章 秦代政治不能適應民族當前的要求

第十二章 漢初君臣無發展民族的企圖

第十三章 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

第十四章 漢以後的政治使英才短氣民族意識銷沉

第十五章 武帝以後的儒者在高度鎮壓之下實踐半面孔學恪盡臣節

第十六章 由魏晉及唐佛老二氏乘政治的昏亂導思想於消極

第十七章 環境歷史造成民族的儉安固閉

目錄

目錄

第十八章 民族氣質日趨浮薄

第四編 本論三 弱點的暴露

第十九章 對異族忍受可恥的女性同化

第二十章 異族入化人口受嚴重的壓迫

第二十一章 對異族忍受悲痛的屈辱

第二十二章 學術思想與時代的不適失却民族彈性

第五編 本論四 華族生命的絕續

第二十三章 今日世界大勢與春秋戰國的不同性與相同性

第二十四章 歷史遺傳的滅亡性

第二十五章 舶來加重的滅亡性

第二十六章 最近以前政治造成的滅亡性

第二十七章 帝國主義不斷的進攻

第二十八章 在錯誤政策經濟極度不平均之下內亂繼續不斷

第二十九章 共黨對國癩分析不清手段錯誤

第三十章 最近以前的政府不能担起重大的責任爲人民求出路

第三十一章 在內爭狀態中人口必然地減少

第六編 結論

第一章 三種滅亡性的實現性

第二章 一九三五—六年國內形勢演變的推測

第三章 二次世界大戰中國的危機

第四章 國民政府對二次世界大戰的適應性

第五章 蘇維埃政府對二次世界大戰的適應性

目錄

目錄

第六章 國民政府與東北四省

第七章 中國革命與蘇俄

第八章 孔仲尼與馬克斯

第九章 目前的一點希望

1 國民政府自動左傾從經濟上根本改革團結應變

2 蘇維埃政府改變方針抓住民衆取得政權以應變

3 兩政府各謀進步畫疆分治依民族立場對外取同一步調

第七編 附論

第一章 極端論與中性論

第二章 戰爭與和平

第三章 戰鬥力和財富

- 第四章 前進與生存
- 第五章 革命路線的直線進行與曲線進行
- 第六章 非正義的不合作與正義的合作
- 第七章 時空交會綫上的政治對策
- 第八章 資財與人生

附刊

中國國是路線形勢圖

關於華族生存絕滅的三公式

目錄

條例

本書構成的基本條件

- 一 本中山民族主義的立場顯乎民族生存的正軌作本書的骨幹
- 二 指出羸秦以後政治一貫的錯誤喚 民族迷夢求真理的實現
- 三 救民族以改革政治基礎之經濟為先決條件來改善經濟現狀的不平衡
- 四 當權者對目前政治傾向的是非而是民族存亡的關鍵「天下為公則存反之則亡」
- 五 認華族重視經濟忽略政治是歷史上失掉政權的因子捨舟徒涉非常危險
- 六 日本整個吞滅中國是要銷鎔華族特性自他同化企圖永遠相安無事非蒙古滿清可比
- 七 華族早中消極自由主義「揚宏學末流」的割滲常用與墨學一體的共產主義為消毒劑
- 八 用共產主義消毒是手段不是歸結消毒作用正負相消即是儒學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的秘訣
- 九 根據新唯物論的哲理以存在與思維統一救華族的蹈空以矛盾對立統一堆雜族使進步
- 十 熔合馬克斯及孔墨學理於一爐以樹起世界革命的中樞勢力
- 十一 用政治力量改造社會經濟力量改造人心打成一片完成救國工作
- 十二 本書專論延長民族生命所趨方向之是非一切辦法毫不涉及原來國是不定一切辦法都是無用

華族生命論

第一編 緒論

第一章 個人求生慾的衝動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國難國難的聲音，不斷打入人們的耳膜，這時個人方在大夢未醒，忽被這牽連不斷嘶喊的聲音叫醒了。俗話說得好，螻蟻尚且貪生，況人類是高等動物，智識最爲充分，知道生命與身體的關係最爲密切，不消說，尤其怕死。所以個人在這三年期間，爲怕死的觀念所驅迫，開始檢查所謂國難的事實，前索國難的起源；現測國難的深度，後推國難的將來，原始要終，方知道目前因九一八事變所造成的國難，不過本民族身上痼疾暴露之一方面，其他尚在蓋藏中間，潛伏他日滅亡的因子不知凡幾，若在這個地方不細加辨別，——尤其是民族領袖該認清白——妄投方餌，便有庸醫殺人的危險。此處除開國難的起源，及國難的將來，留在本論中去敘述，本章只就國難

緒論 一個人求生慾的衝動

573.07
815
2



的深度及現狀，略述一二，以明個人求生慾的衝動，不是一個杞人的憂天吧。

日本在三年前九月十八日，由本莊繁領兵向遼瀋進攻。這不是一樁倉卒的事。這是日本人對於中華民族所有的歷史，學術，政治，風俗，有整個澈底的研究。知政府與人民心理的動向，及上下互相維繫的程度。與一般捍衛民族生命的精神，無一不了然在心，不必用兵相加，早已決成敗於指掌。這不是日本當局的才智過人，實本民族有罅隙可乘，被日本當局識破了的原故。昔班超以三十六人橫行西域，王夫之以爲直戲焉而已。因西域之民柔懦而散漫，不堪漢兵的一擊，班超知之，故悍然不顧以出於此，本莊繁不
是師班超之故智的吧？

自辛亥革命以來，幾無歲不有戰爭，北方軍閥，才德固屬有限，本身沒有能力統御全國。人民固是苦於兵革，然尚不若北伐以後七八年來的利害。革命軍自從廣東出發以來，不數月遂佔領長江流域，這個時候，人民望治之心甚切，凡是革命軍所經過的地域，當地人民都簞食壺漿前去歡迎。後來打到北平，中間發生濟南慘案，那種軍隊的聲光

，也就漸漸不爲人民所信賴。越往後走，這革命軍的統一全國勢力，也就漸漸維持不住。因爲革命方針轉向錯誤方面，精神上就不免帶了病癥。內部分子就開始從離心力的方向移動起來，磨績就是南京政府對李白的戰爭，對馮閻的戰爭，都是極搏鬥的能事，損失民族國家的元氣不少。這時候統一的形勢尙未完成，在湘鄂皖贛的共黨，早已開始活動，直至廿四年，勞師百萬，未能平定。民力疲於餉款的供給，彈藥耗於兄弟的鬪牆，古代聖賢「文以治內，武以禦外，有仁德者乃有文治，以義斷者乃有武功。民國自曹錕受任總統以來，吳佩孚首先倡言武力統一。後來無識的人們，競相倣效，甚至小小的一省，亦瀰漫着此種口號，這個就是證明全中國領土以內，當權的人們都是武人，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大不幸。用武力來對內，便見得文治的不足，就是不仁，以柔媚來對外，便見得勇敢的不足，就是不義，不仁不義，他們的生命且將不保，怎能來替人民造福呢。尤有進者，內亂的開始，必由於利益分配的不均，大學篤說：「國治而後天下平」，這平字含義甚深。大學是造民族領袖的學問，果能正心誠意，便能修己安人，在上的人

們不挾勢以奪平民的錢財，則貧富的差別無幾，何從有內亂來，國有內亂，都因為國政的不綱，任在位的人朘削小民以成富厚，——工商資本又何常莫有政權的憑藉——使頓知權勢的可貴。在手握兵權的人們一旦身受調遣，便公然抗命，這種內亂可說是政權的分裂。○又因苛捐雜稅，民不堪命，一經煽惑，羣起反抗，這種內亂，可說是人民謀生的掙扎。○前者可抽他釜底的薪，後者可救其垂斃的命，都可不折一矢便告無事的呢。

今日民族內部階級對立的尖銳化，便可證明他們各地却民族固有潛伏在儒學裏面的正義。○依錯誤的見解，各向楊朱為我利害不同的兩個反對方向走去，在地盤上拚個你死我活。簡直是聚精會神，目不旁瞬的在爭鬥，甘為鵝蚌，不忌漁人，都以為只要鎮服了他方，則外患不難平定。○明末馬士英阮大鍼他們對付左良玉何嘗不是如此，結果使多爾袞得到南下的絕好機會。○前車之覆，後車之鑒。揚州十日，嘉定屠城，這就是個人求生慾衝動的大原因。

這時候坐擁厚貲地如軍閥貪官汚吏買辦階級的人們，因他自身廣蓄金錢的關係，衍

彷彿看得亡國的事並不重要，板過臉來看見反對多產階級的人們，倒是極可討厭的。甚至有軍閥說：『我們內部剷除共匪，就是國際戰爭』，把自己的同胞看成仇敵，這種鴟梟似的眼光，虎狼似的腸肺，是何等的進步呀！可惜是基於個人利益來談話，不覺得就把整個的民族割裂成兩橛了。這些人們既坐擁厚貲，認現刻的內戰為國際戰爭，——是少數人們——是民族國家根本就不存在。依這種見解來推測他們的心理，恐怕造成九一八事變擁護資產階級的日本政府不是他們的仇人，轉成為他們的好友了。這樣的國難，怎麼不被他們漠視呢。他們轉變而為漢奸，不是一樁不可能的事。

掉轉來看苛捐雜稅壓迫下的人民，救死猶恐不足，誰肯拚死來擁護此不能保障人民生命權益的國家，自甘受此殘酷無情的枷鎖呢！資產家不知有國，平民們又不肯愛國，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軍閥貪官污吏的坐擁厚貲，監守自盜，失掉國人的同情，誰實為之，九一八事變日本不過趁風揚帆罷了，這又是求生慾衝動的另一種原因。

綜合以上諸種因，照着目前的政治路線硬幹下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個人想在這國難當中，爲民族和個人找下一條生路，因此外覘世界的趨勢；內檢政府的設施；上溯歷史的遺傳；旁求社會的病痛，經十數月先後的邏輯，以來完成個人向本民族的一點供獻。至或當或否，這是要求讀者加以切實的批判，方不至誤已誤人的。

第二章 個人與民族

人類爲有理性動物，亦即爲有秩序的合羣動物，因血統、風俗、語言、文字、習慣、各種的因素合而爲羣，由政治作用完成其爲羣的組織。自其外形而言，謂之國家；從他一羣對峙此一羣而加以區別，謂之一民族。個人的地位包括在一羣的當中，個人的生命即寄生在一民族的內部，所以個人與一民族有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民族好像一張皮，個人好像一根毛，左氏傳說：『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所以欲謀個人的生存，須先謀民族的生存，只要明白此理，就肯犧牲一己來爲民爭生存了。一方既取得民族的同情，一方却是盡個人的責任，如果能將外寇擊退，民族賴以保全，個人却是蒙其幸福不少，即

使因此受了犧牲，須知民族既有滅亡的徵兆，一己未必獨能得到生存，慷慨捐軀，更有甚麼遺憾。一個人如此，個個人都如此，這種犧牲精神，確是可以寒敵人的胆，當此民族危急的時候，急須喚起民族這種精神，趕快從教育下手，猶嫌緩不濟急。最好是由握着政權居指導地位的人們，與以事實的昭示，先行爲民族生存作整個的計劃，多拔才能特出之士以豫備作民族的後勁。首先由居指導地位的人們不惜生命，不愛錢財，與外寇作殊死鬥，以刺激民族的精神，全民族必然的要起強烈的興奮以相應和，必到如此地步，民氣乃可運用。如果以爲本民族戰爭工具準備不夠，恐怕領袖們拚了命後得不到相當的代價，以此心存畏縮，作忍辱遷就的企圖，始終丟不了倚賴他人，或犧牲他人的下策。於是民族憤懣的熱情，轉瞬間變爲消極的置國事於不問，散漫的以爲未可如何，充滿着坐以待斃的衷情。這是居領袖地位的人們，不明白個人身分地位與民族的關係，引導整個民族往錯誤方面去的現象。

凡屬於某一個民族的人民，須知道一個民族國家興亡的責任，固是一個民族的人民

共同担負。但就內部組織來說，上自元首，下至平民，其責任之輕重，當由上至下依次而定。其負責愈重的，其犧牲義務亦愈重，負責較輕的，其犧牲義務亦較輕，倘與敵人鬥爭其領袖之幸而不死，得目視其事業成功的，實有天幸。萬萬不許由領袖個人拋開民族，為本身的利益自行打算的。如果挾持一片私心，以自身的生命和功名富貴為前提，充滿了卑怯的情緒，犧牲他人來成全自己，或苟免禍難以驚瓦全，不復知有民族付託的重任。結果身敗名裂，一事無成，民族前途因之益形黯淡，這個黯淡的重要原因，即是在人民心理上起了反應。須要曉得一般人心的感應，無不捷於桴鼓，上思避難，則平民直欲藏形，上不衛國則平民直欲事仇，上溺職以使私，轉欲平民之親上死長，這是斷然得不到的情事。論語上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禮記上說：「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都是例證上古為元首的以德化民成俗，今日居革命領袖地位的尤不得不如此。

歐洲自由主義的國家，在他們紳士的眼目中，以為居領袖地位的，不必正身率下以德化民，人人個個地位平等。因此握着一個實權的人們，自然是要仗國家的權力以便私

圖的。換句話說，這種學說即是爲徹底自利的人們撐腰，即是我們目前社會上的畸形資本主義發展的根由。這種錯誤認識，在歐州已伏下不可救治的，而是必須改革的大病根。我們政府要人怎麼不加體認，一味盲從，把他人所患的病拿來自家害呢。對於孔孟修己安人的學理，不知深思力行，反轉拾他人的唾餘來召紛崩離析的禍亂，自家未免太鹵莽一點了罷！

昔黃梨洲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此語固是不錯的。但這是就匹夫身分講的，居民族領袖地位的人，是不能拿這句話來推担子，並且不能這樣存心的。領袖們既經收拾整個民族存亡的責任放在自家肩頭上，就該勇往前進，並要出死力來築起保障的，必如此方不負民族所付與的地位。其餘各個人之與民族，應各就其地位以盡其當然的責任，平民如此，在職要人猶不得不如此。

第三章 民族的形成

初民時代不知道有所謂民族，同此草衣木食的外形，同此獠獠狃狃的氣象，思想甚

爲簡單·言語甚爲幼稚，往來交際的事情實所罕見。外形上看不出有什麼差異的特點·精神上亦不覺有甚麼貴賤的分別，其時交通不便，有老死腳迹不出鄉里的可能。只知同具圓顛方趾同具兩手兩腳，同是裸體無毛·同是直立能言，在初民心目中，不能強有不同的區別。後來年代愈久，此一地方與彼一地方的人們，各向不同的方向發展，各就本地方的男女以爲婚配而血統異，各就本地方語言以爲孳孕而語言異，各就本地方水土之所生產氣候之所驅策以爲生活而習慣異，就血統語言習慣三種的不同以時相劇切的結果，風俗亦難望有相似的地方。由這種情勢一推起來，這由語言所形成的文字，也必然的不同。世界無數的民族，在這種情形底下，各就相異的特點，極端發展，直至近代必然的愈去愈遠。——目前交通便利，文化交流的條件除外——一旦兩民族勢力猝然相遇，各倚其不同的見解以爲利害，勢必互相衝突，這民族的形式就在此時認識出來了。如果衝突以後勝負兩歧這民族的意識必然深刻化，由此相激相盪，日積月累，在此民族與彼民族的中間·天然的掘了一道鴻溝。譬如黑之與白，色澤分明，這民族的形式就此永遠立成

了。

第四章 民族盛衰的原理

一民族的興盛，自有其所以致盛的根由，一民族的衰滅，亦有其所以致衰的定理。只要人們用心探討，莫有不能得到其中蘊奧的，據一般學者所論定，大抵社會的經濟組織優良，生產工具的分配平均，生產機會的運用適當，一般人民的生活安定，他便不必時刻以饑凍爲憂，他們的精神自然暢旺，局度自然弘闊，氣象自然蓬勃，思想寄在維持生命條件以外，必能使學術勃興，文化邁進。有才智的人們，由孕育甄陶，漸次造到敦龐偉大的地步。中材的人們，亦可潛移默化能夠擔負干城的责任。在前周代的文王，能夠量能授官，因材任事，詩人以「視彼樸棫，或薪或楨」來喻他，使物能效其用，地上便無棄材，人各盡其長，國家便無遺佚。禮記上說：「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當權然的聖人，能使人物各適其本然之性，所以天清地寧，海內無事。詩經上又說：「焉

飛反天，魚躍於淵，」可見只要不阻礙天地的生成，萬物便自然鼓舞。當國的人們，果能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便是不阻礙天地的生成。果能政治修明，國人誰不欲獻身自効，正不必日日召集國人孜孜教誨，致失教育常軌而徒事饒舌了。圖治的動機本是如此，這就是民族所以馴致興盛的大原因。

如果不是這樣，而是由圖私己的人們，高據要津，倚權仗力來破壞比較平衡的經濟組織，或對於不平衡的經濟組織與以擁護。因這少數的軍閥或貪官污吏奸民以不正的掠奪行爲，致使社會貧富懸殊，釀成偏枯的現象。眼見坐擁厚貲的人們日肆驕奢淫佚，四體不勤，放蕩心志，習染既久，視爲當然。只知對着作農作工的人們，施行豪奪巧取的手段，享受超越水平的衣食住行的一切物質，絕不知道有所謂抗敵死難，捍衛民族生命這一件事。這樣的不知務民之義，便是一個社會的賊民，便是構成亡國事實的重要因素。掉轉頭來看廣大的勞苦羣衆，他們賣盡氣力，終日不得一飽。這種孳孳爲利，岌岌不安的情狀，已經牢鎖着他們的心志，圍困着他們的精神。他們的思想，始終不出於尋

求他援的範圍，不知有所謂精神事業，更不暇計及民族前途。從他們心目中來看民族的盛衰存亡，好比古人說：「越人視秦人的肥瘠」總是漠然不肯關上心來的。因為他們救死猶恐不足，不擁護這種政治組織的國家，這是不能深怪他們的。一個民族中間，分別構成兩種不同的對立觀念，無形間便把整個民族分作了兩個集團，這是政治首領要負相當責任的。因為他不知道國內人民生活應有一個水平，他便負不起治平的使命。一旦民族的利害發生，各個集團便各依立場來向這事實估量。結果總是各集團的利害不同，策畫各異，少有共通的目的地。不是放棄職權，便是相禁相制，在此對立期間，一方如果抗敵，則他方便直接或間接的成爲漢奸，與異族以可乘之隙，一切藩籬結構，任人摧毀，這就是民族衰弱的最大原因。

第五章 民族學術與民族生命

一民族能在一定地域之上戰勝異族，能保持長時間的生存，發揚他們較高的文化，

享受他們安慰的生活，這必然的是要有適應的學術來調整他們的思想，統馭他們的精神。對內部的一切建設，賴此學術以爲之指導。凡與人民生命有關的事實和政令，無不仗此學術以爲之撐持，使民族國家的基礎益臻鞏固。如遇到外來侵略的敵人，必本此學術自求生存の至理，團結一致，盡力抵抗。當此國難嚴重期間，如平日莫有學術來開啓他們民族生存的智識，急時是不能靠用的。因此我們知道一民族的學術，所以捍衛一民族的生存，學術而不出脚於民族自身之生存，不足以當民族學術。昔法人柏格森的哲學，主張存在與思維統一，如人們皆有生命，其最合理的思維，乃在用如何方法去保障自身的生命。我國孫中山創民族主義，用意尤爲明顯。不過一種學術，在其民族上的價值，要看牠對於民族生存上所發生的效果大小和久暫，已往的成事，這是不難於考究的。若是一種新發明的學術，或新綜合的學術，人們欲爲之估定價值，只要看他對於本民族歷史的邏輯，與現刻世界事理的邏輯，是不是合於辦證法的罷了。人們爲個人與民族的生存來創造學術，牠的最終目的，是要使民族中的各個人都完成其能生存於現世界的人格，

即是保留其民族歷史留下的特長，採取適合於現代環境個人謀生及維持民族生命的手段。○根本說來，一民族的學術所負的使命，是直接捍衛民族的生存，間接推動人類的進化。○這地球上面，此民族與彼民族之間，既各有學術鼓勵他們的生存競爭，必然有個優勝劣敗逃不脫的公例。○敗的民族必圖再度起來求勝，必思有以致勝的理由，文化學術乃因此爲之更進一級。

人類文化既因競爭日有進步，這原來推動社會進化的原動力的學術，是否仍繼續發生其相當效力，在此頗有可以估計的價值。○這譬如發矢的弓，這矢既因力的推動離弦而前進，人們如再欲將矢搭上弦來，這弦就有更張的必要，不過弦的更張，較之初次無大出入罷了。○學術的情形，在這點上就大不同。○因爲前一時代的學術，多少含得有些時間性，時間轉移，世界形勢與人心風俗往往都有變遷。○人們如欲使其民族的學術有延續性，就須得有由學術當中培養特出的人材。來修改學術，如雞之孵卵一樣，雖雞既破殼而出，又將從事於卵之生產，如此迭相推進，至於無窮。○且在每一代當中皆能運用牠們進

化的方法，來暢達牠們進化的氣機。與每一民族中由學術培養所出的特出的人材，與其民族特種的學術互相推演，理由恰正相似。

由此可知一民族最重要的學術，雖效能足以維護一民族的生存，然究不是一成不變，且有隨時修正的必要。無論創造學術的人，品格如何，即使十二萬分值得我們崇拜，究不能說因崇拜其人，連其學術一句也不敢修改。反過來說，正爲要修改此等人的學術，使牠有適應性，這種學術方能繼續維護民族的生命，使牠的學術能夠長存，即是使牠的聲譽能夠長保，如此方是善用民族的學術而且是善保民族的學術了。

第六章 民族須有強固組織的國家

一民族的生存，根源於一民族政治經濟兩方面的動向，這種動向，如能適合於現世界的趨勢，這民族就大大有發展的希望。因爲這個原故，所以一民族的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必握在一民族內的領袖人物的手中，來決定政治與經濟兩方面的動向，以企圖民

族的生存。欲政治權力經濟權力的集中，必外具國家的形勢，內有強固的組織，使國家如一部機構，馬力一動，就全身速轉，如人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不許有一部分停滯。如此爲民族領袖的人們，方能見得到做得出鞭策一族人走上競爭生存的正軌。不過在這末能有強固組織國家之先，爲民族領袖的人們，應有絜矩之道，以團結民族的精神。如此一層缺乏，欲國家有強固的組織，恐是徒託空言，其要義當於下章詳爲論述，此着是領袖們應該早明白的。

如果一民族無領袖人材。不能組織強固的國家，一切政治經濟等相繼落在他族人的手中。即是一民族失掉了民族生命捍衛的武器，這樣太阿倒持就有任人宰割的危險。華族前此之累次失掉政權於北族，至今猶能保持民族生命者，一因經濟權尙未失落，一因北族人不知使用政治權來掠奪經濟權——因學術勢力轉能侵入北族人的精神界使然。這以往的事實是不能爲例以揆將來的。——當於第五編詳論之——近代進化民族，不惟能充分利用政治權來侵略經濟權。有時且利用經濟權來掠奪政治權。深知政治與經濟二者如輔

車相依，故帝國主義者無往不表現其雙管齊下之手段，有時且利用其文化的侵略，在這樣一種惡劣情勢之下，這種捍衛民族的武器政治和經濟，怎能寄託在他族人的手中呢。

領袖們握這政治經濟的大權，用來保障和擴充全民族的利益，則思想自然一致，精神自然團結，上下脈絡貫通，強固組織的前提既具，國家的基礎可謂穩如磐石。內部既無反側可言，一遇外侮，必然能同心協力，共作民族的干城。不消說政治的大權，斷然不許他族侵犯，即經濟的大權，亦不容許他族人來染指。以出類拔萃的領袖，來運用這個金甌無缺的國家權力，便不難與世界最強大的民族並駕齊驅了。

第七章 民族須有人民愛戴的領袖

一民族的領袖，應該為一民族的學術所養成，前節剛才說過。但有養成領袖的學術，領袖便可出世嗎。人們便可依據歷史的教訓回答道，那是靠不住的。因為一民族的學術，只能養成民族領袖個人的品格與技能，使其伏處草茅，才美不外見，有雖知其行詣

而敬慕之，即或有一二朋從相與講習，其聲聞實不出於閭里，聲光所播之區域既有限，人民之注視所不及，一旦國家有大問題發生，縱有具領袖的品格技能的人們，提出解決的方法，安能得數十百萬人有力的擁護，使這種主張獲得實現呢。個人以為徒有領袖之品格和技能，不能於政治方面得到培養的機會，這民族領袖是不容易實現的。所以一民族在專制君主政體的底下，不惟得不到良好領袖。簡直可說是無領袖，專制君主原是一貫的自利主義，得不到人民的同情，自不待說。假如有有品格和技能的人們在這專制政體底下，對於政治有所主張，得到數十百萬人的擁護以求其實現。但與君主的利益相衝突。彼自利的君主對於此具有民族領袖的品格和技能的人們，又怎能相容呢。結果總是將他殺掉，或是把他驅逐出境，因此便失掉了造成領袖的機會。

從這樣看來，一民族當中要養成這一類的領袖人材，就須得先要改善一民族的政治觀念。根本上一民族的政治，不許為少數人或一二人所利用，如或遇着這種竊權弄柄假公營私的人們，就要全民族一致起來將他打倒，以免伏下君主專制的禍根。一面把政治

向開明的方向推動，使民族國家定下一個國是，全國人民知有所謂正誼。這樣一來有才智品格的人們，對國家政治始能在正當範圍內從事活動，方不受暴力的侵害。倘把握政權者所有的主張不背於人民的利益，抑或依據於人民的利益，必能得到人民的愛戴，領袖的資格乃得以逐漸形成。以人民愛戴的領袖來領導人民，人民必爲之踴躍爭趨，這民族的精神，就這樣表現出來了。

假使民族的前途，不能得到這樣一個前進的步驟，專制政體的積習不能掃除，就應該單憑個人的品格和技能來擔負民族領袖的使命。便要乘政治的罅隙，號召廣大受壓迫的民衆，領導他們來推翻現政府，這就叫做革命領袖，但此在領袖養成常軌之外呢！

人們於此更有當注意的，就是爲領袖所必具之條件，就領袖本身來說，他應有最高尚的品格和技能，就他表現的設施來說，他應站在世界動向的最前線，擁護全民的利益。換句話來說，爲領袖的人們，他應有春生長養沛然溥利之仁，應有周知萬物如日月照臨之智，應有任重致遠百折不撓之勇，其爲言也誠懇爽直，其爲行也磊落光明，一個

民族領袖，如果具備此種條件，人們就緊緊跟着牠的後面，一致擁護牠的政策，向世界狂瀾當中推挽。反過來說，一個居領袖地位的人們，言不爽直，行不光明，言不願行，行不願言，必然懷奸挾詐，別具私圖，將全民的利益置之腦後，讓價也是讓他個人利益站在前頭，全民利益放在第二步或第三步的，要想他顛倒步驟來犧牲他自己一點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們眼見這種情形，不禁忿懣，便喊出咒罵的聲音來，這是儘可不必的。要知道我們民族社會的錯覺，每看到人家子弟得到達官顯宦，往往以為他們的祖宗積有陰德，因此後人纔能發福。社會既認他的達官顯宦是福，他怎麼不將他個人的利益牢牢握住，提前大享其福呢！。結果人民應得點此項的利益，都被他們不客氣的奪去享受了，拿這樣的社會觀念來鑄成他個人的人格，他的寇至則先去以違民望，寇退則返，這種不肯犧牲，蕭然事外的辦法，與他怯於公職，必然的勇於私門的情緒，有什麼可怪呢！。人們但須從旁認清，幸勿為階級利益而挺身擁護其庇已者的人們所麻醉，久之涇渭自分，偽領袖的行爲，自然不能淆混人們的耳目了。

第八章 人民須有民族歷史的認識

一民族的形成，必經過許多時日，其間應有的蕃息，發展，鬥爭，同化，以及一切人事的演變，都有可以記述的價值。一切興衰成敗，不妨留作將來的借鑒，經過長期的歷史當中，人們之絞腦漿動四體，以求達其生存的目的，後來竟獲得如願相償的結果。必其才力方法有為其他人們所不及的地方，一人倡之，衆人和之，全民族竟因以獲得生存。人們能用其所長避其所短，非知道增其所不能，以求達他們惟一的目的。——生存——其他關於衣食住行自身享受的條件，在可能範圍內加以縮減，這種擇別大小輕重的技能，就物競天擇方面來說，這是何等的聰明啊！這種前期的歷史，是值得人們回憶的。

但是無論何族人的歷史，都是有兩方面的，有盛就必有衰，有強就必有弱，有成就必有敗，這種由盛而轉到衰，由強而轉到弱，圖成而反得敗，這種過程中間，必然包含着當局人們分析事理的不精澈，與處理方法的錯誤，或避免不了這時代的必然性。人

們明知牠衰弱敗的來源，便可拿當時的歷史來下細分析，探得當時民族內部的趨勢，與民族外部的環境，及當局個人的立場，使知他用意的所在，與其所以致舛的由來。更推其致舛以後因果的關係，這種致舛的事實，在當時有無較良好的方法避免，這種邏輯，都是可以借來作人們教訓的。又搜求人們既受此衰弱敗在國力上受重大打擊的教訓，爲何委靡如故，這種病根究潛伏在那裏，這也是值得人們考慮的。

又民族在一定地域以內，與四週的異民族接觸，彼此強弱的形勢，因世代的不同，相互變遷。這種變遷的原因，在民族本身應有澈底的研究，前面早已說明。即異民族所以或強或弱的原由，與兩民族相遇一勝一敗的原由，這些都應該作具體的研究，與詳細的分析，以資人們身處現代底借鑒的。

一民族的歷史，人們因血統關係，對他有相當的認識。因欲保持這種血統純一的長存，就不得不把民族精神的優點，與歷史留下的長策，歸納攏來，更滲以新近的方法和學理，由民族中的個人或團體間來運用和表現。這民族的文化，在現世界必然能放異彩。

，民族的精神因以煥發，如此又怎能說不適生存呢！

第九章 人民須有世界大勢的認識

在甲乙二星球未有方法相往還的時代，人類便以一星球爲一世界，這一世界當中，洲域的形勢，海洋的間阻，人種的龐雜，語言風俗的互異，政治學術的差別，無在不表現世界的錯雜紛歧。我相信在中古時代的交通方法，傳甲洲人類的風俗習慣，到乙洲人們的耳鼓，必然的要疑爲是一種神話。近世因輪船鐵路飛機的運送，竟自把若大個地球，縮小了數十百倍。因爲這個原故，其間物產的交易，文化的互輸，異種的雜居，政治的侵略，沒有把世界上龐雜紛歧的現象，化異爲同的趨勢。不消說這種趨勢，是高度文化向低度文化的壓迫，強國勢力向弱國境土的侵略，列強特有鐵路輪船飛機等交通工具，以爲擴充勢力的基礎。大概鐵路輪船飛機所能到達的地方，便是列強民族腳跡所踐履的地方。如果當地文化不能捍衛其民族的生存，那麼當地人民就有被征服，蜷縮蟻伏日

就消滅的危險。這是因為輪船鐵路飛機等是供強權的運用。弱小民族是得不到甚麼利益的。世間有一類蠢見的人們，不知道建國的原理，要先安定人民的生活，來團結人民的精神，上下一致，來鞏固民族政治地盤的基礎，偏要用他們市僧般的見解，來捉着列強的尾巴，望把自家拔出深坑，挽向康莊大道上去。他們不知道如果捉着老虎尾巴，就有被咬噬的危險，如果捉着鼠子尾巴，就有斷而復墜的危險，這都是對於世界大勢認識不清的原故。

現在世界既有這樣交通工具，來作列強壓迫和侵略弱小的武器。自然在弱小民族的頸項上，無形間加上一條鐵鏈子。不消說，這制約的權，是握在列強手裏的，這種情勢，向後走是一天趕一天嚴重的，終結是要消滅這些弱小民族在世界上的腳迹和他們的影子。一個弱小民族，如果明白這種趨勢，便該大胆起來將這條鐵鏈子制約的權奪過自家手中來，作個負隅的虎，向獵人拚個你死我活，或者尚有出阱而逃的一日。萬不要像那些蠢笨畏死的人們，甘作一個屠門拴着的羊，跟作屠者走進殺房裏，向屠者婉轉哀鳴。

求貸一死，縱悽慘到兩淚交流，奈屠者們總貪着羊身上肥美的肉，與夫可作原料的皮和角，終不免將屠刀向羊的項下一捺。試想這無謂的哀鳴，究有何益，我想人雖至愚，必不甘爲俎上之肉，這個道理很是明白。不過要看本民族中，有無代表全民利益的領袖，如果有相當的領袖，不難一致奮起作最後的掙紮，倘是無相當的領袖，或有領袖而出賣全民利益，甘作出賣羊羣於屠門的羊主，便當盡力抓擊，以掃清前塗的障礙。障礙既除，然後團結一致，與敵人作殊死鬥，效往昔斯巴達人之對抗波斯，以三百人殺戮波斯七萬之衆，縱然使人類絕迹，天地黯慘，亦當不顧。因侵略者以殘暴橫加，本民族爲爭生存而奮鬥，我直彼曲，還有甚麼可怕嗎？

這樣看來，人們的勇敢怯懦、全在人們對於世界大勢有無相當的認識，所以這種認識，在民族中各個人是不可少的。

第十章 民族須具歷史學術的精神對抗世界

民族形成的過程，在本編第三章已詳爲論及，既有一定的過程，當然有遺留下的歷史，且有不少的方法，爲我們當前生存的要素。這些方法，雖有時因時代的過去，減少牠的效力。但是有些部分，仍然保留着相當的適應性，這種前輩人絞腦漿勤四體所傳下的民族遺產，我們當後輩人的，應該重視，但不可呆板執一，刻舟求劍罷了。惟是這種事體重大，此處姑且將學術提開別論。茲單就歷史一項來說，人們既欲對於本民族歷史有所選揀，那就應該對歷史的產物，眼前的風俗人心，有澈底的研究，務知其對於現世代的適應性與消滅性。然後來分道溯源，整個的研究我們過往的歷史，看這些智識方法的來源，有無中途發生的錯誤，本源上是否伏下病根，這種錯誤病根，是否有良好的方法來加以改正。至於優越的部分，在今日是否有良好的方法加強其適應性，這種工作，豈是心有偏蔽，無卓識遠見的人們所能勝任的嗎？

更就學術一方面來說。一個有數千年歷史的民族，自然有牠支柱社會的學術，牠的演變必然的非常繁複，與牠對待而起的分道揚鑣的學術，亦必五花八門。現在要來重行

估定牠們的價值，那就有分頭整理的必要。但必先行看明時代的需要，然後才來加以分析揀選，融會貫通，務使成爲民族間相互戰鬥擅長制勝惟一的武器。這須要閱模壯規，深思熟慮，非率爾操觚的人們所能勝任的。

一民族如能利用他們歷史的優點，與學術的特長，來發展民族的精神。如遇弱小民族，不惟於本民族的形勢性質無損，且有使自他同化的可能。即使遇強大民族，有時自身受到嚴重的壓迫，只要能保持歷史和學術兩方面的優點來相對抗。斷不至被他同化，或屈辱於人。這樣一來，對於民族生命的維護，才有重要意義呢！

第十一章 華族政治歷史的分期

本民族的得名，大概在秦以前，因以別於異族，故自稱爲華夏。——義卽華族，連以夏字；不過形容華族之大，異於他族，——在漢以後，因以虛驕之武功，異民族之欲自我相別，故因我國號以稱我民族曰漢族。是華族的得名較早，其含義較爲妥當普遍，且與漢族稱謂有自他自我之別。以典章文物，乃民族的英華，方之橫野無文的民族，固自不

同，以此爲名，於義較愜。不似漢字的意義，限於一水與一地，不過劉邦眷戀其就封之國，遂因而爲統一以後的國號罷了。含義狹小、實不足以代表全民族呢！。

華族自庖犧氏而後，據編年所紀，迄於今日已歷六千餘載。歷史的悠久，世界上實罕其比。今將全部歷史，依時代的界限，可劃分爲六期，以表明民族勢力的昇降，茲爲分列如次。

1. 演進期 自庖犧氏至於帝摯——堯兄——紀年二千一百有奇。在本期的前期，即屬初民生活，在本期當中，係由游牧生活進入農耕生活。當時人們發明有益於生活的用具和方法不少，此處不能屈指具陳，凡少有歷史知識的人們無不知道。因本期中人們的活動範圍一致的向着基本生活邁進，故其德純，其行實，備具了人類競爭生存的條件，藉着向未來時代演進，以故定名爲演進期。

2. 大同期 堯舜二帝共在位一百五十年，視天子之位爲天下之公器，要有能領導人民才德兼備的領袖，方能稱其職，勝其任，故避免了傳子的先例，來簡舉賢能，政尙

開明，使賢能各有展布其才的機會，因之事無不舉。書經上說：「六府三事允治」，照道理說來，是儘有可能的。民生厚而德正，乃是理有固然，所以書經上又說：「黎民於變時雍」。此孟子所謂菽粟如水火，人民便自然生其仁愛的內心，決然無有此疆爾界的爭執，以故定名為大同期。

3. 小康期 自夏禹受禪及犬戎滅周，紀年一千四百有奇。在此期當中，雖然將天子之位視爲一姓的私有物，但是二帝的遺制，猶被保留，取民的制度，總以什分取一爲標準。加之賢聖之君相繼迭出，因之治日多而亂日少，弔民伐罪，時有所聞，連不到平民起來革命，縱有桀紂的暴虐，恐人民所受的害，皆不如後世的甚。據史書所稱象箸玉杯肉林酒池的事實，便可斷定其虐民的程度。是在此時期的人們，實在小康狀態的當中，以此名之曰小康期。

4. 戰爭期 由平王東遷及於周末，紀年五百有奇，前期春秋時代計二百四十二年，雖戰爭頻仍，但不如戰國時代的劇烈，欲知這種戰爭向後加緊的原故，就要看前一時

代一般國家超基本生活的邁進，因為這個是互相掠奪火併的動機。有了這個動機，那些強大的國家，就開始向弱小國家打劫起來，爭先恐後，那種程度，就與時俱進，一直到一雄獨據的時期為止。這一時代惡戰的動機，由於小康期中人們私有觀念的逐漸深刻，由質趨文的自然趨勢，而直接導源於周初的崇尚文治。雖然，生產工具有未見突變，而超基本生活的一種文化，「禮樂政治學術等」有普及劃一的須要，所以五伯假之於前，七雄攘之於后，使人民罹於水深火熱者數百年，以此定名為戰爭期。

5. 衰退期 自秦始皇滅齊以後，到滿清時代的中日戰爭，紀年二千一百，所有興滅的正統國號計十有八，割據者無慮數十，其間所有建國的君主，都是蓋了爲子孫置廣大財產的動機，其成功的祕訣，是盜賊式的拚命，他們不是要得到民衆的擁護來做領袖的，他們只要得到民衆的不反對，由他們爲所欲爲就夠了。他們消滅羣雄的方法，就全憑他們的武力和詐術，好像鬥牛式一般的來取決勝負，人民對於他們的爭

門，好像隔岸觀火一樣。這樣一來，國君不爲人民謀出路，人民亦不與國君共休戚，每到國亡的時候，不過幾個受過豢養的路知報主的人們來死一死難。人們不惟不知過問國事，且在高壓政策的底下，亦不敢過問國事。這種儉安苟且的情志，看來是日甚一日。民族因無發展的出路，一到休養生息，使人口消費超出土地生產力以上的時候，便開始內亂，自相屠殺，來作減少人口的運動。這便是人口的增加，爲不增進的生產力所控制，這就是二千餘年內亂繼續不斷的總原因，也就是使人們精神萎靡階墮的強烈劑。所以一遇外族憑陵，只好聽他蹂躪，這種事實在本期最後的五六百年尤爲顯著，以此定名爲衰退期。

6. 徬徨期 自中日戰爭以後，政府要人始知他們本事的不夠，與方法的錯誤，一直到作者握筆的今天，——民國二十四年——計四十年有零了。不管滿清與民國，那些政府要人當中，心想避免向列強屈辱的事實，一面總想向安全舒適的方向找到一條出路來。他們總莫有看到自鴉片戰爭以後，列強向我國民拴上的枷鎖和鎗械。——不

平等條約是拶逼我國屈辱的工具——要避開這種屈辱，就要先扭脫我們身上的枷鎖和鐵械，這非用拳打腳踢，少了一場惡戰不成功的，那裏會得有安全舒適的路子來走呢。要想安全舒適，便見得他們莫有仁心濟同族，莫有智識看明利害，莫有勇氣擔任艱鉅，便不配當民族一個復興的領袖。他們好像關閉在牢籠裏的一條狗，牠終日在欄檻緣邊顛來復去的走，牠絕無衝破欄檻的勇氣，試看這四十年當中的政，不是就是這樣嗎。要知道他們何以有這樣的行動，這就是前期二千一百年當中的政權集中在一貫自利者手中的流毒。他們一想到自身的利害，就把爲民族找出路的精神減去多少了，不敢衝破欄檻，就只好在牢籠裏面，無方法的東走西竄，心想眼望的，企圖這欄檻的失火延燒燒倖得脫，因此名之曰徬徨期。

第十一章 華族在現世界的地位

要知道一民族的將來，就該先知道一民族在現世界的地位，要研究一民族如何應付

世界環境，就該先研究世界環境，究竟與一民族以怎樣的束縛。我華族在現世界上的地位，在我們未寫研究華族存亡的這個問題之先，就該來詳細的檢查一下。我們華族的人口四億七千萬，約當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土地面積四百餘萬方哩，約當全世界十二分之一，單就人口土地兩項來說，實具有左右世界的資格。加之地常溫帶，生活適宜，土壤膏腴，物產豐富，地闊為一片秋海棠葉形，整然一塊，政治學術容易灌輸，風俗習尚便於同化，又當太平洋西岸，交通便利，占世界重要位置，各種鑛脈藏量最豐，可憑之以為建設的資源。就這種種天然方面來說，華族可謂具有雄視世界的資格了。

但事有待於人為，天雖生材，必待人工的開發製造，其用始彰。如未施以人工，便等於有材而不知利用，雖擁有此天然的偉大豐富，結果總是徒然。進一步說，這些天然害滅，排列在地球上，是不能禁止旁人的覬羨和染指，只要你當地民族無有能力來擁護自身的利益，就越發招致世界偉大民族的相競以奪了。這樣一來，因這個天然害滅豐富的爭奪，便不可避免的與華族絆上了許多的繩索，這在易經上便叫做「負且乘致寇至」。

這就是說華族現在的智識能力，不配佔有此項資源，才招致列強盜竊的意念。

我華族有六千餘年的歷史，爲什麼智識低落到這步地位，不配佔有此項資源呢。其詳細當讓本論中去敘述，大概入了衰退期以來，二千餘年政治舞台上，不見有領袖人物，爲君的只知自私，爲臣的只事諂諛，君不明其爲君的職務，臣不明其爲臣的意義，君臣交誨以防人民的造亂，不知爲牛羊求救與芻，來使人民生活得到安定。待其亂而誅之，藉殺戮以爲鎮壓，政府視爲當然，學者毫未計及，人民歷久得不到出路，遂亦苟而安焉，順乎大化，以任其適然而生適然而死，這種生活，實已陷入非人狀態，這種愚懦的根性，是由苟安的政體導演而來。所以在一民族的社會當中，如果上層階級——有勢力——的人們機詐，下層階級——無勢力——的人們必然愚懦，雖欲效機詐而不能，結果成了一個畸形社會，上下兩層備具的特性，兩者不適於向世界競爭生存，這是自利的人們——英雄包括在內——領導社會必然的結果。所以在這個時期，頭腦清澈的人們，總是厭棄政治，隱居不仕。甚至到亂世末流，惡政治的影響，透入社會下層，更有遁入深山絕迹人世的

○因爲這種政治，不許有才德的人們有發展的餘地呢。這是因爲政治當局目無法紀，私心自用，流風所播，全國景從的原故，舉世皆濁，這不肯蒙世之汶汶者，就非逃入深山不可了。

現在世界經濟情形益趨紊亂，列強皆欲增拓勢力，多闢貨物銷場以渡難關。地球上所有其他弱小民族的領土，大致盡已劃入列強的勢力範圍內。僅此中國一隅的土地，尙在列強共同保護的底下，苟延殘喘。一面名爲共同保護，一面卽是任人各自侵略，偌大一箇中國，能常得起如日本九一八事變幾度的割取呢。虎之飢者必傷人，況均衡之勢已破，不復如前此之爲禁燔，加之本身失其全形，又無應付的善法，世界列強的視線，無不集注於遠東，後此的趨勢，真是令人不寒而慄呢。

本論 華族的發展

第一章 華族的由來

欲述一民族的經過，就必先述一民族的由來，華族的由來，往古學者未遑論究，近世歐洲人種學發明，始引起吾人之回憶。但索之古書，概不得有力的證據，因此衆說紛紜，其中以西來說所引的證據較爲合理。可參攷新民叢報將觀中國人種攷大抵人類的自然趨向，不外因求生慾的衝動，向比較安全舒適的地帶漸次發展，在這交通工具莫有進步的時代，決不願騰山越嶺跋涉大川來冒這種危險。以中國全境的山勢河流來說，大概都是由西至東，因此也就成了民族發展的路線了吧。

以中國西部地勢來說，在崑崙山脈以北一帶，——由新疆到甘肅——地勢比較平坦，漢代卽由此以通西域諸國，可知上古華族的東移，亦必經由此道。始循崑崙山脈，繼循黃河流域而東，既無重岡複嶺，長江天塹爲之阻絕，自然因利乘便，向水草豐美的平原，

逐漸逐漸的走將過來。且有時順著水勢，搬運尤爲便利，因此先到黃河下游的地方開始繁殖。所以華族的政蹟，都在黃河下游的兩岸，冀豫兗青四州的境域內。

崑崙山脈西接帕米爾高原，據人種學歷史家考究，這一帶地方，原是各大民族起源的地方，這樣說來，這帕米爾東麓的葱嶺一帶，無疑的爲華族的發祥地帶。後來循這一條山脈，及其發派的河流，向東追逐以至於海——這是民族發展必然的結果——這種說法，不比較妥貼可靠些嗎。

自有史以後，華族所踞地盤，東盡於海，不能再有路線向東追逐，只好以黃河南北爲中心，逐漸向附近地帶移殖，原有在黃河南北的民族，受華族的壓迫，有的向西北——獯鬻——或東北——東胡貉——退却，有的向西南——黎濮——退却或同化。——萊夷淮夷徐戎等——但直至周代春秋之世，猶見黃河兩岸華族與異族雜處的痕迹——赤狄白狄長狄陸渾之戎，都在黃河兩岸——可見強來弱去，公例難逃，倘華族不思有以抵抗強權，則人來我去，不是事理中所應有的嗎。

第二章 文化的演進

華族既由西方崑崙山麓向東移徙，達到黃河下游沖積層的沃壤，因生產力的突變，頓覺供給豐富，生活舒適，加以氣候溫和，民族精神越發暢旺。這個時候既不愁衣食的缺乏，亦尙未有災害的降臨，於是一民族中才智之士，就開始從事文化運動了。

伏羲手畫八卦，爲華族文化運動的先河，這八個圖案，原以代表吾人日常所見的八種形象。如☰☷代天地，☶☱代山澤，這是象形。如☵☲代水火，☳☱代雷風這是會意。○後世水火二字竟從☵☲二卦脫化而來，這樣說來，即以八卦爲華族文字之起源亦不過。○後世文字，不過參以直斜曲折等筆，以助其孳生蕃衍罷了。其所代八個現象當中，後世佛家之所號四大，如地水火風等皆被包含，亦即爲中國哲學鼻祖易經六十四卦所由演變的根本，不且又爲哲學的嚆矢嗎。

伏羲氏感結繩而治的不便，始把畫卦的方法，推廣來作記事物的符號，來節省人們

的腦力。轉用結繩的方法，製爲網罟，來獵取禽獸，撈取魚蝦，使人們易於獲得食料，以節省大衆的勞力，使得從事修養。

此時人們渾渾噩噩，不知紀日，不識春秋，作事要言，殊感不便，於是作甲歷以資信守，使明長老，自後人們始具時間的觀念。

初民的時候，女子和男子外形既無差別，作事莫有區分，朝夕和男子聚處一地，只有暫時的性交，沒有永久的匹偶，一旦生了孩子，男性的責任既不明確，落得推諉。這女性對於孩子的負累就不免過重，必然要發生拋棄致斃等無人道的事實，對種族前途是很危險的。伏羲氏纔爲制嫁娶以明男性的責任，使其分養育的義務以維繫種族的蕃殖。人們既作文化方面的追求，就不能不有精神上的修養，耳之於聲，其感最捷。偶結繩之兩端，可使鏗然有聲，因而製爲琴瑟的樂器，以備閒暇時娛樂的用。

五穀原爲土中雜生的草，偶爲人所發現，取其粒，知可食，每歲繁殖之，而資之以爲實驗。至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田可得耕，始教民樹藝的方法。此卽由畜牧時

代進到農耕時代的初步。

神農氏生性最喜接近自然，雖至一草一木的形狀色味香臭，無不悉心考察。因悟人身疾病，半由飲食不宜所致。農耕時代的飲食，當然以屬植物的爲多，因思以植物之異其性者治之，使起中和作用，疾病便自然消釋。這醫藥的發明，是民族強盛的一個重要關鍵。

此時雖有書契，不過如八卦的情形一樣，原是一些符號，且缺漏不備，不敷使用。軒轅氏時代，人事漸繁，有將舊有書契符號整理修正分類增補的必要。於是更爲六書以網羅天下的事物，這記載的事，從此使日增月盛了。

此時華族雖未完全脫掉畜牧生活，但已進入農耕時代，對於天氣的測驗尤爲重要。軒轅氏因此立占天官以占星日月風，更作甲子以測日月的運行，而知其節候，作蓋天及調豚以驗其節候的正失，歸餘於終以置閏，天時無失，農事自然更爲順利了。

古時觀日以知方，此種自然現象，有時總不便利。如果行人失道，而又遇着陰雨，

那就感覺困難了，軒轅氏因製指南針以示所向。

人類愈進化，日常經手過目的事物就越發繁多，有時就不能運用心記，必得想出一種方法來替代，這九章算法就從此闡明出來了。

琴瑟的聲音至微，其變化的範圍亦有限，不能滿人們聽官的慾望，於是即凡物之可以發聲者，比次以驗其音之清濁而爲之制，於是五聲八音十二律就從此生出來了。

當畜牧時代，人民衣以皮革，樸鄙不文，自徙居黃河下游以來，氣候比較溫暖，氈裘之用不多，即皮革亦有時不適，便有採取輕便物質來代替皮革的必要。有西陵氏之女嫫祖，檢察昆蟲所吐之繭絲，取其堅韌而有光澤者繅之，以爲衣服，自是人們始有禦暑蔽體的輕便衣服了。

古者人們皮冠皮服，以革爲禪，有時赤脚踏地，常患皴瘃之苦，自繭絲之利既興，布帛之用日廣，凡用不着皮革的地方，無不以布帛代之。於是人們的身體，自頂至踵，無不有衣以蔽之，使各得暢遂他們基本生活的慾望。到了這個生活程度，軒轅氏猶以爲

更須有事，於是更進而爲體制，以辨別在位者尊卑上下的等級，定冕旒的數目與衣裳的顏色、文章，始爲超基準生活以上的文物，以自別於他族。這些事物，卽是華族所以得名的根源，所謂華者卽草木所著的花，取文彩可觀的意義，這種表現，固是文明的開始，亦卽是後世種弱的根由。

參看後面本論八九十等章自明。按通鑑外紀將伊冕旒正衣裳列於教民置旒前而恐係錯誤因皮革不易着色以爲文章必布帛而後可故謹將伊冕旒正衣裳移在教民

的後面
冕旒置

凡是偉大的民族，這些人們無時無地不在憑自身的智能爲人們追求幸福，五穀此時既爲人們食料的大宗，就該想出一種簡便的方法，來使牠容易脫去粗殼，製成火熟食料，於是纔有斷木爲杵，掘地爲臼的用具。因木處而顛，土處而病，才製出上棟下宇以蔽風雨的宮室來。因人死以後，委之於壑，臭氣蒸騰，易致疾疫，纔製出斂藏形骸的棺槨來。地域廣大，物質繁多，人們不勝步履追求的苦惱，水行纔製出舟楫，陸行纔製出車駕來。在這一發展時期，人們如感需用的不足，則思用木製器來備用，或用土燒器來代替牠。

此時器用之制既興，使人思給用，不通功易事，使人各効其所長，便勞而鮮功，反足以阻滯社會進步。如果通功易事，這種抱布買絲的事，在輕重長短間，就生出許多窒礙來，那就有作貨幣的必要。軒轅氏的削金刀，立五幣，乃是應時代的需要而生的。

昔神農氏制醫藥，不過是醫學的初步，恐在當時的效率很少。軒轅氏始咨於歧伯，察五氣以明疾之所自起，因五臟以立五運而各究其功能，明乎性命之原，紀其陰陽之分。能知氣之所自中，而醫之術乃可奏效，這個就是作內經的本意。俞跗雷公察明堂，究脈息，以明人身部位。巫彭桐君處方餌。五人本是通力合作以求盡醫學的能事，自經此一度研究後，醫學得着很大的進步。

以前麻法雖經軒轅氏改正，仍不免有差率，至陶唐氏始命羲和分宅四方，實地測候以驗其時節之差異，以序四時之節候，更置閏法以改正前此的調曆，而使之準確。天空中既知有日月五星的運行，便當立法以測其運行的躔次。陶唐氏所造的璿璣玉衡，便是這種功用。

夏后氏定乘車之制，更於車上建綬設施以爲文飾，以別尊卑，這是與軒轅氏的作冕旒正衣裳有同樣意義的。

夏后氏取九州的貢金鑄成九個很大的鼎，想當時的金就是銅，義取象物，使民知神奸，雖於社會上無甚關係，但亦可見其冶金術的進步。

夏后座采首山之鐵以鑄劍，此爲開始冶鐵之事證，但已後於鑄鼎之歲約三百年了。湯在位二十有一祀，伊尹進策謂天久不雨，民困弗堪，宜發莊山之金鑄幣以振民，此是國家採鑛見於史冊的開始。

自伏羲迄有虞氏這二千餘年期間，可說是民族追求基本生活時代。因感受自然的壓迫，圖謀抵抗，所以能循人類進化的程序前進，對於所以裕其生厚其生的條件，頗有發明，此爲華族進化時期。自大禹受禪至嬴秦混一，這二千年期間，因領袖們安常處順，本身既無爲民族謀超基準生活以上底條件的企圖，又未遇着文化較高的異族相侵襲以爲之鞭策。他們就把視線移注在安定內部，來做些和柔政策與粉飾太平的所謂文教。所以

在這期間，文化的進展極是緩漫而有限，他們所走的路，差不多是走出了人類進化常軌的外了。這歷史的兩截是應當分別來看的。

第三章 政治的演進

在初民的時代，一領袖在一民族當中，所有政治上的能力極是有限，實在說來，不過做了一個生活上的指導者罷了。差不多是憑他的本能來指導一族人。用怎樣的方法來滿足他們的基本生活，因此漸漸獲得全族人的信賴，漫漫纔有政治意味的傾向。

伏羲氏的教民畜牧，不過是一些從事生活的改善，以防果實之有時而盡，禽獸的不易獲得，纔想出方法來補救，牠的政治的屬性是很少的。

以龍紀官，這可說是有政治的傾向，但其權限不明，事實未著，僅取義乎物以命名，即此便可知當時人們的政治觀念是何等的模糊了。

神農之世，製作雖未大興，不能說是綽然有餘，然甲乙雙方的天產，兩人何嘗不可

互易。因爲之列應於國，使日中或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這是連用政治力量來生效果的。

軒轅氏立六相及左右二史，這不能不說是官制的進步，因當時已經明白對於人民有政治上的設施，就有記載的必要，便設專官來執掌這事。

風后衍握奇之法，這是華族組織戰鬥力的開始，一個民族應有統一的政治力量，將全民族組織起來，如人身的五官百骸一樣，自身纔有抵抗侵略的能力。尤其是在兩軍對壘的時候，如果是有組織的軍隊，那烏合之衆是不能抵當的，這便是我華族強大的一個原因。

軒轅氏方行天下，畫野分州，經土設井，這是用政治手腕來擴充領土的明證。凡在四履以內的異民族，有的歸附，有的驅逐，來實行他整個計畫，經此一度整理以後，那華族的政權，就鞏固起來，這亦是強大的一個原因。

高陽氏以民事紀官，以金木水火土等字命名，使人們對於官制的觀念漸趨於名實相

符的一途，這是一個更爲進步的表現。

九黎亂德，民神揉雜，家爲巫史，這是陷民德於虛妄的一個現象。但這是九黎的風俗。驟然革除恐激之使反。且分別之使不爲華族之害，於是命重爲南正治黎——黎在南——以鳳神，北正黎（人名）治華——華在北——以鳳民，使復舊常，保持其固有風俗。於黎不過略施一些限制罷了，這是比較進步的政治手腕。

高陽氏始建九州統領萬國，這個時候的領土，比軒轅氏擴大多了。東由海至蟠木，——東海中山——南由江擴至交趾，西由崑崙擴至流沙，北由釜山擴至幽陵，幾有西漢全盛時代的境域，這可見當時華族政治勢力膨脹的迅速。

陶唐氏承高辛氏既奠定的國基，欲使人們更加上一層聯絡，使八元布五教於四方，於是始有五常之教，以維繫人們的情感，來使他們團結。欲使政治綱舉目張，有條不紊，便置百揆以司其衡，這是政教雙方兼籌並顧的一種高度的統治方法。

史稱堯時有洪水之患，舜命禹繼續其父未竟的事業，仍然以政治的力量來消滅這洪

水的禍患。經過十三年的久，這水患終於被禹和益稷諸人把他引平下去了。因此得到許多可耕的土地，這后稷教民稼穡的成績，就越發展開了。

有虞氏之世，雖然風俗渾樸，少有作奸犯科的人們，然無心之失，不知而作這兩種情形恐不能免，若一概都從免議，恐難以服受損害者人們的心，因此有制五刑的必要。

自高陽氏以來，華族勢力南達交趾，惟中有三苗之國，負澤阻江，憑恃其險，時梗王化，爲華族向南發展的大梗阻。陶唐氏於是謀徙其君而化其民，使與華族相融合，乃竄之於岷江之源，崑崙之墟，卽三危，使治理其族類，這是當時排除梗化的一種手段。

有虞氏因事設官，官別爲九，各有職司，無相侵越，權限既明，人思致力，這國家的政事就日進於修明的境界了。

有虞氏建設學校曰大學曰上庠在西郊，小學曰下庠在國中，這是在五常普通社會教育之外，從事特別教育的開始。

三載考績，計事論功，這是督率官常的一種良善辦法，勤能顯著則賢者自勸。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二典之文比較具體，是唐虞之世，實本民族由樸鄙之風，踏進開明之域的一個大關鍵。其原因在禹治平水患以後，獲得許多沖積層土壤，后稷能利用他來樹藝五穀，且使這種耕作普遍化，極力擺脫其畜牧時代的生活，使人民的生產力突然加大。人民既從公家領得墾地，就有各盡其力的機會，天產既富，用之不竭，菽粟自然視同水火，求無不與，誰肯斤斤自私，來較量物權之屬已屬人呢。這便是唐虞二代所以形成大同之治的基礎。

夏后氏的時代，人口比較的增加，自由耕種地面漸有不足的現象，且恐農民務廣而荒，得不償失。於是繼加以限制，定下一夫受田五十畝之數，取其所入十分之一納之於公，是謂貢法，這便是租稅制度的開始。

成湯制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以待有功，制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五等之祿以待有德，爵祿既頒，於是人各據其才德以趨事功。這種分別的進步，是歷史進入小康期以來，勸獎在官者趨事赴功一種高度的方法。

有虞氏五刑之制，大體是爲庶人而設，官若有邪，則無以示儆，於勸懲之道恐有未盡。成湯始制官刑以儆於有位，指出三風十愆爲施行的標的，這是端臣下趨向的一種善良方法。

鬼方本羌族，立國於黃河上游，牠自成湯以後，是常來朝貢商朝的，商道既衰，鬼方叛亂，時擾諸夏，殷高宗舉兵討平之，殷之兵力達到黃河上游了。

周有天下，淮夷徐戎在淮泗之間，時梗王化，成王時代，一再撻伐，自後其勢就衰，不復能爲華族之害，迄秦之世結果散爲編氓了。

周初的官制，原是歷代相沿，社會日有進展，人事日有變遷，就不免有名存實亡，與有事無官的一種感覺。周公當時便大大的加以改正增補，創爲周禮一書，本因事設官之義，使各率其職。有的指導人民使遂其生厚生，有的捍衛國家使安其內攘其外，使二者交相爲用，以增進人民的幸福。惜當時無普及教育的企圖，人民愚蠢，對於利用厚生的事業，僅居被動地位，不能自動發展。後來人亡政息，這周官的良法美意，竟被有

人指爲莫須有。這是因爲牠自身是曇花一現。對於厚生方法的指導，後日官制中竟尋不出一些痕迹來的原故。這種歷史進化過程中的絕大疑案，著者於此有贅述的必要。茲分列數點以備閱者參考：（一）按周禮一書，其出最晚，漢武帝時獻自河間獻王，書序謂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是之，此其可疑者一。又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爲瀆亂不職之書，他是有鑒於新莽之妄託以召亂，且亦見不及劉歆父子祖孫祕藏滅迹，以遂其苟安之私圖。因斥周禮爲劉歆的偽造，此其可疑者二。豈知王莽以篡僞而比附周官，承襲制苟簡之後而驟增繁瑣，紛更之擾，民已不堪，况其本無己徯己淫的志願。於古聖人的心志未有默契，徒於形迹之間亦步亦趨，優孟衣冠，豈徒取笑，這簡直是召歆的根由。劉歆知周官爲經世之書，但因他個人莫有仁愛斯民的志願，所以不知道周官這個制度，連經過歷史上怎樣一個過程產生的，牠推行的基礎是怎樣的，這種制度在一個時代能否推行，要如何的因革損益，豈是驟然得到一本書，就可以來粉飾文武成康的沿續的嗎。懷

着先人置產的教訓，欲以書生之見來粉飾太平，太平是可以粉飾得來的嗎？粉飾不成，遂倒戈相向，滅族之誅，豈不是罪有應得嗎？但這一些事，都不能爲劉歆僞造周官的證據，倒反有以證明其不是僞造的理由。劉歆而果真能僞造周官，則思之深，慮之熟，必然明白這種制度根本之所在，而知到當日推行的艱難。正爲劉歆剽竊他人，一知半解，不知推行這種制度的根本，在元首心中之一念，即是否有此仁民愛物之誠，劉歆不明根本，徒炫其美備，不及深思，方才有此比附王莽畫虎類狗的笑話呢。再說深刻一點，周初的人心風俗迥與漢代不同，有些關於民間習俗的情事，那豈是學術關了大門時代——漢武帝時代——以後的人們思想所能達到的嗎？說起來也很笑話，由漢迄今，儒者們講了二千多年的孔學，只說了爲臣當忠的半面，直到民國才來揭穿南面爲君所應負的責任。那些怯懦的儒者們，漫說他不敢說非難人君的話，並且他不敢存非難人君的心，況周官備創業垂統之經猷，誰敢捏造任此不臣之罪，縱然國事敗壞不堪，他只好說個臣罪當誅天主聖明，春秋鬻權兵諫之事，後世是絕迹了的。再來檢查後世讀書明理的人君，光武昭

烈憑帝胃而起的，梁武乃佛氏之徒，曹操司馬懿不足以當儒者，此四五人者要皆有所憑藉。其餘便讓那些死利於東陵之上的人們，爲子孫置產業，奮其鬥牛式的武勇，奪守民族的關門，攔阻人民前進的道路。這些講半面孔學的儒者們，還要拿僞孔學來替他裝扮裝扮，使他這個傅子孫的基業越發鞏固些，對於民族的前途說來，這豈不是罪大惡極嗎？他們的罪惡還不止此，遇着異族人吞併中國，蹂躪華族，他們還要來歌功頌德，上些甚麼神聖文武的尊號，這真是廉恥道喪。因爲他們的精神，是爲時王政治所支配，眼光望不出關門以外，而且苟安於私有制度的底下，由此做出許多自欺欺人的事，假使真孔學而果如此，當時孔子何必作春秋，黜亂賊，以嚴夷夏之防呢。此着一失，大本乖異，枝節爲學，直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直僞焉而已。使孔子而有知，不且以杖叩其脛，而出諸大門之外嗎，儒者們這樣窄小的局度，反說他能僞造周官，創作興王的規模，這不是冤枉了劉歆嗎。這樣說來，周官這書就一定不是僞造的了，或者當劉歆在祕府發見的時候，簡篇不免有些殘缺，曾經歆手補輯補輯罷了。

周公制禮作樂，從政治上說來是進步，從思想精神方面說來卻是保守。因為這種方法，不是引導人民思想前進，而是藉追求幸福以來防止牠的動亂，却是要牠安靜在這現實狀態底下，來從事休養生息的。休養生息是要人口的繁殖前進，維持現實狀態，便是擋住人民的生活無法前進，這中間便埋藏下一個大矛盾，這便是孟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說的一治一亂的根由。華族二千餘年沈悶在這種狀態當中，不知損失了許多人口，都是政治的動向錯誤。尤其是秦漢以後的君主，認天下為所置之產業，根本不己無為民族發展的企圖，不但不令人民有發展的機會，還要養成牠倚賴的性質，這種糊塗混賬的政治路線，是絕滅民族生命的毒劑。近世還有人想步牠的後塵來挽救民族，這不是把烏頭當做人參服下了嗎，可笑亦至於此。

按歐西將禮之一字屬之宗教允許人民信教自由使牠有伸縮的餘地不造成輿論來束縛人比較好得多如果不得已由國家制定當以最簡不費者為宜須知一民族的精神須使牠活潑不可使牠呆板須使牠舒暢不可使牠局促自其競爭生存一方面著眼寧失之野不可失之文咧

社會日進，理智日新，貨物日益增多，價值自千差萬別，以有易無，這中間生出許多障礙，因制為錢布之制以資流轉。

井田之制度，說是創自軒轅，前已言之，嗣後便不見其經理的方法如何，征稅的方
法如何。至夏后氏乃用貢法，似乎又不是井田的制度。惟商周的助徹二法，纔備具井田
的規模，而其目的多寡又各目不同。這中間的沿革因襲，史無可考。若說周有天下使舉
商制而廢之，另行規畫以新耳目，形勢毫無差別，自費一些勞力，我想武王周公之施政
恐不若是之繁費。這其中因記載不詳生出來的誤會不少。以理推測，當黃帝時井田只行
于有熊之國，其時統制方法，尚在幼稚期，怎樣能強迫當時諸侯奉行呢。後來堯都平陽
，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如今山西，原非有熊之墟，就沒有井田制度，恐更就不必
是井田的制度。商湯之國，由東亳上商邱上到西亳上偃師上更考之潁鄆上滎澤上徒相上
內黃上四履的當中，即是有熊之墟。所以商湯就其井田的制度來從事擴張，井六百三十
畝，因此人民的生活就得到安定，而且莫有什麼貧富的差異，這軒轅氏的遺制，也就是
商湯的惠政，所以孟子說個天下歸殷久矣。武王周公有鑒於這種制度的優良，於是極力
仿效，而且就成周人口土地的情形來變通一下，所以就成爲井九百畝。加以周代官制加

詳，歸田授田設有專官，辦理較為允協，所以成康的治績，亦能媲美文武。後來犬戎入寇，宜臼東遷，將這良好的土地制度送給秦人，這就是秦國致強的根本。秦國的風俗，因生活安定而強悍，秦國的人口，因生活安定而繁昌，後來商鞅看見地力的不足，不知移殖安插，保存良規，徒開阡陌為救濟目前之計，固可收一時之效驗，但即此伏下了土崩瓦解的禍患。魏斯建國於有熊之墟，先秦國感受人口過剩，受井田制束縛的困苦，所以李悝要盡地力，這就是廢井田制的一個先聲，不過在面子上蒙了一個治田勸謹的題目，把那些犁闢山陬澤隅奇零隙地的事實蓋着了罷。當時除這兩國以外，都看不出一些廢井田的痕迹來，也就看出井田在其他各國的不重要，本來在封建制度底下，天子的權力很是有限，天子所行的政令不必盡達於諸侯之國，只求他所行的政令，不與王政相抵觸罷了。我想西周之世，井田制度不必通行，而授田歸田，十分取一，當時諸侯必皆率奉，表示遵守時王的制度吧。況孟子說：「周人百畝而徹」，「注」訓為通力合作，有似今日的集體農場制，固不必井田纔能推行呢。故與夏之貢，殷之助，同為十分取一的稅制，

都是不失充裕民生的意旨的。

厲王之世，周室中衰，異族乘機肆擾，宣王即位，即速以兵力大張撻伐，禁其猾夏。○六年之間，北伐獯狁，南征荆蠻，東平徐戎淮夷，西破西戎，天下賴以安定，這都是宣王中興的功績呢。

總之三代明王，其政績要自有其特異之點，做唐虞之治蹟，本愛民以爲政，集中政權，逐漸形成統一的國家，如大禹徵塗山之會，夏啓有鈞臺之饗，商湯有觀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歧陽之蒐，康有豐宮之朝，此則較之唐虞而略爲進步。○至其限田授民以防侵奪，法亦較良，惟其以天下爲私，而又要豫防民風之澆薄，便不免塗飾文治，禍根所伏正自不少。○孔子祖述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這可見孔孟意旨之所在，不過未曾明白否認罷了。○這就是三代所以背大同而入小康的途徑，其詳容後論之。

平王東遷以後，無力控制諸侯，坐視他們互相吞併，諸夏都不能保，異族自然是無力顧及了。這與外族相逼近的，就有五大強國，就是晉，楚，齊，秦，燕五國，楚在南

方，他們向異族壓迫發動最早，所剪滅的亦獨多。西收巴夔，北滅庸，夷虎，羣蠻，盧戎。啓漢中上庸之地，南併百濮，羣蠻，東滅羣舒吳越及淮泗之夷。奄有巴黔湘鄂江梁越閩之地，地方五千餘里。其次就是秦，秦在西方獨竊西戎，據史記所載，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卽緜諸，緄戎，翟獯，義渠，大荔，烏氏，胸衍，是也。其後爲秦次第剪滅，遂有秦中數千里的土地，更南取蜀，國益富強。晉在北方，所滅北狄的族亦不少，首滅赤白狄，如平氏，潞氏，留吁，鐸辰，庸咎如，皐落氏，肥，鼓，鮮虞之屬，以及陸渾，揚拒，泉皋伊洛之戎。後更由趙北破林胡樓煩，拓地數千里，北跨陰山，南踰汝穎，西抵華洛，東接燕齊，分爲三晉。齊在東方吞嚙東夷，如萊夷島夷鄆瞞之屬亦當不少。惟獨燕國當初勢其微弱，僻居東北，屏蔽中州，到戰國的時候，燕臣有名秦開者，襲破東胡，拓地千餘里，這便是奪自異族的明證。因在這個時期，戰爭異常劇烈，各思同化其人，收爲己用，及到嬴秦混一以後，便不見有異族的痕迹了。秦代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牠的疆域，比如今十八行省稍大，這便是以後華族的根據地盤。

第四章 前期敦龐渾厚的風俗

孟子說：「民之爲道也，在恆產者在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恆產是說物質，恆心是說精神，這就是說：常人的精神，是受物質所支配的，明白這個道理，那秉國鈞軸的人，要國治國強就要充分的分給人民以相當的物質，這便是有國而要富國強國的根本條件。我們今天且來（檢查）我們的前期歷史，來印證我們所說這個道理是否符合，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樣的風俗，還不算敦龐渾厚嗎。但那是有牠的經濟的背景的，鄭玄注：「大道謂五帝時也」，即上起少昊，下迄有虞，共爲五帝，少昊之前即爲黃帝，爲華族先烈功業卓著的一人。其時華族發展的路線，大率是順着黃河向下游

移動，下游土質肥美，又值神農氏發明樹藝五穀的後代，便有擺脫畜牧生活的趨勢，這時民族經濟既見逐漸改善，人民生活自然安定，這物質的供給，總算是充裕的。後來陶唐氏雖有洪水之患，民無所安息，及到禹治平水土以後，反轉多得了些沃壤來供繁殖，這也是政治進步，使人民生活安定的一種現象。這種為人民生活開源的政治，自然是基本政治。若用而不節，感到困乏，亦不足以維繫人心的樸厚。孔子之答哀公曰：「人道政為大，右之為政，愛人為大」，本愛人之道以為政。這就是五帝的政治走上大同之世的根源。後王先已後人，天下為私，怎能趕得上呢。在這個時候，民生敦樸，和同以聽，當領袖的人們，既為人民任勞役，不必把權利專擅在自家手裏，尤貴本身能夠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以節餘的財用來從事建設。上行下效，人民的經濟必然寬裕，且有餘力來發展社會事業，斷乎莫有使用詐力來欺騙別人的道理。因其凡屬詐力，常使用的时候，問心必多不安，莫有饑寒及其他身體上的必需品來驅策他，他一定不肯行使的。這個道理，「為清明在躬者所保持，」便是領袖們用來指揮民衆的一個鐵券，古來黃帝

用這個來宰割羣動，不使而成，不令而止。帝嚳所以能仁而威，惠而信，莫不服從。陶唐氏存鰥寡，振荒扎，與民同體，故民戴之如日月，愛之如父母，有虞氏柔遠能邇，惇篤允元，蠻夷率服。這都是因爲本愛民之心以爲政，不以天位爲一家的私有物，這中間少了許多避忌粉飾，及一切回護這一點的手段，然後領袖們的言語行動，纔有光明磊落的可能，人民便得了許多誠實的印像，所以說天下爲公，卽是上無私積，下無困乏，人效其勞，地盡其力，物效其用，供給豐富，生產蕃衍。人們的心志既不役於飢凍，精神自然暢旺，局度自然弘闊，氣象自然蓬勃，一般思想都寄在維持生命條件的外部，來從事於精神生活，無疑的這學術文化道德都有長脚的進步，這便是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表彰二帝治績冠絕後世的由來。後人徒慕唐虞的治蹟，乃不明其形成此治蹟的根本，直有人視爲如雨落不上天一樣的盛世不能再臨，有人企盼盛世的來臨，而自身却從私有制度的窄路上去尋求的。這些無識人們的可笑，還是由於他們根本不明白一個民族國家的政治運用的意義及其動向。所以在運用政治的人們，終日只在動亂，但他的口裏說，心裏

想，總是要做到太平盛世。唉，這不是南其轅而北其轍似的嗎。

第五章 學術的演進

一民族在生產增殖精神健旺的時代，順着這種政治前進的趨勢，必然有一種輔佐政治或領導政治的學術產生，來發揮民族的精神，或歸納民族的思想，此是物質條件具備以後必然的結果。

1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貫的薪傳 堯爲帝嚳三妃慶都的兒子，堯以前天位雖不必傳子而傳姪，總是一脈相承。自堯傳舜，把天子的位作爲天下的公器，破除一人一姓私有的制度，特創一例，使民族的耳目一新，思想一變，史書上稱他「存心於天下」這話是不錯的。舜繼堯爲天子，跟着堯的事行，務求其有成，深知生民立君，與爲君治民的意義，故能務民之義，不夾帶自家一些飢寒利害在內，所以能夠媲美於堯。孔子稱他「有天下而不與」，這話也是不錯的。但舜是承繼堯的君位，他的對己對人對事一些思想都比

較要深刻些。他知道一般的人心，激則必偏，偏則必弊，惟用政治的力量，給與相當的物質來調劑牠，使歸於平靜。但這用政治手腕的人，要先用克制的工夫去掉自家的偏激，才能收發政令的效果。所以在傳位於禹的時候，就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個字，以來作一國元后領袖羣倫者的訓。就是說這些事業都要精一果敢去做，仁政纔能夠實現的。並且又要用中，纔能使應的效率久長，他們的目的在仁民，他們的運用在克己，這種學術是造成人類領袖的金針，也就是開後氏儒學的先河。韓愈氏說：「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這一類的話，雖近籠統，然細考他們的行爲，都有類似之點，所說的話都衆相近，不過方之堯舜，便有傳子傳賢的分別罷了。

2 孔子刪詩書作春秋 孔子生當周末文盛的時代，感覺政治風俗今昔不同，有挽回的必要。觀其對哀公的說話，「昔之君子！在位者！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放

慢，國民是盡。午其衆以伐其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田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政治既衰，爲君的人們，竊國家的大權以圖個人的私利，影響所及，人競營私，寔實務虛，詭詐百出，只知滿足自己的欲求，便不計及顛倒原有的情性。這樣一來，將今昔的人們兩兩比較，便顯出古之學者是爲己，今之學者是爲人，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厲，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許而已矣，就風俗人心上現出許多今不如古的毛病來。這個禍根，就伏在政治裏面，也就是由於當政的人們，肥私利己，後世的若干朝代，無一不是因此種下滅亡的禍患。但是他們總是眼光太短，把個人的私慾剋制不住，好像後面有人追趕似的，不斷的往崖下跳，明知是粉身碎骨，無奈他慾念薰炙情不自禁，這因爲他不明白一人貪利（名也包括在內）一國作亂的道理。孔子當初周遊列國，本想獲到大權，拿政治的力量來挽救。嗣後知道一千人君，盡屬今之君子，不得已纔本着述而不作的宗旨，「力矯文勝之弊」來刪詩書作春秋以見其志，這就是以布衣而爲素王的本領。故之本義，原在使人類有以遂其生，

歷史所應遺留，亦以與此義符合者為原則。但遷其生的方法，又有直接間接的區別，為農為圃是直接的，孔子自謝弗如，但也要示以富之的方法，為弟是間接的，要得到安內攘外，然後得以致其能力，遂其生產。所以從間接方面說，就要使他簡而易行，約而不費，這纔是當國的人們為人民謀幸福的要道。孔子看見當時為士者行事的漸遠於實際，罷役於文事，浪用其精神，消耗他們正常的生產時間，他們走的道路前面是一片荆棘，這是生產時間少，浪費時間多的原故，——這個是孔子所深引為憂慮的。因此才把人們所日事研討的詩書取來訂正，其不合於間接遂生的要旨的去之，結果汰其繁冗，留其正義，以為後此斯民的矩矱。孔子生為平民，無權無勢，何從拾起文武周公的墜緒來，不得已取魯史春秋之所記載，加以筆削，寓褒貶之微意在這中間，固是所以誅亂臣賊子的用心，亦即是深惡痛絕亂臣賊子的所由起。深知政窳而後飾之以文，民趨於文，必然的要相率以離乎實，必然的要捨力而任智。所以文勝則僞生，小生盜賊，大生奸宄，這亂臣賊子之所由起，豈不是首領們把捍衛民族的武器——政治——錯用了，來擁護首

領袖個人的利益，根據敗壞所演出來的事實嗎。世及之制，賢者無託足之所，這是孔子的隱痛。放利而行，上下皆貪鄙之夫，這是將來的大患。後人徒知春秋之義在誅亂臣賊子，這何足以窺孔子的涯浚呢。

3 孔子成仁之學 孔子教其弟子，揭出一個仁字以爲要旨，仁者愛人，能愛人的人，必能拋去我見。撇開私慾的障蔽，這人己的感情，纔能使牠相通。故孔子向着顏淵說，克己復禮就叫仁，克己，克己，已訓私，復訓循，禮訓正則，合攏來說，就是勝制私欲以循乎正則，便無在不充滿着這愛人的感情了。大舜在微賤的時候，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就是大舜能充分表現他愛人的情緒，所以不愧爲人類的領袖。孔子叫人爲仁，這便是造領袖的學問，因爲領袖必要具愛人的慈惠，知人的聰明，任事的勇敢，這些要素能備不能備的樞紐，就在自家頭腦是不是虛淨理整，要自家頭腦虛淨理整，就有從事於格物致知的必要。人們果有民胞物與的志量，及救焚拯溺的熱情，便算大體已立，就從這做路子來從事格物致知，便不難見堯於堯見舜於牆了。那誠意正心是說爲學

的火候，掉過來說，即是指這格物致知功候的淺深。這格物致知是培壅這仁心的手段，誠意是將這仁心向時間上而延長，直到屬續的時候為止。正心是將仁心向空間方面擴充，不為外物所震撼，直到天滿地寧的時候為止。至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過是仁德外面的表現罷了。《中庸》上說：「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名雖是三，其實只是一個仁字。修己安人就是仁，欲修己而致力於格物致知就是智；欲安人而見義必為就是勇，融合只是一體，分開就有三面。如果人們處領袖的地位而不愛人，便喪失其所以為領袖的條件，處領袖的地位而或與人民競利，不但墮其領袖的威望，且使人民對他的情感惡化，將演成分崩離析的局勢。因為民本至愚，斷不能饒恕他們領袖不正的行為。所以聰明的領袖，便當清心寡欲謹慎行動，總期無負國人這種使命。如果不是這樣，居領袖的地位不會讀孔氏的書，於孔氏精神上未有默契，無道以授其下，妄襲歐美自由主義領袖的故智，貧子說金，以圖一逞，恐將與桀紂項羽同歸，適成爲亡國收家的軼事罷了。

4 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說仁義 七 雄併出，諸侯競爭功利，連五伯假仁假義的面具亦

拋棄不用。上行下效，風靡一時，相激相盪，竟有欲達目的連手段都不擇的。歷時既久，濡染漸漬，差不多個個都是如此，就成了一個惡人社會。孟子身爲布衣，目擊心傷，想從教育家的立場，拈出性善二字，用劈頭溫髓的辦法來喚醒世人，這是孟子不得已的苦心。在孟子的本意，是要拿到政權使菽粟如水火，——這不是說菽粟之賤，乃是說人之愛人而不重視菽粟，——樹仁政來養民，使政成而民自感化，以去其後天的習性。物質的環境既已變更，這人心風俗自然不期善而自善了。但當時齊梁之王，對於孟子的學理，都扞格而不入。始退就師儒之席，研究施教的方法與啓示的道理，單刀直入去其矇瞶，對這社會的痼疾，希圖補救於萬一。孟子既說性善，當然要提出一個標準人物，自古性善的人類莫如堯舜，堯舜是我們人類的模範，他修己以安天下，替人們造下的福利不少，孟子稱他，還包含着一個天下爲公的意思，不僅是徒慕堯舜的德業。至說孟子於孔子言仁的外面加上一個義字，此亦是有他的意義的。處事合宜纔叫義，如何能處事合宜，大公無我，研求至理，處事便合宜了。這樣說來，分明只是一個仁字，孟子指其惻隱之

端而言謂之仁，指其差惡之端而言謂之義，其實卽是一體的二面。不過仁之一字，內根於心，外形廣漠，中材的人們，往往不能窺其涯涘，不免有些過仁而柔，或是惠而不當，近似婦人。提出一個義字，就是拿來補救這種缺點的，各就事來行其所宜，使中材的人們能在形迹的當中去討求，這就是教授上的一種發明，所以決莫有不仁的義。後儒不明白這個道理，把一些無當於國計民生，枝枝節節，遇事剛斷的痕迹，指他叫義。這便是孫陽的後裔，依乃祖的方法來相馬，竟把蝦蟆認作騏驎了。這種認識的錯誤，引得那些矜才使氣的人們，錯了就從錯處做，以爲是義。其實認賊作子，遺害民族前途不小。

5 孔孟學理的价值與其繼續性 孔子生在春秋，孟子生在戰國，是春秋戰國兩個時代，卽是孔孟學說的背景。這兩個時代在第一編緒論裏面，曾與牠們定下了一個名稱，叫做戰爭期。但也有程度上的區別，春秋時代，周室衰微，諸侯競以兵力互相吞併，所以戰爭侵伐的事，無歲不有，當時各國都是適用徵兵的制度，現充兵役的，都是一些精壯的農民，有事便立身行間，無事就各歸田畝。一國的君卿大夫士，便是他們的將管，

行就爲軍，坐便是國，這樣一個組織，那小民就成了牧場裏的一個羊羣或牛羣，終日在牧童照料的範圍內，表現出頭數和動作，而且忍受着鞭撻的痛苦，所以雖勞而是不敢怨叛的。孔子纔提出一個仁字，欲從這水深火熱的當中，來拯救這些小百姓們，時君既不聽用，不得已纔傳諸其徒。因當日戰爭雖極頻繁，其馳突襲擊，猶或守禮不爲己甚，故孔子所垂的教訓，也就多於闡理，少於指事。○降及戰國，合爲六七，他們的数量愈少，這種相煎的勢子就越見迫切，他們的力量愈大，這種爭鬥的氣燄就愈見高漲。○因此就有爭一城奪一地，殺人至數十萬的。○孟子目擊心傷，嘆着說：「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以爲如孔子的僅提一個仁字，恐把這般人的行爲，範圍不着，再加上一個義字，使他們可以在形迹間去追求。○這樣說來，孔孟的學理，不過是時代的反應，所以一般稍有覺悟的人們，厭苦兵革，想在這種兵戈擾攘的社會中，找到一條出路，這就是孔孟當時得到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原故。○不過孔孟當時提倡仁義，原注重在手握政權，供給人民以生活物質條件，孔子先要百姓足，孟子要使菽粟如水火，這些主張，都是

不利於時君的，所以道皆不行。後來漢武帝知儒學之本倫常以立教，是可以奠定社會基礎的，不無可以利用的地方，所以纔罷黜百家表彰六經，這便是孔孟學理傳至今日的理由，亦卽是以偽亂真病源的所在。

第六章 華族在三大河流的發展

華族自崑崙東徙，卽棲息在黃河流域，史書上載伏羲都陳，神農都曲阜，黃帝國於有熊，一河南新鄭一少昊都曲阜，顓頊都帝丘，一北平濮陽縣一帝嚳都辛，一河南西邱一堯都平陽，一山西一舜都蒲坂一山西一禹都安邑，一山西一湯都亳，一河南一干國都，都在黃河南北，這可見華族的勢力，在初期的二三千年已瀰漫於黃河南北了。文王生於歧周，化行南國，先及於江漢之間，到武王伐紂的時候，庸，蜀，羌，茅，微，盧，彭，濮，莫不率師來會，這是華族勢力達到長江上游的明證，後封嚳能之後熊繹於楚，國於夷陵一卽今姊歸巴東之境一密邇於夔，後來楚境東徙，因以別封其支子。嚳熊本

顯項的苗裔，其後熊渠封其長子康爲句亶王，——江陵——中子紅爲鄂王，——武昌——少子執麻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後來若放跡冒章路藍縷以啓山林，熊渠開百濮地而有之，到戰國初期，楚的疆域，西起夔巫，東盡吳越，長江南岸，無非楚國的領土。並且把許多中原人口，向這一些地帶搬移，如遷許，遷蔡，俘蠻子赤與五大夫及其遺民等，豈不置之長江南北的隙地。所以現今貴州尚有蔡家苗宋家苗等，相傳是楚人得宋蔡兩國的俘虜，放黜到這個地方的呢，楚既滅越以後，越的公族散處海濱，臣服於楚，越的境土，楚嘗放黜些罪人來此居住。如楚滅陳，放司徒招子越卽是例證。自入戰國以來，秦強楚弱，秦既南舉巴蜀，便循楚人發展的路線，沿着江漢二水，乘勢東侵。白起的舉郢鄢燒夷陵，逼得楚人踉蹌東走，既遷於陳，又遷於壽春，這是何等的狼狽呢。楚既舉國東徙，秦人復躡楚人的腳踵，擴充牠的勢力到長江下游。及到王翦以六十萬大兵虜楚王負芻以後，秦人的勢力直到揚越，——卽百越——卽是秦人的勢力，自巴蜀以下籠罩長江全流域了。至華族珠江流域的發展，還是開始於楚，莊威王時，王使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

略巴蜀黔中以西之地，莊躡本楚莊王苗裔，至涪池見其旁地肥饒三千里，遂以兵力劫使屬楚。會秦擊奪楚巴黔中地，道塞不通，躡因從其俗，替他們做個國王，散兵爲民，這一千楚人，便成珠江上游的移民了。楚既領有百越，其南越之君，一漢書注羣姓與楚同祖，一或爲楚所建立，是楚之勢力已到嶺南了。其後秦略取南越，發諸嘗逋亡人及贅婿賈人爲兵，以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五嶺，與諸越雜處，這時候就算華族已在珠江流域植有強固的基礎了。後來漢武帝再征闡越南越，不過就舊有的基礎來再事擴充和穩固吧。

第七章 周末初秦時代學術的反應

人類的思想，是導源於時代的政治，因政治的良窳，思想便顯出正應與反應兩個現象，有時甚且緘默不言，相率歸到沈寂的一方面。人類的學術，便是人類思想的結晶。依前面所說人類思想的三條路線，在歷史上便可分爲三個時期；（一）爲順應期，在政治

清明，民生裕厚的時候，人們以領導者的思想爲思想。這自然是居領導地位的人們才高於一切，一舉一動都是在爲全族人們利益着想，所以才智之士，都能用其思想來襄助治平的事業。領袖的人們既然國而忘家，不知有所謂私，這才智之士就在領袖們幷幃的內面聯成一氣。這便是禹稷臯夔的輔佐堯舜，周召太顛閎么散宜生南宮适呂望鬻子諸人的輔佐文武。(二)爲反應期，文物方興，政治忽闇，才智的人們，不滿於領袖們的設施，又無機會爲之徐圖改革。於是退而指摘時政的不當與風俗的敗壞，就其眼見所及，歸納以爲思想，或使之統系化，或是之組織化，以求台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意旨。但都是各就其本身的立場以爲立論的基礎，於是百家雜出，議論紛紛，這便是周末秦初處士橫議時期。(三)爲降伏期，僞領袖們高據要津，盜竊國柄，欲掩其所自私而禁止他人的窺伺，便開始借文字或言語的嫌疑，殺戮才智之士，獎勵恭順之民，來箝制天下的口。挾其盜賊式的兇頑，以臨手無寸鐵的文士，始皇坑儒一役，這自私自利的領袖們遂得到意外的收穫。自後漢朝的黨錮，唐代的清流，明代的東林，到清代的文字獄而已極。使

盡他們摧毀才智思想的能事，結果是社會一般思想平凡，英才不出，一旦外族交乘，只好對他屈辱罷了。使這民族思想二十餘年停滯在這混沌狀態的中間，究竟誰負其咎。一國的元首，譬如房屋的脊梁一樣，這數仞的堂，怎能容得豎百尺的長竿呢。所以拿一國見識卑近器量狹小的人材來充任首領，這是民族的大不幸。因為他掌握政治的底下，養不出第一等領導民族的領袖來的，他只會用比他更劣的人材——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來供他的驅使，一遇有才德出他之上的人們，他便感到他的地位有動搖的可慮，——其實是由他自利的心理神經過敏發生出來的錯覺——將他排除。就這二個時期來說，周末初秦時代當然屬於反應期。周末戰爭愈演愈烈，這是因為周網解紐，諸侯各憑力量來掠奪土地的必然的趨勢，因此便使人民感覺生活的不安，有才智的人們，深知這種政治病根的所在，各就所見以為指陳，雖未窺其全豹，但亦未始非撥亂反正的一個關鍵。這種病根，就在諸侯們的自利，並不念及人民的困苦，所以不惜殺人盈野盈城，以來逞其私忿，快其私欲。後來嬴秦統一天下，依然還是走着這條錯路，這就是諸家並起

的來由。管商之學，是根於政治的懈弛而起。申韓之學，是根於政之靡俗之敝而起。老莊之學，是原於政治的煩苛，風俗的詐僞而起。墨翟之學，原於強侵弱衆暴寡而起。荀况之學，原於人心陷溺漫無檢束而起。其他莫不皆然，這多種學說，無一不是時代的反應，即無一不是針對政治社會的病癥。如當時的人君能擇善固執，都是足以裨於治術的，可惜當時的首領們不能採用，或偶一採用亦不免人亡政息，這不是學術的屬性，實首領們對於學術莫有認識，不善利用的原故。坑儒的禍，其不是固不待論，有學術而不善於採納，結果無益有損，這必是首領們心有所蔽，不能求得至善的方法來行使，亦屬不是。語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就是孔子教人求得至善的好方法。

本論 七 周末初秦時代學術的反應

第二編 本論二 衰弱的種因

第八章 殷周山質趨文之漸

人類社會本非一成不變。亦非可以截然分爲兩段的，所有一切興衰成敗的道理，都是相爲倚伏，本至繁賾，欲爲之條分縷析，抉出牠的因果關係，使纖細不遺，如辨黑白，恐上智亦所難能。若只摘其大要爲之貫通，以明其因果，雖中材的人們亦未嘗不可指事論究，但必嚴守自身現處的立場，力去當前的朦朧，纔能得其大凡呢。

殷周二代聖明的治績，後世都謂上繼唐虞，兩漢以下的君臣。無一個不想極力摹倣，求且不得，今忽指爲民族衰弱的種因，豈不令人驚絕嗎？但是事實上告訴我們，華族今日的衰弱，不是人身的一格暴病，的確是從歷史遞演而來。把我們華族的一根歷史樹拿來分段考察，纔知道這個病狀的種因已數千年了。從唐虞以後的政治風俗，總是一代不如一代，兩漢以後的君臣，想追蹤兩漢的治績。總跟不上兩漢的治績。兩漢的君臣，

想追蹤三代的治績，總跟不上三代的治蹟。三代的君臣，想追蹤二帝的治績，總跟不上二帝的治蹟。這是歷史上的昭示，這自然是有牠自身的矛盾，和因果關係的。乃近世有些醉心歐化專會講亞丹斯密經濟學的人們，他拿歐美的眼光來看我們古代社會政治，鑽研不入，扞格不通，他便開始懷疑起來，說唐虞三代那些政治風俗，都一是些附會。因他這一懷疑，我們便得到一個教訓，我們纔知道歷史上那些夢想唐虞三代政績的君臣，他們得不到唐虞三代的政績，是由他們自身伏下的矛盾性他們不知道呢。也就曉得今世一些老先生們，他們不滿意現代政治風俗，他們醉心的古代政治風俗，但是他們指不出一條走上古代政治風俗堂堂正正的路子來。這是由於他們坐在井中，沒有方法和勇氣來說明天體的空闊無邊呢。也就曉得講亞丹斯密經濟學的當局們，受環境的逼迫。要來走上古代政治風俗的道路，這是極端矛盾可笑。恐不止是航斷潢絕港以至於海，直是駕駛一葉下水船要來上溯河源了。說到此處，已離題太遠，現刻應該未說一說殷周衰弱種因的由來。這便是殷周由質趨文的漸進，殷周政體既是沿夏后氏的制度，不傳賢而傳其子

若弟，子若弟不盡皆賢，就不得不想出些方法來塗飾塗飾。是殷周的政治本身，也就帶來了幾分病態，不免是懲前代的失敗，想方法來延續自家的宗祀。這些私心，在天位傳子的制度下，雖聖王亦有所不免，但不似後世那樣明目張膽罷了。我們就拿表記所載，夏殷周三代大政的方針來比較一下，便看出他們的用心來。夏承唐虞極盛之後，原無什麼弊失，交他來作參考，所以他的政體也就是坦蕩平直取法唐虞，董仲舒曰：「夏因於虞，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尚同也。」記曰：「夏遵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尊命與先祿後威，先賞後罰，這是國家當然的一種體制。遠鬼神重人事，崇實黜虛，這是維護良善風俗的好方法。至人民的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這是未能受具體教育的人民當然的結果，絲毫沒有損害他們天真的。與其說他是敝。毋寧說他是璞玉渾金罷了。記曰：「般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這般人爲什麼要尊神呢？爲什麼要先罰而後賞呢？因爲

他看出夏遺的破綻來了。夏之君位是拿來傳子的，子不皆賢，就不免與后羿寒泥以可乘之際。這個破綻，原是因傳子而來，如湯能矯之以傳賢，自然也就沒有這個破綻了。但是湯仍是害着夏禹的病，把病根留着，偏要格外想出法子來補救。所以殷之尊神先鬼先罰後賞，也就不是坦蕩平直之道，欲藉神權刑罰來防止人們的盜竊大位，所造桑林之樂，是何等的替鬼神設色，晉悼公且駭得魂不附體，是可知其用意了。但結果是尊而不親，至其民之敵，蕩而不靜，勝而無恥，這種毛病，便是根源他補救的法子來的。尊神權而後人事，虛而無實，自然是蕩而不靜。由尊鬼神所養出的尊，是離開實際的，自然是勝而無恥了。這一味的好勝，雖甚至於無恥，然其天良可說是尙未全昧。現在且來看周人的弊，記曰：「周人尊禮尙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敵，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這周人是有鑒於殷之孤立而亡，雖其宗黨有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一千賢人，曾無補救，且尊神亦屬徒然。因此懲殷失失，就大封同姓，如太王王季之冑，文之昭，武之穆，周公之胤，大小數十國焉，且定下周之宗

異盟姓爲後的禮，原望他們的共獎王室，其寶器的分授，疏遠的異姓都是無分的。——楚靈王詰——至說散鹿台的財，發鉅橋的粟，不過是據他人之慨，這便是周人尊禮尙施的政策。其賞罰用爵列，就是以爵位的進退爲賞罰，是以虛名來駕馭臣下的開始。政本偏重親親，自然是親而不尊，是周人的着意循私，較之殷人而又過之。雖然也講究近人而忠，但其功效實爲流弊所掩，這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自欺欺人的伎倆，可謂是應有盡有。誰看着尙餘存有天良呢？這便是演成春秋戰國鬪爭劇烈的根由，游說縱橫之士，就在這種社會裏面孕育出來。後來秦以武力統一天下，也就不可避免的要扮演焚書坑儒的這一齣惡劇，那陳勝吳廣之徒，也就趁着這個勢子唱起高調來了，這是殷周由質趨文的過程。這文爲制度的所由生，卽是人類日漓其天真，以演近於機巧。莊子所謂：「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筴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墜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這都是上好智術以掩其徇私之迹，失天下爲公之道必然的結果。這禮記上說三代政治

風俗的升降，格外還有許多，如說：「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又說：「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又說：「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又說：「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這些口吻，都是說殷周之不如虞夏，周又更不如殷。但是對於這種退化的根由，却隻字也未道及，他們似乎忘却了天子之位一國元首乃國人之公器。由公器變為私產，這樣的重大變遷，藏伏了退化的病根，都被他們忽視過了。唐虞二帝隻眼獨具，故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因當時傳播文化的工具未備，教育未易普及，故民間維護二帝職志的人們殊少，因此夏后氏便踏進一條錯路。殷周二代更認錯路為正路，以後的政治風俗，便有似河出龍門，終年累歲的滔滔東下了。在夏后氏之世，是應該繼二帝之志來做普及教育工作，——不是後世的孔學——提高民智，使二帝的思想普遍化，從正德利用厚生三事上着手，這纔是當時應走的正路。可惜唐虞之治，為期僅百餘年，竟誤入歧途，這是民族的大不幸。孔孟心知其

故，以格於時王之制，不敢直言，對於堯舜只是一些稱道罷了。

第九章 周公注重文治

周公的制禮作樂，注重文治，這是一種牧民之術，不是一種發展民族的企圖。周公定下這種政策的動機，不僅是鑒於殷政之失，而是有戒於殷民的難治，與淮夷徐戎奄之迭次叛變，纔想出這些方法來馴服這些人們。周公踐阼朝諸侯於明堂，使公侯伯子男繼夷戎狄之國，都各依其尊卑定其位次，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這朝覲之禮遂於是脫化出來。孔子曾對哀公說：「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可知周公制禮的本意，原在分別名分，使人各安於其分，以爲天下從此使無事了，這樣一來，對於消弭內亂亦未嘗不多少收些效力。但因禮教的束縛禁止，竟減少人們多少活潑進取的精神，所以舉動呆板，不能團結，內亂固可弭平，孰知外患竟無法抵禦呢。所以降及幽王的時候，犬戎便開始蹂躪成周，宗

廟宮室盡爲禾黍，失却豐鎬千里之地。東遷以後，一任楚之憑陵，聽其坐大，後來命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欲求庇一宗室的國家，晉一而不可得。此時的秦國，已成突飛猛進之勢，雖欲不入朝獻地，已是不可能了。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這些繁文縟節，不知消去了人們若干精神時日，魯稱禮樂之邦，國雖大而見過於郟莒。尙文治而忽視武功，崇虛文而遺棄實利。怎麼不讓華路藍縷以啓山林的楚，與小戎棧收五羖梁駟的秦，來跳跟大嚼鯨吞中原呢。雖然，在周公注重文治的初意，不過借禮樂來防民之淫，以鞏固其兄與侄的大業。那知制度一從隄防入手，連類而及，枝節橫生，末流之弊，竟至於此。無論三百三千不足以盡防遏的能事，恐再加什百倍以後，將見禮愈繁而情出愈奇，如今日之所謂法學，那是何等的周密呀。但其結果，遇暴力則撕而碎之，遇狡桀則竊而據之，這就是莊子所說：「並其聖知之法而盜之」了。但周公非是據有天子之位的人，不能責他以負天下爲公的責任，不過人們要曉得政治的根本既錯，注意文治也是無益，徒多些智巧，爲後世蒙君上之名而行盜賊之實的人，開些方便法門，點染一民族的汗史，有

些不值錢了。有些人認周公制禮是爲人類的必需，是對周家基業沒有含着什麼意思的，那麼我就要倒問一句，那些歐美人不懂得周公所制的禮，爲何他也在傳世建國呢。

第十章 孔孟表彰文治的儒學

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此就是說上有明君則重行而不重言，下有賢人，則徒有言而不能行。孔子的學問，原是效法周公，周公的注重文治，前已反復說明，孔子既要效法周公，赤手空拳捨禮樂制度之外，便無從入手。但周制尙文，用繁而費，這種政策，實促私有制度的形成。換句話說，就是在上的人們，拿私有天下的方法，反來引導人民走上私有財產的路子罷了。照理來說，劃井授田的制度，是只應該在天位傳賢的時代行使的，那時上下的政策纔是一貫。三代以天位傳子來行劃井授田的制度，根本上就伏了一個大矛盾，這君民間交互用智力的一種鬭爭，這就是由質趨文的一種潛存力，也就是商鞅廢井田的根由。孔子身爲布衣，不能把所有的思想達於

行爲，只好就禮樂制度來表現自家一點意思。這禮樂制度，是國家的上層建築，國家的柱石，還在人民的生產方法和生產力量，這是與君位有連帶關係，是不容以言語來使國家的基礎搖動的。所以孔子便空空洞洞的說了幾句足食足兵與富之教之的話，所以後世儒者之學，就是詳於禮節而略於生產，在時君的統治下面來維持治安，自身不免建築在一個大矛盾上面。！這便是儒學不自然的形成，但上溯創十六字薪傳儒學鼻祖之堯舜，他的面目不是這樣。——自然禮之爲用，是因人情而爲之節文，合於天時，設於地財，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穀，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這是有與生產相關連的意義。但是禮總是一種虛文的消費，是移注應該從事生產的費用以爲費用的。孔子當時忽略人口是要逐漸加增，維持基本生活的費用，是要逐漸擴大的。這種費用的自然擴大，是與時俱進，不由人力來施控制的。現在有些人們結合團體專心致志，從事生產的進步，來應付這種自然趨勢

，尙虞不足，漫說是不注意生產的進步，但來迂緩的控制消費，——由禮所養成的習慣，如遇着生產與消費不相適應的時候，自然要勉強來虛席的。這不是中國社會的一種普通現象嗎？這不是帶着瀕於破產的危險嗎？——那是決不如制禮的人們的意思那樣伸縮自如的。在這一點上，衛鞅還要看得清楚些。他說：「智者作法，愚者拘焉，賢者作法，不肖者拘焉」，人們的恆情，大都是拘泥於尺寸之間的，希望他們來自由應付環境，那是一樁不容易的事，所以虞書上說：「臨下以簡」，這是得牧民之要的人們纔能道得出呢。然則周公的制禮，豈不是與唐虞之治根本衝突嗎。觀周官一書，周公非不知趨策人民入生產之途，以寄託其精神，消弭其禍亂，僅以有傳子傳賢之分，治術遂不得不有繁簡之別。大本既差，枝葉皆敝，舍此不圖，雖智者亦無如之何。儒學既在這樣的方式上產生，故雖有革命的心志，而不能有革命的行為，因其不能有革命的行為，故其主張不能實現。哀公之對有若曰：「貳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這便證明儒者的政策，是與時君利害相抵觸的，徒拾得些繁文縟節來消費時間精神與財力，這不是未蒙儒學的利，先受

儒學的害嗎。

但儒學亦自有其不可磨滅之精義在，如成仁執中集大成諸大端，爲運用政治和研究學術的基本條件。吾人允當奉爲圭臬的，自是未可以一概論呢。

孔子既知他的主張不爲時君所採用，他便想以布衣而爲素王，証春秋以見志，著孝經以見行，他向或人說道：『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所以他在孝經上說，『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忠不及者未之有也』，又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他想借天來壓服人君，以興孝來代替周公的制禮，以爲人皆有父母，人皆有孝敬父母之心，或者可藉此以遏止時君的暴行。但其效力仍然有限，不過爲那些規行矩步的人們多加上一些紐絨罷了。並且偏重家族觀念，催促私有制度的形成，根本是一種暫時安內的企圖，但這國家安定與不安定，是與人口發展的速度有密切關係的。實際說來，孔子這種思想，便是盤空，未免多此一舉。事實告訴我們，政治的根本既差，便不能舍根本來說其他枝葉。譬如良田中種下糞稗，培雍總是枉然。

。反空折了農人許多血汗資本呢。

孟子的私淑孔子，是因孟子與孔子同是平民，同處一個階級有相似的環境，有同樣的心理，同樣的世界觀。不過孟子生在戰國禮崩樂壞之餘，對於禮制的維護，不像孔子那樣的深刻。但猶不忘禮的印象，即人心以示其端，就朝廷男女之際以示其範。孔子主張孝治，孟子便厚葬其親，並且喜歡他人的厚葬其親，聘辭齊來顯明儒者的學理，如關許行之說，答夷之之間，真是具拒揚墨放淫辭的本領。目擊井田制度十一而賦的崩壞，始反覆與滕之君臣相為論究，這都是些以布衣的地位，欲保留先王的遺制來救正人心風俗的辦法。好像一個蟻在磨上行走，蟻是左旋而磨是右旋，蟻雖竭奔馳之力，誰也知道這左旋的速度終久是不能趕上右旋的，如果把這個蟻變成一個推磨的人，由人來推動磨子左旋，這是何等簡切，那些螞蟻式的奔馳，豈不是都是可以省去的嗎。因為孔孟生當春秋戰國，目不覩平民革命的事實，所以想假人君的權力來行自己的主張，不免對於人君作許多的讓步，希望走上文治這一條窄路，殊不知時君連窄路也不容許去走。不但孔

孟在春秋戰國拿不到政權，就是後世所謂儒者，又有何人得到政權呢。結果這些文治的繩索只會束縛人民了。

我們要曉得社會的敗壞，是緣於政治，人心的敗壞，是緣於社會，政體是以經濟為基礎，我們要想挽救人心風俗，便要從政治下手，以改善經濟基礎，如果放鬆這一着，便是砍伐大樹，只會剔枝，終難連根帶根拔倒底一日，並且消費工人許多汗血。這是最不合算的辦法。

更進一步說，假設所砍的是樹，樹是無知覺的，雖剔盡枝葉，也沒有知覺，不能生什麼反抗。但國家的組織便不能這樣的說，你既要挽救人心風俗，言語間就不免要涉及政治，有時就會要討人君的嫌。既不能將政權挽在自己的手中，厲行其所謂仁政，在不善藏身的人們，又終日在那裏暗中篡索。一遇着專斷剛狠的人君，便應着履之乾的卦象，以至履剛，履虎之尾，竟得着噬人的凶禍了。

秦始皇承春秋戰國人君一貫自利之後，竟自混一區宇，掃除封建勢力，驅黔首如牛

馬，這些事實，增加他的自信力不少。這時儒者們從旁聒聒，是要惹起他的煩惱的，因為他的事實已證明儒者學理的效力是有限的，他的耳膜不願意再接受這些沒有效力的言論，這就是儒學在秦時廢墜的必然性。

第十一章 秦代政治不能適應民族當前的要求

秦滅六國以後，把治理華族的全權統一起來，照形勢上來說，算是政治的一種進步。但是那嬴政的觀點錯誤，視三十六郡爲其私產，視華族人民爲其奴隸，帝王的寶位欲其子孫世世享有，便想出些愚民的方法，如焚書坑儒，銷鋒鑄鐮，徙豪傑於咸陽以便鎮攝，築長城萬有餘里以固邊陲。始皇自以爲計謀慎固，這國家好像一座金城湯池，如果嬴氏子孫坐鎮其中，那些手無寸鐵的愚民，只好俯首帖耳受他的驅策。這原來是由他錯誤政策得到成功，將蠢笨的六國滅掉，製造下來的一架大墨鏡。在嬴政的心想，這世間一切的物质，都在我權力支配之下集中，——他的聰明被這架大墨鏡所翳蔽，一切事理都

蒙上黑暗的顏色來，——現在既無擁兵自衛的國君，都是一些各不相謀的黔首，誰有力
量來反抗我呢。因此凡是可以有利於嬴氏子孫者，無不爲所欲爲，這便是竭天下以奉一
人。有了一人的自由，就沒有萬姓的自由，這一人的利害與萬姓的利害便成對立。換句
話說，這便是以一人抵敵萬姓，一人孤立於上，萬姓仇視其旁以相攻襲，這種形勢是何
等的危險呢。這便是當局的一人，不知道擁護民衆利益，吸起民族的同情，來得到民衆
的擁護。這架專看自身利害的大墨鏡，便成當局與民衆間的鴻溝。任他當局如何賣弄精
靈，那些人民總在那裏啞謎似的猜着，得不到牠們一聲喝采的。嬴政不知道依着術變
法圖強的路子走，以國家的力量來領導人民，逐步向外發展，使他們安居樂業，精神有
所寄託，使內亂暗中消滅於無形。譬如船之與水，兩不相離。水漲則船高，水平則船穩，
水深則船大，水淺則船小，行船不離乎水，故船之高出水面者有限。人能深知水性，
然後可以行船把舵。當局者須熟悉民情，然後不至收家亡國。當秦纔把六國滅掉的時候
，因人民久苦戰爭，自然想得到一些休息的機會，嬴政應在這個期間，多用儒臣從事教

育來少事休養。一面該繼續把新開啓的土地移民屯墾，寬其稅賦，使內地無剩餘的人口，新領無荒廢的土地，人民得遂其所欲，來寄託他們的精神。什麼十家連坐的方法都以廢除不用，因人民感嘆衣食條件的下面，自然容易康樂和親，誰肯抵觸法網來罹於罪戾呢。況嬴秦繼六國紛爭之後，民雖罷而難期安靜，如欲專事休養如漢之文景殆不能，以漢法寬而秦法嚴，設使心無所寄，勢必日與法網爲仇，這揭竿而起的舉，恐仍是不可避免。最好是利用其興奮鼓動之氣，導之人於正軌，使民族的精神日見發展，民族的事業日有進步，使政治力量確實能夠領導民衆，雖陳勝吳廣劉邦項羽縱有野心，那得人民來附和呢。所以當局者的竊權利已拋棄民衆，聖賢之所傷心，豪傑之所扼腕，這是他們所見相同，而存心各異的地方。嬴政犯此竊權利己的錯誤，他根本不明白國家是民衆的國家，他滅掉六國雖然有功，但是他自願替民衆去做的，這不能拿來要挾民衆，求其拿國家的元首來做賞賜品。如果硬要當他是一種酬勞的代價，那便不能禁止英雄豪傑的爭先奪取。你們看那一朝要滅亡的時候，他的子孫不受當時桀驁者的屠戮呢。不惟

如是，即伐己功，矜己能，有飾非拒諫之才，恐有時及身而亦罹於禍患。如後世梁之蕭衍，唐之李存勖輩，不是歷史的事實嗎？嬴政此理而不知，徒與陳勝吳廣劉邦項羽以袒臂一呼的機會。以爲諸侯既滅，天下無人與我爲難，他是把人民太看得呆板了。人民雖愚，合力則智，可以馭於一時，不可必之久遠。豈知斬木爲兵，揭竿爲旗，一種兒戲的舉動，竟演成平民革命，爲千古亡秦的事實嗎？

第十一章 漢初君臣無發展民族的企圖

劉邦的爲人，本是一個無賴，所有建設國家的原理，人民與國家的關係，爲君所應負的責任，可說他是根本不懂。不過他乘暴秦之亂，受陳勝吳廣的暗示，趁着混水出一出風頭，豈有成謀定算，決勝負於指掌之上，奪取國家大權，來矯正亡秦的陋習，爲人民謀長治久安之計，推動人民向發展的正道邁進嗎？初焉劉邦的目標，只在攻秦，至羨慕皇帝的尊榮以爲大丈夫故當如是，是他的潛在力。當楚漢紛爭之際，羽之剛暴而粗率

與韓信彭越黥布等之苟富貴而無遠志，爲劉邦造成可利用的機會不少。又加以張良陳平等爲之巡視邏輯，使之有機必乘，無隙不入，這就是他成功的祕訣。良曰：「抑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這話實在是不錯的。觀漢之君臣，對於國家沒有共通思想，未據前代成型以爲準的，如伊呂周召之於湯武，徒以勢相禁制，以達合夥求財之目的。以勢相制，則勢有時而窮，勢力之所不及，即叛變之所由起，這正是少了人力的原故。果有使民族發展的力量，利用當時的人才，使牠趨於事功，銷其厲氣，這叛變的禍事也就無從發生了。

漢初君臣本以誅無道秦爲對象結合擁來的，但其自身却非湯武伊呂。秦既誅了，又將這個對象移在項羽身上，——爲義帝發喪，使使告訴諸侯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項羽滅了以後，對象既除，於是漢之君臣據有地盤的，便一個一個的火併起來。這固然是人君要想鞏固權勢的反應。但是這些起反應的與代劉邦贊畫掖廷的，都不知道從民族方面來策畫，以容納對方的勢力來消弭內戰。所以叛而輒敗，平而又起，內力既

分，其勢難以對外。所以劉邦一遇匈奴，便有白登之困，內既無可用之將，便不得不從劉敬定下和親之策來苟安旦夕了。

漢之君臣，本少儒者，不明春秋內諸夏外夷狄的大義，張良爲首屈一指的人傑，但他的大前提是爲韓報仇，不是來一心匡輔劉邦的。秦既滅，志已遂，仕隱於朝，緘默其口，固知一己之非伊周，亦灼見劉邦之決非湯武，陛下所謂天授一語，饒有絃外之音。楚項既平，而劉邦之勢已成強弩之末，不復更有所爲，這是明白易見的事。酈食其隨何陸賈等，皆嬴秦坑戮之餘，不足以言經術，於是這建設國家的根本大計，只好交蕭何曹參等刀筆小吏來跛躄從事了。蕭曹習嬴秦之律以爲漢律的胚胎，是漢之律意即秦之律意了。然秦以亡，漢以興，這便是當時人民盲目不知辨別，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實質無分，容易受騙的一個鐵證。王船山說「亡者爲後戒，而興者且爲後法，」這便是後世僞儒承君上意旨，將錯就錯欺騙民衆的一干事例。不過秦法繁而刪之使簡，秦法嚴而出之使寬，使面目略有變更罷了。以其未能根據人民意志，違悖典謨大意，其簡陋固不待

言。惟其不明乎造律之本義，與國家政治人民文化的演進，便覺才智之士難以躡屣，一人孤立難以持久，才有復行封建制度的政策。不知由夏到秦算是封建時代已經脫化，如果這種制度可以重行有效。那便不合乎人類進化的過程。正因為不能從人類進化上與政治演進上兩方面來着眼，便覺得前路茫茫不可把握，只好隨手抓住些竹枝樹條來圖暫時的插脚了。這種辦法，是不合於圖治之要的，是表現他們沒有為民族創造的精神，他們沒有想雪白登之恥，祇圖以子女金帛送與冒頓，以冀避免匈奴的威風。犧牲邊塞上百姓，來暫保一姓的安全罷了。他們知道苟有戰爭，匈奴傾國而來。他們却是無法喚起民衆，他們的摧秦滅楚，是他們求富貴的捷徑，富貴已得，誰肯再作此有害無利為民族打算的傻事呢。

說漢初君臣，除一二有特別作用者外，都是些為個人富貴來賣氣力的。——此話不為過刻——他們的政治是東塗西抹，根本不知道國家要建設的。因其沒有建國的方針，所以把那縣與封建揉合成治，君與臣無共同對外的目標，就不免有利害上的衝突。大封功臣

而功臣叛，改封同姓而同姓亦叛，這都是無建國規模，把天下當做一些財產，而又無整理的方法，所以天下已定便相率以入於酣嬉，這便是內亂倚伏的根由。最可恨的，是他們玩視外寇，不恤民族的犧牲，甚且連他們的子孫的利害都不計及。立國而苟偷若此，其未速即敗亡，祇算天幸，——漢武之却匈奴常另章詳論——正惟有此天幸，後世竟相沿不悟，蒙最後的奇恥大辱，實是民族的大不幸。

第十三章 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

武帝的崇尚儒術，表彰六經，罷黜百家，這種動機，固然是由於漢初之崇尚黃老，專事無爲清靜之習，漸成病廢，所以武帝急欲改絃更張。且武帝即位之日，年方英壯正欲有爲，加以董仲舒賢良對策，極力表彰儒術，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種說法，很可以爲武帝崇尚儒術的一種推動力，進而按之事實，講儒術如公孫弘輩，又皆廣陳經義，任人主採擇，其人柔順易使，不似講番老術之汲黯，黷

直難語。這樣的一種人材，正合雄姿英主驅策之任，所以武帝就益信儒術。但是他對仲舒對策之語，正心以正朝廷，又居君子之位不得爲小人之行，又漢政常更化而不更化，均未嘗採納焉。仲舒舉王道之大凡，而不知將此意以與世推移，因人進諫，切中時弊，所謂知其常而不知其變者，以昧於日新新民之道，未可遽語於時中之用呢。武帝雖禮用當時儒生，然少有不當，輒加誅戮，顯爲一時利用當時儒者的權術。當時儒者因更益溫馴，恪盡臣節，適成爲半面孔學的規模。汲黯之面折武帝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誅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爲治乎』。又說：『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武帝對於當時儒生儒術的真實面目，都被汲黯語語揭破，這種事實的結果，適成其爲愚民的政策，把誘啓智識的大門關住了，掉句話說，就是要人民就儒術拘束的範圍，人君却可以遊於儒術拘束之外，這儒術就變成了人君箝制人民的工具，這神用儒術的大權，就被人君一手攬着了。拿他所得的惡果來說，實在是趕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政策毒辣的多。後世人君也就曉得利用這個製

就而且是有所抄襲的方法來駕御這些臣民。這些臣民的眼光，也就只好從這閭閻裏望出去，以後就把這閭閻當着大門來走。試問從這閭閻裏望出去的眼光，能看見幾許高的山幾許大的洋呢。

從此以後的儒者，都受了政治影響，都是謹小慎微的，連漢初的規模都趕不上。養着這種由閭閻望出的眼光的儒者，做了幾篇文章來勸告這些人們，向那十二萬分努力，拚下絕大產業——國家——的國君表示恭順，免省他們觸犯時君的忌諱，遭受九族的誅滅，這是最好不過的方法。試問這麼短小的眼光的儒者，能替民族創造適應環境的新學術嗎。

齊人轅固謂公孫弘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所以轅固為諸儒所疾毀，遂以老罷歸，可見武帝當時所用之儒，皆小人儒呢。轅固於儒術其造詣如何，運用如何，尚不可知，然已不容於世，則當時儒臣與武帝之所契合者，不問可知了。這樣看來，仲舒對策所陳罷黜百家的意思，豈不被武帝利用了嗎。

百家之旨，雖不盡軌聖人之道，有時甚且相反，然其針對時政及社會立論，救濟的功，仍不可少。與其蒙上假儒學的皮，來擁護暴厲的君權，聽其蹂躪民族，不如摘取白家的精義，來攻擊時君裨政，指責風俗的瑕疵，來從事救濟人心的墮落。倘居領袖地位的人們，認人們思想之龐雜為行政之障礙，用武力來挾持，這是不能領導民族的領袖，行不滿人意的政令，硬要來鞏固自己政治地位的一種私見。其實只要你的政治觀點站在民衆前頭，果真是為的國利民福，一切財用公開，又不惜犧牲性命的硬幹下去，恐怕那些龐雜的思想，不期統一而自統一，好事譏評的人們都出謀畫策來贊助你的主張了。這學百家之學的人們，對於現政還生得出反應來嗎。董仲舒那種見解，只是就他個人擁護儒學的立場來說，不知異地易宜，便遺下了絕大的流弊呢。

一國的國君，或是當政的人們，不在這個政治演進的觀點上看眼，却要強人後退來就一己的範圍。譬如把自己矮小的身材比作尺寸數目，照作門楣的高度，硬要叫文王曹交俯首從這矮門下闖過，如不肯闖，就把他去掉。這樣一來，聰明才智之士就只好隱迹

銷聲，不問國事全身遠害了。使全國的人材盡如傴僂一樣，這樣為當國的個人打算，莫予敢撓，誠然得計。但一遇着與長大的異種人角力，這些矮小的鬼子們，怎麼能抵敵得住呢。我想這個譬喻不為不當，世有無識的人們，不責歷朝政府之不能容賢，反說隱逸之士對於國家不負責任，硬要人削足適履，這是何等的錯誤呢。這樣一種富有退化性的政治勢力，不根本剷除，結果是使民族層級退化，這就是中華民族二千餘年來對世界民族總退却的一個大原由。從中國後期歷史上考來，為一國首領的人們，往往是不受學術才德上優勝劣敗的公例支配的，他們是要以武力來強持他們的優勢的，特有講偽儒學的人們來替他撐腰，這種事實，是教唆全民族的人們轉變為虛偽強暴，不肯去做實在的事，漸漸養成普遍的習慣，這不但是攔住民族進化的關門，而且曳着前進的車輪使向後退却了。莊周說：「鶴雁雖長，短之則悲」這些有才智學術而且勝過當代領袖的人們，一歷朝隱逸——生在中國，都是無用，都是冤枉生的。

這都是漢承秦制，本其府庫天下之心，一意相授，武帝更竊儒學之皮毛以文飾之，

以訛傳訛，使民族思想晦暗蔽塞者二千餘年，使政治學術風俗人心無一不着着後退。漢武帝此舉，影響民族前途不小，如果不是這樣，而是由天下爲公的經濟基礎，上率二帝野無遺賢之教，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恐華族的勢力早已遍布於五洲了。

第十四章 漢以後的政治使英才短氣民族意識銷沈

武帝既採用董仲舒言表面更化漢政，一面仍然本其極端擁護君權的唯一手段，這明明是一種利用，陽崇儒術，而陰攬君權，後世更少有如仲舒那樣人格的人，啓迪人君，那些人君也就明目張胆的指鹿爲馬，肆行詐欺，愚弄其民了。對平民既然施以愚弄之術。使他馴服，永遠供一己的征取。則對於才智之士不滿意現實的人們，就必然的要施以鎮壓的方法，極其意想所及，嚴刑峻法，以造成人們的恐怖，這是與愚民之綑同一根蒂發出來的。這種政策，乃領袖們心坎上一種儉安苟且情緒的表現，這是無須說的，如果

從民族的立場看來，這是一種後退的自殺政策。在這種政策之下，決不能養出領導民族前進的第一等人才來，前進的人才之產生，是要有適宜的社會，適宜的學術，適宜的政治，適宜的領導者。至於資質的聰穎，體魄的強幹，則何代無之，以環境條件的不適合，便不知不覺的走入歧途了。所以以堯爲君，則舜不難由平民而使之在位，更由慎微五典，納于百揆，賓於四門，納於大麓，進而命陟帝位。在堯的存心，寧知帝位之爲莫大之富貴嗎，又豈不知帝位之爲己所固有嗎，因他一心在增益舜之不能，使允堪爲帝位之繼任者，此其存心，可以動天地，泣鬼神，感萬民，所以暗示於舜者至深且切，此即舜之所能成其爲舜。實在有賴於堯的培成的地方不少。孔子因以天之大比於堯，指其能虛己以成人，造物而無我，得一舜而禹稷皋夔二十二二人無不各效其力，其實堯只是一個莫有私心，目中祇知有國有民，並不似天之不可階而升。所以孟子說：「人皆可以爲堯舜」，孔子所以大之之由，蓋以反形乎時君之狹小自私，冀其有所感動，然後爲此言的。若真是把堯舜看得如天一樣，那是愚人的一種蠢見。

反過來說，如果這領導者不是聖，而是秦以後的一般人君，這種固持君位的私見牢不可破，便由領導者的思想影響於政治，政治影響於學術，學術影響於社會。雖人們有聰穎強幹之資，但以耳濡目染，無非爲個人富貴名利，這貪富貴名利的病根，自然會滲透這聰穎強幹者的心坎，「腦海」成爲支配一切行爲的原動力。無疑的要與人君的勢力凝結在一塊兒，則這聰穎強幹的人們，適成爲虎豹的爪牙罷了。縱有一二有志之士，不肯隨俗浮沈，葆其固有之美質。然與時際會，終老衡門，得不到小試的機會，經驗既缺，資望殊淺，何從得到第一等人材的物望資格來。

進一步說，秦以後的政體是壓制才德之士，把他排除在政治勢力之外，不許他來領導人民，以來維護人君個人首領的地位。這種政治，倒是對於一般暴徒與民間不規則的行動，反使極端可以自由的。因爲這些事實祇能害及社會風俗，在最短期間，是不會危及他們領袖地位的。彷彿他們看來，這除惡勸善化民成俗像不是他們的責任。由此這個社會就成爲暴徒勢力的社會，「政治的鬆懈使士豪劣紳們得到很大的自由」排擠才能善

類便無立脚的地方。——政治根本上不容許有善類，所以才不能善類是狠不自由，孫先生才講革命的時候，對於什麼人自由，什麼人不自由，全未加以分析，就是看不出本國政治的弱點。後來講三民主義，一味說中國人過於自由，一樣看不出弱點來，真是糟糕。這秦漢以來二千餘年政治的弱點，養不出領袖人物，自家不覺得，還要勞歐美來調查後，替我們一語道破，說中國人祇是無領袖。——中日紛爭起後國聯調查委員的批評語，——那時得這個病根，就在我們爲一個領袖地位來演成的特別政治，——就是才德不配當領袖的人們，挾着武力硬要來當領袖，——這種政治，是以處領袖地位之人的權利爲中心，開始向四面放射的。這樣一來，就得到譏夫高張，賢士無名，奸佞滿朝，忠良殺戮的結果。這是因爲譏夫奸佞，與當時處領袖地位的人同其利害，站在一根戰綫上的原故。所以中國這個政治是有利於奸回昏亂的人們的政治。

內政既如此的昏亂。這是民族退化的根由，讓一步說，亦祇是想不出辦法來隨便一些敷衍，這全國上下兩方，必然是各據一根戰綫來彼此互相估量的。在上者知道得不到

民衆的擁護。——如古來詩歌，有些描寫邊塞沙場傷心慘目的風景，這是他們厭棄國家一種情緒的表現。他們得不到人君來代表他們的利益，所以就無心擁護牠。——一遇着強鄰壓境，便甘受屈辱，如果要違拗的話，往往得到撓敗師徒的結果。在評論史事淺見的人們，將這責任放在將帥身上，以爲他們不善用兵，這種批評太不允當。試問百姓窮困，軍餉無着，軍實不充，上無德感，士無鬥志，這些大病，豈是區區統兵的人所能補救的嗎。所以在不能更化政治，而又少明利害的虛擁領袖地位的人們，便甘心屈辱而不惜了。

漢初屢次以女妻與匈奴，佐以金帛彩繒，美其名曰和親，其實即是納款。以漢代君臣本無發展民族之意志，總以虛擁領袖地位的人們，苟得安閒爲幸。及漢武之世，屢次擊破匈奴，然亦非是爲的民族，不過爲子孫計，欲身當其難，子孫當其易耳，——武帝語戾太子：「所以雖得其地，未嘗以爲國家民族拓殖利益，史記載曾一度移民！元狩二年用主父偃計移民於朔方——以政府無澈底之經營，用力不專，成效無幾，恐尙不足抵償匈

奴入邊之損失。所以當時長於計算的臣子如汲黯主父偃輩，大都諫阻征伐匈奴，以這種得不償失，徒勞無益的武功，怎能壓服他們擁護人民利益的心理呢。甚且因此窮兵黷武之結果，人民祇炫於漢族之勝，不及覺察元氣的虧耗，加之後人盲目的崇尚武功，以後的民氣漸變成虛驕柔脆，這是驚於名而不循乎實的政治，有以導引而成。總之人君視國家爲私有，以保持君位爲大前提，而視爲人民謀拓殖利益爲無足重輕之事，所見既差無論對外族的示強示弱，都無有一些是處。

第十五章 武帝以後的儒者在高度鎮壓之下實踐半面孔學恪盡

臣節

儒者之學，本肇啓於二帝，至周公制禮作樂而儒學之形一體漸備及孔子以布衣當之，雖非二帝本來面目，然猶全乎其爲王者的器量。故曰：「其爲東周」託春秋以見志

，且雍也亦可使南面。當時在孔子所謂儒者的本身，不必視君位爲無分，在社會上的一般人，亦未始指其有不臣之心。可見當時的人心，猶知天子或諸侯之位，乃有德者之所居。桀紂幽厲，本來是開世一出，他們的亡國，一般人都認爲很公道的。孟子的規模雖然不及孔子，然猶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不消說孟子便是當運的一人。是故講儒學而不言王道，言王道而不欲以身任之，那便不算真儒學。（這不是鼓動人們的領袖慾，而是要人們担負挽救民族的责任，須知儒者之鼻祖堯舜，是有天下而不與的。）以儒者自命，而無拯溺救焚之志願，與領導民族的才能，那便不算真儒者。拯溺救焚是之謂仁，儒者當仁固應不讓，試問漢以後的儒者，誰是顛頑孔孟志濟斯民，而當仁不讓的。恐怕他們都忌於楚漢時之紛爭，沒有勇氣來肩荷這種戰爭的责任，就把天命所歸一語，硬當作定理看待。他們看見漢家天子那種尊嚴，那種榮貴，與三代迥然不同，儼如天神一般，所以他們不敢希冀非分。他們却忘記了這是人君的奢侈，這是孟子之所不屑爲的，這當然是人君服御的不度，是當日婁敬叔孫通等導佞之所爲，豈可因此而卑小儒者之器。

本論二 十五 武帝後儒者在高度鎮壓下實踐半面孔學恪盡臣節：一一二
量，促狹儒者的局度，自比於小人儒嗎？

漢武帝以厚祿峻法顛倒才智之士。這根本不是採用儒術，而是利用儒術。當時儒者宜事之以直，寧疏遠而不見用。毋曲學以文其非，取這種對待的方法，雖儒學在當時不見大用，然猶不至張起半面孔學的幃幕，來閉塞後人的耳目呢。這個張起半面孔學幃幕來的原故，前由於秦人一炬，儒道中絕，文景以後，儒學始更萌芽，無異是儒學的重行開始。此時講儒學的人們的腦海中，不消說滲入了秦代的許多功利思想，始基不正，自然是要貽害無窮的。孔子之刪定六經，——刪繁就簡節省人們的精神時間——本是述而不作，除春秋誅亂臣賊子外，並未滲入其他成分。孔子之意，即以六經爲孕育人類領袖的酵母，吾人必總覽六經之大旨，然後能窺孔子之全豹。——孔學在一種不自然環境當中成了一個畸形。——今漢儒各執一經，考校其一字一義之微，其才能近似於藝術，只算是想復興儒學的初步工夫，於堯舜儒學孕育的大本，真是未能確立。當時的所謂儒者既受了政治的影響，早已把秦法漢制的思想充塞了自己的腦海。今又把某一種經文枝枝

節節的意義，引來傅會其說，據以斷事，人們遂認真個儒者之學其效用不過乎此。恰好是爲人君利用的一種工具。不知這是以秦代思想爲骨子，以儒術爲皮毛的一個披上羊皮的狼，他是容易欺蔽人類，而是常常向人類肆其狂嚼的。掉過來說，這些經文不澈底的加以片面的解釋，有時候與孔子之意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的呢。

講儒學的體制，原是以王者自居，是以有天下而不與爲條件，不一定是因人成事，其學理無非闡揚王者治世的手段。不過孔孟生當封建之世，當時君臣一體，軍政同途，人民愚而力弱，不容易得到平民革命的機會。如佛肸公山不狝陽虎等皆意各有在，不是可以憑藉的一種革命勢力，孔子的退而講習，實不得已。孟子所處的時代雖略有變更，然仍是得不到平民革命的機會。武帝表彰一面，公孫弘輩又蒙着一面，後儒直認孔孟只能講學，并且只能講爲臣爲子之學，是只看見了孔孟所講儒學的半面，這樣坐井窺天，爲害不淺。

真儒學爲造民族領袖之學宜於一國最高學府中擇國中雄傑俊秀之子弟而具體教之以爲養成一國領袖之預備今世中學以下萬不宜設此科來養成兒童自尊的心理因其既不能實他來躬行實踐反爲社會不能合作的大弊國人前此對於真儒學無深遠之研究所以民族得不到領袖以道統途說之儒學擁護者一無愛惜同族之心一而妄充領袖羆馬虎皮就是國事日壞的原由

本論二 十五 武帝後儒者在高度鎮壓下實踐半面孔學恪盡臣節三二四

漢武本乃祖視天下爲私產之心來提倡儒術，其爲偽固不待說。且好殺戮臣下，當時之儒臣奉命惟謹，故只能剛發學理之爲臣爲子的片面，本爲當時環境下產生的現象。據理來說，後來時代一移，人們便常有所覺悟，何以武帝以後竟不加體察，將錯就錯，奉爲圭臬，豈不是一般人們精神，向政治暴力屈伏的一種表現嗎？由此錯誤的結果，後世諛媚小人，動輒導人君以無君不臣之罪加諸臣下，以求信任，此種事實，充斥歷史篇幅，結果所號爲儒生者，盡皆變爲妾婦。這就是二千餘年來天下之公器，徒供盜賊之競奪，無有王者崛起的大原故。此等一知半解之自儒其儒，自誤誤人者，尙可據他們的解釋來再誤民族嗎？

攷查歷史上所謂儒者的事實，他個人大半是個不事生產的無產階級。——也有例外——如果他是與孔孟學理全面符合的一個真儒者，他却能從政治上來間接使人民走上生產之路的，因爲儒學的本身，本是帶有平民的精神。不過孔子上繼周公，所闡學理原爲當權者說法，就當時的環境論，這種學理，原不須要普及民衆，當是實亦無法普及民衆

，只要他們做個上行下效就夠了，所以說他是造領袖的學問。漢武以後，不把這儒術來約束君主，反拿他來箝制臣民，臣民也就甘於受箝制。這樣的曲解誤用，中其毒者不成爲順君滅義死而無益的愚忠；便成爲私事一姓，不擇順逆，背叛民族的漢奸。前者以不明君死社稷，大夫死國之義，後者以不明春秋嚴猶夏之防，內諸夏而外夷狄之義。這些都是受了曲解六經的害的。

儒者的不事生產，是孔子取其大而略其細的地方。漢武以後儒學既因曲解而虛僞，又因政府的提倡引誘而人數增多，成分揉雜，甚且日事呶呶咕嗶於殘編斷簡者，亦自號曰儒。因而儒之數目激增，殆且徧於全國。以這麼多數的人並不從事生產，便隱然成了一個豫備貴族階級。一般人看見僞儒者的尊貴而且普遍，便引起了他們的羨慕心和虛榮心，所以他們甘心實踐半面孔學格盡臣節，但他們却不必完成爲當代的所謂儒者。祇要不從事勞作生產，便得到他們心境的安慰，他們一面會專任智巧來代替生產，這就是僞知識充滿惡劣社會的來由。

儒學在春秋戰國的時候，因文事工具——筆墨紙印刷術等——的缺漏不備，物質條件的不具，勢不能將儒學大意普及民衆，這是事實，但這是暫時的，儒學雖爲這領袖之學，但使大意普及，亦正不妨，人們祇要知道儒學道理之所在，可說巢父許由隨在皆是，決不會因此鼓勵其領袖慾而釀起爭奪來。孟子當時必欲把勞心勞力分途來看，未免把社會太看呆板了。因此竟推定社會的演進爲一治一亂。似乎認這一亂是無法避免，又未免太信任這自然推演了。漢武以後的儒者們，實踐半而孔學的結果——君不君——竟把政治引上一治一亂的塗轍，因與孟子所說湊合，也就不去探求致亂的根由，豈知凡是國之所以亂，無不由於人口消費的超過生產，雖然有自然——地狹人稠——人爲——浪費不節——的不同，但這些原因居領袖地位的人們都可以設法先事避免的。不一定就成定理。這避免的方法，就在內部人工整理的方法如何運用了。——有治無亂——此外還有強隣勢力的侵入。也可以將這一治一亂的程式衝破。爲有亂而無治。人們凡是推測一種道理，無不看他設定的範疇，範疇一有變更，這推測當然就有不確。這人類社會——

除開特別原因外——就大體來說，是次第演進的，——不必定是進化——事實既有演進，這範疇當然就有變更，——只是實踐半面孔學的人們不知道——且漫說遇着強烈優秀的異族起文化上的劇變呢。

人事既是演變的，所以儒學亦富有演變性。祇就周公孔子孟子三人來說，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講學提出性善并稱仁義與養浩然之氣，這些地方，都看得出他們的演變來。換句話說，就是他們要博採古人之所長來應付現代社會。孔子身既不用，就來闡明以孝治天下的學理，這是看得出孔子意旨之所在的。但這是孔子就布衣地位來觀察社會所得到的一種綜合，是要連君和民一齊關鎖在這座孝字的城垣裏面，來安定社會基礎的。使孔子果爲東周這種方法便不見得莫有改變，因大權在握，便應得直接有效的辦法。後世人君不能充仁愛斯民之心，根本效法孔子，一千實踐半面孔學的臣子，都來拘泥於不適情勢的迹象，取其以孝治天下一語，來崇尚虛文，塗飾耳目，抹殺孔孟學理的精神不少。人君既降孝治，則繁文糜費勢所難免，當時臣下之以此匡君，亦

自有他的用意。（恐觸怒得罪）不過爲君的人們，不該以此自限，還得從愛民的根本上入手罷。即在當時海內民族惟我獨尊的時代，縱然隣國沒有英主，境內農產調和，這種實踐半面孔舉敷衍文治的手段，亦是僅能得暫時安定的。

方今國難當將民族之存亡所繫父母子女之關係去慮文回於質候養老適中並死

從簡以費於父母之費費於國家注於父母之力注於國家爲之父母者亦當盡其晚年之餘力以自給自足間接以效力於國不可厚責兒女之供養如係壯年之父母幼年之兒女當極力爲兒女謀獨立生活的方法不可廢監遺產使之坐食與其如此毋寧積財於己以爲養老之資不若貽害青年比較社會之損失尙小且父子之間不以孝道相相責報亦可以維持相當情感難孝之名而有孝之實於儒學之大旨亦不相悖反這不是一種變通的辦法嗎

第十六章 由魏晉及唐佛老二氏乘政治的昏亂導思想於消極

在一國政治不能領導人民思想的時候，受四面環境的壓迫，便生出一種反作用來。

但這種反作用，是要來看政治本身的毒害，加壓迫到那一層民衆身上，便是社會上的那一層民衆的心理先起反作用。東漢末季，寺宦竊權的政治，是當時士大夫階級思想起反作用的根本。王船山讀通鑑論中說：『曹孟德愈知挫折者之固爲亂政，而標榜者之亦非善俗』，於是綜核名實，欲以抑制其浮蕩之情，其法未始不善，不過曹魏的政治本身

，是承襲漢之餘習，依然是個產業天下的思想。依然是不能領導人民思想的。加之曹氏父子先後以文辭相誇耀。士習早已趨於浮華，無所用其才，則狂者自然是要放浪形骸，及時以行樂，無所勵其志。申其氣。弱者自然是要脂韋柔媚，隨政治的趨勢以取容。又何怪當時士大夫階級的思想之詭出於玄虛。浸淫於佛老呢。夏侯玄何晏阮籍嵇康之於魏，王弼劉伶王戎王衍樂廣衛玠阮瞻郭象向秀之於晉。這一般人專務清談，遺棄世務，這是他們十足消極自由主義的表現。這是與曹魏司馬氏之篡竊天位，玉食萬方，在個人享受上說來，是有因果關係的。加之前距黨錮之禍爲時不久，前事不忘，談虎色變，他們拿老莊清靜虛無之學來敷衍他們的門面，這是最好不過的隱身術了。至說當時有一般人拿老莊之學來傳會易理，這是他們師心自用的一種牽合，根本不知易理是以乾坤爲門戶，以陰陽剛柔四時之推進爲易理之演變。繫辭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這是中國開山的一種唯物的哲理，怎麼能與清淨無爲的老莊之學相提並論呢。這分明是兩目病黃硬說四圍都有日光反照，是無有一些是處的。

本論二 十六 出魏晉及唐佛老二氏乘政治的昏亂而思想於消極：一二〇

進一步說，老莊學理的積極方面，是對現代的政治社會表示不滿，而是潛伏着改造的意識，仍然是不免有自由主義的傾向，但不是他學理的全部。不過當時夏侯玄王弼諸人，就適合他們口味的部分，摘取一些來寄託他們的思想罷了。他們不採取積極的部分，偏來採取消極的部分，這便看得出後世民族性的弱點，這便是秦以後數百年的政治勢力所養成的。從此以後，政治的方針未曾有變，這清淨無爲遺棄世務的思想，就普遍於民衆，相沿以至今日了。

佛學是由漢明帝命蔡愔到西域去求佛經，伏下了根柢的。到東晉時代，姚秦以鳩摩羅什爲三藏法師，崇以殊禮，廣譯經典，而佛學始風行於士大夫階級，佛教始普遍流行於民間。近人呂思勉以爲是老學與易學的哲理，不能滿足純正哲學的要求，於是佛學乘之而興。『見白話本國史二編中古史二一四頁』這是他看見了當時學術的弱點，而忘却注意到政治弱點的原故。據作者個人的見解，這佛老二氏的學理，深入於下層民衆，浸淫於士大夫階級，這都是當代政治弱點的反應。

凡是一種學理，在民族國家的根本上看來，是應該以發展民族爲基礎的，有學理以爲原動力，來組合健全政治，纔有向前推進的可能。抱民族主義的人們，應將某種學理加以精密的分析，採取適宜的部分，提供應用，以爲政治直接間接的補助。這是民族領袖們，站在民族的最前衛，實行統制民族最經濟有效的辦法。把民族固有文化，經過一番整理之後，自然要除却許多弊害，這是要才德出衆，廣攬賢才，善善從長的領袖，纔能做得到呢。

如果政治不健全，便只好聽任一種學術，在政治領域內自然的產生，既能有產生的適宜性，也就不是拿一種手段來撲滅得了的。——不從病根上着手的話——所以北魏太武帝之誅沙門毀佛書佛像，其後北周武帝毀寺塔，焚經像，厲行廢佛。以及唐代武后之黜佛，都未曾收到若干的效果。因其有適宜的土壤，雖一時披其莖葉，但根紮自潤，不久又會發生。

因佛老二氏消極思想之盤踞人心，有時與牠種思想發生結合，便形成一種新形式

本論二 十六 由魏晉及唐佛老二氏乘政治的昏亂導思想於消極：一二一

本論二 十六 由魏晉及唐佛老二氏乘政治的昏亂導思想於消極：一二二

這是必然的道理。宋代理學的產生，恰是這個原故。因其濫入了佛老的成分，故其學理偏重精神的修養，一面對於政治的本原，至尊無上的君位，依然與漢儒一樣，一點也不敢論列，換不了君位是天命所歸的一套基本觀念。他們並莫有去澈底研究這二帝三王之治，是怎樣的不能回復。現代人君的政治觀點，是不是與二帝三王同一政治觀點。這政治觀點的不同，是不是就是治道隆汙的分別。後世人君政治觀點的錯誤，有莫有改善之可能。如是因栽插的錯誤，——就是國家建立的形式——根本不易改善，那就應該在學理上來討論這種不易改善的原因，以求改善，放鬆這着；這是不是後世孔孟之徒的無能。這一切一切的他們毫不理會，這是不是他們意志卑陋精神萎靡祇會因人成事，缺少特立獨行，雄視萬方的氣概。所以他們在社會上是處於從屬地位，是一個被支配者的材料。他們的勢力的升降，是看當時人君在政治上的分配，及其操縱之手腕如何而定。他們是常不起政治上的摧殘，一經摧殘以後，他們便銷聲滅迹，溶解於無形的。因為他們莫有政治根本上改革的企圖，一遇着國家紛崩離析的機會來，他們是無心來利用，亦莫有力量

來利用的。說起來亦可笑，有志願治理天下的人們，却無一種氣魄來担負這種艱鉅，專憑來擁戴別個，這就是中國二千餘年大半部歷史，找不出一個領導民族發展的領袖，一任盜賊流氓異族之相競以奪，悍然高據君位，一干所謂儒生，只會匍伏下拜的一個內在的條件。變更導民之政為取民之權，大本既乖，這不是些須修飾所能奏效的。宋儒於漢學之外別開生面，自是有他的意義和價值，但對於民族上影響甚少，祇是講些識仁，主敬，主靜，存誠等的傳授口訣來約束身心，一消極的士却不能在政治舞台上充分表現，那百姓們是沾不到多大的實惠的。

元明兩代講宋儒學理。大概不出朱陸二派的範圍。即王陽明的致良知，亦逃不出金谿的門徑，他們創造的地方甚少。

明朝既亡已後，人民感受到異族在政治上不平等的壓迫，其中有少數識見超卓的，便感覺民族抵抗力的薄弱，這必然是學術伏下了一個病根，他們使竭力來加一種矯正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等。他們同是有這種感想的人，他們站在被壓迫民族的立場，

便反應到以前君權之濫用，——黃宗義原君——民族意識的銷沈——王夫之宋論——號爲儒者學術的空疏——顧炎武著郡國利病書王夫之著黃書——能力的柔脆，——顏元之研究兵農，身習六藝，顧炎武之創立錢莊徙居關中，——他們有復興民族之思想和企圖，表現出他們反抗異族的精神，這是漢以後明末以前的儒者所不及的。他們的氣概，是值得富有民族思想的人們佩服的。不過滿清的政治路線，不但不與他們的學理相適應，而且是立於反對地位，——前章說儒者柔懦，他的思想是跟着政治路線走，——所以他們的學理，是得不到有力的傳人呢。近人呂思勉他以爲是當時思想復古的趨勢，於後世的事情無暇分其精力去研究，這思勉所說的話，是忘却了國家政治力量能夠支配人民思想的原故。——白話史第四編一一七頁——試問清初興文字之獄，燬書二十四次這人們思想不受到相當的影響呢。顧黃王顏四子不過藉復古以寓意，避言事以遠害啦。康熙之表彰程朱，尊崇理學，這是不是想士大夫從消極方面，實踐半面孔學恪盡臣節呢。恐怕在滿清將南京既下以後，中日戰爭以前，這二百餘年中間，都是這種政策的支配吧。那些胆怯嗜利思想消極的儒

生們，——四子除外——怎麼不承着政府意旨來銷磨歲月呢。這便是願黃王顏四子得不到有力承繼者的根由。

第十七章 環境歷史造成的儉安固閉

民族佔領地盤的四圍，向無優秀民族相觀而善來溝通文化，這是民族的大不幸。中國除東南兩面瀕海外，其餘西北二面，概屬滿蒙回藏怒夷棲息之所，這些民族都是有待華族的文化來發矇振聵的。其餘便是緬甸安南日本朝鮮等國，除却近六十年來的日本外，便都是一些文化較次的民族，他們的寶藏都不足以引起華族人的歆羨。比較遠一點的如印度波斯大食大秦等，都因道遠梗阻，交通不便，雖間有可以使華族得到一些利益的，如印度之佛經，——害多利少——波斯之商品——數目甚微——等，究其關係殊非密切。可說是在清代以前，華族與四鄰異族無文化上之競爭，因養成惟我獨尊之觀念，而實際是無恥的屈辱於人。

一個民族照正常生存的道理說來，一切能力應該循着進化的路子與年俱進，因其閱歷豐富，自然能力增加，這在運用政治的人們，能為民族造幸福的國來一定是這樣。在中國看來就恰恰相反，因為中國運用政治的人們，得不到政治上的比較，其間優良惡劣之觀點，是狼狽糊不清的，所以他們對政治，就不知不覺的儉安固閉起來了，在政治上既缺乏了改進的願望，這無疑的就會變成阻礙民族進化的惡劣勢力。所以中國人是閱歷多來越發胆小，越見汙濁，反轉不如青年們的英勇進取坦率真誠，這就是證明中國社會是一個退化社會。社會是政治的寫照，也就曉得中國政治從歷史下半期說來是一個退化政治。所以人民對於政府之設施，往往是淡漠或疑懼，這是受過歷史和事實上的教訓鑄成的心理。因為秦以後的政府，向來是祇知剝取人民，對人民不懷好意的緣故。

第十八章 民族氣質日趨浮薄

政治是人民生命的保障，民族強弱的關鍵，政治不良，則經濟之分配不均，物質之

享受，與勞動之行使，在貧富兩個階級皆不能有適宜之運用。貧者勞動過度，富者勞動過少，過度則傷筋骨過少則滯血液在不適生存的條件上原是一樣的。貧者物質的享受過奢，富者物質的享受過豐，過奢則以溫飽之不足而致疾，過豐則以溫飽之有餘而致疾，其失依然是無二樣。欲來從事矯正，就該從經濟機構上來大事改革，使分配普遍勻稱，此着一漏，一切政治設施，都是空費氣力，東扶西倒，民族精神，是不會雄偉龐大起來的。所以古之聖王，必勤求乎牧民之術，而尤以豐足衣食爲先，使人民得遂其生，適其性。如神農氏之制醫藥，軒轅氏之察明堂究脈息，處方餌，消除疾病，強健身體，無一而非牧民之術。本此道以牧民，人民未有不愛戴之如父母的。此便是莊子所謂「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後世只知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使民不得遂其生，適其性，因損傷其精神，遂波及於身體。所以今世人體日趨矮小，證之國境隨處掘出人骨化石，以與今世人體比較，這化石的骨節都要長些，這就是一個人體衰退的明證。再看今日都市醫業之發達，尤爲一種顯示。

據國聞週報十一卷三十五號載向景雲東遊印象說是一日本因爲近年提倡改良人種的結果日本人的身材却是參差不齊平均起來青年人都比老年人高壯這便是日本

本論二 十八 民族氣憤日趨浮薄…………… 二二八

優良政治的成績還便可以反
將明本章所持理由的正確

第四編 本論三 弱點的暴露

第十九章 對異族忍受可恥的女性同化

自殷周山質遷文以後，華族不知幾時染下了一種務名不務實的怪毛病，我想這種心理，是與漢武帝的征伐匈奴，一定有因果關係的。武帝征伐匈奴之目的，與始皇不同，始皇命蒙恬伐匈奴，盡收河南地，築長城以爲之限，這是他杜絕匈奴侵略的一種政策，這種行爲，對於民族不算是有害。武帝就不是這樣了，他的目的是在誇耀他個人的威德，把整個民族的利害完全拋開，不惜與匈奴互相仇殺。這便是委邊塞人民之生命財產於匈奴。以來換取衛青霍去病諸人的功業罷了。尤不可解者，收匈奴渾邪王四萬餘人處之河南地，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爲五屬國，使河西南山至鹽澤一帶空無匈奴成爲曠土，直是大反始皇之所爲了。從此與華夏雜居，到東漢和帝時，南匈奴以屢破北匈

奴有功到北匈奴逃亡後，漢朝却不遷他到北匈奴的地盤上去，偏要任他雜居西河美稷（今之鄂爾多斯旗）——後來曹操更將他們移過山西。原有北匈奴數千里的境域，竟坐令鮮卑人侵佔，招致後來的大患。這一段事實，拿今日帝國主義國家人民的眼光看來，這華族首領們的舉動，不是一個愚蠢可憐的獸子嗎？——心想漢化以後，不再爲患，不知門內引進匈奴，門外來了鮮卑，他們總想永久得到安閒，根本不知人類是要奮鬥才得生存的。——後來自西晉時代割淵倡亂於離石起，到魏孝文帝遷都洛陽變易胡俗止，其間紛紛擾擾者共一百七十年，這不是華族人民的伊戚自貽嗎？這一百七十年當中，政權淪於胡虜之手，所有黃河流域的人民，受異族欺凌汗辱之慘，而又呼籲無門，含酸茹苦，難以言喻。在一個富有自身生存學理的民族，能培養待出民族領袖來的時候，一受到這種刺激，必然要起多少的反應。但是在這一百七十年當中，除張茂李嵩馮跋等同一股虜胡來趁火打劫外，絕未見有振臂一呼的豪傑，領導被壓迫的華族，來驅逐胡虜啊！在偏安江左的司馬氏，累葉而後，視中州之淪陷，早已漠不關懷，更有誰人曾以此輩同族之罹於

水深火熱爲念。這都是自秦漢以來，學術既以一面之解釋而失孔孟之真，連孔孟一種不自然的形態，都未窺其全豹，政治又復提倡個人主義，——人君以天下爲私產，聽豪強兼併土地。——來摧毀根幼穉的民族思想。於是精神散漫，民族肢解，因此演出被人宰割不感痛苦，像一個失了知覺的動物的悲劇。

從漢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以四萬餘衆降漢，居塞內事起，至宣帝孝武帝太元五年符堅散戍人十五萬戶（百萬有餘）於方鎮時止，先後約五百年。其間異族之相繼內殖，無論其自動抑係發動，先後不下二三百萬人，更經過此長時間之生聚，其蕃衍之數，必然較移殖之數更爲龐大。——千萬以上——二者合計，其人口數目總在千數百萬以上，以此龐大之人口，加入到二三千里黃河流域的境土以內，這華族的生計，受壓迫到何種程度。其間因受生計壓迫而竟被天然淘汰去了的，不知究有若干人。當時并不聞有將華族移往塞外之舉，照人口爲生產所控制的原理說來，則華族之暗中被淘汰的，亦當有千數百萬。又加異族挾政權之賤賤，殘害華族，所失掉之人數，必然更大。民族人口在

歷史上受到如許大一筆損失，以往的歷史家。他們竟失了檢點，把這一筆虧損賬漏略過去，這是什麼原故。因為他們的眼光，只注射到一姓之興亡，他們的思想，是受了後世帝王個人主義的支配，忘却他們所學儒學的眞傳，是具有嚴夷夏之防的要訣。甚或因爲他們要諂事異族的帝王，縱然不忘却，也落得些照漢儒的老路子走，來講孔學的一半，恪盡爲臣爲子之節，把這種事實姑且置之腦後。當時既將這一筆賬抹煞下去，後世淺見的人們，便認這是異族被華族同化的事實，他不但想把沈睡二千餘年的人們提醒，反要來加上一些麻醉藥劑，使民族的精神麻木下去。因為他們不知到民族也該講實利主義，站在一個民族立場的人們，遇到一個問題來，祇看對於民族利與不利，不必管什麼同化與不同化。卽如這五百年間，漢族與雜處的異族，後來固是同化，但其主動是在異族，在華族不過是倡伎式的一種誘惑罷了，這就叫做可恥的女性同化，華族自身不但得不到絲毫利益。而且是要蒙絕大損害的。

註1. 漢宣帝神爵元年趙充國先後得羌萬五千人以上置之金城
2. 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率衆一萬二千降漢
3. 神爵四年姑夕王烏禰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狁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檀匈單于左大且

萬餘人。王莽末年，諸羌人居塞內。光武建武十一年，馬援從降羌數萬於天水隴西扶風。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鄂爾多斯地）。章帝章和元年，北匈奴屈障儲等五十八部詣塞中，五原朔方北地人口二十萬。和帝永元元年，竊賊等北匈奴二十餘萬家。

附註 就前列十款其人數約在五六十萬之間，加匈奴那王降衆，萬餘與十五萬戶之民人，以戶八口計，當得一百二十萬十二款合共三百萬。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自平城南發步騎三十餘萬至洛陽，罷兵，遂營洛都。文帝本以統一天下之說風動羣下。舉都南遷，定爲一種漸進政策，這不是無實現之可能。所以當時羣下對於遷都之舉，心雖弗善，究未敢作強烈之反對。加以孝文又藉南伐爲名，至洛陽而忽然罷兵，以達到他遷都的目的，這可見魏孝文帝的銳意南遷，是有他內在的動機來鼓盪著。他的企慕華俗，不過是動機中的一部，其絕大的潛在力，還在他鮮卑族由獠狽世代向着文明時代進化，要經過這個必經的過程。以他樸厚無華的氣質，驟然間來感着華族初期文化，便覺呼吸之間適相調合。在當時孝文心理，覺這中國堯舜禹的治蹟，周公孔子的學理，都有領略的必要。所以他命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這是含有重

要意義的。他看明白堯舜禹的治蹟，是民族進化必經的過程，而這種治蹟的建築，是以農耕社會爲基礎，而不是以畜牧社會爲基礎的，這就是他決意捨去平城遷都洛陽「效法周公營洛」的大動機。他這番密意圖治的精神，是受他父世二親的暗示。真是銳不可當的。可惜當時李冲李彪高閼王肅尉元游明根韓顯宗諸人皆非伊周之侶，不能佐此有爲之主以郅治於三代之隆。在獻文及文明后輔政時代之勸農事，定賦法，罷門房之誅，定律令，頒祿制，砥礪廉隅，均田畝裕民生計，禁讖緯巫卜以黜誣妄，置三長定民戶籍，定樂章，非雅者除之，這些都是王者治國的根本大計，不能因獻文帝之好道與文明后之淫亂而非之，這是外族君主，窺見儒學的全面，非實踐半面孔學者事實的證明。及孝文親政以後，崇明祀，立太學，省宮掖費用以給軍實，其善政亦有可觀。惟對於拓跋氏本身有一樁絕大錯誤，就是魏氏君臣，應該就平城以北，向山諸族牧畜之地，用一種強迫政令，使轉變爲農田，其無法引水灌漑者，方許保存畜牧之習。這樣一來，則平城變爲農耕地域的中心，提高諸族的生產方法，使與華族相並肩。在這種情形之下，來回復中國

古代的文化，以生產與文化相適應的關係，必然的用力少而成功多。且因鮮卑本族，由進化所形成的文明，自然是有悠久的延續性，又有相當的團結性。日後華族縱起反抗，仍然可以退至塞，外亦能保其獨立國家的形式，到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唇齒相依。當時未能注重到這一點，實在是孝文的失策。遷都洛陽以後，平城則感空虛，伏下後來六鎮跳梁，高車蠕蠕柔然叛變等禍亂。在洛陽地方的華族，一面則感三十餘萬騎人口壓迫的痛苦。又在河陽境內關方十餘里之牧場，驅逐八民他徙，當地華族又感受牲畜壓迫的痛苦。結果魏亡以後，鮮卑種性自行銷滅，雙方均感不利，不過從華族立場說來，這仍然是一種不可忍受的恥辱。

五胡之亂，既開華族擁戴異族人為君長，俯首帖耳，受其支配的惡例，後此更無特創之學說來喚起民衆意識，伸張民族精神，以來彌補民族精神上思想上的這種弱點。一般人民認當代第一有力的人君，是天護神佑，認他的利益為當然利益，他們都須得一致擁護。因此使不問這人君是本族抑是異族，便是以人君的權利集中人民的觀念，來壓倒

民族思想。到唐之末季，李克用以沙陀餘孽，席卷并晉，雄長一方，其後存勗代梁而興，嗣源故塘智遠蟬聯四姓，此時華族人民腦中，并不知有所謂民族，如替者之於五色，黑白莫辨，如醉如夢，昏迷罔覺，一任有力者之顛倒簸弄。在他們這種沈寂昏亂的腦筋中，已看不出受異族約束，與受同族約束的分別來了。在這種民族意識沈寂，蠢蠢然如鹿豕情狀之下，這些握有宰制權的領袖們，便可以把一個民族分做若干羣，把牠如鹿豕般的送幾羣與別人，來做他的酬勞品。這種鹿豕般的酬勞品，豈不是秦漢以後政治與學術的模型鑄成的嗎。所以石敬瑭就乘着後唐內部的紛亂，把燕雲十六州的人民，當做酬勞品送給契丹，掉得一個兒皇帝的頭銜，來向華族擄取。於是這燕雲十六州淪於異族之手，聽其蹂躪同化者四百年，這就是領袖們個人主義越見抬頭，民族思想越見沈寂的明證。凡是講個人主義，都是一貫的利己主義，所以他們尋求利益，是終日孜孜死而後已。其情既是如此迫切，所以有時不免患得患失露骨表現他乞憐無恥的本相。這趙德鈞與石敬瑭二人，各求契丹主援立，桑維翰甚至跪於契丹帳前，為石敬瑭涕泣以爭之。這種

屈辱以求尊榮的事實，便可爲後世華族僞領袖們的寫照。一民族有此僞領袖這是民族的大不幸。

凡是歷史上一種事實，雖在後世人們認爲是一種汙點，倘在當時如不被人發覺，這必然的要變本加厲的向前演進。石敬瑭得個兒皇帝的綽號，算在滑稽歷史上開了一個新紀元，其後一百九十年而有靖康之禍。其時金人南侵，宋室君臣欲在乞憐政策之下，來求安定，這是他們心知實力不敵金人，不肯犧牲一個人的利益，盡他們的責任，來爲民族生存上作殊死戰，結果就不免拋棄民衆，來任胡騎的蹂躪，因此宋室政治中樞，便失掉了民衆的同情，一般民衆反來向韓岳劉吳諸鎮將表示好感。這就是政治中樞人物的利害，與民衆利害衝突，他不但不能領導團結民衆，反有以促成土崩瓦解之勢。建炎紹興之間，宋室君臣所以應付金人者，都是一些屈辱遷就，始終無有整個對策。因爲君民利害兩相衝突之時，罅隙既多，和戰均不可恃，一實在找不到整個對策來。宋室政治中樞，既是無有整個對策，便無形中給金人以若干便利，雖以韓岳劉吳諸人之驍勇善戰，但

以兵不厚，糧不繼，命令不貫徹，祇可坐待敵之來，與烏珠尼瑪哈等，不過發生遭遇戰。從未集中主力，任一上將，一張浚文人督師無功例外——指揮規復中原，突破金人東馳西突之勢。祇知用以守為守之拙計，而不敢取以攻為守之壯圖，結果是人逸我勞，人聚我散，浸成不可收拾之局。這宋室君臣，是富有女性中之承受性的，祇因他們的席豐履厚，利令智昏，便把民族固有的雄偉性銷燹了。這一幅對面文字，要詳細說來，很是麻煩，姑且不說，現在且來說金人卵翼下的張邦昌劉裕兩個。張邦昌本宋室舊臣，原繼南而稱尊的奢望，亦無拯救斯民之素志，金人以異族而驟得中州，知不足以繫民之望，於是採用分離漸取步驟，委一張邦昌以暫維繫尊自宋室之人心，以漸滅兩河豪傑反抗之心，此金人對付華族之深意，非得其地不以為利一種寬大為懷的態度呢。邦昌庸懦而貪，竟不顧及金人援立之動因，甘作傀儡，以遂其邯鄲道上之迷夢，後因呂好問之勸止而氣沮，在這張邦昌個人的品格上，便看得出華族貧而無勇，愚而無識的弱點來。邦昌既敗，金人更立劉豫，劉豫之於金人，可謂勝爪牙之任，不惜操刀內向了。借金人之力

以充實其國防，儼然是近代偽國的一個雛形。但他不明白託庇於他人勢力之下，終被他人玩弄於股掌之上，這種大利大名所在的場合，是不容許無德無力的人們尸居的。劉豫在位九年，雖然對宋甘爲戎首，然終以非其族類，易啓金人之疑，致爲金人所掩襲，依然是表現着他們貪而愚的品格來。高宗派王倫奉迎梓宮，使謂達贊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這是一個無恥的可憐蟲。本一己之國土，要恢復便恢復耳，那有向人討乞之理，既然憚於一戰，刻意求和，便該痛懲前非，修明內政，拔擢人才，以爲異日收復失地之準備，高宗內懷苟安之情，與秦檜默相契合，疑忌鎮將，這是暗中與金人造作許多可乘的機會，偏要夢想收回境土，這是何等的矛盾呢。這些當時僞領袖——高宗——代表華族的思想，也就是現在有些人們，代表華族的思想，這是多麼無恥可笑，不切實際啊。華族社會上既充滿這種不切實際的思想，金人便好來利用轉移華族的目標，如保姆們引誘孩兒睡眠一樣——製造漢奸——來消滅華族反抗的心理，以便達到牠逐步成功，奄有華北的目的。後來金人爲蒙古所逼，率衆南徙，汴蔡中州隸其

版圖者百有餘年，紹定以後，金人爲蒙古所滅，其族自然與華族同化。然河淮流域，增加許多異族人口來奪我華族的生計，試問這是光榮的一段同化歷史嗎？

宋代民氣軟弱特甚，這因緣於宋代的重文輕武，對於宋學亦不能說莫有因果關係。士大夫只知尊君，而撫養人民不如兩漢，尊君之觀感既甚，則民族之意識遂微。此種君民利害，因階級不同，原是立於衝突地位。自中古以後，君位愈尊，衝突尤甚，黨於君者，只知擁君之利而不顧斯民之害。所以國破君執，一指徽欽二宗，在庶人方面，不過表示一點惋惜，甚至漠不關懷，絕無有認體是民族之恥辱，慷慨激昂，號召徒衆，來誓死與異族相抵抗，表現民族不屈不撓之精神的。這個緣故，就是後世士大夫專講自漢以來半面的孔學，以推重君權，一方又加緊人民束縛，使三數健兒感覺人心渙散，縱抱滿腔俠氣，決意犧牲一己，然而以大利終歸人君一人掌握的原故，恩惠不出己出，得不到大衆的同情，終必以孤掌難鳴而失敗。一如宗澤之招兩河豪傑，此時如果真擁護人民利益爲口號，不但爲時君所不許，而又格於士大夫之清議，甚或藉尊君之名麻醉無知之民

衆，以供其利用，向擁護人民利益的旗幟進攻。好像他是義正詞嚴一般的義舉，以來斷喪民族生命，摧毀對保持民族生命上有十分充足理由的新興勢力。結果新興勢力往往被其摧倒，「岳飛之被殺」這是什麼原故呢。這便是民衆的認識不足，對於自身的利益與危險，茫乎不能辨別，反與自私自利的偽領袖們「如秦檜」以可乘之隙，供其顛倒利用了。豈知新興勢力摧倒以後，這便是權道濟所說的自壞汝萬里長城，「這道民族的萬里長城，偽領袖認牠是個人利益的障礙，所以要簸弄人君來摧毀牠，」所以強寇當前，便顯出束手無策的恐慌狀態。但是他們決做不出投袂而起，把一切裨政改絃更張的事實。因爲在偽領袖們的眼中看這喪師削地，并不算一回事，只要有殘餘土地與殘餘人民，可以供他們的榨取，依然法宮高拱，保持固有的尊嚴就夠了，割些土地送與強敵，不過是一些禮物吧。至於被割者之備受欺侮虐待，萬姓啼哭嘶喊之聲，這是喚不起他們的同情，有時他們本身受到危險，倒要使盡方法欺騙民衆去救護他，因爲他們思想，是以個人利益做出發點的原故。即使遇着敵人過強，不使他們有立腳的餘地，但因他們與強寇結

在同一階級上，只要說個此間樂不思蜀，便終身安逸，富貴不絕。當宋朝亡了的時候，宋帝累既降於元，元封他做瀛國公，將他貲財之在杭越者，命有司罄至京師付之。這些僞領袖們，是何等的柔順易與，他們心目中，何嘗知道有什麼民族，他們的民族觀念，是被因榨取民衆而防止民衆反抗的僞智識朦蔽住了。民衆的民族意識，亦因僞領袖們無情的壓榨而銷沈下去了。上下各階級，大都拋棄固有民族意識，有了這樣的條件，便形成蒙古人統一中國的局面，這便是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的一個例證。蒙古統一中國，爲時雖僅八十餘年，然此時華族的生命，實寄於蒙古人刀俎之下。當蒙古之初從金人奪取中州，便思屠其民衆，以其土地爲廣大之畜牧場，幸得耶律楚材之諫而止，設使不得楚材之一言，這僞孔學一半而孔學一僞領袖惡政治所培養成如綿羊一樣的人民，早已於最短期間，經蒙古人之手，而迅速地礦物化了。歷史上告訴我們，這些綿羊似的民衆，是決沒有勇氣掙脫政治上和社會上的縛束，來作無情地頑強抵抗的。宋自寧理二宗以後，元人着着進逼，屠城之事不一而足，以這樣毒辣兇猛的行爲，尙未見激起民衆羣擁的反抗

○這些人民是因爲受政治學術的麻醉甚深，是由僞領袖們已經用種種方法，替這異族的劊子手，催眠牠們在一個屠宰場的刀俎上睡着了。所以華族的僞領袖，是異族向華族屠殺，天然的一副工具。這一副工具，是由秦漢以後的僞孔學，惡政治，次第演進成功的。蒙古人於無意中得到這副工具，「按宋末時苛捐雜稅甚多，如減役錢，除頭子，賣糖，日椿，印板帳，等名，都是宋室君臣榨取小民的事實，強寇當前，而宋之君民不同利害，人君實自外於民以保守其固有陣線，於是人民祇好垂頭喪氣，聽元人之宰制，這是趙宋亡國的根本病痛。」便是他統一中國，支配華族，後來有些蒙古人民實行移殖同化的大成功。「如浙江之墾民卽其一例，」這個時間，華族縱有有識之士，因鑒於趙宋一代僞領袖們「人君」席豐履厚的立場，總是與民衆隔了一條不能飛渡的長江。這樣全民族分成兩般的形勢，是很容易爲敵人利用，被敵人操縱，迅速地歸於失敗的，因此也就緘口戢翼的，甘受屈辱。所以趙宋南渡百有餘年，可憐那些君臣們，根本找不出一個自我的整個復興的主意來，本該喚起民衆共同奮鬥，但就必得先拋却自家一部分權利，

來與民衆作交換條件。這是趙構秦檜諸人根本不能承認的，抑是他們所想不到，這是他們寧肯納幣求和，不惜屈辱的主因。他們既得不到民衆的擁戴，於是他們就想作收復失地的一個機會主義者，幫助老虎——蒙古——來湊殺一個垂斃的狼，——金人——這便是王黼蔡攸童貫史嵩之諸人的經國大猷。那知道得不到民衆擁護的政府，空拳赤手，尚不能敵垂斃之狼，又怎能敵雄姿出押的虎呢。這些失地，便成自身的一個鈎餌，剛吞下去，便從頭至尾拖泥帶水的被敵人掣在陸地上了。這一大宗被政府排斥在利益之外的羣衆，他們覺得民族精神，民族思想，固是應該表現，奈這隔河相望，昂頭天外的政府，在異族加緊侵略這些時間。他們擇取人民越發利害，不但不能與以救濟，有時還要勾結異族來共同壓迫，獻媚異族來保持他們的利益哪。這民族精神思想又從何表現得出呢。異族爲分解民族團結計，對於政府這些人們亦必樂於扶持，——秦檜——實現一種以華制華的政策，結果還是政府諸人肯出賣民族而得到利益。這些被政府排斥的民衆，如果內中有英雄之士，不甘屈服，衝起那股倔強的精神，硬要來抵抗異族，他總成了一個無味的犧牲者

·白白的擲掉自己的頭顱，并且連帶死去了許多健兒。不惟得不到民族的代價，還得不到國內安富尊榮者的一聲可憐。這些事實便是使民族柔弱無能，甘受屈辱的強烈劑。民族受到這種的印象很深，那抵抗異族的能力，就越見減少。當元順帝時代，華族本無整個反抗異族的能力，元朝的土崩瓦解，都只因元政不綱，于張士誠陳友亮郭子興徐壽輝諸人，一下囉囉土棍以可乘之隙混了。一般平民對這土棍囉囉，依然是當着隔岸觀火般看待的，因為他們明白這些盜賊式的首領，都是一些投機份子。他們是利用飢餓迫切的人民，來為他們個人利益而奮鬥，決不是站在民族的立場來為大眾謀利益呢。

到了這個異族勢力非常膨脹時代，上元朝上華族自秦漢以後千餘年來錯誤的政治基礎，已開始發生動搖，使華族在這個期間，能得到一個高瞻遠矚識見超羣的領袖來，轉換政治路線，使向着孕育虞夏光明磊落的道路上走，或者在蒙古族既被趕出關以後，不至再有滿清入關之禍。奈這些盜賊式的偽領袖們，祇知道為子孫掙產業，半面孔學的學者們，只會擁護人君利益，不知道有所謂民族利益。所以朱元璋更大封其子弟於天下，

來向民衆榨取——更不計及日後之結局如何，這樣一貫錯誤的政策，便是使民族政權繼續被強大異族奪取的大原因。所以華族政權由朱元璋恢復者僅二百七十年，又復淪於滿族之手。滿清知華族之懦弱，肆殺戮以塞其胆，知華族之貪小利，施籠絡以收其心，揚州十日，嘉定屠城，便證明華族是由歷史政治調教出來的一羣馴羊，他們的性質是很柔和，極容易收畜的，可說一日之間殺他千百萬頭，也起不了什麼絕大的反抗的。這是由於牠近二千年來歷史上，未曾演出一個政治領袖的原故。那些盜賊式的領袖，他們是莫有政治目標，他們惟一的辦法，是約些夥伴來做此日共患難，他時共富貴的分贖工作。有時起了衝突，爲君的便把這些功臣，一個一個的殺掉，所以就有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一種譏諷語。既是莫有領袖，所以在異族壓迫他們的時候，他們不過表現一種反應勢的下等動作，這便是柳宗元所記一個黔之驢，這個民族是多麼可憐啊。這一個罪惡，無疑的是由當代的民族僞領袖們造作的，所以僞領袖是民衆的仇讎，是外寇異族的幫手，人民們在這一分析上不可馬虎了。滿清既入處燕京，眼見南方之馬士英阮

大城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左良玉輩，他們都無意前來抵抗，而且爾詐我虞的互相禁制，實際說來，他們不是多爾袞的好朋友嗎。是以滿清得到從容不迫的時間，將明之後裔弘光及唐桂二王次第剪滅，遣八旗兵分駐重鎮，如成都，如荊州，如福州等，並命將軍都統領之，亦如苻秦舊制，這種鎮壓式的雜居同化，從華族獨立的立場說來，這是多麼可恥的事情啊。

第二十章 異族之入化人口受嚴重的壓迫

一個國家的領袖，其對於國家人民統制的方法，應該用鍋爐式的將全部蒸汽，由汽管引導到別處去衝動機械，使這蒸汽盡量發展牠的力量，做出許多事業來。不應該像一個蒸波式的瓶蓋子，將蒸汽堵着在瓶子裏，不放一個氣孔，許牠有上升的機會，使這蒸汽蟠繞於瓶之周圍，因渙散軟弱而終歸無用。前者是一個聰明進步的領袖，他能着着為民族前途打算，愛惜民族英才，自身站在最前線來領導牠們，走上目前生存競爭正直寬

平的坦道，這種領袖，必然是爲民衆所愛戴的。後者是一個笨拙浪費的執政，終必爲民衆所唾棄。山前之說，便是堯舜，其下雖有禹稷皋陶等二十二人，無不各展其才。出後之說，便是秦漢以後的人君，伸張個人利益的傘蓋，來籠罩一切，凡有與這傘蓋爲難不利的，他便把這些一概殺掉，使這個民族文化層級下墜。這便是秦漢以後的人君，依個人利益來支配政治的錯誤，成爲二千餘年無聖哲挺生的原因。縱有少數天資高邁，不肯苟同附和之流，多半是遷迹於箕山祖水之間，甘自放廢。這樣一來，整個民族，因組織之鬆懈，分子之軟弱，把一個民族裂開了許多罅隙，任異族隨便侵入，來加重壓迫，這個問題在民族生死關頭上是多麼嚴重啊。照一個民族健全發展的過程來說，是不容許有受異族人口壓迫的事實發生的，木朽然後生蠹，空隙然後來風，一民族而感到異族人口的壓迫，不知自身病痛已潛伏了多少時日。這個病痛之潛伏，歷許多時日不曾被人們發見，這便是居政治領導地位的人，把眼光移注到個人利益身上，並且來麻醉人民。所以大家都忽略了民族的利害，直到創鉅痛深，又受外來的啓示然後發見。這個民族的麻木

不仁，隨時都有被人肢解的危險。在目前要成一個近代式的民族國家，絕無任人侵入蹂躪，甘受其壓迫的事實，亦絕不容許有這種事實的發生。譬如一個蜂羣，在管理方法上，是不容許有盜蜂侵襲的。在事實上說來，一個蜂羣如果發生盜蜂，必然要發生甲乙二蜂羣繼續戰鬥的事實。這戰敗的必然逃跑，或是全羣殲滅，絕不容許有降伏屈處相安的事實，人類之合羣以競爭生存於世界，照生物學的法則說來，必定要取這種蜂羣抵抗外敵的方式，方表現得出這種民族特異的精神來。如果任他族以強力壓迫來滲入血液和文化，積久以後，便失却民族本來根性，這就弱小民族的立場說來，是何等的危險而可恥呢。一個弱小民族處此情形之下，而不得到覺悟，設法把這些弱點根本排除，恐怕終久總有滅亡的危險。——在這種嚴重期間是不能拿強大民族的外示寬容的態度來比擬的。

第二十一章 對異族忍受悲痛的屈辱

一個屈辱的事實，必先行完備了屈辱的條件，然後屈辱的事實方纔到來。若是對於這些條件，想不出方法來糾正，或是根本不願意糾正，這必然到臨的屈辱，也就無法可以避免。華族受整個異族——指契丹金人蒙古——強烈的壓迫，實開始於趙宋，趙宋享國二百餘年，前後對付遼金元及西夏，未曾一次得過勝利。這是因為宋室君臣無整個對策，「前於二十章中已略言之」此王安石所謂：「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本朝百年無事節子——又謂：「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久顧，爲宗廟萬世計，」——上仁宗皇帝書——就王安石這幾句話看來，宋朝士大夫之迎合廟計，姑務休息，而忘却及肩之牆，賊日窺伺其室家之好，韞匱之玉，將有岌岌不保之虞，對此民族當前莫大危機，一點輩盜也未曾計及呢。他們所一致防範的，乃是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輩，恐有以黃袍加在此的身上。則天下非復我有，所以王船山說宋室廟計，是摧抑英尤而登進柔輒的。自有宋一代人君的眼中看來，英傑的既跋扈堪虞，柔輒的又與尸可懼，只好捨角逐疆場的首功。來從事羈縻敷衍的下策，甚而納款納幣重累人民。北失之於契丹，（在真仁之際）不乘

契丹積弱之勢以張打伐，轉因羈縻之術，坐失收復燕雲十六州的機會。及契丹已見逼於金，始欲承契丹之敝而收其殘土，利人之難以爲己榮，所得於契丹之利有限，而示弱於金人之害無窮，所以童貫之會師燕京，卽伏下靖康北狩之禍。西失之於定難，當李繼筠死後，太宗當乘平定北漢之威，捨契丹而移師西指，脅繼筠入朝，視其留後，收其土地，殲其反側，揀一重臣坐鎮其間，假以便宜以防宵小之竊發。卽或不然，當繼筠以夏銀綬宥四州入朝的時候，便當掩其不備，除其燼餘，不令繼筠叛走，卽或脫網，亦當繼續搜捕，使無容留當地的可能，後來自然沒有死灰復燃的機會，西顧之憂既釋，然後傾全國之力以圖燕雲，正不必假力金人爲日后召禍的根本了。這樣一來，宋代西北國防，東起滄瀛，西迄銀夏。數千里間，分爲數鎮，一如太祖時命李漢超李繼勳等分守關南昭義故事，待遇厚而給錢多，使之俟契丹之釁而動，爲多方以誤之謀，果如此，恐不待耶律休哥之亡，宋已先金人而奄有十六州的境土了。於是北守長城，閉關自固，使南北之情不通，金人便無從知南朝之虛實，恐不但無靖康之禍，宋人如果善遇元人，謹守信義，

又何自召蒙古南侵之事。然則宋之積弱，是由宋對外之優柔寡斷。宋之召侮忍受悲痛的屈辱，是由宋之伊感自貶。宋自太祖黃袍加身以來，於剝削羣雄之外，對於民事和內政未能加以振刷。此安石所謂：「理財大抵無法，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一語觀其因循萎靡，不思修明內治，訓練人民以抵禦北方之強寇，消弭他日之隱患，其無法又何止是理財一端呢。安石知宋之所自敝，而於理財方面，無法以避免君民利害之衝突。因安石不知一切政治文化之基礎，在於經濟，國家分配經濟的原則，又須基準於人民生活水平，變法而不師井田均田之意，作莫多益寡之圖，以求安定社會，這便不是圖治的根本，而是一種遷就的辦法。這種遷就的辦法，所發生的結果，就不能將社會上苦樂不均的病態歸於銷滅，有時還更使他加緊的嚴重，如青苗免役諸法之反增極貧民衆之負累。授當時反對黨如司馬光蘇軾諸人以口實，這都是因爲人君不能與人民站在同一戰線上，休戚與共，來向異族奮鬥的表現。人君既不能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節浪費以增厚國防，戒奢侈以固國本，自然便不敢損富室之贏餘以益貧戶，因恐激起地主階級之反

對面召崩潰，王安石之變法，雖有良法美意，就在這種君民利害衝突情勢之下招致失敗，近人只思勉，他只知安石之法并無大失，而不知其失敗之主因，并不在其所創之法，而在其變法的一個根本問題。這個根本問題既是沒有方法來解決，那變法也就是敷衍兒戲然必然的失敗。因秦漢以後無聖明之君主，深知社會經濟之患在不均，一服覲定民族利害，目不旁瞬的來圖改革，這是根本上不能說變法的。雖一百個王安石，奈這一根本問題解決不了何呢，根本問題既沒有方法來解決，君與民的利害永遠對立着，這就是根本不能圖強，必然要向外寇屈辱的條件永遠存在，所以僞領袖們！人君！一想到自身的利害，便不由他不盡量的忍受恥辱啊。

一個國家的組織，儼然是人之一身的機構，一個民族國家的領袖，相當於人身之頭腦，百司庶事，相當於人身之五官，全國民衆，相當於四肢百骸，三部湊合，始組成一個人類的健全身體。這個身體的機構當中，頭腦自然是居重要部位，操全部機構行使的大權，人類身體的全部，是由循環系統運輸血液來平均灌注營養的。各部營養的成分，

是依他一時勞力的多寡來分配的，絕不因部位的輕重而有厚薄，所以周身的部位，都是平等互助。又加之神經系統，其纖維密布全身，痛癢相關，使各部更加上一層親密，這便是高等動物身體的組織。在一個高等動物的頭腦，牠決不願組織中的任何一部分同牠分離，有時受到外界無情底壓迫，牠不惜犧牲全部利益和生命，以企圖奮鬥，這都是因牠的身體機構當中，脈絡貫通，營養平等的關係。一個組織合理的國家，在其運用上說，是應該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的。所以有堯舜為領袖則下有禹稷皋夔之臣，自有於變時雍之黎民。此時如遇強寇壓境，國勢上指土地人民，并非什百倍之相差，便毫不遲疑的統率國人，出全力以相抵抗，只有從奮鬥中去求出路，更無猶豫計較的餘地呢。這是因為一方是施暴力者，一方是受暴力者，彼屈則此伸，猶豫計較之結果，總是失敗。只有無情的掃射，纔是求生的路線，方今依科學方法所組成近代式的國家，雖內容略有些不同，但其重要之點，無不趨重脈絡貫通營養平等。

再來看宋代的國家組織，是不是脈絡貫通營養平等呢。宋承唐末五季藩鎮竊權，任

意徵取。賦稅紊亂之後，——太祖初政迄未加以減削整理，後來甚至變本加厲。——請參看呂思勉白話史近古史第五章第五節——宋朝官制帶五代車閥餘習，冗濫極多，兵制亦承壞亂之餘，人多紀壞，要皆不免病民弱國。總之宋襲周之帝位，安於固陋，患得患失，諸務因循，除解除藩鎮兵柄一項外，少有特削之舉，翻然改圖，為人民興永久之利的。由這種敷衍的政治，便可見得當代人民康樂的程度，究竟有多少了。官兵皆不能用，則脈絡不能貫通，人民担負過重，則營養不能充裕，身體極感罷乏，決無時間精神注射到民族的強弱，國家的興亡。以這種感覺痛苦的人民來保衛國家，能不能如手足之捍衛頭目，凡明眼人無不知之。當金人渡河之日，宋兵數萬不事抵禦而逃，金人譏南朝為無人，這種鳥驚獸散，一盤散沙的現象，早已駭得宋室君臣魂不附體了。黃河南北，藩籬盡撤，民氣銷沈，這徽欽二帝便成了釜底游魚，早晚待金人的擄略罷。以一個國家元首，民族領袖，而得不到民衆的擁護，這便是頭腦與四肢百骸之間，起了病狀，生出障礙來了。這個障礙，就是君民利害的對立，官與兵則依附君主壓迫人民，人民不得已而表

示消極，靜默不動，便成了一個瓦解之勢。宋朝在真宗時候，就有一個以多報少的人口調查，數目爲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到徽欽時代，必然的加多，以擁有這樣多數人口的領袖，倒來被人擒獲，這便證明此廣大人口當中，他不曾領袖得一個。這些出身皇子皇孫的領袖，他們平日席豐履厚，漠視人民疾苦的結果，使國家的精神渙散，組織麻木。好像一尾涼血動物，棲息山溪石床間的山椒魚，牠身上的肉，被人們一塊一塊的割去，牠偏不感覺痛苦。這是一個民族沒落的政府，他必定要運民族拖泥帶水，墜在深淵裏去的。他根本不知一個民族領袖，是該與人民同甘苦，共利害忠實誠樸的爲國家服務，光明磊落的以肝膽照人，纔能取勸羣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如是然後可以轉危爲安，轉弱爲強。徽欽既已北去，高宗復不知拔擢人才組織民衆，一任烏珠之縱橫馳突，終宋之代，其君無一個配當民族領袖的。民族既無組織，君民的利害不能相共，這便是國家滅亡的基本條件。文天祥要違反這個條件，挽救瀾於既倒，就必然的要被執。宋帝昺違反這個條件，欲存已亡之社稷，就必然的要被追趕海。這個原故，就是

失了組織民族國家的精神，則國家根本不能存在，其有幸而獲存者，徒以外無強寇，苟延旦夕的生命罷了。

依這種合理國家之組織來說，華族是由明瞭世界而入昏睡狀態的。且二千來年，這種昏睡狀態的導演，是由羸政愚民政策的結果。當時才智之士，半皆殺戮，後來崛起草澤的多鵬無賴，劉邦以平民革命而乏學術的引導，纔創造一個畸形的國家。他建設的方式，是偏於維護君主地位和權利，一面他們君臣的眼光，是不曾看見有所謂民族，并不知道君位是爲人民而設，是負有教養人民之責任的。雖然他們也曾枝枝節節的有些有益人民的政事，但他們的主意，是要人民安靜，國內無事，來安定他們的地位和權利的。因爲他們的動因錯誤，所以做來也就不能澈底。歷史上既然種下這個錯誤因子，又沒有學理來加以矯正，後來便會認賊作子，顛倒是非，使民族國家犯了一個絕大的危險。所以宋朝雖然屈辱達於極點，當時淺見的人們不加深思，總認爲是偶然現象，茫乎若迷，莫明究竟，所以依然貿貿前行，看這宋元璋之建國，跳不出這個畸形的窩臼，所謂梟傑

者，其見不過如此，下此者更無足論了。便知道自漢以來一千人君之短見，祇知顧目前之安富尊榮，竟忘却安內攘外長治久安之大計，領袖不過如此，對付異族怎麼不失收呢

• 嘗就歷史檢查，在一姓當中，前數代的君主，猶知創業艱難，謹守前型，尙能撐持危局。中葉以後，暮氣寔深，一遇強鄰壓境，往往喪師失地，平庸之主，大半不能自存，以君民之氣既不相通，而君臣之間復多隔閡，這種情勢，便無形中與敵人以許多可乘之隙。這些病痛，都是由立國的根本錯誤，這天下爲家四字產生出來的，敵以整，我已分

• 敵抵我之瑕，我受敵之掣，一個國家便從此漫漫地滅亡下去。大凡一個國家，祇要建國的精神偏在對內，一遇到強寇，領袖們便聞雷失箸。以素所猜防的臣和民，平時都不可用，急時便無法使他親善樂爲己用，強寇之來，便露出赤手空拳的破綻，祇得徒喚奈何罷了。我們現在來看明朝牠抵禦外族的形勢和結果，究竟是怎樣呢。牠遇着也先俺答這些小醜，他們也就鬧得張皇失措，隱忍求全，難怪後來遇着滿清，袁應泰敗死，失去遼河以東七十餘城，王化貞敗走，失去遼河以西四十餘城，又先後將熊廷弼袁崇煥殺掉

，以遂他們不信認臣下之志願，更是撒蕩蒞臨，一任強寇之馳突。使常時國內縱無闖獻之禍，抑且不能自保。到滿清定鼎燕京以後，南方的福唐桂三王，他們不惟不能打破傳統君民利害對立的錯誤，來拉攏民衆，得到民衆的擁護，而且他們是當時軍閥如馬士英季定國的傀儡，連個人的生命都寄在這一千人的手裏，還配來說復興國家嗎？這是由他皇子皇孫所經過的歷史，所培養出來的一個庸人，由一勞永逸的思想，所孕育出來的一個惰性代表者，所以清兵一旦到臨，他們就如雞子一般的被捉去了。這是他們本身一個不可避免的屈辱，而是強迫他們要無情的忍受呢。他們貪着席豐履厚，他們却不知道競爭生存，更不知道一個民族領袖在這世界的驚濤駭浪中，競爭生存的舞台上，是一刻不容稍懈，要以全副精神來照定四圍形勢的發生變化，博訪周諮來相為應付，窮竭智力來相與周旋的。一個民族必得到如此偉大之領袖。而后可以避免屈辱，而后可以達到生存。

滿清以北族入主華夏，其疑忌華人，防制華人，是牠先天得來的一個暗疾。既不能使多數之華人同化於滿族，滿族亦不甘願同化於華人，這根本上便不能說血脈貫通，利

害與共，而組織成一個健全的民族國家，這對外的抵抗能力便是有限。加之中國政府（無論華族或北族）在歷史上有傳統的惰性，所以一遇着西洋戰爭的利器，（砲艦）（從與英國鴉片之戰起）便不斷的繼續屈服，而且不惜訂立不平等條約來束縛自己的手和足。到咸豐十年的英法聯軍入京，咸豐也就奔避熱河了。結果是結了天津條約。後來光緒二十年因朝鮮內亂，與日本戰鬥於遼東半島，海陸俱敗，結果是結了馬關條約。二十六年義和拳暴亂，更演出八國聯軍入京之事，京津間死了無限的人民，結果是賠款四萬萬，又結下庚子條約。以上所舉一切的事實，都是與民衆利害對立的領袖，忍受不可避免的屈辱的事證呢。我們單就這些事證看來，這個屈辱的病根，到今日是不是還附麗在民族身上，如果尙附麗在民族身上，是不是該忍痛的加以割治呢。

第二十二章 學術思想與時代的不適失却民族彈性

華族的學術思想，自秦漢以後，不但是毫無進展，而且是一天一天底祇見萎縮，這

是有牠歷史上的必然性。有些蠢笨的人們不去研究，硬要拿歐洲的歷史過程，——進化——盲目的來生嵌強合，說我們的學術思想，也是同樣在進化，這麻醉人民的過惡真是不小。我國學術思想不適宜於近代民族國家，近數十年來始漸漸的為少數有識者所認識。但這種不適時代的學術思想，現刻猶盤踞在多數人的腦海中，為革新民族習俗前途的梗阻。凡抱有革新民族志願的人們，皆當對此不適時代的學術思想，加以精細研究，如發現有不適宜的部分，便加以糾正指示，使恢復彈性，來應付現代一個強烈競爭世界。

政治為學術思想的產兒，但有時倒果為因，不良的政治，反為陋劣學術思想的生母。漢以來的政治便是這樣，結果總是學術思想受政治的影響大，政治受學術思想的影響微。這是由於中國歷史上，深於學理者不易得到政權，這學術便不能支配政治的原故。

一個時代的哲學，必然的與其時代的政治相伴而生，在昏暴政治壓力之下，其哲學思想發展的方向有二：1。屈服於暴政之下，消極的內向以約束個人的精神。2。是反抗暴

政的壓迫，積極的趨於革命，以尋求人們生存的出路。

人們寄思想於學術，以學術來推動思想，無非是爲自身的生存。倘生非自由競爭時代，而是在一個集團鬥爭的嚴重期間，自身不能單獨得到生存，則不能不求之於與自身有密切關係的同一血統的民族團體，相與共同努力，以求得到生存。所以今日學術思想，應當轉移目標集中於民族的生存。我們試就這改造民國二十餘年來的學術思想，所演出的事證，來檢查一下，看牠是否與現世界及華族目前環境相適應呢。

華族早受滿清政治的壓迫，繼受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的壓迫，在這雙重壓迫之下，人民自然痛苦難堪。由孫中山先生領導所演成的辛亥革命，對民族前途是負有重大使命的，華族這個民族，從嬴秦把封建制度推倒以來，實行個人專制，經過二千餘年的時間，人們祇要翻開歷史一看，精神上便感覺許多苦悶，一旦撥開雲霧，可說是人人都有嗚呼望治之殷。不過在當時人民方面是偏於坐待，一面不知想出有效方法，去驅策監督這共和政治的進行，這是人民智識幼稚的表現，在當局一方面，孫中山先生自甘退讓以促

成統一，這是他堯舜爲懷，高不可及的地方。但在握有實權的袁世凱，他的思想，便不似孫中山先生那樣純潔。因爲物質的刺激，他做了大總統以後，還進一步想做皇帝。來背叛民國。可見袁世凱本人，他接受孫中山先生革命的思想 and 學理很少。掉過來說，他受滿清政治思想之暗示，是很多的。這滿清的政治，當然是有背後造成他的汗濁歷史，和半面孔學，左傳上說：「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因庸人恆是追隨逐臭，這臭就容易遺留永世了。袁世凱稱帝以後，他本人雖因全國人之反對而歸於失敗，但南方國民政府統御地方的能力，因之薄弱了許多。國內的軍閥就因此抬了頭，他們明知道推翻專制改建共和，是四萬萬人一致的要求。但他們覺得凡辦一事，稍有不慎，便不免有議會和人民的指摘，自家無伸縮自如營私便已的餘地。就想把這個通光透風的政府，對人民關閉起來。這點不必多述，單就當時籌安會來說，如楊度孫毓筠諸人，貢諛獻媚，希圖獲推戴首功，身膺公侯之賞，便慫恿袁世凱照他的本意變成帝制，放胆做去，心想祇要政體變更，人民便不敢過問，那時便好把玩花鏡的筒口，交給人民賞玩，這樣一來，

政府便可以安坐，不勞而得到人民的稱贊了。自從他們創了這個籌安會，便收羅了一批富貴熱中，乘時射利的人們在內，他們在當中爲要改造帝制所弄的玩意兒，真是五花八門。——那些事實不是本題的範圍讓讀者自行去參考——這種心勞日拙的辦法，究竟麻醉了幾許民衆來，這司馬昭的心事，未必莫有人知道嗎。最可惱的這些糊塗混蛋的人們把一個歐戰期間，中國該埋頭苦幹，發奮圖強的機會，教他們故意翻新花樣，來把牠鬼混過。結果還討得太平洋中的夜叉，笑咪咪的來投下了二十一條的炸彈。這袁世凱想做皇帝的辦法，同法國拿破崙想做皇帝的辦法，其巧拙之差，真是不可以道里計了。這些事實，不是不進步的學術思想造成的嗎。但當時籌安會諸人與袁世凱所持的理由，是中國人民程度過低，對於政權不能安全運用，有時使政府陷入困難，以致百務廢弛。爲解除困難計。始有改變帝制之議。這是一個不充分的理由。當時國民黨佔多數席次的議會，早已被袁世凱解散了。在這個期間，祇要政府中人能忠心民國，領導人民埋頭苦幹，所有各種建設，能在最短期間實現出來。又能造成廉潔政府，人才政府，使國家日臻強盛

，先設假想敵人——日本——以爲建造海陸空軍的標準，而圖最後的戰勝來廢除不平等條約。事實上果能得到如此成功，人民必然非常愛戴，決不肯與政府再事爲難。果其人民信仰政府到這個程度，雖總統與皇帝何異，不且爲近代歷史上的一個堯舜嗎。備具可以待大名之勢而不知享，這不能不說袁世凱是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啊。至那些籌安會的人們，更是等之自槍以下，難到他還有甚麼理由可以置辯嗎。

中國的政治革命，自然是由孫中山先生一手造成，其功良不可沒。但先生是一個醫士出身，對於中國古代政治哲學少去研究，他的革命路線，是以歐洲政治思想爲領導的。他能利用人民嫉惡滿清的心理來湧起革命波濤，他未暇檢查民衆的質量，想出方法來分別組織訓練。結果是他親信的黨徒，一天一天地腐化，擁有實力的黨徒，一個一個地背叛，使這革命的事實，期待着不能成功。孫中山先生當初以爲國家當以法治，只要有來奉法，法便行了。他不知這個奉法的人，質的方面，實在有考慮的必要。在歐洲各國是不成問題，在中國便成問題了。中國人是一個世界人類不忠實的代表者，這是由政

治社會歷史誕生出來的，並不是中國人在先天遺傳上有甚麼特異。談中國革命而不注意到人心的改造，那便是優孟衣冠，雖然扮演終日，不曾改進絲毫，只是一些兒戲罷了，如果想從改造人心下手，便須注意到政治的下層建築，社會的經濟背景，這些一切一切鑄成一般心理物質條件，必需澈底改造，始能收效。但中國的現行制度是二千年來的舊習，社會形態，帶着資本主義的色彩頗為濃厚。不過海禁未開以前，尙未達到工業革命階段，民國成立，仍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欲完成工業革命而不能，這個只可說牠是一個準資本主義——前期資本主義的雛形——社會。這是有歷史思想做牠的背景，有政治勢力爲牠的護符，一旦澈底改造，其事本至繁難。但一個革命領袖，抱有挽救民族的熱忱，必定不畏此繁難，不過孫中山先生在革命初期未曾注意到此啊。有些人認人心之趨利忘義，以爲是屬於種性，是無法救濟的，這是一個錯誤的見解。因爲他們不明白心理是由物質所鑄成，——照唯物哲理說來，這存在與思惟原是統一的，只因物質條件與人心不相契合，（政治病態）所以人心浮動而發生妄覺，迷妄一生，離開現實，一切言動皆是

擊空，伏下一個不可救治的失敗因子。——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略帶有點改革人心的傾向。但不澈底，不過是對於人民生活上加以若干之修正，所收效果是有限的，後來經腐化黨徒們的曲解，便是修正亦不可能，連這有限之效果亦歸於泡影了。這三民主義所以呈現在這種現象，亦自有牠的必然性，這是因為三民主義是一個多邊形的主義。在個人觀察上，最容易發生錯誤。這三個主義實際施行起來，本來是有先後，在有些腐化黨徒爲防止對於他們不利起見，硬說這三個主義是齊頭並進，或是連環式的。似此巧爲立說，不但不切實際，并且連理論都拋開了。這樣便把民衆引到一個迷陣裏去，這是何等的錯誤啊。好像在運輸重要交通主幹的一條大道上，自家砌起一道障礙來，這不能不說是三民主義本身帶了一些破碎性，發生出來的歧異。如果是孫中山先生的「一個忠實信徒」，便當研究這三民主義在實際上如何能逐步使他實現，依照他自然漸進的程序，不滲一些私意，使國人明白了解，忠實履行，希冀革命早日成功。無奈這帶有破碎性的三民主義，已被腐化黨徒們支解割裂不具全形了。

民國十三年，國民黨在廣東改組，振飭紀綱，剔除腐化，這是有重大意義的？當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出宣言之後，大得國民的同情，國內的真實革命分子，都踴躍的加入國民黨，大有蓬蓬勃勃不可遏止的氣象。是年十一月，孫中山先生應段執政之邀請，由滬繞道日本入京，不幸舊疾復發，以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先生死後，華族便失掉了領袖。雖然到十六年仍然有勝利的北伐，但黨徒的目標，已顯出左右兩派的傾向來了。這七八年當中，繼續不斷的內亂，都是這個原因。我想先生不死，一定不至因內亂死掉這許多人，用去這許多錢，到十九年也不會發生九一八的事變，失掉四省的地盤。這個大禍之來，便是由於實力派之思以個人勢力籠罩全國，不許有其他思想及勢力的存在，一心總想當一個狄克推多，他們心頭羨慕的是力拔山兮氣蓋世的一個中古式的英雄。使孫先生在，便用不着他們來賣這些氣力，只要他們忠實誠信的，照第一次宣言做去，國人莫有一個不服從的。少數分子縱欲左傾，恐怕也逃不出這個宣言的羈絆，湖南事件，我想必定尋得出適當處理的方法來。不幸先生一死，

黨內失掉了重心，國共兩派就不免互相傾軋，甚至愈演愈烈。北伐之師達到寧漢以後，就演出寧漢分裂，隨着就是國共分離的慘劇來。這場事的是非曲直，姑且讓後人去評論，這是要他們雙方拿出對於建設國家救濟民族的事實來比較，纔能判定得下去的。現在的事證尙未齊全，那些人都尙未蓋棺，對他們的事實，不能從事邏輯，也就不必在這個時刻來下判斷。但是這當中有不能令人忘去的一件事，就是再由寧漢繼續北伐，這一段過程當中，這國民軍的聲威名譽，便遠不如由珠江流域到長江流域的時代。——這是查看當日的報紙可以明白的！可見後來的動作，似已失掉一部分民衆的同情，而當時北伐的重要性質，也就隨着時代消失了。

一個社會的變動，照理說來，是應該有兩個方式的，即一個是前進的方式，一個是後退的方式。國民黨經一度分裂以後，究竟是前進，抑還是後退呢。這是國人有目共見的，無容作者在這個地方着筆。但有一件不能令人忘懷的事，就是他們把黨停止活動，似乎已將一件三民主義的大衣卸下，披上一件資本主義的袈裟了。由政府當局們的眼中

看來，這孫中山先生所有建國的步驟，與一切的規畫，都像是一些駢枝，都被他們置之腦後。使先生空有主義和計劃，而不見實行，因此一般人民愛戴孫先生的熱情從此減退了多少。這些握有實力的黨徒們，對於先生的學理和規劃，已經開始懷疑了嗎。固然中山的學理和規劃，也不是絕對不許懷疑的。在這個地方讓作者站在國民黨的正確立場，來爲我孫總理吐一吐氣。依總理的學說規劃宣言，走上這個路子，滿是可以拯救這瀕於危殆之中國的。即使推行起來，理論與事實偶有不合，當作一些進步的修改，這是合理的，亦是可能的。但不能違反真實三民主義這一個路子，與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這個政策，只是手續和方法上的修改，想總理在天之靈，對這種舉動，是很表同情的。因爲總理的爲人，是勤勤懇懇，力求進步，到死方休的。只需要握有實力的黨徒們，忠實奉行遺囑，以求三民主義的實現，這中國民族就得救了。如果未有奉行之實，甚或別具肺腸，遽然對學說規劃宣言加以懷疑，企圖有所改絃更張，這恐不是一個忠實信徒的表現吧。

第五編 本論四 民族生命的絕續

第二十三章 今日世界大勢與春秋戰國之不同性與相同性

人類因種族之不同，在政治上劃分若干的政治領域。因利害的共同關係，形成若干的政治集團。由政治勢力的互相侵入，以吞滅兼併的手段，造成一種大形統一的趨勢。又因交通的進展，文化的征服，政治的高度壓迫，使這大形統一逐漸完成。自有人類以來，政治歷史的進展，大概倚着這種方式次第完成各個階段，綜合人類歷史看來，這種趨勢，是帶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地球表面所有人類，大別之則為黃白黑褐紅五個不同顏色的人種，細分之則千歧百派，要莫不各有其所自生之歷史，以為鑄成民族性的主要成分。而又因種族有強弱之分，以定特性保留的多寡，無疑地強大種族所保留的特性獨多，弱小種族所保留的特性必少。因弱小種族的遺傳性，強半與時代環境條件不相適

合，以致受天然淘汰。丙受強烈刺激之結果，不能不棄短從長以求符合適者生存的條件，這便是弱小種族所保留特性絕少的原故。由此這種特性漸次消失，以達到與強大種族完全同化的程度，這弱小種族竟消滅於無形，這本是一個優勝劣敗物競天擇的公例。

現在且把這種公例應用到今日世界大勢，來測驗華族所佔的地位。且恐測驗有正確，不能促醒華族人的覺悟，更把在華族人腦筋印象最深的春秋戰國的歷史，來作一個比較，使讀者得更為明確的觀感。

華族底春秋時代，各民族所據底地盤，共有面積，相當於中華民國本部十八行省底區域。當時周室衰微，諸侯兼併，戰爭攻取的風氣，如荼如火，列國諸侯其見於朝聘會盟戰爭攻伐者百有餘國，大者地兼數圻，次者地亦數同，小者保守封疆，亦能不失其社稷。這大次兩等國家，牠們時常帶甲十數萬或數萬，壓迫隣封，削其土地，較之西周時代，形勢愈形緊張。二百四十二年當中，幾乎是無歲不有戰爭，到三家分晉之日，諸侯

之幸存者無幾。入戰國初期，浸成七雄并峙之局，其少數小國，如魯衛周等之如蓬生麻間者，實不足以詔於輕重之數。因其存亡之運，實操於四周之強隣，其自身乃無法以避免他人之吞滅。孟子爲滕文公謀，所謂：「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蓋因國際間迭遞演變的結果，而成此強弱懸殊不能抵抗的局勢。更自強國書之，大凡國之所以強，無不由其內政之修明，實力之充物，始則潛滋暗長，終至閔中肆外，迨而驟既揭，則國際形勢爲之驟變，使弱者震赫不及措手。昔管子用軌里連鄉之法寓兵於農而齊以霸，於是魯竟以同等之國終世北面事齊，此弱國君臣坐誤事機，因循委靡，養成不可救治的痼疾。因爲大小之形迥別，強弱之勢不侔，存亡之機已判，雖有賢者而固未可如何。滕之於齊楚如是，魯之於齊楚，周之於秦，衛之於趙魏齊亦何莫不如是。所以大勢之所趨，愚蠢人之所忽，聰明人便不轉眼的注視牠底動向了。五霸在春秋時代，牠有卵翼弱小的功績，使吞滅的風尚暫時得以和緩。同時牠又有兼併弱小的危險，使這種趨勢轉入戰國時代，益發緊張。戰國的七雄，便是拋却了五霸底卵翼弱小方面的事業不做，單獨法

效牠兼併弱小的危險性，來逼進當前時局急轉直下的一個過渡。現在且把戰國七雄與今日世界大勢來作個比較，現在的蘇聯，恰是當時誇一個強秦。秦以變法而強，因其生產充裕，人民體力充實。精神健旺，故其民俗强悍，樂於戰鬥，而又兼併西戎八國，同化異族。蘇聯經列甯變法之後，於世界別開生面，其人民加緊生產，由此國運日隆，并將國內一切異民族以共產主義的力量實行同化。以其由樸野踏進文明的過程來說，在帝俄時代，亦相當於強秦在孝公以前爲晉楚所播棄，不得與於中原盟會，原因難用戎俗，未能免於樸野之習，爲東諸侯所鄙棄。亦猶帝俄沿用專制，不得與歐西立憲國並論如出一轍。一經變法，則文野調和，恰爲一適合生存競爭的民族，其他文勝或質勝者均不能與之相競。此蘇聯與強秦人民文野程度，適合世代要求，其氣質之相埒者一。強秦三面環以未開化之異族，以一面臨東方諸侯，握建儲之勢，扼殺函之口，而司啓閉之權。故秦人常以逸待勞，而抵東諸侯之隙，據險自固，以禦東諸侯之鋒。而彌縫其缺。故秦人善用己之長以攻人之短，護己之短以禦人之長，如是與諸侯相持百數十年，而諸侯固已不

能支持了。蘇聯北帶冰洋，南隣弱小，都不虞有侵襲之患，獨西部接近中歐，東部瀕日本海，始有被敵人襲擊之憂，內部地曠人稀，雖假以百餘年之生聚，亦不患人滿。最是土地完整，形勢險固，不亞堯昔之秦關百二，而弱隣最闊，隨時都予以拓土之機會，比之強秦，其形勢之相埒者又一。此外則今日之美利堅，有似當日之齊，今日之日本有似當日之楚，今日之英吉利，有似當日之趙，今日之德意志法蘭西意大利有似當日之韓魏燕，今日之中國有似當日之巴蜀。巴蜀之地，秦楚共爭，當秦人尙未得蜀之先，楚恃上庸巴夔之守以拒秦人。及秦既得蜀，則上庸巴夔浸以不守，於是鄢郢之險阻，且爲秦人跳踉之鄉，楚遂不得不東徙於陳以避其鋒。是蜀之爲國，秦人藉其富饒以爲殄滅六國之工具，秦既滅蜀，這六國的滅亡，祇有時日的差異罷了。中國地大民衆，物產豐富，爲世界帝國主義賸餘貨物的尾閘，換句話說，即是爲全世界視線之所集注。世界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分域，形成兩大壁壘。但資本主義以世界貨幣之集中，潛伏社會的崩潰，包含着絕大的矛盾性，而日就沒落。這殘忍很毒似豺虎，貪食不智如封豕的帝國主義

底領袖們。爲圖最後的掙扎，想攫取中國土地之精華，人民之膏血，以供他們的榨取。這是他們想犧牲中國，來延長他們自身生命的毒計。中國人民爲自身生存計，必然地無疑地一致興奮起來，抵抗這一羣擄人勒贖的強盜，與牠拚個你死我活。要牠自動放棄侵略。如果不是一個喪心病狂的人們，無論如何是不肯同這一干強盜妥協。無廉恥地，卑躬屈節央求牠們的饒恕。而是勇敢地，隻眼獨具不顧一切地秉承先總理遺教，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個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無疑地是指蘇俄，與中國壤地相接，休戚與共的國家，世界上亦祇有一個蘇俄。目下中華人民切身的需要，是要廢除列強強迫訂下對於民衆不利，而是榨取民衆汗血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是民衆身上底鎖鏈，扭開這些鎖鏈，是民衆迫切的要求。不過先總理死後，遇着些無勇氣志在功名富貴的人們，他們持着不兌現的支票來欺騙民衆，延誤了七八年期間，錯過了可以自強的機會，他們實實在在是對不着先總理。他們把先總理訂下的黨綱和宣言，拏來改竄改竄，曲解曲解，這種辦法，分明是拋開民衆而變成一個尾巴黨了。我看他們任

何一件事都可以簸弄他們的聰明，來麻痺民衆，祇是立國根本的農村，一天一天地破產，無產羣衆一天一天地增多，國際間的形勢一天一天地險惡，國家財政一天一天地瀕於絕境，他們使無法隱蔽起來。到這個時候，他們縱然覺悟到前此措施之不當，褊狹自私，豪闊奢縱之害事，急欲翻然改圖爲亡羊補牢之計。但船到緊水灘頭，挽回殊非易事，大信已虧，則人心散失，重來收拾，往往曠時費力，而收效仍微。况未必勿憚改過，行同君子，樂受盡言，喜如子路，倘猶矜名好氣，過雖欲改而不欲受人之指摘，人或指之，即蓄怨不忘，實無異箝制天下之口。似此設施，決不能團結民意，民氣銷沈，將何以弘濟時艱，此即中國當前絕大的危機。政府既不能解除人民的苦痛，其或有加無已，則是政府對於人民迫之走入絕地，形成社會崩潰，如巴蜀相攻授秦人以可乘之隙，此時便不虞司馬錯不爲秦人建伐蜀之議了。——不一定是吞滅——蘇俄挾地勢的便利，主義的方興而日盛，以迎合中國民衆底心理，這種潰決之勢，必然地滂沱澎湃，恐非一二人之私智巧慧所能豫防而制止。雖合世界帝國主義所有之士敏士以爲之蹙遏，而防止此割性

虎列拉之傳染，結果將使此舶來之士敏士，受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河流之沖刷。被浩浩滔天的驚濤駭浪，捲入太平洋的深谷裏去。這排山倒海的驚濤浪駭，與帝國主義內在的矛盾醞釀成的狂風驟雨，飛泉瀑布，息息相通，互為呼應。這萬古震盪之水，彼抱帝國主義侵侮弱小的人們，豈直樹不起障水的堤防，恐將并其壘築帝國主義基礎的資本而浸滅之，使人民出於水火之中，而為全世界另闢一個新紀元。這些話語，不是對於資本主義的咒詛，這是資本主義內包的矛盾性，必然的要趨於覆滅。這個地方，讓作者對於資本主義來下一個臆斷。在研究馬克斯學說的學者們，加資本主義一些猜惡凶猛形容詞，在醉心資本主義倚權恃勢窮奢極慾的人們，他們總是回護辯白，而對於馬克斯學說所形成之共產主義，亦與以相當不美的名詞以為酬報。今就第三者的立場，一研究孔孟和平學理的人們——來平心探討，信奉這兩種主義的都是人類，人類思想，當以維持人類底繁榮為原則。設有一種思想之結果，而至毀滅人類底繁榮，這種形成的事實，必與開始發動這種思想人們底初意不合。這種事實與思想的演變，到達一定程度，就有矯正

的必要。因動於便利人類的初心，而反得傷害人類的結果。譬之一種食物，所含原質，原是可以滋養人類的，但因存儲在空閒的時日過久，就不免沾上一些微菌。據醫學家防止毒害，講求人類衛生的見解來說，當然是祇有拋去不食的一個辦法。現刻這造成劇烈戰爭的資本主義，牠不安於自給自足，而是到處施其搜略掠奪的技倆。藉開發地，藏便利交通利用資源的種種題目，任意侵入弱小民族的政治領域，這種暴強行為。苟屬圓顛方趾之儔，誰能忍受，尤可慮者，利之所在，則甲乙丙丁各帝國主義連翩而至，苟不均沾，則爭鬥立起，豈端一聞，則連類而及者，如水之赴壑，終至釀成數千萬生靈的巨阨。索其動因則助於爭利，且無有生死存亡之利害寓乎其間，這便是孟子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豈獨有虧人道，苟非披毛戴角，張牙舞爪之倫，誰肯忍心出此，昔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然則今日如虎豹犀象的帝國主義，都是中國古代鼎人之所鳴鼓而攻，執弓矢以從事驅逐的呢。方今資本主義之弊害，固彰彰在世界人類耳目之中，是非如判黑白，然少數站在資產階級的人們。一心欲保持其固有的地位，直

欲挾優勢來一手製造是非，硬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籍弱小民族之口。這不過暫時的可能，從古未有蓄意棄水而本身不遭滅頂之禍者。尤有進者，欲蓄資本而厲行資本主義者爲人類，因他人之蓄資本，而使自身失去其營養之膏血者亦人類，因此一人類蓄資本，而害及他一人類，不惟於學理附會不通，亦且於言詞談論不順。揮資本之力以噬人，因戰爭之結果，恐挾資本者，亦且爲資本所吞滅，苟非至愚自癡我想終必有覺悟之一日。據此以觀，則資本主義之撲滅，直有旦暮之別罷了。資本主義本身既不能自存，則代之而興的，無疑地是共產主義。則俄之相當於強秦，中國之相當於蜀，這恐不是一句踵口而出的無稽之談吧。

以上所述，便是今日世界大勢與春秋戰國之相同性，總括說來，這含着矛盾性的世界資本主義國家，通通有被共產主義吞滅的危險，這不像往時強秦吞滅六國嗎。但是這一個吞滅的過程，便不似往日強秦的吞滅六國那樣簡單而容易。因強秦時代，七國地盤，不外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其間所有弱小民族和國家，老早就被牠們吞滅盡淨，所遺

的不過是一些邊僻荒遠半開化和未開化的人類。那些人類所居住的地方，都是些山川險阻，荒漠絕域。當時的交通工具，尚不足以征服自然，所以當時的燕趙楚諸國，雖力能征服異族，但牠不能充分利用。對於充實國力的幫助並不大，故當時一意的從事拓土開疆，仍然挽救不了本身危亡的局勢。所以秦人不數十年，竟將此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的六國次第滅掉了。

方今人類智識增進，科學昌明，世界天產無不羣思利用。這些天產，有多少是保持在弱小民族手中，往往與帝國主義者以奪取的機會。天產的奪取，即是帝國主義生命之延長。所以弱小民族之不能保持其固有天產，而自行利用，便是和緩帝國主義滅亡的條件。根本說來，要帝國主義走上滅亡的道路，一點莫有躲閃地直線進行，使牠快快趨於覆滅，以滅除人類底痛苦。便是要弱小民族自身，依科學方法加緊的進化，以日趨於強大。世界的弱小民族絕迹的時日，便是帝國主義絕迹的時日。現今弱小民族，自身尙未能依科學方法加緊的進化，便是使帝國主義在這趨於覆亡的過程當中，得到掙扎的餘

地。要世界一般弱小民族的進化，就必要宅心公允的強大民族！蘇俄！底相互提攜。這一般弱小民族當中，具有可以提攜的資格，而又可容易收到效果的，祇有太平洋西岸的中華民國。擁有四百餘萬方哩的土地，四萬七千萬的人口，擁有國有的文化，擁有悠久的歷史，擁有人民的性格，比較敏活聰明，以牠來充個世界革命的中樞，那是最好莫過的一惟一選手了。如果蘇俄能切實援助中國革命成功，引中國為同類，則世界帝國主義的壁壘，便要縮小了許多。再由中華民族依歷史上關係去提攜牠比鄰的弱小，則亞洲的弱小民族，必然地可以完全得到解放。下除澳非兩洲，是供帝國主義的榨取的，實在有限，到了這個時代，那帝國主義已算到了不攻自破的階段了。所以中國革命的成功或不成功，便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在世界上劃分疆域，誰勝誰負的一個判斷。

現在世界上有許多不同文字，語言，皮色，形狀，的民族，均各有相當的文化，並富有科學的智識，近代的技能，欲於最短期間彼此互相溶化，勢所難能。苟非由事實的需要起自然同化，或強烈的壓榨，經過較久的時間，施以人工同化，這民族間的形迹，

是萬難消滅的。不似六國與秦，爲同文字語言皮色形狀的民族，結合是非常的便利，這便是世界大勢與春秋戰國的不同性。

大凡以地域關係而成一個政治集團，其間就必有強弱，縱然欲以人工爲之彌補，但以經過絕長時期，終必有不能彌補的一日，這兼併的事實，就從此發生，在一個設定區域以內，經過絕長時間，漸次以歸於統一。這是因人事的需要，交通工具的進展，文化上因隨地隨時的接觸，而化異爲同，以漸泯其敵視的觀感，互異的形勢。並因血統的混合，心理的改造，逼迫着使愈以接近於統一。這些消滅民族特點的事實，就要看各個民族間對於人事向背的努力如何，纔能斷定其或急或緩以趨於統一的程度。但是無論其或緩或急，終必有趨於統一的一日。並且是弱者爲強者所兼併，上不必一定是戰爭，文化低者爲文化高者所吸收，這是必然地，一定不移地，可以當做算學上定理來應用的道理。

第二十四章 歷史傳來之滅亡性

有識人知歷史的智識，必然能夠明白歷史上底因果關係，這些因果關係，可分爲正變兩種。人們對於歷史上的一件事實，觀其因，便能推測牠的結果，這是事理之常，這是一個正例，這是普通人底智力所能了解的。若是一椿事實，前因後果迴不相侔，尋常的智力不能測其究竟，這必是事實過程當中，滲入別種因素，尋常人們不及探討，這是一個變例。中華民族自秦以後，便伏下二千餘年以來未及發覺的滅亡性，當其尚未滲入別種因素的時候，誰也不能指定牠到後來一定的時間，要到來滅亡的一個危險。到了滲入別種因素，這滅亡的朕兆，乃大白而不能復掩。在人類行爲未能依辨證方法進行的時代，這種隱隱伏下的錯誤，恐怕是不能避免的吧。最重要的在一經發覺以後，就要毫不遲疑的急於設法補救。倘在應當補救的時間，猶尚徘徊不決，瞻前顧後的莫有勇氣來擔負處決的責任，那錯誤真個是不小了。

一個民族有悠久之歷史，許多人認以爲是足以自豪的一件事，這種觀念實在錯誤。試問這歷史上所記的事，是否盡是古聖先賢所貽留的嘉言懿行，如書經的典謨訓誥一般

，如果中國一部歷史底過程，凡君都是二帝三王，凡臣都是皋夔伊呂，以悠久的歷史，而能有此以善對惡十得八九的成分，則藉以自豪，不誠足以自豪嗎。奈自嬴秦以迄現在，政治則建築在個人權利——人君——的基礎上面，日以榨取人民膏血，壓服隄防人民的反動爲事，對人民生活方式，允許以極大的自由，而在以小農立國的社會當中，個人財富僅是足用，甚而是不足用，人民爲要滿足他們的慾望，他們總得從經商的路子去尋求，這社會上便出現由官而商，由士而商，由工而商，由農而商，以經商爲高度形勢的生活狀態。誰都曉得，這種小規模的經商，是全憑施用詐術——俗語是盤點小心，就是盤錢——來博取微利。在這種蠅營狗苟的社會組織裏面，便是鼓鑄一干壞分子的廣大場合。如果政治是加緊剝削人民的話，他們智巧的花樣越分翻新，詐欺的程度越分高漲，所以漫漫地就習成了一般機巧變詐的風俗。孟子說：『根於其心，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所以秦以後底政治，便達不到根本清明的程度，這機巧變詐的風俗，便成了一個普遍性的無限漫延。釀成這種風俗的主因，便是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

何以利吾身，這上下交征利的事實，便帶有演成機巧變詐的必然性。換句話說。即是財產私有的觀念，因汗濁歷史的演進，更形明確。率性爾詐我虞的事實，因汗濁歷史的演進，更形劇烈。這華族在這過程當中，不知不覺的伏下了幾乎不可救藥的滅亡性。汗濁歷史的演進不已，即是人類慾望的前進不已，即是人類慾望與人類汗濁歷史成平行綫的進行。不從經濟基礎根本改革，這恐不是一個巧妙的方法可能制止的吧。所以一個民族的聰明分子，老早便當心這些歷史的鑄成，歷史鑄成的因子，倘不是根據一個政治領域內全部人民的利益，後來一定要演成不可收拾的禍變。這些因果關係，便不是一個半凡卑近，庸俗不堪，帶上一套自利的墨鏡那些人們所能窺其底蘊的了。

華族自秦漢以來，得下一種自利的痼疾，——便是歐洲十九世紀以前標榜的個人主義——使一個民族當中，分子與分子的中間，埋藏一種互相排斥的力量，使民族不能堅實團結，形成文弱的廢病。但此種廢病，在漢唐時代，一般學者猶未感覺，自趙宋時候受遼金元三個北族的威逼，迄朱明時代，又受滿清的打擊，這些士人當中，頗有見及民族日

身底文弱，難以抵禦強隣。然又不知其致病的由來，仍然本著尊君的舊說，承認財產私有，企圖國家的富強，盲人瞎馬，殊屬可笑。豈知中國國家文弱的廢病，就在個人自私自利，中國社會分析起來，便是未脫封建時代的一個準資本主義社會，使整個的民族不能團結。歷史上所有的暴君污吏權奸悍將，都是由此適宜的土壤產生出來的。人君尙且視國家爲一己的私財，又何怪臣民挾自利之心，以從事於熙來攘往呢。是以當國絕少忠良，人心難以醇樸，以之守城則不固，以之禦敵則曳兵反走。因爲這些人民原無整個國家觀的念，認爲無致死於敵的必要，其躡脚行伍之間，都是一些出於不得已的情緒，這都是一些根本不能與強敵抵抗的表現。間有一二曠代稀有之士，欲爲民族細愆糾謬，使走上生存競爭的正軌，一如王安石，却不能勝安於現狀，沈溺於私有制度者的蠢起阻撓攻擊。加之雖有良法美意，却少人來推動奉行，其結果往往與計劃相反，因此這個曠代稀有之士，便成現代的一個犧牲者。由此看來，一個民族的私有觀念愈強，則國事愈益無人過問，見利則豕突狼奔，遇害則鳥驚獸散，團結力的薄弱，殆有過於春冰，無學好

樂貪歡，遇事避難就易，無形間伏下一種不易拔脫的僥倖心。這個僥倖心，便是華族一切事業不進步的總根源，這是與民族國家的衰弱，有連帶關係的。這些民族廢疾的因果關係，被他族人覺察了，知道牠是迫促民族死亡的一種險症，便在設法防制。滿清禁止滿族人與華族人通婚，元人甚欲殺盡華人，將其地闢為牧場，他們心目中的鄙棄華人，是因他們有鑒於拓跋魏和遼人金人底淫於華俗，以致覆亡。所以他們視華俗如一種富有傳染性的惡疾，如麻瘋，如楊梅，從華族的立場看來，這是何等可恥的事實，殊怪自身患麻瘋患楊梅毒的民族，倒反甘之若飴，毫不感覺牠是一種痼疾。這簡直是一種至愚無知，蠢笨可憐的下等動物，還配與世界人類來爭生存嗎。

這種麻瘋楊梅毒似的惡疾，中在民族本身，究竟那一級的人民先受其害呢。這無疑的是至愚的貧苦人先受到犧牲，因為他們的膏血，被偽智識階級的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所榨取。他們震駭於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威勢，雖至形如槁木，仍然一點也不敢反抗，雖屈服至死而不悟，他們還能覺悟到自身絕滅的根由嗎。

至說那些偽智識階級的人們，方欣因智識的運用，不勞便可獲來目前的安樂，是其鋼鐵方深，可斷定其無澈悟的機會，此外便是一般青年，因環境比較適合，腦筋比較清澈，間有億逆及之，而覺悟到民族前途的危險，然又以政治的壓迫，教育的麻醉，轉瞬又沈寂下去了。是這種麻瘋梅毒似的痼疾，終於不可救治。從前是遇小寇則以毒化自我而可苟存，今遇強敵，恐招致剷除毒化的手段，而自身難以幸免。在我既無繁殖生存的方以自衛，反有內在的矛盾，引起自相殘殺的可虞。在彼有移民繁殖防止腐化的必要，必然出於強烈的制止，而不惜施以毒辣的手段，民族自身既不知有以謀自身之生存，將來侵入的強敵，亦正不欲我族齷齪忍垢的生存。○在這環境條件的下面，也決莫有第三者來代替維持這個民族的生存。因華族伏下內在的矛盾，終久是一盤散沙，古代的百越百濮，這些民族，各擁酋長，不相上下，卒致滅亡，便是一個好例證。

遺產制度的推行，即是自由主義的表現，牠是與政體相伴而生，牠能鼓鑄人類自私的心理，堅決人類自利的行爲，與龐大的資本主義結成歷史過程上的一環。牠和龐大的

資本主義，是以相同的性質，用相異的方法，從不同的方向，表現出參差的形態。換句話說，即是遺產制不必爲龐大的資本主義，但是這龐大的資本主義，無有不歸納在遺產制當中的。再掉一個方式來說，這龐大的資本主義，是以遺產制爲基礎開始產生出來的，是資本主義的毒害，即是遺產制的毒害。現在華族當中，有些打起革命招牌的人們，牠們喊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但是牠們却要保留承襲遺產的制度，似乎牠們不知道這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孕育成熟的，這是何等的矛盾可笑呢。這簡直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的一個惡子，牠們攻擊共產黨廢除遺產制，牠們的理論，是說中國資本主義尙未達到龐大的一個階段，此時來說廢除遺產，時間未免過驟，且等中國資本達到龐大階段，再來將遺產制廢除，實行其所謂共產制度。這種理論，譬之患疔毒的人們，他以為這疔毒尙未至傳筋發熱的時期，姑且保留，不施救治，必待其外形隆起，疼痛不堪，這纔是施治的機會，個人甘受此時間上無味的痛苦，苟非至愚，誰肯出此。因爲他不明白這疔毒是一種能危害生命的險症，牠的外形雖有強弱大小的分別，但牠的毒質，早晚一樣的能够

殺人。如果是遇着一個聰明的人，尤其是這疔毒發生在聰明人的身上，他必然地，無疑地，立時施以救治，不使韌底形勢蔓延擴大，以減除他本身時間上延長的痛苦。這處有不可忽略的一件事，即是這疔毒在強大的時候，與在弱小的時候，所施救治的方法是兩樣，不是一樣。在弱小的時候，是用緩攻輕治，使患疾的人們不感覺他身上的痛苦，這種認識，是斷斷不可少的。如果不分別形勢的強大和弱小，一概投以猛劑，施以劇烈的手術，那便是一個庸醫，要愚蠢的人們，纔有這種看法。這種遺產制度不除，這些流毒便永遠埋藏在民族精神裏面，率性表現，這些倚賴，偷惰，險詐，褊狹，慳吝，忿戾；的種種惡德。形成一個不顧公益，營私短見的卑劣根性，時常伏有吞下強大民族鉤餌的危險——充當漢奸——被迫走入屠場的可能，這便是物質的影響於精神，這便是存在與思惟的統一。

左傳上說：『戎狄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這些極端的個人主義，現在中華民族，可以說差不多是普遍染上。但是在春秋時代的戎狄，因為他們的

祖先，不知道在人們的行爲上予他一種規律，強迫他嚴格地遵守，把一族人的力量團結起來，所以在二千餘年前，他們的種族便已陷於滅亡的境地。華族幸得在開化初期，異人輩出，「堯舜禹稷皋夔」就他們特達之知，卓絕之行，與民族以精神上的暗示，鑄成民族特性，推動民族使日進於開明的境地，所以能將民族壽命延長到四千餘年。但自秦漢以後，政尚苟且，所有民族優良的特性，隨歷史歲月的延長而漸次消失，至今日可說是已經掃地無餘了。在前梁任公在他出版的新民叢報第三十八九期上，指出我們民族危險的程，他從學術方面說：「舊學漸滅，新學未成，青黃不接，謬想重疊。」從民德方面說：「混濁達於極點，諸惡俱備。」現今距這書出版期間，又經過三十年了。這三十年當中，試問學術有相當的改造嗎？民德有相當的改造嗎？可說都是沒有，并且危險的程度轉而是與年俱進。現在雖有創造新生命的說法，但是他們的誠見魄力和勇氣都是有限，牠缺乏鋪錠的透視作用，來檢查歷史黑幕裏包藏的事實所埋伏下的病根。他不知道舊病根和新生命間成了怎樣的一個過渡關係，所以牠雖然想創造新生命，但是牠對於

舊有的病根竟有勇氣來施療治的手術。誰都知道舊病根不去，新生命無論如何不能創造。這樣一個不除舊病根想造新生命，離開實際的思想，適構成了一個烏託邦的幻想。我們所最不可忘記的，這華族自秦漢以後，已經把從前所走的康莊大道，廢而不用，來走上一條偏仄崎嶇的羊腸小道，誤入了當前戎狄的祖先們，與戎狄指下的老路子了。他們的個人的嗜利無恥，不顧民族利害，便是他們民族底一番勾魂簿。以這樣貪得無厭的腐敗情緒，來支持全民族社會底主要心理。那裏會有堅實的團體來抵抗異族的壓迫呢。

人類在世界上第一個問題，就是人類自身的生存，要如何纔可以得到生存，就在人類自身的實際行動。這就是行爲本於需要，利害根於行爲，一串自求生存的道理。自求生存的行動，是質樸地，切直地，無有虛飾地，純任自然的表現。世界上無論那一個民族，在由初民時代踏進半開化或全開化時代，這過程中間，無疑地，他的行動是合乎自然規律的表示，和人類進化的程序。如果不是這樣，這個民族就會停止在初民，或半開化的過程中間。華族前期的演進，便是合乎自然規律的例證。中期的停頓，是與所謂一

意安內的禮制所設尊卑貴賤男女等區別有連帶關係的。社會上設了這種區別，便無意間播下了後世社會虛榮矯枉踏空掩飾種種心理的種子。到了歷史後期，禮之真意喪失，而禮之容止猶存，這種禮制便越發成爲助長虛榮矯枉踏空掩飾種種心理的工具。換句話說，就是要把自求生存的实际行動，——禮意——巧妙地駕馭他人代爲服務，自家儼倖地得到安逸和優裕的地位。這樣一來，社會上除開依政治地位劃分階級之外，在平民當中，又依私智小慧盜竊權利來分劈一些階級。階級既多，便率性地爾詐我虞，相禁相制，將完整地一個民族，弄成四分五裂的形勢。一遇到異族鄰封，施以強烈的壓迫，在狡黠無恥之輩，有不恤諂媚異族以殘同種，——所謂決奸——思於此日效死立功，以爲他日希榮回國的地步。異族於此遂得於將征服的民族甲乙內等派別當中，施其操縱的手段，以行其宰制的權力。一個民族的生命，墮落到受人宰制的地位，便是所有的人們不務正常利益，而是崇尚虛榮，意圖安逸，使內部自行分裂，與異族以可乘之際的原故。

民族的模倣性，在有一個期間，是可以催促民族進化的。但一味的盲目模倣，不加

擇別，便有把烏頭當成附子服下的危險。原來一個民族的成長與盛，自有牠的特長，以鑄成牠的民族性。如果另自掉一個方面來看，牠的長處，或者也就是牠的短處。從另一個民族的立場來轉相師效，這是要看明白自身的需要，纔能向這些事實開始抉擇的。如果自身需要看不明白，那便不能抉擇，祇好連根帶蒂的一齊拔殖，那就有失掉自家民族性，甘心同化於人的危險。中國自變法以來，自上至下，無不從事摹倣，步武異民族的文明。但是他們都不明白本身的需要，像個莊周所說壽寧餘子之學步於邯鄲。所以自滿清戊戌變政以來，至今三十餘年，他們是終日跟着歐美亞三洲的列強追逐，到底一無所成，祇落得異族人加上一個等於摹倣的民族底徽號。因為自身這些浪漫性的摹倣，使帝國主義無意間闢了一個廣大的銷場，得到操縱金融的機會，自身常常是居於失敗的地位。

華族人們的身體，自秦漢以後，個人主義發達以來，民族中國勞力勞心分成畸形的兩個階級，各倚其智力以為生存。因為他們智和力的偏枯，所以他們莫有健全的精神和

身體。這鴉片的毒害，都是乘着偏枯的罅隙滲透來的。有了這個罅隙，便是一方奢縱豪闊，貪淫嗜殺，一方詭媚愚蠢，凶橫殘暴，種種惡德，都向着這偏枯的罅隙一齊擠入，侵襲這不健全的精神和身體。加緊使這民族的外形腐敗，這是一個民族枯萎的徵候。

非族自兩漢以後，新興一種詞繁義寡的俳優文字，上相如子雲——與箋疏傳注的駢枝文字，這些文字的興起，便是證明國家政治入了廢道，民族思想離開了實際，從民族精神上看來，這顯然是一種病態。如果當時遇着黃帝堯舜的君王，他們是要急速設法來加以救治的。不過漢代君臣，祇顧到他一家的利害，并未打算過民族的將來，所以也就漠不關心地拖延下去了。這一類俳優和駢枝的文字，牠是吸吮民族膏血的魔鬼，牠是減少民族實際行動的一個洩水管，牠是民族進化過程上的障礙物，牠譬如是一株果子樹上的空花，徒消耗果樹的元氣，不會得到一些收穫的。這二千餘年當中，關於這一類著作的書籍，可說是汗牛充棟，強半是發揮個性，缺乏民族意識，依民族精神的經濟計劃上說來，當年始皇政策是可以重行應用的，不過應該加一點擇別罷了。因為在一般著作者的

目的，是想在未來的後世留一點點名，他們并未意識到這個世界是全人類的世界，既有此一民族，又有與我同時並存的多數民族，彼此有利害的衝突，便要形成一種鬥爭，這種鬥爭的開始，便要生出民族存亡的問題，更連帶演出自身存亡的問題，這是何等的切要重大呢。因為華族在這個時代當中，一般士人的懵懂無識，一讓步可說是大多數一跟着政治尾巴擺動，已經把求學的使命鬧錯了。求學而不講求實用，終日佔畢咿唔，舞文弄墨，去生存之道愈遠，領導民族崇尚虛文，這便是使民族走上了滅亡的道路。

人們對於物質私有，這種智識，是與人們的身體相伴而生，原不假什麼教育的力量來啓發的，不過一種物質對於人們的身體為利為害，與其利害淺深的程度，這確實是要依賴一種正確智識來加以判斷。這種智識的培養，便少不了教育力量的啓發。如果在一個教育不發達的國家，政治中樞得不到一個領袖人物，一任私有制度的過行膨脹，則一國的境土，便成為巧取豪奪的場所。結果總鬧得有官皆貪，無紳不劣，民貧則女為倡伎，男為盜賊，弊吝則一文不捨，耀霍則千金立盡，在彼此競賽嗜利依累進法則逼人民

走進只知自私的一座迷樓的時候，這畸形社會當中，人民大都遺棄遠矣，舉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這遺棄遠矣的幼蟲，人都知道是糞蛆，這一坑糞蛆的命運。只好等待嚴霜冰雪的到來，使氣溫降在零度以下，這些糞蛆拗不過這種寒凍，當然要受優勝劣敗天演公例的淘汰。不過常人們成了糞蛆，鬱悶在糞坑內面的時候，有政治責任的人，當設法防其蔓延，除其污垢，止其孕，使復歸於清潔。但從教育着手，則功緩而效微，從政治着手，則功速而效著，兩者相權，毋寧從政治着手截止財產私有制度，為直切有效辦法。因為這財產私有的意識，在人民各個身上，由歷史的演進，是依累進法則進行的，加緊教育的速度，亦恐不易追趕，在這種情勢之下，這財產私有制度，便為民族衰弱以至滅亡的主因。

人們的腦筋如果埋藏了財產自私的一種觀念，他莫有又豐富智識和偉大能力來征服社會，而又夢想安富尊榮，這一定是要乞靈於鬼神的。拿事實來說，他們往往種下不必然之因，來望獲得或然的果，設或十有一中，使其信為鬼神的呵護。於是信力彌堅，信

徒愈衆，求且應的實事亦日益增多。因為他們缺少算術的智識，他們只知傳聞或日見者的求則得之，而不知來求的人數，且數千百倍於應驗之數，依然是十與一之比，他們以為鬼神有靈，其實倒是自家的愚闇無識，由這種心理的演變，人們各自站在自利的觀點上，來看自家的行爲，凡是僥倖得利益的，都覺得是有鬼神的呵護。看別人的行爲，凡是遭遇不幸的，都覺得是有鬼神的譴責。他們以為這些鬼神都是爲他一家或一人來作呵護的，社會上的各個人都是如此，他們只有拚命向諂媚鬼神的一條路上競走，便覺得鬼神的威權煞是不小。這鬼神的觀念，既在社會心理上樹起威權，便越發使人民精神陷於迷妄。換句話說，即是離開實際浪費時間和金錢走上一條亡國滅種的錯路。

綜上所舉，都是歷史的遺傳，僅就個人管窺所及，滯略恐是不少，苟讀者能舉一反三，那更是私心驚視的了。

第二十五章 舶來加重的滅亡性

誰都知道一種瀕於崩潰的政治組織，是經不起外來勢力襲擊的，遇到外來勢力的襲擊，便有陷於崩潰的危險。華族本身依歷史底遺傳所伏下的滅亡性也就不少。現在突然舶來許多物質的襲擊，這民族精神便起了一種極不規則，而是含着危險性的畸形變化，這就叫本民族舶來加重的滅亡性。

物質是有實體的，經人工所造之物質，是由人類智識的構成，依着審美的方向進展，而是帶有效用性和誘惑性的。在教育不發達之國家，人民缺乏理智，牠們是要向實際撲捉的。所以一見到帶誘惑性的物質，牠們便瘋狂似的，如燈蛾撲火，全身一齊浸滅下去。因為牠們莫有抽象的人生觀念，早就把支持民族精神的孔學，弄得來虛偽不堪，可說是名存實亡，並且是只有少數人知道，多數人簡直是昏聩似的。所以對物質的誘惑，根本上就莫有辨別的能力，以這種智識幼稚的民族，當此生存競爭時代，無疑的是要因被誘惑而受欺騙，因受欺騙而走上滅亡的道路。加之自秦以後的政治，二千年來組織是異常疏鬆，老早就踏著歐洲自由主義的路子前進，他們是不知道一個民族國家的經濟

命脈，是該由政府來通盤計算，對人民加以切實指導的。以中國這樣一個不能適應時代要求的政治所籠罩下的人民，一遇到歐美物質文明的攻襲，便無疑地當者披靡。因為華族一般淺見的人們，眼見這外來的物質文明，在內部財力充足時代，節帶二分開啓人民智識的利益。却不知及到了金錢外溢，財力枯窘的時候，遂變為消滅民族具有強烈性的毒劑。牠的功力過於鬥爭屠殺且千萬倍，這不是個人的危言聳聽，是因為一般人民的安坐享受，不知外來的物質文明是衝破本國手工工業的坦克車，為自身不容接受的一種醜毒，怎禁得起那樣狂爭浪飲呢。這種道理可說是最明晰而且甚確切。

在一個未受外力侵襲的民族，牠的慾望和智識，是依着一定的程序前進，而是常保持着一定的聯繫。并且這種聯繫，是富有歷史意味，而為安定社會的一種機構。以這種聯繫為基礎所構成的一般人類的行爲，大多數是合於一般社會的規則，所以這個社會便表現出一種安定狀態。轉過來說，華族人民自中國私有制度形成之後，「春秋戰國」他們自利的心理，便是與年俱進。不過自春秋戰國以後，這二千餘年當中，孔孟的學理

，也要將這自利的心理羈絆着一小部分，尚能做個對面寫照，知道牠是一個不正的行爲，不過無力來替社會驅散禱罷了，這種自利的習性，歷史愈久，政治社會的浸漬愈深，終必有潰決的一日，又從一般人民應有環境需要來看，智識則停滯不進，能力不足以征服自然，因之慾望不能滿足，遇着歐風東漸，驟來一種物質文明的侵襲，使人民慾望達到過度膨脹，一面智識的啓發依然停滯不進，從此便突破安定社會裏面慾望和智識的聯繫，一般人爲追求的原故，往往因智識能力的不足，演出許多不規則的舉動來，如詐欺，盤剝，剝削，豪奪，等等，這都不過是心思騙取一點金錢，以求滿足個人慾望罷了。

上面所說這種不相適應的社會機構，是必然要產出不由正軌，而是畸形發展的一種社會。這種社會的發展，前段說過，這是生產手段幼稚，不敷人們慾望的追求，我華族伶俐慧黠的人們，他是不跟着民族生產手段走，而是要跟着五官所接觸的一切物質條件走的，在這一個矛盾情勢的底下，民族當中便裂開一條很大的罅隙，不可避免的變成了

帝國主義的尼閻，昏昏沈沈地，一天一天殖民地化，譬之一個患癆瘵的人，牠的精血總是一天比一天枯竭，這病勢是何等的危險呢，即使有些抓住帝國主義尾巴的人們，依據牠們的立場，放胆說牠們的新興勢力，將來可以對抗帝國主義，拯救中華民族，這是一種近似欺騙的囈語。試問他們用這種方法所獲得的利益，究竟是取自各帝國所屬的人民呢，還是取自於國內的同胞呢。這顯而易見的是取之於國內同胞，何嘗能在各帝國主義所屬的人民身上取得一點來抵補呀。他們不過拿出一些本錢，乘着帝國主義的勢力，就本民族榨取所得的當中，來分點利潤吧。他們的功用是把本民族一個經濟比較平均的社會，借着帝國主義的機能，加緊地使他分化成貧富懸殊的兩個階級，而又是貧多富少，顯出這資本主義社會絕對不能撐持的現象。譬如人之身體，一指之大幾如股，一臂之大幾如腰，而又脛短如膝，腳小如鹿，這種醜怪形狀，誰也不能承認他是個健全的身體，他怎能抵敵過一個孟貢烏獲！帝國主義！呢。所以這種買辦階級，自身就帶上了一種偏枯柔脆的卑劣性質，因為他是要仰帝國主義的鼻息纔能生存的。他與帝國主義成了不可

分離的一個有機組織，今說要來抵抗帝國主義，那簡直是一句笑話。所以買辦階級對帝國主義。雖有時利害衝突，亦不敢掉頭反抗，那些無產階級，又因受他們無情的剝削，不願出面代他們反抗，這便是偏枯柔脆的大病根。一個民族生產技能和智識的不進步，而人民又復醉心私有，思有以滿足其慾望，這代人銷售成品從中漁利，一經商一便是最良好不過的方法。所以買辦階級的心理，是以人類惰性為根據，不肯從生產方面着手而忍心作掠奪行為的一個魔鬼。中國周末時代，商業早已繁盛，這是與當時政治動向互相呼應的。在二千年前已伏下此種病根。因為當時人君一意營私，所以人民孳孳為利，強者憑權，智者恃巧，聽其演變，不知救治。馴至富者豪華奢靡，貧者不能自存，這便是二千年迭演循環內戰的一種根由，所以買辦階級，只會掀起內戰，準作漢奸，還配說抵抗帝國主義嗎。

中國中古時代，士大夫階級的女子，受了一種禮教的束縛，便把自家從事生產的能力，漫漫地縮小下去，實際上成了一個寄生蟲。他方面又漫漫地把倚賴心虛榮心膨脹起

來，成了效忠於士大夫階級的一個適當的配偶者。——如果不效忠她便失了生存的要件——這是封建時代必然的現象。但是封建勢力，後來漸次崩潰，以後從這個階級蜕化出來的女子，是否看透了這般女子地位的危險，來從事指導與救濟。這可以說是雙方都不曾覺悟，而且因這種女子在社會上的地位尊榮，她們這倚賴虛榮的心理，深滲透了社會上的各個階級，這些男子有時也樂於她們的效忠，對於她們的思想及行為加以擁護。但以坐食寄生的原故，帶累也就不小，如果在經濟崩潰，政局不安的時候，那就要受到飢寒交迫的威脅。中國在海禁未開以前，這種威脅為時甚短，男子心理雖有時不免起了變化，迨緊張期間過後，不久也就半復過來。自歐洲物質文明侵入以後，男子們所受的威脅愈大，期間愈長，馴至於不可耐忍，女子們則對新奇之物質欣喜若狂，在這男女間一種供不應求情勢的下面，這男女的配合，便生出絕大的問題，在醇謹自持不逞狂潮的男子，則視時髦婦女如蛇蠍之不可近，在醉心物質享受的婦女，則鄙棄醇謹守舊的男子為無能，因此一國之中內多怨女，外多曠夫，來助成社會的不安定，使人口無形的減少。在

這過程當中，女子爲暫時的生存計，遂不惜獻身社會，在武力與金錢威脅之下，成爲公開式的玩弄品。以利於男子玩弄的原故，不能不競尙裝飾以爲引誘的手段，使天然的習於遊惰，並充帝國主義剩餘商品的好顧客。這種趨勢，非政府從積極方面充分興以工作的機會，消極方面嚴厲加以制裁，這是無法可以制止的，推其結果，後來這些沒有能力得不到婚配的男子，亦必樂於結納，恬不爲怪。如歐洲之吉卜賽族，男操賤技，女爲遊倡，專供白種人解決性慾之用，卽廣東的蛋戶亦何嘗不是如此。所以女子沒有生產能力，而又溺於物質文明，便失却了身體生存的自由，向後更加緊的商品化。以這樣遊惰的婦女爲母，所生的子女，雖不都是骨軟如棉，甚難望其備具民族特性。左氏傳說：『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昔梁任公亦曾以此爲憂，這是民族從物質的優劣轉入遺傳方面留下的一種滅亡性。

冠履衣服，古人原卽以爲禦寒之具，質地取堅實樸素，御用取清潔整齊，過此以往，也就無所需求。後世物質進步，人事日紛，心思更行複雜，始於遇寒正容之外，更進

而求美觀。因之對於衣服冠履，便有花紋色澤形式之選擇，進而求之身體，則有爪髮顏面之修飾。這原是超過必要的一種動作。這是要生活優裕，不受工作逼迫，拋開一切學問事業，專來研求享受的人們，纔有暇時來作如此勾當。從前法王路易十四，每日清晨漱口，都要耗去許多時間，這便是今日摩登青年的一個特點。但他適宜生髮的條件，還是要自身金錢充裕纔能得到許多寶貴物質來供他裝點，閒暇時間，來供他消耗。他的思想是不出於他一身的整理，他常常是顧影自憐，眼光不出五步以外的，他是以討得對方好感爲目的，他是絕不知有所謂自身之生存與民族國家之關係的。近日這種時髦人們的享受，是懶惰者無恥的享受，是墮落者自絕生命的享受，這便是資本主義社會走到末路的一些亡國滅種的現象。

男女社交，原基於一種正常工作與調協的情緒，這當然是以倆生存的利害爲連繫的。如果莫有這種連繫，那便只限於事實上一般泛應式的交際，也就無透入精神界的必要。現刻有些人用摩登方法企圖透入對方的精神，想進一步生利害上的連繫。但是她們忘

却了美觀的引誘是一回事，切身利害的連繫又是一回事。不見得能爲美觀所引誘的，即能共生存的利害。這種結合兩性的方法，有似滿清時代的科舉取士所得的結果，是取非所用，這不是枉費精神作無益的周旋嗎？這便是男女間的一種錯覺社交。如果存心不是這樣，而是另含一種不可告人的企圖，貪利無恥，借修飾來設騙局，如呂不韋之進邯鄲美人於公子異人，李園之謀進其妹於楚王，所不同者不過牠們是自獻其大好身手吧。這是與近今滬上折白騙術同樣的手段，這種汗穢行爲，實够令人掩鼻。但在一個柔懦而貪鄙的民族，這種事實不得政府之正常指示與嚴厲禁止，是無法可以避免的。

在這女性慾望過度膨脹期間，其資源專靠男性供給的情勢下面，這婚姻問題一定成爲苦悶。在女性對男性的觀點，必然是以財富爲重要條件，而是要男性底能力能博取得多數金錢來滿足自家慾望。在男性對女性的觀點，必然是把自家能力所換得的金錢，除開一部或全部來滿足個人慾望，一面要求女性行使個人的能力，換得金錢來滿足其慾望的全部或一部。這麼看來，這兩性的思想是何等的矛盾呢。在行事慎重的人們說來，這

兩性根本便無合作的可能，這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帶有普遍性的。在這種社會情勢下面，兩性只好各抱什麼獨身主義，成爲社會上的犧牲者。倘在兩個事前不愼的人們，貿然結合，以這兩種互相矛盾的思想，作牠們的原動力，無疑地不久之間，便要演出爾詐我虞，互相攻訐的怪現象來。如果牠倆猶不遽然宣告毀婚，便要演成充滿厲氣的一個壞家庭，不是犧牲一方，便是各任意氣，越分胡行，結果蕩盡家財，各自離散。此種情勢之下，在歐美各國，情形本不算十分嚴重，但在政府猶在提倡什麼禮教下的中國，那可算是十分嚴重了。因爲歐美各國的政府，牠們時常注意到國內人口的增減，如果覺得人口增加率過於緩慢，牠們馬上便要設法來獎勵，何況是婚姻問題的根本上起了障礙。牠們豈有不設法來排除的嗎。再進一步來說，一國人民的婚姻不得其宜，配合不以其時，這便是國家政治上一個大關點，直接影響於人口，這是要由執政的人們負責的。所以周代婚姻，男女婚嫁以時，其過時者則有奔者不禁之說，以謀婚姻問題上的解救，外國的私生子是要受法律上保護的，中國現行法律雖不曾加以限制，但以舊勢力的壓迫，社會

上實少見到私生子出面的。以全國計，每年所拋棄者不知若干，向後且有日漸增多的趨勢。如果在一個近代化的政府，就必要想出一種補救和調劑的方法來，對於兩性的作婚姻試探，是不能加以蔑視，而且該指導作正當行爲使社會加以相當尊重的。并於相當地點，設立育嬰院及孤兒收容所，以爲棄養嬰孩與失教孤兒，不容於既存社會的一種補救，庶免阻滯生育，爲人口增加上的障礙。須知男女慾望的膨脹，是由歐美物質文明的侵襲，政府既有無能力來捍禦此種侵襲，就應該追認這既成事實設法來加以調節，如果橫施壓迫，便是一種矛盾行爲，只徒暴露出政府本身的無能。

第二十六章 現政治造成的滅亡性

國家爲捍衛人民的工具，政治爲國家捍衛人民的手段，一國的政治而不以捍衛人民爲目標，乘一國政治的人們，而不負捍衛人民的責任，這個國家便僅有一個空名，不會具有內在的實質。有這樣一個國家，那些執政的人們，毫無疑義的要把政治的力量，來

與一般人民加上一些枷鎖權械，這不是人民的張網自投嗎。人民因自求捍衛而組織國家，現在不惟得不到捍衛，反於自身加上一層束縛，這世界無政府主義，便從此反應出來。在一個地位不危險——對世界——的國家，情形尚不十分嚴重。如果是國家地位，當着衆流所匯，這些失掉捍衛，并帶上了腳鐐手铐的人民，怎當得起洪波巨浪的沖刷呢。所以一國負政治責任的人們，根本要明白一國政治的作用，人民當前的需要，并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個人利害應該早就拋開，使頭腦清澈，眼光銳敏，一直看透現實，力挽人民從趨利避害，或利多害少的康莊大道上走去。估計果能得到無上代價，則雖本身與民族遭受一切犧牲亦所不惜，具有此種決心，始能肩荷國家重任，人民纔不至有淪胥以溺的危險。如果一個當政者，一心只知道個人富貴功名，前不明既往的歷史，後不計民族的生存，外不瞻世界的趨勢，內不察國人的需要，一意孤行，步步錯誤，這無疑地是要領導民族走上滅亡的道路。

一個民族要求生存，就必要備具生存的條件，要求備具生存的條件，就必要先求有

生存的智識，要求有生存的智識，就必國家先設備施有生存的教育。什麼叫做生存的教育，就是在現實情狀之下，應付環境以求生存的一切方法。這種教育，是清晨講演，日中應用，教師住了口，學生便動手，要這樣緊張的工作，纔能應付中國目前嚴重的形勢。回顧我國維新數十年來的教育，始而日本化；繼而德國化，繼而美國化，這是由於少數洋博士，不諳國故的人們，他看過一個葫蘆，便想把牠拿來依樣畫下。但這葫蘆常中所裝的究竟是什麼藥，醫不醫得好中國目前所患的險症，可說他們是一點也不明白。他們既不明白本身的需要，所以教育的目標，可以由他們高興起來任便移動，這不是一個無目的的教育嗎。中國維新以來，辦了數十年的學校，但這不切需要的教育，只能加了一般學子們的偽智識，幫助膨脹了沒落的資本主義，造成了世界帝國主義傾銷大量生產的一個尼閥。這種教育向後如果愈是發達，國家必然是愈益窮困，社會必然益見紛亂，因為是中國教育的根本方針錯誤的原故。例不如未受教育的人們，心思比較醇厚。用政治力量指導起來，反轉容易得多。但是由這種偽智識所給與民族生命的打擊，影響非

常之大，在中等社會上的人們，差不多是普遍沾染。在當政和施教兩方面的人們，又大都未曾見及，不惟未能救正，尙且推波助瀾，將來所得的結果，有非吾人所能逆料者。現在民族抱有不見救治，而又必須救治的一種痼疾，就是受歐美物質文明的侵襲，所給與精神上的影響，這便是偽智識無限膨脹的一個根源。我們試想一個新奇物質給我們的印象，與一種抽象物理給我們的印象，二者孰爲明確，這自然新奇物質的印象最爲明確。尤其是使身體感覺舒服的物質印象更明確，這是精神上的一種自然法則。依這種自然法則的結果，人們便是耽於物質的享受。國家政治的動向，就在有以領導他們的精神，使他們的心志另有專注，——這是指對於生存上應有物質的前進，不是虛空指什麼道德，——將他們的重心移轉。一面用教育的方法，使他們物質的需要漸次滿足。換句話說，即是使他們對於物質的追求，有一種合理而且能滿足的辦法，不至於永久不相適應，成爲一種畸形來妨害社會，這教育的使命是何等重大呢。若教育不從自給自足處着眼，而依然是大而無當，既不顧他們的需要，又要抑制他們越軌的行動，硬用什麼偏頗不適的政策

治手腕，和陳腐的學術，強使青年們來俯就，這譬如朽索之馭六馬，適以動成他日橫逸絕塵的勢子。縱能誘之以利，威之以勢，強勒使就範圍，然利盡則疏，時久則懈。即如現在政治迷途上的新生活運動，和其他利誘結合的社團，便是這種情勢。且看後來所收的效果究竟有好幾成。

一個由帝國主義卵翼下的政府，是不能代表全民利益的，因為全民利益，與帝國主義的利益相互衝突，而是要把帝國主義的勢力趕出國境以外，如果政府代表全民利益，那帝國主義就根本不會來卵翼牠。但是在現刻民族當中，露了頭角的人物，除孫中山先生外，還不會見着如此不畏強禦的，這是因為他們的醉心自利，牠們不會體貼孔子無慾則剛的教訓。世間任何一個人，只要根據自利的原則來擔負一國的政治工作，他們一遇着難關，無疑地避開自身危險，向荆棘叢中亂竄。不惜扯破衣服冠帶，結果是敗露了自家的狼狽。他們決不能引導民族大踏步向競爭生存的正軌上走出去的。這是因為他們自身的利害，是與帝國主義生連繫，而與全民利益成對抗形勢的一個原故。如果一遇着利害

衝突過劇的時候，這政府就恐要變成了出賣民族生命的交易所。當國家危殆的期間，形成了這樣一個政府，那便是民族的末日到了。拿我們的黨來說，已往是喊的黨外無黨的口號，這分明是要代表全民利益，纔能使人人地位平等。如果是像歐洲自由主義國家一樣，一個黨來代表一個階級，而又採取一黨專政的辦法，則一般不被代表的人們，其利益無法保障，這便是激起人民怨怒和消極，這便是造成內亂和招致外侮的總原因。世界上決莫有第二個如此畸形的政府，——即法西斯蒂政府，亦不如此，其他相似的老早就亡掉了，——歐美各國代表一個階級的黨，牠的國內並不是一黨專政，牠黨有代替執政的機會，可以互相調和的。並且他們人民的生活，是因他們國家的先進，民族勢力膨脹的順利，國內資本之充裕而牢實，生產量之龐大，雖在無產階級，亦能達到基準生活水平的上面。決不像中國人民這樣的受重重壓迫，無產階級有不能自存的趨勢，這種現象在無產者本身，已經伏下一些爆發性。再加以代表牠一階級的政府來橫施壓迫，使得他們無路可走，那就必然的要發生動亂。——土匪遍地便是事實——蘇俄是被世界號作代表無產階

級的國家，牠本身似亦以代表無產階級自命。細繹起來，這話是何等的錯誤。人類生下地來便是一個赤裸裸的無產階級，這無產階級，是民衆的最下層，亦即是國家內包的最外層。只怕人們不肯去當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決不能把任何一個人們扞隔在大門以外。換句話說，那些資產階級的人們，只要放棄所有資產，把自身的勢力提供社會，他是可以與無產階級過同等生活，受同等待遇的。這被號爲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牠分明是代表全民利益，在非田時代，這鯁寡孤獨便是當時的無產階級，因爲是牠沒有受田耕種的資格。詩經上說：「毋矣富人，哀此惻獨。」所以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是文王定下的大政方針，就是代表無產階級，亦即是保障全民利益。然則現世代表無產階級的政府，即是古代王道的權輿，向前也就是仁義的正路。這與東鄰日本掠奪他人，標榜王道來掩盡世界人的耳目兩相比較，便有上下牀之別了。如果一個資產階級的人們。在一個範圍以內，不肯與無產階級過同等生活，認爲這種資財，是由個人才力之所獲得，應由個人來作豐富的享受，這是他們的一種偏見。他們不受國家法律的統制，便是否定保護

自身的國家之存在，並且與孟子所說：「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之義，孔子所說：「力其惡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之義，均相違悖。所以資本主義本身，原是一種罪惡。牠是反抗不了代表無產階級政府底一切設施的。但在一個代表資產階級的政府，牠的藩籬好像銅牆鐵壁一般，無產階級不惟得不到一些利益。反要感受牠們壓迫的痛苦。這是因爲無產階級在社會上失了憑藉，不容易得到獲取利益的機會，所以分不到政府一點光來。

人類的競爭，原具有一種哲理，凡是得了優勝的，都是先人一着，落伍者無一不是失敗。對於一樁事業，或是一個地勢，在這萬人競賽的當中，能不能搶上最前線獲取優勝的地位，那就好看個人的魄力。才智和勇力。如果已經把獲取優勝的機會錯過，那就要另掉方向來改造局面，使自家成爲一個捷足先登者，中國在國際上的形勢，在資本主義的國羣中，是不可諱飾的一個落伍國家，已經錯過了獲取優勝的機會，這如何能步武資本主義的路子，來與帝國主義競爭呢。況這資本主義，與國內深入人心的孔孟學理根本

衝突。——孔孟反對個人富有——中國在現刻嚴重情勢之下，要提倡資本主義，如果不是賦牲顛預，便是借政策來掩護個人利益。但是民族一經走上這條錯路，結果總是輾轉就斃，一點也不能幸免的。因為這資本主義，早經被學者們分成兩個階段，叫做前期與後期，以中國這個落伍國家，要來走資本主義的路子，不消說是要先走進前期這一個階段。這前期資本主義就是從買辦階級入手，也就是借着洋貨來透弄國內農民的金錢轉手送與帝國主義，自家來分一點點利潤，輾轉輸送，使民族脂枯血盡以致死亡。漢代西南夷貧市漢人綰幣以亡其國，種族亦歸無形消滅，便是我們一個先事例證。因為這新興的商業資本，藐小的金融資本與很幼稚的工業資本，一遇到帝國主義保護下底大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不但是不能抵抗，而且要被牠吸收。這種道理眼前的學者們，論究得狠多了，是一點不錯的。所以這個資本主義的路子，在中國無論如何，是走不通的。這些因提倡資本主義所製備下的一切工具，都變成製酒缸中的濾酒器，自滲精華，待人吸取，不久期間，全國民衆盡都成爲糟粕。如果不是一個喪心病狂，將以求其所大欲，不惜犧牲

民族的人們，誰肯來走上這條錯路幹這漢奸勾當。及到國內資本事業之累次失敗，便惹起一般醉心資本的人們，開始向民衆作無恥的掠奪。舉凡一切卑汙醜態可以實行拿錢的手段，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加緊地催促民族滅亡。這是一個落伍國家，來走不能再走資本主義，必然的現象。因為資本主義的正路前走不通，這般人的慾望無從滿足，惟有倚仗權力向人民榨取，這條窄路可走。遂不惜擾亂社會秩序，斲喪國家元氣，而惟詐欺是尙，遂成爲今日不可救治之疾。這一般在社會上的地位，社會與他們加上的綽號，就是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無一個不是買辦階級的好顧主，與買辦階級締結了不解的姻緣。他們是直接間接的成爲漢奸，有些還要把掠奪來的金錢，存放在外國人所設的銀行裏面，以爲不受國內禍變的影響。這種辦法，直是剝國人心頭之血肉，以作外國人席上之珍饈，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昔閩獻銘銀汁灌貪吝者之口，證以今日的事實，恐不僅是閩獻賦性之兇橫，而是他們行爲的一種招致吧。

一個農業國家中的買辦階級，佔全人口的最少數，牠們的利害與其他人民的利害是

立於相反地位。一個國家萬不可依據他們的觀點來支配政治，如果真是一個買辦階級來支配政治，他們自然是要照顧他們的利益，採取媚外政策，這是他們腦筋中應有的認識。因為有了這種認識，便是根本不能革命，一個國家因內在的條件與環境的需要，為整個民族謀出路，不得已始採取革命手段。這當然是要具有一副犧牲精神，始能擔負這樣艱鉅的工作，牠負的是摧毀剛暴剝蝕強大的使命，達強凌弱的事，是他不屑做的。試想這樣枉金革死而不厭的氣概，豈是日圖居積，計較錙銖的人們所能辦得到的嗎。所以以買辦階級來擔負革命工作的使命，便是一幕滑稽劇。他的設施必然錯誤，一遇到嚴重關頭，他必然是要躲閃，甚至於有時要拋開扶助革命的友人，來諂媚壓迫自己的敵人以求和的。他進行革命的大政方針，他的祕訣，就是避開危險。因為他知道，這反抗強權避緩狠危險，壓迫弱小是很安全而有利的。所以他們的革命過程，始而是與民衆表同情，想賣弄氣力來拾回自身的壓榨。及招來帝國主義的譴責，便想遺開伙伴，卸去目標來避免自身的危險，不惜走入孤獨革命的錯誤。那知伙伴走開以後，帝國主義的威嚇，仍是

不免，轉覺這壓榨的重量是披牠不動了。明知受了帝國主義的欺騙，但是保持了自身利益，也就默默無言地丟開民衆，越過鴻溝的對岸去了。這是因為她本身與帝國主義有內在的連繫，當時專恃感情一時的衝動來講革命，那是靠不住的，是投機的，是冒牌的。更進一步來說，既然是代表買辦階級的政府，牠便是以爲商之法爲官，個個侵吞公款，敗壞法紀，舍正理而任情勢，犯罪者不必置之於法，持正者不必擢於位，以祿位爲擁護者的交換條件，使一般青年心存僥倖，徑覓終南，去效龐渾厚之風愈遠，此豈是一個復興民族的企圖嗎。左傳上說：『民之多幸，指奸民；國之不幸也』又說：『善人，指能革命者；在上，則國無幸民，是無善人之謂也』，所以買辦階級根本不能建設廉潔政府，因廉潔之士，不曾站在買辦階級範圍以內。買辦階級本身又皆以貪得爲懷，不知道什麼叫做廉潔。對於國家觀念，總希望的是坐享現成，或是犧牲他人成全自己，如像現刻的偽國傀儡溥儀御下的一般臣僚一樣，他們是絕無犧牲精神來捍衛民族生命的。

代表買辦階級的政府，牠是水確場裏分別米和糠粃的一架機構，（俗名風簸箕）牠的

權力的效用，就是製成貧富懸殊的兩個階級，換句話說，就是把全部感情可以融洽的人民劃分成兩個壁壘，把全部能為國家効力的人民，各使他們身體羸弱歸於無用。富者因不勞而怠惰其身，貧者因過勞而枯萎其身，！詳見前章！雙方均有轉趨毒化的傾向。即使身體羸弱一層，政府可用別種方法來補救，應作別一問題探討，然貧富兩階級間的利害衝突，意志不齊，不能共赴國難，這是不能避免的事實。我們且拿左傳上載襄公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的話來看，伯輿之大夫瑕禽訟王叔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閭資乎。」這貧人對富人的怨氣是何等的深呢。我們又來看上下利害對立，意志不齊的國家，其抵禦外侮的能力如何。從前戰國終期，秦人屠戮諸侯兵卒百有餘萬，其容易有過於割雞撲兔，這六國的將卒，何以愚懦至此呢，因當時六國君臣只顧自身之存亡，勿卹人民之生死，用兵亦只在數量上計較，不在質量上計較。所以六國的人民，宵衣旰食以供愚懦君臣的奔走，是已經能勞達極點了。在上者既驅使人民如牛馬，不待其喘息之定，縱不遇着虎狼，亦將自斃，何怪

秦人攻之如殺雞撲兔呢。○人民的生活既如牛馬，精神鬱悶，體魄羸弱，朝不保夕，更誰肯愛其國，衛其君。即使有愛國衛君之心，奈兩國兵卒之間，強弱之勢既殊，戰則往遺之禽而已。民心既散，積弱難挽，君臣皆知國無可守，所以秦人之捉其君，直是釜底捉魚，百不失一。這不是一樁偶然的事，這是出封建社會轉入前期資本主義社會，代表資本階級的政府，在強隣壓境軍費浩繁經濟恐慌之下，一個必然的結果。這樣說來現刻我國之不能抵禦日本，是政治路線上必然的現象。如果政治路線不變，便永遠也不能抵禦。○我國無產階級受歐美物質的刺激，不能過從前貧苦的生活，這是事實。全國無產階級約占全數百分之五十，欲使這般人生活得到些須安定，勢必節制社會上少數富人的浪費，以資挹注，須知這無產階級的怨氣，和精神的鬱悶，體魄的羸弱，除用金錢調劑之外，是無法消除的，除了節制富人的資本，這窮國家是沒有這項金錢來應付的。政府若不採取這種辦法，還要向一般貧民加緊壓榨，那社會就要急速的崩潰。誰都曉得，富人的子弟是不必讀書的，貧人的子弟是不能讀書的，從智識方面來說，他們通通都是愚陋。

形成一種貪且愚的凶德，試問這貪且愚的國民，而又是極羸弱的身體，當此國難嚴重期間，如何能自救呢。

民族的智識技能，與民族一般慾望成平行線進行，這種自然的秩序，是合於民族生存的正軌。在歐洲先進國家，由前期資本主義踏進後期資本主義，在這過程當中，都是保持智識與慾望的平行。我們中國是一個資本落伍的國家，民族是一個智識落後的民族，驟然感到物資的侵襲，又未能應用科學的方法，結果是智識技能不進步，而慾望的前進不可遏止。離開了平行線進行的自然秩序，無意間走上了滅亡的道路，充分表現出牠的危險性來，這便是中國民族歷史過程上，慾望膨脹顯出智識鉤頭的結果。不過在海禁未開以前，是受政治勢力的壓迫鉤頭的。在海禁既開以後，是因慾望的突飛猛進，教育失敗，智識未免落後，比較看來，似乎仍是鉤頭的。前者由於歷史上在每一朝開闢的時代，人君用愚民政策的結果。在海禁未開以前，少有外來之物質以相侵襲，慾望猶未軼出常軌，雖在政治上未有進步，然猶可獲數千百年的太平無事。後者當目前的競爭時代

、如果不鞭策智識進步，則因慾望之膨脹，精力之外耗，而使身體羸弱。既無健全之精神即難有健全之學識，與健全之人格，一千人們都是如此，所以民族便不易得到良好的領袖。

在一個政治上不上軌道，而是又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政府要來提倡資本主義，這一般人民便依着各人的地位環境，向那趨利避害得苟免的道路上走去。因為有了這種自利的心理，他們便把維持國家的責任從肩頭上卸下來了。大約說來，他們所走的道路有三方面，在政治方面大小得着一個地位的有些人們，他們可以憑着權勢向公私財產肆行掠奪，充分表現公開的盜賊行爲，以他們這種貪狼的性質來說，是與擄人勒贖打家劫舍的人們，同在一根戰線，上下其手，互相輝映的，這便是政治上的一種盜賊化。一般無產階級與準無產階級，他們的生活原帶有一種不安定性，再加這種不上軌道的政治擾亂與壓迫，他們便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這無路可走的陷阱當中，雖是一隻老虎，只要牠不想立時就死，也須得向人們搖尾乞憐。如果是一隻狗，或是一隻狐，牠見到

手操飼養器，富有威權的人們，牠自然是要窺伺意旨，委曲奉承，心想乞得飼養器中的食料到口來延緩牠們的生命。這便是乞丐和倡伎的來源，都可說是倡伎化。在中產階級的人們，他們的地位，上受軍閥貪官汙吏的壓迫，下受土豪劣紳的威逼，因為他們要保持這點財產的私有，不自由地，忍氣吞酸暗地叫苦，把從前本階級支持中國社會的正義與人道，通通拋去，因為要貪得一時的苟免，也只得跟着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的尾巴擺動。一人如此，漸次人人都是如此，他們便成一個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言論政治勢力的擁護者，拋開支撐社會的責任，來向正義人道摧殘。換句話說，就是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說個是，去做的事，他們不敢說個非字。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說的不是，禁止發表和工作的事，他們也不敢說個是字。這種現象，便是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這一盤製造亡國滅種的機構，以威權統治輿論和人民動作的大成功，這便是中產階級的鄉愿化。一個民族以自利為核心，一遇着大軍閥開始運轉這亡國滅種的機構時，——拿錢——便首先產生貪官汙吏土豪劣紳來加強機構的馬力以後，——幫着拿錢——在社會下層的盜

賊——搶錢——借伎——要錢——鄉愿——措錢——便絡繹不絕的產生出來。這當中如果不遇着金屬和寶石，恐全部民衆通通要從這盜賊借伎鄉愿這三個孔洩流迸出去。因爲在社會上三種人，他們都是以自利爲核心，一遇到政治上的壓迫，便各依其地位和個性，在不能反抗的條件之下，變成不同的三種形勢，成爲民族精神上的三種病態。華族當中，除去此三種病態的人們，下餘的金屬和寶石，在全部民族當中，究竟能得到若十成分，這是值得我們考慮，而又惟恐其失望的一件重大情事，據個人大量觀察，染着以上三種病態的人，恐要佔百分之九十九強，其不染着者佔百分之一弱——不足四百七十萬——以這樣微弱的正氣看來，這民族的生命只延着一綫。又當此中產階級支持社會正義與人道的人們，變成鄉愿來跟着軍閥尾巴擺動，成爲軍閥的一個擁護階級。成了這樣一個形勢，軍閥便越發胆大，公然盜憎主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製造輿論，來擁護自家利益，更用各種方法來麻醉青年，民族前途，更是不堪設想。民族的健全分子既是如此的寥寥，政治和社會都似無此輩置喙的餘地，一國那得有健全輿論來。民族本身既無健全輿論，政府却

要來統制輿論，這種塞嚮球戶的辦法，這個民族也就昆蟲似的用土壤窖藏起來了。

一個成長了自由主義的骨子，歷史最悠久，私有觀念最深刻的民族，在牠本身生產工具不進步，政府又不依增殖生產方式指導。在這種條件之下，依着他們貪得的心理，便顯出掠奪式的盜賊，——包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在內——和屈辱式的倡伎——包乞丐在內——其他中產階級爲暫時保持他的資產計，亦只好唯唯否否惟有力者的命令是聽，及到所有資財漸次被其吸取淨盡以後，依然是向着盜賊倡伎兩途分化。一個掠奪人民的軍閥政府，到了一國經濟破產的時候，爲牠本身生存計，牠便顯出他醜惡的本色來加緊壓榨，不惜奪取人民的生命來供一己的繁榮，他的自利，便是他醜惡的病根。孟子說：「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這還不是推本之論，加緊壓榨平民，便是民族中的賊民，這賊民產生的根本，還在他的自利呢。既然對內用得出這種毒辣手段，他對於可以制他死命的，帝國主義，必然竭盡柔媚，承奉惟謹，苟悅取容，以免觸怒。對內則爲盜賊，對外則爲倡伎，這叫做一體的二面。上行下效，便鑄成民族的殘忍性和柔媚性，這兩種性格

，表現的對象，不消說殘忍是對弱者表現，柔媚是對強者表現。華族當中究竟誰是弱者，此處把倡伎鄉愿除外（因他們能採取不正當的方法以苟遂生存）前面說過，這比較全部百分之一弱的，不屈弱於軍閥勢力的健全分子，他們是一個超階級性的，但是他們的人數過少，勢至孤微，處境非常之困難，從社會人羣中分析起來，他們無疑地是一個弱者。中國這個下層社會，充滿了哥老會和青紅幫的勢力，他們差不多是爲軍閥作爪牙的土劣，良善往往不免受其蹂躪。所以這些超階級性的人們，因他們的守正不阿，常在軍閥殘暴政策，及哥老青紅幫惡勢力夾攻中過活着。持身謹嚴的，便形成稿木死灰，秉性剛直的，竟有時喪失生命，馴至社會的正氣銷沈，民族的生機撲滅。詩經上說：「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左傳上說：「國無其人，誰與俱立」，說到這個地方，這民族的前途，不禁令人興無窮之感了。

對於金錢的掠奪行爲，就資本主義來說，這不是一種正當手段，誰都知道，這是因爲他們的慾望膨脹過度所產生的一種機會主義。這種機會，是發生於政治和經濟混亂的

場合。有一種見利忘義的人，一遇合這種機會到來，便實行其行同盜賊的非法掠取。這因爲他根本不知道爲政以德，政在愛人，一般的基本條件。只知道政治原來對人民是有強制性，如果是有人倚仗政治勢力略取人民，人民是無法抵抗的。所以在學術和歷史上承認從事政治生活的人們，先要蓄有愛人之心，「仁」與其有廉潔之行。「義」倘若這政權落在一個僞智識階級和一個一知半解的人們之手，「不仁而在高位」這民族前途，便要顯出十二分黯淡景象來。一些不廉潔的人們高據上位，根本說來，卽是人民能力薄弱，對於政不府能施以控馭之所致。春秋時代必說禮樂而敦詩書者方可爲將，故命將出兵，往往以政治領袖來兼軍事領袖，如晉如魯無不如是。秦漢以後，文武分途，武人擁兵有時倚勢干政，劉裕朱溫「略具智識，往往不能澈底，國家機構不免成尾大不掉的弊病。二千餘年歷史當中，只有兩個時代，比較的尙不爲害，卽一，當一朝開國時代，以命世之英主來駕馭羣雄，無不俯首就範。（如建武貞觀時代）一，在朝政清明時代，以文臣爲之主帥，調度有方，亦能令其帖服。（如武侯相蜀時代）以外都是跋扈梟張「如

唐之藩鎮明末四鎮等——小則貽害地方，大則破壞法紀。這是由於他們自身未曾受古哲遺訓，不明任職大體，本不應該過問政治——國家法令視爲具文——而過問政治。一遇可以掠奪的機會，便不顧一切法紀，恣意掠奪。在他們勢力籠罩之下，便有許多願供奔走甘作爪牙的人們，依怙勢力來向人民搏噬。此外還有憑着金錢勢力，用高利貸向貧民掠奪的人們，他們還是靠政治勢力爲他們的保障。除了倚仗政治勢力來掠奪人民之外，還有憑藉詐術來攫取的商人。中國市場上的商人，所有的貨物，祇要是可以魚目來混珠的，無一樣莫有假，並且要在食料上滲假，雖防害他人衛生有所不惜。這種利己重心，慘無人道的辦法，是結胎在政治上的資本主義的肚腹中。所以當今中國社會的病證，是不能以各人資本的分量來計較的。徒看資本主義的外形，以爲由膨脹過度的資本主義，始能轉入共產主義，以馬思克學說來估量推測，這是錯誤的。這是因爲他們不知中國私有制度有悠久之歷史，——長期資本制度的演變——影響於人心至爲深刻，與歐美大量資本的影響於人心，雖形式不同，而有同等結核，發生同樣的病痛。這同樣的病痛，便該應用同樣

方法去療治。若只看着共產的作用是在財產與人口外形的分配，這是淺見極了的。如果有人這樣說，他或許也是借來保持他的資本地位的一種曲說。中國的人心，受了資本麻醉之深，世界上各民族實罕有其比。由這一根柢所發出來的戕賊民族生命的事例，不知究有若干，這樣民族自殺的險症，不該趕急救治嗎。從這樣聚積攏來的資財，因取之不以其道，自然是無智識技能來運用去發展生產。這種財力必然的爲自身及家人婦子淫樂揮霍之用，轉入帝國主義的寶庫，實際已成爲近代的饕餮。因爲有這一大宗可揮霍的財力，這精神思想，便向人欲方面四處橫溢。因之好行凶德可比渾敦，毀信廢忠可比窮奇，傲狠明德可比檮杌，這四凶的惡德，都備具在一人的身上，真可說是中國近代的特產。而其數量之多未易屈指，設使有虞氏復生於今日，必然爲當罪之誅，結果恐將不止流血數里。這個有天下而不與的大聖，不幾要被二十世紀莫辨是非的中國人，加上一個屠伯的名號嗎。

總之一國政府，譬如一個火車頭，這火車頭如果在軌外行動，那這一系列車的乘

客，「民族」必然負傷奇重，折臂斷足的往往而是。在這出軌期間，如果遇着盜匪的襲擊，這護車兵士，亦祇能救護未經受傷的乘客，挽之走向安全地帶。其折臂斷足不能行走的，祇好棄而不顧，因為環境條件。對於此輩具有必然的犧牲性。如果救護的兵士，不加分析，恐未經受傷之人，亦將救護不出了。倘使這些護車兵士能力有限，不能抵禦盜匪抑或根本不願抵禦盜匪，便是這一系列車的乘客，都會死於盜賊之手。因車頭出了軌，根本無法脫險的原故。

第二十七章 帝國主義不斷的進攻和離間挑撥

世界上的帝國主義，宰割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已經是無有賸餘了。只賸下這遠東四百七十兆人口，四百餘萬方哩的一個中華民國。因牠的地大物博，所以各帝國主義，都想爭得一鱗。又因為各帝國主義要防止彼此相互間的衝突，就於利益均霑之後，定下一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這就是不要中國關門，將自家的寶藏收拾起來，而是

要任帝國主義隨便踏進大門來左攜右取，填塞牠們慾望的。以這樣一個富有寶藏而撤去藩籬的國家，又有這種條約來做牠們的工具，束縛住中國人民的手足，這樣一個由牠們任便擄取的場所，有百利而無一害，誰也不肯放棄。所以各帝國主義，因為牠們自身利益不斷的在中國地面上經營各種企業，和以商品向人民騙取，這便是牠們用吸取的方法，向我民族生命上的一種進攻。我國政府因為條約關係，不能將民族藩籬樹立起來，一般人民又復智識低下，不能團結一致。對於列強政治的壓迫，既患無力抵禦，對於經濟的壓迫，亦復不能避免。因此農村破產，工業不振，商業蕭條，一般民衆生活愈感困難，心理越發慘毒，有時不惜為絕少之財產，而奪取他人的生命。乞丐餓殍狼藉街市，一般熟視無睹。男子因為得不到相當工資故不娶。女子因為恐嫁人後生育子女，得不到男子相當的供給故不嫁。任何一個地方，只要我們啓眼一看，便覺有許多婚配失時的青年男女。我知道牠們並不是規避為國家增殖人口的義務，是因為恐增殖人口以後，得不到相當的工資來供給兒女們呢。所以牠們只好把兩性的正常關係，向太平洋的深谷裏拋去。

，來從事不正當的男女社交，或忍耐着職蜂似的生活，終日奔忙的過活着。這人口增殖的根本，便受了重大的打擊。再加上戰爭殘殺饑凍不能自存，這死亡率更是大可驚人。在這出生率減少，死亡率加大的情狀之下，這時間的進展，便與人口的增殖成反比例。這當然是一個向民族滅亡的道路上推進的事實。在這個期間，民族自救唯一的手段是革命。當這個環球列國互生連繫的時代，政府的存在，都賴有國際間的維持，一個民族革命，當然是要覺得國際背景遙為聲援，始有成功的希望。但能够出力援助中國革命家，無疑地不是一個帝國主義。這是因為中國革命的最終目的，即是推翻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勢力，這是任何一個帝國主義所不甘心的。所以在中國這個革命過程當中，各帝國主義不惜用種種方法和手段來阻止革命的進展，破壞革命的工作，在革命首腦部與國際背景之間，做了許多挑撥和離開的功夫。從前民國十七年的國共分家，就是他們所演的拿手好戲，牠們是想這中華民族永遠馴伏在牠們鐵蹄之下，供牠們的宰割和擷取，作牠們帝國主義永遠支柱一個企圖的。

第二十八章 在錯誤政策經濟極度不平均之下內亂繼續不斷

一個民族革命，首先就要認清本民族的歷史，與民族歷史所鑄成的民族性。然後再來看當前環境下陷的程度，始就民族性的正應或反應，來覓當前環境下惟一的出路。中華民族在秦漢以後二千餘年來，因政儉俗薄，鑄成一個狹小自私的，放任疏散的，柔懦無能的民族性。因豪強兼併的結果，社會上便失掉了經濟的平衡，這是應該從矯正經濟制度、革新民族性下手，來反應環境的一種革命。是萬不能仿效歐美本自由主義來成立政黨，相互執政，相互監視，以爲伸縮的。因歐美社會雖風行一貫的自利主義，但以脫離野蠻時代不久，故於自私習性之中，猶保有崇實的美德。中國雖有儒者濟公祛私的學理，然自春秋戰國以後，祇能支持下層社會的一小部，師儒的闡揚，終不敢君相的抹殺，在這一點上，早已有救濟的必要。不料在維新的開始，當局竟本其亞丹斯密的主見，從而鑿鼓其間，拋棄孔孟儒學濟公祛私的根柢，以求滿足提脚者自家的慾望。殊不知歐

美的自由主義呈了病狀，早經是碰了壁，現在我們把別人所害的病，抱到自身來害，走到革命的反對方向去，使社會經濟越發不平均，這真是一個大惑不解的情事。中國人的私心，是由二千餘年的歷史遺傳下來的，如果以一個政黨來代表一個階級，以一個階級來執掌一個政權，在朝黨要執行政策的時候，在野黨便橫加阻撓，因此互相贈鬥，結果總是釀成政治越軌的行動。——民國初年便是這樣——現在政府是採取一黨專政一人獨裁，政黨的害固可免除。但未能代表全民利益，躬行實踐來領導民衆。走向革命的途徑，却把歐洲的自由資本主義，拿來做牠的骨子，粉飾一些新式文彩，於是政府要人一方面可以滿足他們的慾望，一方面自身對付人民，在管理方面，又可得到相當的保障，其自爲計則甚得，但在領導民族革命的責任上面，便犯了二重錯誤。一國政府既不採納政黨政治，任人民依政見自由結合，就應該代表全民利益。現政府既不代表全民利益，——拋開農民與無產階級——又要採一黨專政——蘇俄是直接代表無產階級，間接代表全民，他原是消滅階級的一種政策，比較看來，何只霄壤。——那便形成一種壟斷政權的畸形政府。使

大部分不被代表而意志無從表見的人民，含冤莫白，釀成莫大的危機，四下漫延，繼續內亂，——盜匪充斥——一個資產階級的一黨專政，直接不能代表多數，間接不能代表全民，便是犯了一個政策的二重錯誤。這種錯亂的政治方針，貽害民國的責任，是要黨內少數人去負的。（下略）

因一部分人民權利不被代表，所釀成的內亂，這是政府可以政治手腕消弭的。祇要執政者的心中，不存一個政權卽是我的錯誤觀念，以公開式的政府，來容納對方意見。其或移開他們所攻擊的目標，一面刷新政治，組織下層民衆，改善社會經濟，力求民族的生存，人心一安，則國基鞏固。對方如果不曾抓住民衆，則勢且崩潰，如果對方亦能抓住民衆，則便隱隱形成兩個政治區域，更不妨分途趕進，相觀而善，等元氣回復，事機成熟，以後再謀統一。一個民族統一的方法，不必全賴戰爭，當十九世紀中葉意大利的統一，如加富爾馬志尼加里波的諸人，皆可爲吾人效法。他們的心目中是只有拉丁民族生存的一個印象，絕莫有個人的利害滲雜其間。負一國政治責任，或革命使命的人，

而涉及個人利害，處理必然不當。左氏記：『鄭駟過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非之』，當局以爲才有可取，則罪必有可原，而奚必致之於死。報載江西共產黨所施行之土地法，經中央軍收回以後，仍然保存原狀，——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某西人評論——可見其所施行之土地法具有重要性，固非徒事擾亂社會秩序者比。彼既爲民衆努力，正不必以兵戎相見，追之爲寇，拚個你死我活，以斷喪國家的元氣，這便是利國利民，並存不悖的一個道理。

革命的使命得到相當地盤以後，其緊要工作，不在急於消滅對方，而在澈底澄清內政。培養元氣。父師教訓子弟，能供給子弟的智識，不能供給子弟的物質，這人類需要的物質，是要國家纔能供給的。如果國家不予供給，或不能供給，此輩有了知識，便是動亂的因子。國家需要人民生產，又要代人民平均分配這人類需要的物質使不缺乏。國家要人民從事生產，就要節制人民的勞力，禁止其作無益的消耗，一面更使之有宜洩勞力的場所。中國歷史社會上遺留詩文字畫，以及記述佳人才子，談神說鬼等書籍之多，

在世界上可說是絕無僅有。即此可見已往的政治不能領導人民，使聰明才智之士，無正當宣洩勢力的機會，所以纔假借這些工作來消磨歲月，甚或逃禪辟穀。民族歷史上這一筆無益的消耗，便是造成今日社會苦悶的大原因。東坡有詩曰：「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言不如睡」，這兩句詩便是當時政治和社會現象的寫照。雖在今日號稱革命的政府，猶不脫中古式政治中樞排斥異己者的範疇，決不容許有英俊之士廁身其間，以資養鍊，日後民族何能有特出的領袖來匡亂扶危。此中國自嬴秦以後人才不出的一个根由。由此看來，要有堯然後有舜禹益稷皋夔諸人，這不是人才獨多生於這個時代，實堯能領導才智之士。其政治足以陶成他們的原故。（下略）

第二十九章 共黨對國癩分析不清手段錯誤

前面說過，中國全民中百分之九十九為盜賊倡伎鄉愿，現在來重行分配估計，這九十九分中之四十分為秀民，一盜賊同倡伎一部分一其餘五十九分為蠢民。一鄉愿同倡伎

一部分，就這些莠民來說，刑罰固不足以蔽其辜，然又安能舉一萬六千萬之莠民而盡殺之，即使能殺，以這樣多的莠民，又怎能束手以待斃呢。如果以其黨中的忠實分子來與此輩互相消殺，在共黨未免太不合算。況這莠民與蠢民的分別，一般蠢民無論如何是看不出來的。如果屠殺莠民過多，反足以增加蠢民的疑懼，而促成蠢民與莠民的團結，多自樹敵，亦不合算。從整個的中國說來，這軍閥貪官汙吏另成一個階級。其餘土豪劣紳是潛伏在社會裏面，統於莠民之內的。服從割據軍閥的士兵。他們大半是無業遊民和擾亂社會秩序的一種壞勢力，他們是社會上莠民的化身，因為他們的素行是不肯從事於生產工作的。如果從重新建設國家的理論方面來說，這些怠於生產工作的莠民，便應該一概除去，而不與以優待。但事實上不能如此，現聞共黨政策改變一律與以優容，聽其服從工作，或放還鄉里，固是為消除他們的敵對意識起見，別有深意，然這百分之四十分，總計為一萬六千萬的莠民，獨無能力作敵對仇視的行爲嗎。是可以一概屠殺的嗎。如果毫不變通，硬幹下去，不特是延長革命時期，並且加重革命犧牲，最終之成敗究屬誰

手尙未可知，怎能負荷這革命的使命呢。當前列寧應用馬克思的學理來製造革命，考其過程，有許多曲折通融的地方，怎能像這樣的呆板啊。況士兵尙且可宥，莠民獨不可效法中國古哲殲厥渠魁，勝從罔治的辦法，開一面之網，許其自新嗎。其中之最不可忽者，莠民萬不可與蠢民混在一個區域以內夥同訓練，因治莠民以嚴，治蠢民以寬，待遇上根本不同。訓莠民使之勤勞，從事生產工作，以化其凶頑，啓其慈惠。訓蠢民使之有現代智識技能，適應環境競爭生存。二者使之居處各別，則清濁自分，自不虞其夥同反動，牽制革命勢力了。以第三國際來分析中國社會，自然有許多隔膜之處，其所採革命手段，就不免有些不合國情，他們以爲這蠢民中的貧苦民衆，必能爲革命中忠實可靠的分子。不知這般佃農和手工業等勞苦民衆，根本上受了二千餘年財產私有的毒害，他們是不明白自身的地位，和所以受貧苦的原因，總是醉心於將來的轉變地位，大過其不勞而食的生活，以爲當前勞苦的慰藉。——這不是冤枉一般貧苦民衆，要看他們男女求神拜佛的程度，就可以知道他們心中是這樣想的了。——所以他們一到了生死利害關頭，便要拋

棄他們的立場隱忍求全，——俗語說的是下河思命——依舊去過他們的牛馬生活。因為他們羨慕龐大遺產制度的榮幸和舒適，就一心想充一個資產階級的後補者。——在中國不久以前的社會裏面，是富有可能性的，——所以他們最容易被富有魔力的金錢收買。如果把他們投入赤區以內，非經長期訓練，是不可把他們認做忠實分子的。此外更是一些流氓無產階級，他們的本身是富有惰性的，他們的忠實與不忠實，全要看他們對於主義信仰的程度，亦不能以他們的地位來做憑證的。總之這一干的無產羣衆，以他們所受到歷史和環境的影響來說，驟然與說共產主義，恐怕都不免有些不適。這是我國特殊現象，是不能拿歐洲的工人無產階級來比較的，但這共產主義確是醫治國人自私自利的一劑對症藥。既是東西的國情各有不同，便不別拘執蘇俄的革命過程和手段。倘使這些無產階級，因誤會而不被抓住，或更起分離，那共產黨的革命勢力，就恐有失敗的危險。我們要曉得一樁革命事業，根本上的理論是一回事，應用的方法又是一回事。譬如蘇俄革命以後的外交途徑，拿形勢上來看，豈不是十二分的在向右轉嗎？但這不能認爲是蘇俄革命

的回頭。這是因爲世界與牠造成的環境，在牠應付上所必需的事實。但牠仍然是抱着正確理論，向革命的道路上推進，牠從前所採取的新經濟政策，是牠拿來應付世界經濟環境的，與牠外交路線同在一個方向進行。這種革命右傾的方式，譬如人行球面，由一點出發，作一直線進行，終結必能達目的地。如果革命因環境的需要而右傾，而仍是節節前進，以覓求最後出路，遂所懸目的，那便是與革命理論不相背馳。所以說中國革命，還是應該照顧中國的環境事實。如果是爲事實上的需要，把革命策略拿來右轉一些，不用多殺戮，但祇殲厥渠魁，戮當其罪。不誣不枉，則殺一足以警百，聲威所樹，綱紀自伸。這種右轉的政策，決不是革命回頭的一個事實呢。

第三十章 最近以前政府不能担起重大責任爲人民求出路

中國政府的責任，比世界上任何一國都更重大，牠的事務，比世界上任何一國都更繁難。但是爭奪政權的人們，確比世界上任何一國都更多，這便看出中國政治舞台上的

人才，他們是怎樣的不自知不解事了。以中國環境這樣的惡劣，人民這樣的愚蠢，又莫有許多可用的人才來供驅使，這事務的繁雜不難想見。當領袖的唯一出路，在以赤誠來吸引全國同志，分頭培植人材，改革則從經濟根本做起，毀家紓難，身爲國倡，不企富貴，不念功名，不惜生命，見民族之利則爲之，見民族之害則去之。既以赤誠吸引善類，復以同志組織政黨，共以廉潔忠信勤敏相砥礪，持之既久，國人見其肺肝，果能如此，所收潛移默化之功當在不少。但這是怎樣困難的一回事：因爲國病既深，療治不易，與其坐以待斃，毋寧犧牲領袖個人利益，開誠布公，伸張正氣，添精補髓。這種辦法，實在對於領袖個人不利。他們如果灼見及此，當然不能形成爭奪的事實，與獨攬的情勢。○既是出於爭奪獨攬，便無疑的他們還在做那些富貴功名的迷夢。這領袖既無高深的學理，遠大的智識，負重的勇氣，再加以不能虛衷延納學識深遠的正士端人以爲之輔助合作，仍本其中古式的英雄思想來回護其個人利益，不但是全國人民得不到出路，并有陷民族於萬劫不復的危險。因爲人類慾望易增，理智難進，但有物質之慾望，而無其理智

之分析，便已伏下滅亡之根。這雙方消長之樞機，又關於當局政權的運用。政權如爲果爲抑制個人的享受，爭民族的生存而運用，則結果人民理智超過慾望，人才衆多，國內寧謐。理智與慾望相等，亦不至發生內亂。如果政權運用在個人繁榮享受上面。一名位與勢利，則政以賄成，上行下效，一般人民慾望超過理智，綱紀廢墜。不肖者則挾勢橫行肆無忌憚，才能之人，馴至無事可辦。種下了大亂的因子。最近以前的政治就發生了這個現象。政府如不用斬釘截鐵的手段，努力將這滅亡的根性剷除，即根本不能說救亡，即是政府負不起這種救亡的責任，——這不是厚責政府，因前已說明人民無獨立自救的能力，必賴政府以導護之，——結果總是同歸於盡。領袖們這種執迷，是因爲他們不明白資本主義與世界人類的關係。資本本質的金錢，原是世界人類歷史的汗血積下來的。資本主義國家聚積資本的速率，比起世界人類開闢資本的速率，不知要大若干倍，而且牠的吸引力，是逐年增加。眼看着資本家大吞小的結果，數目次第減少，這便看出世界人類開闢資本的力量，實在有限，不能供給牠們大量的聚積。牠那種金錢拖帶吸收落後

資本的魔力非常偉大，要避免牠和制止牠，都是不能從後面去跟追的。！防被牠拖帶吸收——只好攔腰截擊，纔是避免拖帶吸收的善法。我們中國是怎樣一個資本落伍的國家，現在我們要想發財，試問從那裏得到許多資本來。以我們這樣幼稚的工業，能夠把已入帝國主義寶庫的金銀賺騙的出來嗎。不過把國內的苦同胞拿來重行榨取一徧罷了。試問從這些苦同胞的身上，究竟能榨取得幾何資本，成就了幾許的資本家。即使如像日本和美國成就了數百個的資本家，佔本國全人口百萬分之一，以這種微乎其微的比率，對於國家這樣危殆的前途有何補救。況這新興的資本家，怎抵敵得住帝國主義，藉不平等條約爲保障護庇下的大資本家呢。結果是榨取苦力同胞的汗血，來奉送之於帝國主義，這是世界上一樁最愚蠢不過的事情。如果爲着個人發財，硬一口咬定要走歐洲資本主義先進國所走的老路子。不顧及中國人民二千年所受孔學富不可求的洗禮。這用意所在，路人皆知，啓人疑忌，在民族方面必然要到紛崩離析的結果。須知在二十世紀舞台上的國家，因爲國際間的糾紛愈大，則政府所處的地位愈難，合全國人爲一氣以資應付，猶

懼不濟。爲今之計，應該革除利與權合的政府，而建設道與權合的政府。爲之領袖者，處此名利不可兼收的時代，便當舍利求名，以博國人的愛戴，其爲計亦良得。眼前中華民族的出路，只有兩條。如欲存國家的形勢，要人民受政治的保護，將民族生命延長下去，就該學斯拉夫人實行共產主義，過其勤儉勞苦的生活。如少數人欲雄據厚貲，安坐而食，醉心資本主義，就該拋去國家的羈絆，任憑日本人來宰割，去學猶太人四海爲家，過其飄蕩忍辱的生活，二者必居其一。這是由於我們民族覺醒過遲的原故，不比在滿清時代，還有使我們選擇回環的餘地。若猶閉着眼睛，縱破舟於狂風巨浪之中，驅四萬萬人之生命以供其建設資本主義國家之試驗，斤斤不捨，以求僥倖兩全，恐春夢方酣，而金甌已報曉了。

第三十一章 在內爭狀態中人口必然的減少

一個民族的繁榮，是以經濟充裕爲背景的，如果一旦經濟崩潰，這民族便無法自

存。一個民族的內爭，大半是以經濟的分配不均爲其動因，後來內爭的息滅，亦在在其經濟關係。但拿人口來說，如果因戰爭而影響到經濟崩潰，則以二重惡因的關係，人口必然的要加倍減少，並且這減少是在加速度的進行，這便是民族既經走上滅亡的道路上，第一個階段。原來人民的需要，是要靠政治力量來領導，始有實現的可能。如果政府不顧人民的需要，硬要叫人民回頭坐着等待，那就是要人民等死，恐怕除了中華民族外，莫有那一個民族國家有這樣的一個政府。因爲一方既有挾着錯誤觀念來行使政權的政府。一方又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抱一腔怨氣的擬無產大眾，這內亂一股匪潛伏的爆發，或緩或急，便成不可避免的一種趨勢。在政府方面錯誤的解說，是且等我照我計劃把一切準備夠了，自然就會替你們謀出路。這話還是不錯，但不知他們心裏是怎樣的一個計劃，欲望何時纔充塞的滿，在擬無產大眾方面，他們說的是，我們飢凍的不得了，你們的生活好像是天堂，我們連一些粗布糠覈都得不到穿喫嗎。積下了不平之氣，他們直接表現的，便是聚衆爲匪，那種暴厲恣睢的情態，相激相蕩，心忍手辣，有非人

情所能揣，常理所能喻的。且看報端揭載土匪之多，殺戮之慘，就可想見，只好說他們不曾具有人類互愛的心理罷了。他們既因感情的溢激，失掉人性，退去人皮，政府方面則以誅匪爲名，盡力屠殺，外借帝國主義金錢武器的力量來撐腰，內則壓榨人民，使之大批赤化匪化。這就好像一個造豆精——名豆乳皮工業的人們，把豆漿貯在鍋裏，燻以微火，以扇扇冷漿面，使牠凝成薄膜，然後揭去，如是反覆製造，這一鍋豆漿，被他揭去若干層的薄膜，終至漿盡，纔能罷手，這便是現刻中國政府，一面製造土匪和共產黨，一面屠殺土匪和共產黨，減少華族人口的絕好譬喻。這種政治手腕，繼續延長，結果得到暴骨如山，尸橫遍野，這便是西方雅利安族，向遠東，和東方的太和族，向大陸，廣大移民的好機會，這個中華民國與內包的中華民族，恐將留下一個空名，一如巴比倫亞述一樣，留與後世考古家和歷史家作研究，我這一段偶然感觸到的感想，讀者們或者以爲過當，但若使政府永遠依偏見執迷於資本主義，以慘刻手段對付土匪和共產黨，則騰出這赤縣神州的地盤，不是一椿不可能的事。況且是只要你地盤上人口稀鬆，別個便

能移來隨便插腳，你且看現在的華北和東三省，這不是眼前擺着的一種成例嗎。後來喧賓奪主，同化於人，這民族的痕迹便就消滅於無形了。

本論四三一 在內爭狀態中人口必然的減少……………二五二

第六篇 結論

第一章 三種滅亡性之實現性

前篇所述的三種滅亡性，是在三種不同的路綫上演進，譬如水之就下，直是順其自然，不必再用人力來從旁推動，牠結果總是要朝宗於海的。現在從這三種民族滅亡性的因子推測起來，雖然伏下年代的久暫各自不同，但都是已經渡過了慢性傳染的階段，而是轉向劇性腐爛的過程上進行，這種進展性，不消說是已成爲自然的趨勢。如果不用特別有效的人工裁制方法，牠是決不會自然消滅於無形的，是要依牠自然的法則，逐層演進的。綜合這三種滅亡性的癥結，無不含有自利享受的因子以爲三種間的聯繫，前者伏下中後二者的病根，後者爲前中二者的導火線。在最近數十年前，是由政治路綫的錯誤，引誘人心恣縱，形成社會的假繁榮，伏下消費過於生產的危機。這第一個階段，是

政府要人的播種惡因時代。人民既是消費過於生產，這生產不足的差數，是要靠舶來品補充的。開始的時候，舶來品在人民消費的數字上，是居於從屬地位。後來以質地精粗，外觀美惡的關係，舶來品逐漸由從屬地位轉移到主要地位，這舶來品消費的數字，因此過度膨脹。國內一般的生產力量，以內受政治的壓迫，外受經濟的侵略，不惟無法使之增加，反有急遽萎縮的趨勢。在這消費膨脹，生產萎縮的情勢下面，這中間的大窟窿，是要把民族若干年代以前舊有的儲積移來貼補的。而且這個貼補，是要逐年把部分擴大，數字加多，延展到貼補的最後階段，形成經濟的崩潰。這第二個階段，是人民步武政府要人的後塵時代。國民的經濟既到了崩潰時期，這社會上便顯露出一種不安的狀態，隨處都見到掠奪豪霸，巧取欺騙的事實。結果是智的強的得以暫時生存，愚的弱的便大批成爲溝壑中的餓殍。這溯於俄死的大批羣衆中，有許多青年是不能婚配的，縱使彼此願意婚配，生了子女，依然無法使牠育成，因此人口就得到加速度的減少，這第三個階段，是人民生活緊張瀕於死亡，最感苦悶時代。到這人民窮困達於極點的時候，國家

就有瀕於破滅的危險，這個期間土地任其荒蕪，生產概行凋敝，文化因此逐漸衰落，民族精神因此一蹶不振。四鄰強悍的民族，得到廣大移殖的機會，駸駸乎有喧賓奪主的情勢。一般土著人民，對於棲息的地盤，就漸漸失掉了主人的資格。這第四個階段，是土著勢力縮小範圍，讓異族勢力膨脹時代。一個衰退的民族，與新來的強大民族同處一個地域以後，這種情勢能否繼續，看法便有了兩樣。——前編已經說過——一是新來民族對舊民族能否相容的問題。一是舊民族對新民族能否屈處的問題。如不能屈處，無疑的這土著民族，就要避開此地向別一個地域流動。在這個地域上面，就漫漫的除掉這土著民族的痕迹。即或有少數能夠屈處，但以文化衰落，生產落後的原故，不能保持民族的特性，終結總是被人同化，消滅原有的痕迹。這第五個階段，是土著分途消滅痕迹的時代。以上五個階段，是就已經種下的因子，觀察自然的趨勢，絲毫不加特別人力，推測所得的結果。但社會是活的，原是說不定的，如果在這五個階段的過程當中，滲入別種因素，那必發生相異的結果，這亦事理中所應有的事情，對於上面的推測是決無妨害的。

第二章 一九三五—六年國內形勢演變之推測

今天欲預測一九三五—六年國內形勢的演變，首先就要拿把握政治主權的人們，取得政權的經過，及當前運用政治主權的機構，和政治基本的動向。連同反政府組織的經過機構動向分成兩件，全盤來加以分析。比較其推進的速率，機構的靈活，動向的正確，來斷今後牠們勢力的消長，事實的推移。今日國內的政治勢力，形成兩個壁壘，不可掩飾的，一個是握有政權的國民黨，一個是新興勢力的共產黨。先就國民黨本身來說，這個黨的組織，向來是不健全，因為中國人民久困專制淫威之下，思想是因束縛，不曾得到正確路線的。孫中山先生因吸收西洋文化，感覺國勢岌危，開始叛集所謂興中會，為今日國民黨的始基。但中山先生對於本民族文化浸漬不深，民族歷史爛習不熟，因此革命不免帶着自由主義的色彩。黨中先後所吸引的青年分子，除極少數學識較有根柢，能認識革命的使命者外，——如廖仲愷等人——餘都不免以入黨革命為後日陞官發財的終南

捷徑。所以他們盼望革命成功，就是陸官發財的到手。當時標榜革命的青年，祇要肯去調查他的歷史，差不多都是一時為環境所迫，起了血氣的衝動。說到這民族積弱的病根之所在，及療治的方法，與國家當前的出路，可說在中山先生左右的人們，多數是不理會。以為我們得到陸官發財，便是中國革命的成功，把個人一身當做中國的全體，革命事業當做發財的手段。——事實昭然用不着證明的——以懷着這樣的認識，挾着這樣的企圖的大批人們，日圍繞於中山先生的左右，這國民黨的精神上，就開始無形的腐化起來。這國民黨黨員的腐化，是孫中山先生一生最痛心疾首的一樁事。這是因為他所關革命的學理，與黨內所有的綱紀，不能轉移黨員內在的重心。換句話說，即是當時黨員不曾得到相當的訓練，擔負不起中國革命的使命。後來民國十三年一月，復召集國民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發布改組宣言，製定三大政策，聯俄容共，重視工農以增加革命力量，剔除舊日腐化份子，一時吸引國內智識分子不少，這是孫中山先生熱心救國賢明治事的表現，即此便伏下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軍事進展的因子。只可惜中山先生早於十四年

三月在北平死去了。國民黨此後竟不到一個赤心爲國坦白公正富有情感的領袖人物來，稟承總理遺教，按步前行。在這十四年與十六年的當中，舊份子的因墮落而失勢，蓄下滿腔忿恨，自家不好說得要開倒車，便捏造他人的實行篡黨，以爲甯漢分裂的口實。這甯漢分裂，是國民黨右傾份子極力右轉，勒住中間份子與左傾份子，和共產黨脫離關係的一種事實。當時共產黨勢力原極幼稚，不能在分裂期間，立時取得相當的地盤，那些國民黨左傾份子，又能力柔脆，支持不住這種左傾的局勢。在這種情形之下共產黨的政策便不得不暫時停頓，從此國民黨右傾份子，既擺脫了左方的羈絆，便肆無忌憚的背叛總理遺教，改竄三民主義，變更三大政策，率性的開起倒車來。他們絕大的錯誤，是對於帝國主義榨取我們的膏血，所加在我們民衆身上的緊箍咒，如像鐵殼一般的外圍，極力迴避，企圖造成一個自身安全的革命。但這種政策與事實隔離，又爲一般民衆所不許，因此就不得不拋開民衆，單獨企圖國內軍事勢力的發展。心想待政權鞏固以後，再來從事政治上的改造，這無疑的是向牛角尖端上去找出路，這是扮演的一齣革命滑稽劇

。在這政策回頭，革命目的不能實現的過程當中，便惹起另一般國民黨人的不滿，割據地盤，擁兵自衛，來樹起統一前途的障礙。全國農村瀕於破產，不消說約在三萬萬以上的農民民衆，終日在呻吟愁嘆之中過活着，他們對於現政府是當然的表示懷疑。因此這右傾份子鞏固政權的企圖，便無限期的延長下去。很聰明的日本人，他一眼覷定這個罅隙，以待時機之湊合，二十年的九一八事變，就從這個罅隙裏爆裂出來。這右傾份子一種不合邏輯的偏見，漫不經意的釀成世界絕大危機，陷國家於朝不保夕的絕境。譬如川河行舟，每遇一個凶灘的到來，舟人便早先目不旁瞬的，一眼覷定水經，不任其差錯分毫，倘若因事前顧慮未週，水經一錯，任舟人在這緊水灘頭，汗流浹背，用盡平生之力，結果仍然不能避免凶信的到来。目前的右傾份子，顯得他們在十二分的努力，但以前事所走的水經錯誤，效率甚微。譬如一隻蚌是鴨子，怎能趕得上世界前進的一隻鴉鳥呢。能否免此破舟之險，此刻尚難推定，恐其得到安全成數，不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因今日國家絕大的危機，國內任何人也不能否認。美人艾迪博士在成都講演便是

結論

二 一九三五—六年國內形勢演變之推測

二五九

以中國不亡於日本則亡於蘇俄爲標題，這便是右傾分子開倒車以來所收穫的成果。再以政治中樞的組織來說，政府所在地點的南京閱其部署中的各員司，總覺終日無事可辦，因其各部署首腦人物，終日奔馳於京滬京津之間。無有人以爲之指揮，廬山名勝，本爲閒人眺覽遊觀之所，以蔣委員長常來憩息之故，政府要人大概均購地築舍其間，隱然成了一個政治中樞，這是南宋賈似道半閒堂的故事。日本謂中國南京是一座空城，此言雖謔，但亦不可謂言之無因。這便看出中國政治是以個人爲轉移，一人當前攔阻去路，則四萬萬人都不能許跨步前行。所以那些在一人之下，衆人之上的人們，牠們都須得來取旨行事。這樣一個政治組織的形態，怎能擔負得起一個火車頭的任务，拖帶這四萬七千萬百分之九十九的頑劣偷惰的人們前進呢。又拿所謂則共軍事的形勢來說，江西的紅軍區域，據報端所載固然是縮小了好多。但是紅軍的滑圍突出，福建的地盤，幾乎是全部受了糜爛。此刻共黨的中央，仍然駐紮贛南，不曾移動，可見自剿共來所發明的碉堡政策，未能收到鉅大的效力，恐怕也就是軍隊與民衆間未有一種感通的聯繫，不

然的話，便是中央軍的戰鬥能力有限，纔能任紅軍這樣的縱橫出沒。此外皖浙與贛鄂之間，都爲紅軍常常出沒之區，在在都須要多數軍隊來彈壓。據報端所載單以東面軍隊儀所屬的軍隊，卽有四十師之衆，合計西南北三面至少亦在百萬以上，加以津鄂陝甘無匪省分，可以抽調的軍隊當不在少數。至於報端所載，贛南紅軍主力不足十萬，連同竄閩與皖浙贛鄂間的零星小股，其數殆不足二十萬，可謂是舉百倍之地，十倍之衆以相周旋了。在理當不難於短期殲滅，但結果總不能如限，勢必出於自動延期者，必有其相當不可勝之理在。況今日紅軍之爲中國患，不在江西而在四川，有識者無不引爲隱憂。以四川的形勢論，勝過江西何止十倍，以守則固，以攻則取，幅員人口，均且三倍於江西，舉足可以爲國家的重輕。秦漢皆利用其富庶以兼并天下。目前各將領的無辦法，紅軍之必然的坐大，黔中蕭賀聯合的加上一層威脅，川中將領可說是成了一團坐以待斃的情勢，凡是國人，莫不知之，豈有國府要人盲目不知的道理。然而任川中人民如何呼籲，終不敢遽然遣將出兵以救人民於水火爲己任，借此把與中央多年脫離關係的四川，收在掌

握之中。這可見中央的不肯輕視江西，實抽不出相當的人才和兵力，來拯救四川了。

次就共產黨本身來說，就一般觀察之所及，牠的勢力固然是很幼稚。但牠的主義是在抓住下層階級社會的廣大無產羣衆。牠所排除的是一些不中用的偽智識份子。牠政治體系的組織，是比較嚴密而合理。牠全部黨員那種艱苦耐勞，不顧生命的精神，是值得人們佩服的。牠廢除私有財產制度的辦法，是救濟中國人貪污慳吝的起死回生丹。牠鑄成鐵的紀律似申韓，艱苦耐勞似墨翟，推翻現代社會似老莊，運用政治手腕似管商，處事依辨證法的邏輯似孔孟，可謂兼周秦諸子之長而有之。牠的主義和政策，可說是東方文化思想整個的形成。在中國歷史學術上，都有牠相當的根據。祇要當權者能抱定主義，小心執行，不偏不急，不激不隨，必然有水到渠成之一日，那些溺於享受，醉心自由主義，誤吸歐美海洛英，嗎啡白麵，違反孟子爲富不仁遺訓的人們，終結是要被牠一口吞下的。牠雖然現刻祇有江西貴州四川一些零星散漫的根據地，但是眼看着國內農村日復一日的加緊破產，便是牠們無限發展的好機會，將由慢性傳染達到劇性膨脹的龐大收

穫。中央政府如果借不到鉅額的外債來作普遍救濟，這宗危害本身生命的險症，不自家轉變是無法治療的。依個人的推測，這龐大的外債，恐怕任何一國都不能繼續應舉。在這一九三五—六年二十四個月期間，也就是白色減退，紅色加增的一個運轉。（下略）

按本書成於民國二十二年朱毛正突江西之圍，分股西竄，似有與徐向前會合的企圖，疑其以川滇黔爲歸宿。原文本係一種推測，迄今事過境遷，容有未合，姑附按語數行，使知時間上有了出入吧。

第二章 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民族的危機

列強宰割世界的趨勢，在滿清末季早已形成，對於中國甚且有瓜分之說，這是何等嚴重的一種警告。滿清君臣因爲這種形式的逼迫，下令變法，作過不少的掙紮企圖，只以不肯拋棄自身的立場，便無意間踏進一個矛盾的場合，因此變法的企圖終歸失敗。民國成立，居元首地位的，本應該領導民衆，另闢蹊徑，追尋民族的出路，在這帝國主義侵略一天加緊一天的過程當中，加大自身的馬力，一直前進，猶恐突圍不了，怎許如袁

世凱那機別具企圖，中途周折，坐待敵人圍困越發加重呢。袁氏認爲富強國家，必全權在握，然後運用自如，欲攬全權在握，就有改變君主的必要，這種認識，是由他個人安全感發生出來的絕大錯誤。自環球大通以來，民族與民族之間，早已形成一種鬥爭，競爭生存的基本條件，就在要把民族團結一致，這團結民族的方法，就在大政方針，要取得多數人民的同意，換句話說，這政治的對象，就在維繫多數人民身上的利益。袁氏如能把多數人民的利益放在前面，把自己的身分地位放在後面，他無疑的是一個終身總統，如德國當前的興登堡，這不是一椿料不就的事。因爲他不知道國之本在民，不知道政治原是替人民找出路的一種方法。所以便不明白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的意志所在。他總想步武漢祖唐宗，執敲朴鞭撻民衆，使他蛻伏在高壓政策之下，由君主來操縱驅策，取這種便利易行的方式。不知這是捆束民衆而不是組織民衆，是壓抑民衆而不是警醒民衆。這是跟着時代尾巴追逐的一種落伍思想，怎能滿足中國民族現代的要求呢。所以他帝制的傾跌，在有識者先事預料之中，然而帝制雖則不成，這中國滅亡的危機，倒因此越

發加大了。以後的政治路線，便是立法行政的相互猜忌，在北洋軍閥執政時代，可說是對於利國福民的事，不曾辦過一件。直到黨軍北伐，國人亂極思治，始獲觀民族前途的一線生機。在此北伐期間，眼見得一般人民的精神異常興奮，大有乘此方新之氣，向帝國主義殺出重圍的氣概，但爲時不久，這種生機又被當權的武人踐踏下去了。因爲他們恐在帝國主義砲艦政策之下受到犧牲，總想把自身的艱難危險躲過，收到一種計出萬全，一帆風順革命的成績，這也是他們自身的安全感發出來的一個絕大錯誤。他不知道一種革命的路線，當然是以擁護多數人民利益爲前提的，自身便是多數人民利益的代表。○這革命的前途如果受到危險，那自身便要首先受到犧牲，這是事理之所必至，決莫有一個安全革命的路子來走。如果根本就怕犧牲，那就根本談不上革命，歷史上告訴我們，革命的成功是要投下相當的代價的，尤其是中國革命的犧牲，因環境的惡劣，是特別來得大，這是在革命政策未定以前，明眼人是早已覷定的。中國革命在當時估量的成功與不成功，端看領導革命的人們犧牲的程度如何來決定。要曉得中國四萬萬人口之衆

，一致向帝國主義對我的包圍衝擊，這是很有價值的光榮革命，這種鉅大犧牲，在民族歷史上，是有相當價值的。假定民國十七年革命不鉤頭，能夠硬幹下去的話，世界上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讓步的，恐不只是一個英國，那革命亦斷無不能成功之理。縱後退一千步來說，把沿江沿海一些地盤失掉，總不至如今日失掉東北四省之大，七年以來自相屠殺損失人口之多。但是一切不平等條約，便從此打爛撕碎，像土耳其那樣的擺脫枷鎖了。因為當局對革命使命的不忠實履行，滲進了些個人利害，他自身便放出了許多烟霧，把革命的前途昏黑起來。因此目標不定，認識不清，戰慄恐懼，不知不覺的投遞到敵人營壘去了。鉤頭以後，不僅向着敵人——帝國主義者——要好，而且還在敵人——帝國主義者——的面前賣弄氣力，板起猙獰的面目，回頭來向民族新興的革命勢力屠殺，這便是在中國三種滅亡的危機之外，更加上一種民族滅亡的危機。如果以後永遠藉著帝國主義的力量，硬要兩腳擋住民族出路的大門，兩手拋擲炸彈，消滅這種新興勢力，緊逼民族向窮困的阿鼻地獄後退。在這鬥爭的過程當中，新興勢力竟被壓服下去。結果總是餓殍載

途。死亡山積，不消說這是一種很有成績的滅種工作，二次大戰的到來，更不煩列強消耗牠們的彈丸白藥了。如果這新興勢力不曾被擊破的話，至少要奪取民族出路的大門，彼此相互對立，取得政治團體的資格，跳上這二次世界戰爭的舞台，在將來的國際和會席上，始有被承認的可能，這是新興勢力的唯一出路，亦即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但是這是帝國主義卵翼下的政府所絕對不容許的，眼看着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演中國人向中國人的屠殺，再加上世界列強向中國人屠殺的慘劇，這屠殺期間，經過數年甚或十數年以後，試問這四萬七千萬的中國人，究竟能餘贖幾何呢。以這種得不到好多代價的重大犧牲，來比較民國十七年硬幹下去犧牲的數量，兩相估計，究竟誰大誰小。當時莫有多大的內爭，這一部分自相殘殺的人口，總是節省下來的肥。撫今思昔，走那一條錯路，是何等的不合算呢。但以政府代表資產階級的立場說，這也倒是意料中事。他生怕倡前，個人犯到一些危險，所以打算還是跟着時代尾巴走的好些。總之袁世凱等人，不敢走在時代前方，這是他們只看形勢，不能認識真理，并有怕死愛錢的社會心理在暗地

作祟。這是他們負不起領導民族責任的根由，從此可見這資產階級當中，決尋不出領導中華民族的領袖來。但是現在的資產階級，却要來包攬政權，這簡直是孩子們的賭賽負重走險，這民族前途是何等的危險呢。這新興勢力，也就在這種危險情勢之下相持着。但在他們雙方握有實權的人們，他們總是把四萬七千萬同胞的生命供他們快意的孤注一擲。在所求出路比較正確，不失為民族出路的一方面，固情有可原。在因為民族謀出路，竟走入迷途的一方面，獨不可就眼前政治的影響，清夜捫心，求其結核之所在，急速加以糾正嗎。硬要加緊扮演這齣慘劇，淪中國於萬劫不復的境地嗎。除了自相火併以外，莫有對民族較為有利的路子可走嗎。我為魚肉，人為刀俎，兩害相形取其輕者，恐怕這可走的路子正寬闊得很呢。

第四章 國民政府對二次世界大戰之適應性

現在世界上富有冒險性的國家，以日本為首屈一指，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以後，牠便

成了東方的炸藥庫。滿洲便成了炸藥庫的導火線。現時西方的德意志和義大利，恐怕都趕不上牠那樣的勇敢。這大戰如果爆發在遠東，無疑的這主腳是日本與蘇俄。這是因爲蘇俄與滿洲毗連之境土近三千里，日本人的眼光早照定在西比利亞，而是與世界帝國主義者，負憲兵前衛的使命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絕對的衝突，二國各喊使對方的反動勢力，時相侵襲，有此四種原因。兩個的戰爭危機，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不過在此勢均力敵的情勢下面，誰也不敢先事發難來作戰爭的嘗試。但只盤馬彎弓虛聲恫喝，以待事機的到臨罷了。如果俄方到了牠的二次五年計劃成功以後，西方的安全保障益臻鞏固，日本如果再事咆哮，這時戰爭便有發生的可能了。這日俄如果真是戰爭起來，華北當然受其蹂躪，這時就國民黨的立場，和已往事實的昭示來說。不出中立或幫助日本的兩途，如果國民政府是不忘九一八國恥的話，牠便消極的嚴守中立，如像滿清當年對於日俄戰爭一樣。屆時政府坐視華北——包括內蒙在內——人民受戰爭的蹂躪，亦如滿清政府當年坐視東三省人民受戰爭的蹂躪一樣。待戰爭經過以後，低聲下氣的在戰勝國的佔

領形勢之下，要求收拾枯骨遺骸頹垣碎瓦吧。這些事在國民政府方面看起來，不算是一樁可恥的事，牠們儘可以鄭重聲明的說道，我們實在是真有能力來和別人打仗呀。說至事前未能預備的原因，他們儘可以說國內反動分子和他們搗亂，使牠們無能力時間來預備。但總不說牠們政策的錯誤，把國內一個整整的革命勢力，猛力的劈而爲二。這還說是牠們在從民族觀點上着想。如果不然的話，要依牠們的階級利益，或是個人利害來看，好像富翁的一個收子，他不惜勾引盜賊來偷竊他的家財，共同使用。那就一定拋開民族利益不顧，幫同打家劫舍的日本，來打平等相待的蘇俄，以求日後殲滅國內的反動。任便東北四省的永遠脫離，我恐後者實現的成分比較多一些，因爲這是華族畏懼強大卑劣族性的表現。至說趁下次日俄戰爭幫助蘇俄，向日本手中奪還東北四省失地，這恐怕是烏托邦的一種夢想，因爲到那時要幫助蘇俄，事前就應該溝通內部的衝突，以期對外一致，這件事就表面上看來，好像水火不能調溶的一樣，事前既無準備，倉卒又怎能說對外一致呢。此外就只有在最短期內殲滅國內共產黨政治勢力的一個辦法。但中央軍把

江西圍剿了四五年，至今尙未剿得平靜，而川黔兩省又已赤燄滔天了。像這樣此撲彼興的一種剿辦，恐怕再三數年亦得不到若干的效力，這是因為政治路線的錯誤，不能救濟農村破產。這農村破產，便是助長赤燄的絕好機會。舍政治而倚靠軍事，舍民生而偏重形式，恐怕這最短期間，倒是個無限長的縮影，對這世界大戰的迫切期間，又如何能趕得及呢。

第五章 蘇維埃政府對於二次世界大戰之適應性

二次世界大戰如果爆發在遠東，而是以日俄爲主腳的時候，中國蘇維埃政府無疑地幫助蘇俄。牠對於大戰的立場，是有一而限於一。屆時究竟蘇俄能否得到中國蘇維埃政府的直接幫助，這又要看中國蘇維埃政府在大戰以前，革命的成就如何來定。據現刻情勢的推測，牠們的勢力是籠到了贛閩浙皖湘鄂川黔等省，區域不可謂不大。就報章所載看來，牠們的紅軍區域，都是一些山脈奧衍的地方。并且除江西四川有少數地盤比較固

定外，其餘都不免帶有流動性。便是他們的政策不能實現，人民不得安定的一个大原因。這可說是牠們勢力的分散而不能整個聚積來發展事業，飛揚主義的聲光。徒事遍地流血，損失無數的有志青年，這不能不說是他們的政策的失敗。即如他們所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階級鬥爭，在中國社會革命實質上說來，階級固然是有，但在這下層階級的人民，他們的智識和能力都屬有限，他們是看不清楚階級與階級間的鴻溝。下層階級對於上層階級，因為他本人自身的階級立場，不乏轉變的機會，所以不一定加以仇視。況且那些佃農雇農和百工雜技人等，他們的腦筋是充滿了宗教信仰，他們最怕的是爭鬥和犧牲，要是靠他們來自動反抗壓迫階級，簡直是不可能。眼前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形勢，是由少數非下層階級的愛國志士，領導青年學主，抓住貧瘠區域的勞苦羣衆，湊合而成的一種革命勢力。這種陣線，因為是急就章的辦法，原不十分穩固。如果得到堅強的勢力，在後方督促，或不至發生變化。如果敵強我弱，須要十分苦幹忍耐的時候，那些下層階級的民衆，便與主義不相呼應，而有投墮敵人的危險。無疑的這革命勢力，因此招致失

敗。奧家之言曰，「毋以己之短攻人之長，」革命方張之勢，宜急用之以除舊布新，先收服一國之人心。纔借全國力量以鎮壓舊有的潛勢力。一般社會下層民衆，眼見蘇維埃政府擁有全勢，必然斷絕逃跑規避的企圖，以後革命勢力的基礎，必然日臻鞏固。這是因爲各種建設。以不受敵人軍事壓迫的影響，政策能够逐步實現的原故。這算是用我之所長，來掩護我之所短的一種方策。現在蘇維埃政府不圖急於摧陷敵人的營壘，使牠人得從容布置，以完成其困我的方略。自身又無堅強的勢力以爲後援。示敵人以勢不可侮。反因拒抗持久，勞苦百倍，惹起內部民衆的疑懼，這叫做以己之短攻人之長。數年以來，革命勢力，軍事重心，由湘粵而豫鄂，由豫鄂而閩贛，今且由閩贛而川黔，陣地數移，勞民傷財，信用不立，久必見絕於民衆。此種絕大的危機，皆由於對社會的分析錯誤，政策的運用失宜所致。將來對策的如何，想蘇維埃政府要人，必有一番的研究改革。但是已往他們那種犧牲的精神，萬死不顧一生，是值得人們佩服的。如果將來中國蘇維埃政府移贛到川黔，繼續打通西北國際路線，取得陝甘青新的地盤，對於軍實和建設材

結論

五 蘇維埃政府對於二次世界大戰之適應性

二七三

料上得到援助的時候。到世界二次大戰洶來臨，驅我數百萬健兒，沿陰山山脈，以直撲遼甯，必能顯揚中華民族不可侵侮的勢力。如在事前不能將國際路線打通。臨時猶困處在國內奮爭的階段上。他時國民政府的政策，一定是委華北於日本人的手中。嚴守中立，來與族人自相火併。那時蘇俄也就得不到中國蘇維埃政府有力的幫助，只能牽掣國民政府無力加入日本一方面罷了。

第六章 國民政府與東北四省

國民政府要人，對於曾由他們手中失掉的東北四省，就在他們心目中看來，收復已是失望。在九一八事變以前的日本，他們尚且畏之如虎，不敢交手。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知此事是要惹起列強的疾視，朝野上下都認為是非常時期的到來，處處在爲戰爭豫備。現已經過了三年，以中國這樣只知發展軍事，於政治上可說是無組織，無紀律，無效率的一個政府。切然置人民利益於政治責任之外，得不到人民的擁護。以這樣頹廢

不振的一種國家，怎敢向養精蓄銳磨礱擦掌的日本，爲東北四省來挑戰呢。這最近期間，只希圖日本不再攫取牠的華北，也就是萬幸了。這是因爲國民政府的本身，和所抱的政策與收復東北四省的立場，兩來成一個矛盾的原故。這東北四省，自日俄戰爭以來，卽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項下鎖鍊，是一天趕一天地加緊，情勢是一天趕一天地惡劣。國民政府要想替這四省的人民，把日本所加上的這條鎖鍊掙脫，就不應該與這橫暴無禮的敵人同紮一個營壘。應該在反對方向去找我們的夥伴，來連結成與日本對壘，成包圍的形勢。日後等待機會的到來，才有掙脫鎖鍊的可能。現刻國民政府既以認識不足，早經投入敵人的營壘。在這舉目無親的情勢下面，當然是金銀珠寶任人擄取。在這種強力挾持之下，不但屏息不敢出聲。還要破涕爲笑，以求免敵人惱怒下的筆楚。此卽是九一八事變的必然性。國民政府的不抵抗爲其必然的結果。因牠本來是在向敵人製好，對着自家的夥伴作聲作色，敵人僅僅取去這四省的土地，國民政府也不便因此反臉呢。況從實際上說，本身既是離不開羣盜賊，後來相關的地方甚多，何敢孟浪的遽行反抗。

○日本人早就窺破這一點，所以才從容不迫的，俯首拾取這東北四省，只要拿過手已後，把列強對付的安穩，這中國是說不出收回兩個字的。現已經過三年的期間，居然是半靜無事，當此內戰方酣的緊急時期，中國政府還有餘力來過問嗎。但政府黨人的宣傳，說他們現刻正在準備對日，且莫說政府的力量對內對外不能兼顧，即使就能兼顧，試問這政府自身投入敵人營壘的矛盾，如何解除的了呢。（下略）

第七章 中國革命與蘇俄

中國人民處在這種極端窮困，走頭無路的期間，這革命的路綫，是否該接着蘇俄的脚跟前進，這是極端重要，而且是富有興趣的一個問題。要分析這個問題，就要先看清楚白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世界列強是如何的鉤心鬥角，爭先恐後，各自帶些繩索來向中國人民身上重重捆束。這中國分明是上了一隻盜船，滿船都是強盜，一個綁票被圍困在他們的中間，是不敢拿出自己主張來的。如果這綁票要違反他們的意思，恐怕就有撕票

的危險。直到現在，中國的情勢，依然似此陳列着。不過內中有一個強盜，他是已經改邪歸正，自動的跳上河岸去了。！是指蘇俄！中國在這個時間，要想脫離這一羣強盜的包圍，那就不能向這一羣強盜哀告和理說，尤其不能個人來訴諸武力。是應該向跳上河岸的人打招呼，取聯絡，一面自家乘着風勢，猛力向河岸跳遊。羣盜既顧忌到岸上人的呼聲，招徠大眾的圍困，又恐綁票在肘腋間的襲擊，勢必遲回審顧，這便是一個綁票脫險的機會了。從此看來，要希望中國革命的成功，自然是要倚仗蘇俄的幫助。如果口頭在向蘇俄呼籲，眼睛却向帝國主義打睨。像這樣一個滑稽革命，是得不到蘇俄底幫助的。在眼光脫敏的人們看來，中國革命，當然要向着蘇俄革命的目的地進行。要想保存華族人種，向這條路走，是莫有徘徊却顧的餘地的。因為世界上比較有力的好友，只有一個蘇俄。就拿中國本身歷史來說，這為世界所詬病的四萬萬人一盤散沙，牠的病源，即是歷史流傳下來的漫性自由主義的自私自利，在這病源上得不到救治，這一般散沙是無法團結的。蘇俄現刻所奉行的共產主義，對於我們這個病根，在救治上有絕大效用。從

前一切自由主義的舊觀念，無不受到牠的犁庭掃穴。這民族遺傳的劣根性，此後必然要被剷絕許多。但是如果以革命推進的方法來說，因民族體力的強弱，歷史演進的差異各自不同，方法似有選擇的必要。換句話說，即是兩民族時空之交會各自專斷，——現實——似難依樣葫蘆，但緊跟着蘇俄的脚步走使能集事。第一是蘇俄民族生長寒帶，體魄壯健，對於自然的壓迫少所顧慮。中國民族生長溫帶，體質柔弱，若是使他生活艱難，他便望而生畏，此層在不背主義之下當與顧慮。當前列甫引導俄國革命，他對於馬克思的學說，看得非常靈活，只求於最終的目的不錯；其他手段無不因時因地曲予通融。中國蘇維埃政府，據說是做效蘇俄，並且受第三國際的指導，如果不就歷史與現在情形隨機應變，曠日持久，挫折革命錄銘，便是買櫝還珠，襲馬克思列寧之貌而遺其神了。在俄國當時，雖說趁歐洲大戰來從事革命，但外無奧援，獨立撐持，與中國今日革命的深困重圍，固外有聲援者，情形殆相彷彿。然則中國今後革命的成功與否，端看蘇維埃政府領袖諸人對於主義的認識，與手段之運用如何來決定罷了。

第八章 孔子與馬克斯

孔子是爲人類社會謀幸福的，馬克斯亦是爲人類社會謀幸福的，因爲他兩人所生的時間・地域，人種，文化各自不同，遂成兩個不同形勢，不同方法，而有同樣歸結的兩種學理。

孔子生在地球古代的東方，當時傳播文化的工具甚爲缺乏，因此他的學理和施政的方法，也就是由從上至下的一個路子發展。固然他是沒有伊尹和周公的憑藉，他的學理的主張，自身能夠實現的成分是很少，但亦不能說是絕對不能實現。不過孔子的學說，原是上繼周公，他是以平民想肩荷王者的責任，他的這種思想的變態，就有如下的兩個看法。一方面表示這王者的學說，固可普及於平民，不必爲貴族所專有。一方面表示匹夫固可爲天子，至尊無上的爵位，平民不必無分。他之周遊列國，原是望王道的推行，舉世不用，始退而作春秋，明王道，以爲朝廷的爵位，惟有德者可以居之，故譏世及之

制，這是他在挖掘封建社會的牆腳，因他自身認定國家如果保有這世及的制度，平民縱有才德，也是無用。這是他感到當時政治不良的一種反應。因為他生長在農業社會當中，知道這農民散處各方，形勢非常散漫，要利用牠，鼓吹牠，來對不良的政府，作堅決的反抗，那簡直是不可能的。所以孔子在這個經濟階段當中，也就放棄了號召農民去擁護牠自身階級利益的主張，而是更思其次，作轉移政權，機會利用的一種改革。觀其欲應佛肸與公山不狝之召，孔子固未嘗忘情於政權的取得。不過佛肸公山不狝陽貨諸人，牠們的用意根本在攘奪權利，絕無推翻封建勢力，樹起平民革命旗幟的企圖，去孔子修己安人的主張甚遠。所以孔子欲去應召而又中止，這不能不說是孔子遭遇的不幸。

現拿孔子仕魯的經過與其政績的表現來說，當他爲中都宰的時候，史書上稱他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這些政績，是不是他對於人民生活的一種統治，是不是與墨子節用節葬的學理同一主張。魯受封於少昊之墟，人民開化日久，少有荒土以資墾闢，只有從人事方面來加以調

節，使生產略有增加，所以史書上又稱他使人民強弱異任。後由中都宰爲司空，分別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五土之性，使物各得其所生之宜，這是他有計劃的在增加農業生產，以達到國境以內消費與生產之平衡。換句話說，就是他安定民生的一種設計。後來升擢爲大司寇，經過年餘期間，他的治績，便是法雖設而不用，這不是靠着什麼道德上的感化，而是備具了安定民生的物質條件的。有人說這遺不拾遺夜戶不閉的治績，是孔子道德高尚的感化，這是他們生了兩隻俗眼，把孔子的政治基礎工作看不透闢的原故。不然的話，他便是依附剝削階級的見解，來向一般工農羣衆欺騙。

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剛七日而誅魯之聞人少正卯，據孔子說，「人有五惡者五，盜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不得免於君子之誅，少正卯兼而有之，故不可不誅也。」孔子不以盜賊爲大惡，則今世以盜賊爲大惡的法律，殊有未當。這孔子並不是縱民爲盜賊，而是要從政治上去消滅製造盜賊的根原，排除阻止消滅製造盜賊場合的勢力。說到這

個地方，我們再來看這魯國的閥人少正卯。他是站在怎樣的一個立場。他個人的史略和社會的地位，史書上不曾見到。但拿孔子所指出的幾端來說，指出他的心迹，他逆的是什麼，不消說他的主張是與孔子的政治路線相反。孔子主張的是財產公有制，「前編說過」這少正卯不消說是主張的財產私有制了。惟其要維護這財產的私有，所以便不惜行險以徼倖。其次指出他的行僻而騷，這是因為他財產私有的興趣最為濃厚，獨行所見，不顧一切的向前邁進。因為春秋時代，魯國的徵斂日繁，井田的基礎漸次動搖，與少正卯的思想以出發的動機，並給他以自信。惟是財產私有，終結是一個渺小的規模，這種主張，對於民族和國家的前途都是一種不利，少正卯深知此種秘奧，在這思想萌芽時期，不能當衆公開，這當然是包含有楊朱所主張底，個人享受的豐屋，美服，厚味，姣色的願望，這便是逼使他形成一個言偽而辨的條件。如果要拿這理論在文字上來爭勝，那就不得不援引此類的事實和理論以為印證，所以孔子又說他個記醜而博。凡是人們在社會上的一種主張，都是要多數人來擁護，纔有實現的可能。少正卯順從他黨羽的主張，

以相互結合，這是他增強自家力量的一種手段。綜觀指出的五端，牠萌蘗的根源，歸約攏來，即在財產自私這一點。因此我們可對少正卯下一結論，他便是一個財產私有人們的代表者。有人說他是當時孔子的政敵，這種片面膚淺之見，不免小視孔子而高視少正卯了。依着井田制度下面人類經濟平等的原則看來，他原是人類正義的一個姦賊，孔子說他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豈是一句苛刻的論斷嗎。所以毅然誅之，以防止人心的日趨褊狹，這是握着政權擁護全民利益當然的一種手段。

「我戰則克，」這是孔子的一句自負語，孔子何以這樣的自負呢。兩軍交綏，決成敗於俄頃，以常理論，自是難操勝算，孔子之所把握的，不在兩軍對壘之形勢，而在兩軍未對壘以前在政治上發動羣衆的力量。不消說他發動國內羣衆的方法，是先使羣衆衣食住行四者都有相當的滿足，「富之」然後使他明白個人和國家的關係，戰爭與生存的關係，維護正義與抵抗侵略的必要，再加以臨陣時人事和物質的配備與調整。「效之」此孟子所謂「得道者多助。」在一方既完成不可勝之配備，來沉靜以待敵人必可勝之機會。

所以孔子請討陳恆，向着魯之君臣說，『陳恆弑其君，齊之弗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只此數語，已看到孔子是如何的發動羣衆了。孟子又說：『失道者寡助，寡合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這樣看來，孔子之所謂我戰則克，是以發動羣衆爲前提的。而發動羣衆，又以富之教之的政治作用爲條件的。當政的人們當心把握着這些條件，便不難我戰則克了。

至說孔子的學理，已見第二編第五章此處不再提及。

綜合來說，中國孔子的思想，是正大光明的，是和平博愛的。政治是開明公允的，徹上徹下的。學術是盡其在己的，推己及人的。

馬克斯他是德籍的一個猶太人，他生於一八一八年，後於鐵血宰相俾士麥三年生。因爲他是猶太人，而又抱着社會思想的一個有智識，而是左傾的份子，所以他反對當時的德國政府，而是被政府排除於政治勢力之外的。他同情於法國社會黨，因之不見容於

法國政府，遂更移居比利時都城佛爾尼，後又寓居倫敦。他過着這樣飄泊的生活，他同情於倫敦工人，他描寫工人的困苦生活，頗為詳盡。他一方面看到倫敦資本家的豪侈，因思揭發資本家的隱秘，發憤而為資本論。他是就資本存在的外形，來追求資本蓄積的定律。以顯明資本的蓄積，是否在資本家個人特殊豐富能力條件底下產生。在事實上，這資本的蓄積，是否有不能違反的必要，他推究的結果，一個工廠主所獲之剩餘價值，便是榨取工人的剩餘勞動，「汗血」而為本身的利潤。又因往覆再生產的結果，將剩餘價值之一部或全部變為資本次第膨脹而為工業資本家。商業利潤，是商業資本家從工業資本家手中分出一部分的剩餘價值得來的又以購進賣出的手段，往返蓄積，以成龐大的資本。金融資本，以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高度形態出現，牠是建築在工業資本與商業資本兩者的上面，而是間接向勞工羣衆榨取汗血。歸納攏來，都是在向勞工羣衆榨取汗血。他們的資本，並不是成長在他們個人特殊豐富能力條件的下面。這些資本，既經這些人們蓄積之後，無法使牠消化到羣衆有利的一方面。反來煽動政府，「因納龐大稅款

與金錢收買的關係，——爲爭奪市場來從事不必要，並得不到好多代價的戰爭，這簡直是揮發資本的力量來向人們狂噬。

世界人類，凡進於文明時域的民族，無一不以愛好和平爲職志。乃因資本蓄積的結果，恍惚似的，迷惑似的，於無意識中轉變其愛好和平的習性爲貪殘兇狠，即此證明，資本有轉移人類本性，向凶惡方面去的作用。即此知道人類思想，爲四圍物質環境所鑄成，就中以資本力量爲最大。拿我們中國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惡不殺法的情形來看，這資財不但是他們的第二生命，簡直是支持他們生命的一根柱石。看不滿物我兩者間關聯的程度。在一定限度內的需要，與一定限度外的不必要，癡迷似的，將資本與身體兩相熔解，凝結而成了一個莫究詰的資本人，——他不是一個錢神，而是一個錢鬼，——所以輒便失却了愛好和平的本性。馬克斯爲要暴露蓄積資財底人們的凶惡，不惜竭畢生的精力，以致力於形成資本的前因後果的鑽研，綜合而爲資本論。他的主要目的，是要那些資本家恢復人性，想望當資本家的人們，不再去造這種罪惡，他的維護和平與中國古代

的孔子有同一志願。他把握着事實來研究，由末以達本，由委以竟源，是與孔子的單刀直入，直探本原的手段，有相得益彰作用的。而又是帶有十分可靠的實現性的。所以他說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膨脹達到頂點的時候，就像雞雖所孵的卵，這卵殼內的實質，暗地成長，達到具體成就的時候，這雞雖是要破殼而出，顯出牠突變的形象來的。這就是說，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到了龐大的階段，淹沒了社會前進的兩腳，這雞雖必然的是要被人們扭斷擺脫，進到新的一個階段的。

其他如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用一種掠奪式的方法，所構成的資本，可惜馬克斯的資本論中，不曾分析到這一點，想來在生產手段革命的歐洲，不曾見到有這樣一回事吧。○這個遠東中國準資本主義社會的病痛，不會被他發見，不然的話，歐洲如果也有這樣赤裸裸依着政權表演向農工羣衆掠奪的一種形勢，那些人們，便是在馬克斯心裏，一與孔子一樣，一認爲是不屑教誨的。

總攏來說，歐洲馬克斯的思想，是抵抗強暴的，維護弱小的，實際亦是一個和平博

愛的，開明公允的。不過他以科學的方法來表現，是深刻的，是緻密的，是把握着實際的，他是與孔子同站在一個平民的戰線。他們的學理在今日有凝結在一塊兒的必要——至少也該使他們在和平陣線的本末兩端，發揮他們的戰鬥能力，互相呼應。——如果真是由目前的學者們努力的結果，使他們的學理凝成一個保障和平的武器，這一套武器，便是釋迦牟尼佛的護法菩薩，——韋馱——運用自如當者披靡的降魔杵了。

第九章 目前作者的一點希望

吾人當此國難期間，超然立於兩種勢力之外，不忍坐視此赤縣神州的淪喪，黃帝子孫的絕滅。古語說得好，當局者昧，旁觀者清，吾人不幸只落得一個旁觀，多少有點見地，雖不配當得這個清字，然想盡國人一份子的責任，亦不敢不貢此一得之愚，冀減輕些滅亡的因子，撮其大要，條舉如後。

所希望於國民政府的，國民政府最近以前已經拋棄三民主義的立場，充滿資本主義的色彩。看牠的用人行政，都是在顧全資產階級的利益，向法西斯蒂的程途邁進，對於

中山先生的四權行使。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與『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完全擲之腦後。這是牠拋棄三民主義的事實，因為濫下了這點私意，開始變更立場，就此失掉了黨內許多志士的同情，一方面又招致了許多投機份子，和買辦階級的充塞。甚至連本黨也分出一個寧粵，二十四年還莫有調和得下去。至若一般民衆，簡直認這個政府完全與他無干。甚而心存嫉忌，以爲這個政府只知道剝削民衆，爲人民解除痛苦的話是絕了望。我曾記得在二十二年日報上見到，汪院長談話說：『現在國難期間，民氣銷沈，實在可慮，』不知這民氣的銷沈，正是因爲政府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的反應。他們嘗試過的，這奔走呼號，都是白費的氣力，他們因此覺悟到這中華民國，是被少數國民黨人所壟斷。國民政府，卽是代表少數利益的政府，因此便把國難也冷落起來，孟子說：『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這便是國民政府離開了民衆的一個事實。根本既是錯誤，——指對民族國家言，——以後任你如何努力，終是無濟於事。譬如造屋，既已築成草舍茅庵，任你如何的彫刻塗飾，總不會變成高樓大廈。真是覺到從前的錯誤

，「蔣宋由蘭州過甯夏轉北平時，宋美齡對記者語，說從前錯誤在不曾接近民衆，「便應該根本改革，自動左傾，至少要回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的立場，來代表全民利益，收拾已散之人心。把往日致錯的原由，昭告國人，屏絕一切統制輿論，金錢收買，這種彭成括的辦法。向國人披肝露胆，以示大公，鞠躬盡瘁，以示不二。對於新興勢力，縱然不能立即使之就範，也該採取包容默化態度，廢除打擊政策。如此泯除內部鬥爭，以保存國家的元氣，在必要期間，且不惜犧牲個人地位，以圖內部的團結，應付將來的事變。果能具此熱忱，則中國民族尙有可爲。這是由國民政府的立場，來尋求民族生存的一個出路。

所希望於共產黨的，國共分裂以後，歷時已屆七年，共產黨的宣傳工作，和戰鬥痕迹幾遍國中，到目下的形勢，仍是敵強我弱，一些民衆，到了手中，又復脫離出去，未到手的，往往裹足不前，在這種情形之下，自身對於應用的方法，就有研究的必要。如前章所說的誅戮，和本章要商量的抄沒，都應該加以節制，明示軌範，來祛除民衆的疑

惑。主要在當權者的抱定主義，始終不渝，以求政策的次第實現。大本既立，便不妨變更策略，取和緩態度對待人民，在小節上略事優容，招徠羣衆，使他們從速內向，以減少戰爭的損失。從主義的奉行上說來，不過略假他些轉移時日罷了，大體上可說是毫無損傷。至防止他們後日遊離叛變一層，此又在招徠以後的監察處置和訓練，只要有嚴密的組織，便不虞牠變出意外了。況在前面已說明，凡在可疑之列的，都用隔離監置的辦法，移之西北，實行屯殖，以平均人口的密度，豈不是一舉兩得的良計嗎？況不根據一種法令來殺戮和抄沒，執行的人們，既不免任意出入，身受者在事前更覺危殆不安，此與漢高入關約法三章之意相反，這不是收拾人心的一種辦法。最好是分別門類，訂成多種簡單法令，先事宣傳，使一般人們明瞭真象，心目不眩，然後畏罪者潛逃，良善者依附，清濁既分，則煙幕自散，無形間消除了許多障礙，減省了許多兵力，加磁本身的力量不少。須知一種革命事業的基礎，是建築在多數民衆身上，革命路線上的工作，要估量他們的能力來引導進行，不過在一個嚴重期間，要他們進行的速率特別加大罷了。要

牠速率加大，這引導人就該在革命勢力的組織和方法上加以調整，不應該把選擇民衆的方式隱蔽起來，構成一種一方任意處理，一方有幸與不幸的場合。蘇維埃政府如果這樣的改變方針，民衆必然的會被牠抓住，早日促成統一。這是出蘇維埃政府的立場，來尋求民族生存的又一條出路。

當此國難嚴重期間，倘兩個政府各謀進步，勢均力敵。雙方俱無征服對方的可能。與其永久交鋒對壘，捐生命於鬪牆，何如各就民族立場着想，屏除一切有我無人，惟我獨尊，縱敵即是自殺的偏頗不正，受劇毒污染下的病態心理。雙方同時廢除戰爭手段，保持原狀，劃疆分治，努力使人民工業化，生產化，近代化，社會化，同向一個民族生存時空交會的一點前進。因彼此研求真理的結果，這路線必愈走愈近，甚至兩線相重，政治上既不發生歧異，本是同一民族，這和平統一，不一定就是一椿不可能的事。這原來是以雙方同抱民族生存的基本觀念爲條件，所下的論斷。有同樣的心理，必有同樣的事實發現，加以同是一個民族，這利害相同之點正多，對外的形勢，不難取得同一步調

○二十四年當兩軍混戰之際，果能廢然思返，以強大來包容弱小，化爭鬥於無形，則國家人民所蒙的福利確是不小。但在國民政府方面，首先就要拋開資本主義的立場，這七八年的戰爭，原只是爲這一點，現刻要叫他丟盔棄甲，恐難得此慷慨而且是絕頂聰明智慧的人。

如果以上三種形勢都不能得到的時候，便是各逞私慮，努力忿爭，循着民族滅亡的途程邁進，不至實現民族滅亡不止。那作者的一點希望，也就掉到太平洋的深谷裏去了。使後人反謂作者不幸而言中，此豈是作者的本意嗎。

結論

九 目前作者的一點希望

一九四

第七篇 附論

第一章 極端論與中性論

二十世紀以來，進化的人類思想，分作左右二翼。右翼是循着自由主義的路子前進，以資本主義中之帝國主義爲極先鋒。左翼是循着社會主義的路子前進，以共產主義爲極先鋒。在這兩種主義對壘的今日，因他們倆間極端的矛盾，這個世界無疑的要呈一種既不安的現象。因爲他倆是各依其階級利益走向極端，中間高低不平的差率太大，如果的空間上既許牠們有接觸的場合，在時間上又與牠們以發生作用的可能，這種因高低不平所起的劇烈變化，必演成空前未有之大衝突。這是因資本主義演變成帝國主義的強硬化，已達到有我無人的最高階段。世界上一般不能自存的民衆，開始伐掘帝國主義的基礎，想毀滅個人資本，將牠擠入萬丈的深坑裏去，這原是由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必然的趨勢。因牠右翼的走向極端，依物理液體表面保持平衡的原則，來推測社會的流動

性。這些被牠榨取不能自存的民衆，自然要被逼向左翼去走到極端，企圖保持社會表面的平衡。這是人們精神作用，具有物理性的表現，不是聰明的資本家，和具有鐵腕的帝國主義所能殘暴壓服得了的。除非牠肯將毒瓦斯把地球上一切勞苦羣衆屠殺盡淨，方能除掉牠的左翼對立。如果世界上少不了勞苦羣衆的話，這個對立便永遠存在，而且天平似的，估計右翼的質量，增減牠左翼的籌碼。這種含流動性的人類社會，常然是逃不脫這液體表面而平衡地物質定理的。在此二十世紀的地球表面，便是這左右二種勢力的相互牽掣着，衝撞着，造成恐怖。因為世界人種的複雜，和性質的差異，國界的錯綜，歷史的糾紛，欲防止此種衝突，鎮壓這種恐怖，誠屬不易。但在人種同，性質同，歷史同的一國以內，此種衝突和恐怖，是可以依整個民族利害的觀點，來設法消弭的。要曉得這種衝突和恐怖的主動，全在右翼，因為牠掠奪他人有限而且是維持生命的金錢，以置之於一己之縱慾，廣置壓榨工具，或無用之地，這是何等的殘忍豪霸呢。從人類共同生存的正義上講，是要牠退到生活水平的界線上來，所以消弭的方法，全在右翼的自動放

棄一切特利。這是欲求息影，本身先常停止運動，便是這事實的好比喻。那與右翼相伴而生的左翼陣線，牠是處在被動地位，牠是由生活水平下面，企圖升上生活水平，這是像韓信用兵一樣，結下了一個背水陣。這左右兩翼，可說都是以經濟為中心，總發生明爭暗鬥的關係。世界國際間不可避免的這種鬥爭，都是由人類當初踏上自由主義路線，未能加以社會調整的錯誤。人類原是政治動物，在一個政治領域內，是以合羣禦敵，共同競爭生存為原則。惟其備具此項原則，所以纔能戰勝其他一切動物。要保持人類永遠的勝利，就要保持合羣事實上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人羣內最聰明公正的人來執掌政治，一般人民在生活水平線上，無條件的服從政治，因為這政治是捍衛一羣人類生命的武器。在這種情勢和原則之下，那許個人，在當中保留着選擇和游移的餘地呢。目前的帝國主義國家，牠們在前一世紀憑着這自由主義，也能得到長腳的進步。這種勝利的原由，不在自由主義者的本身，其在當時世界上的多數弱小民族，供給牠們以自由活動的餘地。這種偶然適合的發展，不能拿牠來推勘這世界以後的情勢。當此世界弱小民族抬頭，和

金融集中偏枯的今日，牠們如仍藏匿在迷樓中心，一朝遇着政治組織堅強的民族，開始戰鬥，牠們總是得到土崩瓦解的結果。這是由於牠們內部左右兩翼利害相反，政治組織鬆懈的原故。這些危險的避免，讓世界上帝國主義者們自行去研究，這裏要說的，是在一國以內，具此兩極端性的壁壘，并且日日互相廝殺，這種整個民族的危機，真有不絕如縷的情勢。在這入了迷樓的資產階級和特殊階級的生活優裕着，現刻要叫牠退到生活水平，放棄一切特利，這不是與虎謀皮嗎。牠們覺得牠們自身是一隻虎，非肉食則不能生，這是牠們的錯覺。從旁人看來，牠們原只是一匹馬，受了孔孟學理教化的馴養多年，牠們原無傷害物類的習性。不過牠們眼見虎；歐美資本家「有爪牙的威猛，不禁心裏暗羨，竟將虎皮拿來蒙在自家身上，驕入虎羣，威嚇羣獸。但是因為牠的爪牙，「弱小」的中國！終是不類，體力迥不相伴，長久相睚，便有被虎驚破，不免有被搏噬的危險。只要牠們醒悟過來，便覺得學步邯鄲，終非其類。況這蒙上的虎皮，「買辦階級」並未與自身的肉連成一塊，把這虎皮退下，依然馬革猶存，竄入這長鬚修尾千百成羣的同類

中，便覺興趣橫溢，不難一日奔馳而至千里，回視力猛蹙短之虎，不且瞠乎其後了嗎？善因者不失其所親，如莫親於同類，敵莫敵於相煎，今日我國上下實爲相煎之敵人，曷若帝國主義國家，——日本——躡其後而履之，終必爲所吞噬。二十三年上海的烽火，不是帝國主義加於中國資本家的打擊嗎，本身無強大的海陸空軍以爲之捍衛，勢孱弱而貪多金，適足以供強鄰的掠奪罷了。中國的資本家，尤其是政府中的資本家，能依物質的因果關係，明瞭此理，必當舍右傾的企圖，轉而向左，上政得平而下情不激，於是左右二翼，各回復其本位，而中道——孔孟的政治基礎——因之以立。換句話說，卽是將國內一切有利可圖之事改歸國營，利與民共，務使人民力無枉費，時不虛度，地無曠土，國無廢事，生產消耗，分配勻稱，節其有餘，以益國防，全民利益，因此得以保障，向來敵對區閥的情感，從此可以溝通，這便是息滅內爭的唯一條件，挽救國難的最大前提。在這個地方，有一層意思是該補說的，就是全國民衆，同據一根生活水平線，這根線的標準有兩個。無產者能免饑寒的是一個標準。資本家大地主軍閥們膏粱履厚裘錦食肉的是一个

個標準。兩個標準，本來都可以用，不過取第二這個標準，就要看國家和人民的財富是否足用，因為一個國家的堤封以內，是天然的一個經濟區域。所以一個國家，便是一個經濟單位。如果這着認識不清，妄拿英美兩國個人享受以為比例，便是大錯特錯的掀起內爭，而甘為戎首，使帝舜復生，恐將被饕餮之誅。以中國這種國家和人民的財富現狀看來，當然是不能取後者的。所以前面所提的生活水平，即是前一項無產者能免飢寒的一個生活水平。這不是對有產階級大地主軍閥們的刻待，這是在一個窮困的國家裏，照量入為出的方式，一個必然的結果。這些資本家大地主軍閥們，在這種方式下生存的路線，是以勞動代藥餌，發汗代輕裘，疏食代肥甘，安步代汽車，作者相信牠們的壽數，不但是不會減少一歲，還要增大若干。這可以說是去其角者與之齒，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結果還是相同。但從國勢方面看來，化個人享用為民衆享用，民族國家便有貧富強弱病不同了。以上這段議論，可說是將前三項人們從迷樓中引導出來。如果不是一個喪心的狂的人們，自必有翻然悔悟的改進，切不要忘記那些無產階級，是擺下的一個背水

陣勢呢。

在這個地方，又有應該提出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右翼放棄其所築的攻勢後，左翼便失掉了用爲鬥爭的題目。在化學上投鹼性物於酸性液體之中，則起酸化作用。在這酸化已過，或是不起酸化作用的狀態當中，這社會有無前進的推動，抑或是陷於靜止狀態。這個問題，是不難於解答的。本章所論列的主要，是限於一國的範疇，這國際間的衝突，向後必然劇烈。如果一國的社會限於靜止狀態，牠便不能應付環境，終必爲列強所吞併，這國際間的利害對立，便是世界前進的推力動。前面說過這世界上人種的複雜，和性質的差異，國界的錯綜，歷史的糾紛，這些痕迹，都不是一時消滅得了的。有了這些痕迹，這國際間的衝突，便一時難以避免，且向後越發加緊。在警敏的人們看來，國際間既埋伏下這種危機，便一刻不容少停的做充實內力的功夫，以爲將來金甌國防的準備。這種推動向前的力量，是何等的龐大。如果國際間這種均勢的競爭，能夠繼續保持。這種前進的程途，亦必延展至無限度。但必受戰爭的扼制，回折而又前進，終至均衡。

破裂，強者囊括宇內，這種國際利害對立，推動前進的力量始告休止。時代至此，已入另一階段，當然有另的因素出現以爲推斷的依據。但以現階段的目前來說，這以經濟爲標準，所指出政治上的一種中和手段。牠推動社會前進的能力，就是如前面所說的，要人羣內最聰明公正的人來執掌政治，牠推動社會前進的能力自然偉大。如果任非其人，則推動力減少，甚至等於零。但是不要忘記如果執政一非其人，這國際的均勢就會馬上破裂。這個民族國家的名稱，和歷史文化的痕迹，就會隨着戰爭的彈藥消散。這種千鈞一髮的時代，是不容有尸位素餐，與譚竿充數的人們盜竊政柄的。如果國人對於元首不加注意，——所以要實現真正民主，——一任亂僧高躋，這是必然要招致強敵的搶奪。中國古代堯舜禹的轉相授受，便是看破這一着豫爲防止的辦法。中國古代的領袖，既具有如此眼光，所以在允執厥中政策之下，社會文化依然是前進不已。後來進步的停頓，因爲是政治上失了領袖的原故。楊朱墨翟就在這個期間應運而生。所以當時楊朱爲我，——即今歐洲之自由主義一派——墨翟兼愛，——即今歐洲之共產主義一派——他們掃去希望聖哲在

位的空虛思想，站在平民立場來自求出路，學理非不精到。然究皆不能突飛猛進，壓倒社會，這便是由於當時的社會經濟基礎，尙能保持平衡的殘餘，楊朱墨翟二人，尙未獲得運用思想其間暢利推行學說的必要條件。不過因爲政治失了領導，各人就人民生存上來補充一點學理罷了。一個學理拋掉了經濟結構的基礎，牠在政治上的魔力，也就有限。○又加之有由井田經濟制度所產生的孔學爲之羈勒，所以牠們便得不到極度發展的可能。○後儒許多人認爲楊墨之道不著，是孟子辭而闕之的功績，這是何等的淺見呢。從前孔子作春秋誅亂臣賊子，而亂臣賊子不絕於後世。孟子斥暴君汙吏，而暴君汙吏亦不絕於後世。只要有牠適合產生的泥土，牠便蓬蓬勃勃地成長起來，這豈是不利於牠的幾句言語，便能斲喪牠胚胎中生機的嗎。何況是一種學理，尙有牠推撼不動的立場，相爲印證的環境，要滅殺牠的勢力，決非筆舌所能奏效。○假使生楊朱於秦漢之際，必能取孔學之地位而代之，這是因牠的學理，可以代表當世人君的政治思想。當時的經濟基礎，與牠學理以發展的機會，由牠的學理所構成的經濟條件，必然有發展的可能。而且相信

由牠的學理所構成之經濟基礎，必然能載任英雄事業的消費，恐漢武帝的功績，倘有更高紀錄。因其爲我之學，有了正常發展的途徑，更不須表彰六經，外施仁義，來塗飾這多慾汗穢的自身。更用不着以孔學尊君抑臣畏天聽民的枷鎖，去束縛才智之士來束縛自己了。在這個場合常中，楊朱的學理——自由主義——可以支持到資本尙未崩潰，瀕於崩潰的今日。並在這二千餘年當中，抵抗外族的能力，必然要加強若干倍。——因爲楊朱的主張，是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這是牠的思想，能發揮自由主義真理的一個原故。在這經濟條件與牠適合的時代，——如秦漢——牠必能駕勁牠的經濟機構向前邁進，以達到牠的豐屋，美服，厚味，婬色，的願望。祇以生不遇時，失掉了經濟的憑藉，空談學理，激發不起青年研究的興趣，所以繼起無人，及後日事機到臨，只惜此種學理已不復有人談及了。但以這種自由思想，自然漫延之結果，無有學理爲之制約騙策，遂流爲楊朱所謂畏鬼畏人畏威畏刑的一種遁人。自身則可殺可活，其制命之主力在外，這便是華族在歷史後期甘受異族侵侮的病根。換句話說，就是拋開學理，依着人身的情性發展

，誤走上了消極自由主義的錯路，一直到作者握管的時候，還在迅速地四處漫延。這種足夠危害民族生命的險症，非投以毒攻毒的劇性藥劑，不能奏效。這個與楊朱對待而生的學理，當然就是墨翟之學，牠對於楊學是含有反作用的。不過墨翟當時，亦與楊朱一般未能根據經濟基礎立論。把現代經濟立場，讓與儒家提出獨占。然猶窺出地力不足，生齒日繁一個破綻。所以纔有節用節葬非樂尚同等篇之作。至於墨翟心目中所謂認定的經濟基礎，當然是離不開牠目前的所謂井田制度的殘形。在井田已不存在的今日，來提倡墨學，建築牠的經濟基礎，當然是祇有同隸左翼先後一派的共產主義，這便是救治消極自由主義病痛的對症藥劑。要使這楊墨之間發生一度變化，然後去其太甚，始有回到孔學立場！中性上的可能。譬如前段所舉試驗化學，於酸類液體中投下鹼性物，必然的要起酸化作用，而其作用的結果則成爲鹽，在化學上叫做中和。即是起了酸化之後，才能得到中和的。又如人們由六淫致疾，投藥的方法，勢必先攻其邪，次方施以補劑，其理至明。今之對於國痼施治療者，不用墨而用孔，這是明顯的一個錯誤。用孔而又拋開

經濟基礎不談，這更是欺人的一種伎倆，漢武帝表彰儒術，便是根據的這偶見解。須知儒家都有同樣的平等經濟基礎，如莫有勇氣從此處着手變更，可說一切努力都是錯誤。中國儒家的這種中性學理，固然是泰西各國所無，然以經濟條件為基礎，實與泰西左右二翼的學理無異。泰西學理，是人類自身求生存安適慾望的產物，是平凡卑近的。牠道理的發明，是依鬥爭方式由歷史的教訓而獲得牠的基礎，是建築在自身生存安適的盤石上，所以牠攬捉不住一個執中之權。中國稟承堯舜的孔學，是拋開個人的立場，來代替人類求生存安適的理智的產物，是慈悲廣大的。是聰明智慧者，為防止人類鬥爭的危險所設的欄護。所以牠具有宗教家的精神。並用不着宗教家的迷信。這是在泰西歷史上找不出而且莫明其妙的一種思想。前面說過，這是由於四周異民族文化低落的环境所形成。後世聰明智慧之士不出，或出而不在其位，這承繼堯舜的孔學，便喪失固有之精神，結果便成了藏拙者之柑，形全面實敗。空際來風，無疑地要招致歷史後期異民族的侮辱。因為這種學理，容易養成人民的倚賴性和虛驕性，牠是利於世界全人類，而不利於失

了領導爲一種空泛學理所籠罩下的民族。至用以療治消極自由主義的病痛，更是藥不對症。這種中間性的學理，固自有牠的特長，將來影響於世界，亦正未可限量。但是在使用上必得有一定的範圍，不能人人盡皆聰明智慧，每日從事農業工務的人們，原用不着，亦不須有斯格致誠正之學。就他們平凡卑近的資質和地位，只可順應潮流，以出入於楊朱——即今自由主義——墨翟——即今共產主義——之間，而受中性學理的領導，使社會思想得到一種調和，這便是中國民族在精神改革時期的必然地一種動向。孟子之闢楊墨，他是站在孔學護法的立場，不曾從人民身上着想，使他們來照顧牠們個人的利益，不免落於一偏，不是牢固不拔的一個理論。

第二章 戰爭與和平

人類在這種族的痕迹尙未能消滅，每個政治領域的界線尙未能衝破以前，除甲乙二人或兩團體之間，發生對待不同的兩種形式外，甲政治領域，與乙政治領域之間，亦發

生對待不同的兩種形式，這些形式叫做戰爭與和平。在一個地域之中，有兩個以上的人們，而又不是同受一個勢力的支配，這其間就有許多利害的對立，有時也可以相互容忍，在衝突過劇的時候，就不免要訴諸鬥爭的形勢。在團體與團體之間，所包含的鬥爭性比較的多，尤其是兩個以上的政治領域之間，一遇到利害的對立，便不免出以鬥爭的形勢，驅策大量的軍隊，扮演屠殺的慘劇。同是一樣的鬥爭性，不過在個人和團體間，還必直接訴諸武力，得採取牠種方式發洩憤怒的情慨罷了。這是因為個人和團體間，還有一個富有支配性的政府，只要雙方呈訴以後，所有糾紛，便可望得到公平的解決，所以無直接訴諸武力的必要。但在甲政治領域，與乙政治領域之間，情形就可不同了。牠們利害對立的糾紛，雖然也能得到仲裁裁判，但是莫有最高權力來為之強制執行，結果總是強者欺負弱者。要變更眼前強弱的形勢，只有各個政治領域內的人民，自行團結起來，將實力比較一下，爭最後五分鐘的勝利，這便是國際間戰爭一個不可避免的理由。如果弱者仍然失敗，這國際間不平的痕迹，依然陳列着，強者侵略的心理和事實，依然

是向前推進着，除非是弱者一蹶不振，或是滅亡，這戰爭的事實必要重演的。所以要使國際和平的機構，就在弱者本身有強固之組織，能抵抗外來的壓力，使國際間的強暴勢力，不能任意流動，這便是弱小民族呼籲和平的一種有效辦法。即此證明內政之不修，即是招致外寇的一封請柬。這修明內政，又不是專在制度上去摹做些形式，今日定一章程，明日頒一法令，便能收良好效果的。孟子說：「徒法不能以自行」況法之適合與不適合，尙有其歷史的背景，與當前的需要，有賴於當軸者的巨眼獨睜，和國民間的充分了解。即使制度與國情適合，尤賴當軸的以身作則，相見以誠，一般官吏，都能奉法惟謹，使上自首領，下迄官吏公役，無一人敢枉法以徇一己之好惡。有則執法者得按其罪而治之，使國內無一人不游於法律範圍以內，則全國上下湊合而成一具有機體。譬如人身，身可使臂，臂可使指，運用靈活。則能力精神充分表現，這樣纔叫做強固組織。可見這強固組織，不是專恃一種嚴密的方法，或人民一時的激動所能奏效，而是由人民對於國家的愛護，政府施為的信仰，組織方法的了解。人民不但是甘願受這種強固組織的拘束

，而且是自動的鞭策自身游於組織範圍以內，來擁護這強固組織。在人民的心理上，如果一設有這樣一個大轉變，這個國無疑地可以轉弱為強。這個關係，就在政府與人的施為，所給與人民信仰條件的程度如何。在一個教育不普及，文化落伍的國家，一般愚蠢的人民，是望着政治勢力的指導和驅使而前進。這國家的元首，對於人民，便成物質上的一種維他命，是只容許仁聖賢明，斷不容許貪殘敗類。不比教育普及的國家，人民常識充足，政府如果不良，他們積極的可以改造，消極的不與合作，不至毒中人心，潛伏滅亡之禍。如果在一個文化落伍的國家中，而又是一個受毒甚深之民族，身居元首地位的人，不知以身作則，領導人民向生存的道路上邁進。惟舉過安富尊榮的生活與歐洲先進國的元首，接踵而行。這便是不明自身的責任，一般人民的精神思想，便領導不起，國家便無復興的希望。從世界大勢說來，便盡不了維護和平的責任。空際來風，這空氣恐怕就在這一國的地盤以內掀起對流，財產人畜都有被捲去的危險。如果一個國家要維護和平的話，當政者就該趕急修明內政，延攬人才，集思廣益，倘遇才德出眾之士，便

當置之高位，領率百僚，虛己以聽，如當日鄭子皮之於子產，甚或如許遠之於張巡，竟以位讓賢，而已爲之下。必如此方不愧當一國之權，必如此方能盡爲天下得人責任。務使野無遺賢，但發動羣衆則人才自會集中。此黃梨洲所謂：『明乎爲君之職分，則許由務光非絕塵也』。在歷史上的昭示，當權者並無納福之理，所以洪範五福，貴者除外。惟其有含垢納汙的企圖，政治便不光明透闢，追踵逐臭者因緣而附和之，顯露出一種畸形的發展。語曰：『以賢則不肯，則不肯者懼，以不肯者而賢，則賢者慚』。在這種情勢之下，聰明才智之士，已結合者，必受彼輩排除，未結合者，勢必相率遠去，漢奸羣小包圍左右，元首一人孤立其上，聰明蔽塞，長傲遂非，一切政治，開足馬力，向錯誤的程度邁進，國困民窮，自侮召侮，這個民族國家的危亡，便已到岌岌不可終日的情勢下面了。說到一國滅亡的到來，就不免要蒙戰爭的損害，弱國自身縱無絲毫抵抗能力，列強亦必訴諸武力以維持國際均勢。這弱國地盤上的財產人民，無代價的供他們雙方敲彈和毒瓦斯籠罩下的犧牲。這種損害，比較自身奮勇抵抗敵人的損害，特別來的大。

所以和平不是人們口頭呼喊行爲退讓的結果，而是勤求治理，強固組織，盡力抵抗的成功。

第三章 戰鬥力和財富

一國的財富，是一國的人民維持生命的生活素。這種生活素如果欠缺，那一國人民的生命，便有不能繼續維持的危險。國內使呈露恐慌的現象，厝績演進，便是現有政權者的土崩瓦解。所以一個國家的政治當局，欲保持現有政權之穩定，便須先行顧慮到全國本身的財富。積極的量出爲入，以謀生產事業之發展。消極的量入爲出以期人民元氣之保存。不恃外債以衍敷一時，不膨脹通貨以貽害百姓，自量其財富之豐吝，以爲戰鬥力之強弱。一國之政治當局，苟欲其戰鬥力之強，必先從事於生產訓練與組織，以增加其國富，建築所謂戰鬥力之基礎。如是以財富——不是私人——爲武力的根本，這武力的對外行使，必能運用自如，這武力的抵抗強權，必能加大效率。這便是一個弱小民族發奮

圖強的正當途徑。一個垂死民族企圖復興的唯一方法。所以一國國民的戰鬥力，是脫不了國民財富關係的。如果一國的政治當局，不曾把二者間的連鎖看明，欲賂其武力以求僥倖，這無疑的是要招致失敗。倘在一個國難嚴重期間，因環境之逼迫，不能不出於武力抗戰之一途，惟一方法，是在節省國內一切浮費，實行統制生活，增加勞動時間，以加強生產能力。這種場合，是以保障國家安全所必需之武力為標準，然後調節財富以求與戰鬥力相適應。這種變態的政策之行使，是全仗人民愛國心的熱烈來撐持。要引起人民的愛國心，這個樞機，又全在政治當局犧牲一己的成見，來代表多數人民的意志，并且忠實勇敢，穩練可靠的，發展多數人民意志的威權。於是這戰鬥力過度膨脹，財富不相與適應，所給與人民擔負上的困難，因此得到極度忍耐性，對於事實困難的克服。但這種情勢，總以把期間縮短為正當方法，愈縮得短，愈受人民的愛戴，這種危機，便不難安穩度過。應付這種危機的政治當局，對於國難是該如何的忍辱負重，對於國策是該如何的準確應用，對於民力是該如何的愛惜調節。一視規定國家民族的出路，身先國民

，不顧一切的勇往前進，這是出於他愛護國家民族的一片不忍之心，這樣勇敢的精神，是他本身情感上不容已的表現。果具如此的精誠，則民族精神上的一盤散沙，立刻可以使他團結，形勢上的萎靡不振，立刻可以興奮。至其人民本身受到暗示以後，所起反應的繼續性的強弱，那是與經濟制度問題有密切的關係。經濟制度如果是要人民趨重於個人利益方面，人民中縱有甘願拋棄個人的利益來經營國事的，恐不懂事業得不到政府的扶助，這人民個人的利益，老早就會被社會上墮斷而登的人們剝奪了。換句話說，這五分鐘的愛國熱度，已經是使盡平生的氣力底賭賽，因為他們得到歷史政治和社會上的教訓不少，他怎麼會延長到七分八分呢。所以反應在五分鐘後之能繼續與否，是另一問題。我們只當知道在國難期間，現有財富與所需戰鬥力不相適應時，是可以用政治當局者的信用和精誠來救濟一時的。

第四章 前進與生存

地球亙古運行於太空之中，依着同一的軌道前進，這地球的前進不已，不消說一切附麗於地球的生物，都是前進不已。這地球和附麗於地球的生物運動和變化，是要消費許多時間，亦即證明時間在一直綫上的繼續前進。人類是生物之一，當然不能逃出這個例外，他的生存是由繼續運動和變化表現出來，這繼續運動和變化，便是人類生命形式的前進。不過這運動和變化，對於自身生命有益的程度，是應該加以考究，而且要有預定的計劃，以求對於維護生命的利益，獲得多量的收穫。在這種既定方針下面，採取經濟有效的辦法，這便是一種維護生存的手段。牠是因人類智識的開啓，時間向後越發展開，因而越臻完備的。若把這些手段從前至後的比較一下，這無疑的要顯出前進的痕迹來，這是人類歷史自然的一種趨勢。但必不曾受惡劣政治與以病狀的影響，其民族保有蓬蓬勃勃的氣象，方能順其歷史自然發達的趨勢。如一個民族能緊跟着歷史的發達前進，不曾誤入歧途，則牠生存的基礎，是非常之堅穩牢固的，但亦只限於適合競爭生存的環境條件下面。倘在一個特別的環境當中，誘致人心的蕩逸，文化的虛浮，學術的消極

·這種行動·便是軼出人類生存競爭的常軌，這民族不免要遺下後退的痕迹，至少也是
一步不曾前進。這種來勢很緩所種下的一種普遍病根，漫無覺察的在民族腦海之中藏伏
着，鑄成民族的錯誤觀察，後來這種錯誤觀察，竟把民族生存的正當途徑掩藏下去了。
一遇到地球上而新勢力的發生，將舊有的環境迅速改造，這種普遍病根，纔由新環境的
不適暴露出來，并且由其他民族眼光中看出牠對於現實觀察的錯誤。在幾經招致失敗以
後，能得到一個有威權的政治當局，或是一種堅強的學理，對於普遍病根的矯正，使復
入於生存競爭的正軌，向前奮進，這便是險中得救，是民族前途的第一幸事。若得不到
一個有威權的政治當局，或是一種堅強的學理，對普遍病根施以矯正，則民族前途形色
黯淡，便茫茫難以逆料了。

總之這種普遍病根的潛伏，固是由特殊環境的暗示，亦由於民族智識的過低，因偶
然的物質條件竟變更民族本身的思想行動，忘却自然界所昭示人類，對於生存的一種定
則，——前進——這是同等的冒昧呢。試想地球上一切生物，那一種不是日日的在繼續前進

·要發現他前進的停頓，除非是牠死亡末日的到臨。一個民族的前進運動，陷於停頓狀態，便是準死亡的徵候，如得不到回復原狀的機會，無疑的是要死亡。這種徹底的認識，是靠國家平日有充分的教育，使人民知道生物生存的定則的確切不易。這地球和月球，如果有一天停止了前進運動，那便沒有世界，人類如果明白這些道理，他便不斷的要在前進運動上去找生存。

第五章 革命路線之直線進行與曲線進行

一個國家的現行制度，在不能維護全民利益，而瀕於崩潰的時期，執政的人們如不急圖改變，以求適應，〔甚或用高壓手段，對現行制度予以強迫的維持。〕一般人民厭倦而得到強烈刺激所生出之反感，必然的要發生衝動，這便是一個國家革命時日的到來。

一種革命勢力的發生，自然是有牠革命的動向，但牠的成功與不成功，就要看牠內

包的實質與外延的方法，向既成環境進展這內外二者間的適應性。因此這革命的事實，就是一個極複雜的分析，這革命的路綫，就該是一個極委曲的前進。因為這既成環境當中，各個阻碍的力點有堅確和脆弱的區別。這革命勢力的進展，從經濟便利的立場上着想，無疑的是該從脆弱方面前進，因為脆弱方面，容易得到罅隙與革命勢力以透入的機會。但這阻碍力的堅確和柔脆，在既成環境當中，分布非常複雜，強弱參差，因此革命勢力的進展，便不能得到暢利的一直進行。而常是灣灣曲曲，東衝西突，對準弱點，順其自然的趨勢前進。這種避實擊虛的方法，在革命過程當中，未能抓着政權以前，是一種最重要的策略。因為革命這種新興勢力，比較舊有環境，是非常柔脆，總不使受到過鉅，妨害革命勢力之進展，這便是曲綫進行的一種理論。

新舊兩勢力的互相衝突，這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有持久性的一方，這革命路線的曲綫進行，便是保護其持久性的一種原則。凡是關於革命勢力之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軍事的，……無不以本身勢力之繼續存在為前提。從舊勢力的破綻中，以應付當前環

，這是於抱着一定革命宗旨之中，而又不可株守一定策略的。俄國革命之成功，全仗着革命領袖列甯的善於隨機應變，所有革命學理，都看做是事實的印證，而不一定認為是事實之指導。這種本身應付事實的學理，就要領導革命者的個人，能夠綜合起來，汎應曲當。避免因革命而遭着失敗的死方法，造成一種非常活躍的革命新勢力。這個關鍵，就在爲人民謀出路最後一個方針的不變，而是有十二萬分的熱忱，來吸引人民的信仰和擁護。

一個革命勢力當中，如莫有這樣的一個領袖，不能將革命勢力藝術化一般的活用。而是由多數智識不齊的人類，牽掣和監視，逼迫他照着書本中所指定的，或是數萬里外一紙隔靴搔癢的理論，呆板的，機械式的前進。對於當前環境的轉變和需要，缺乏靈敏活潑的應付，以致失掉了許多勝利的機會，革命形勢在這種情況之下，前途是非常危險的。因爲這革命勢力起了內在的矛盾性，一般革命份子，對於革命領導者的懷疑和防範，始企圖執行一種計劃來相抵制，便不顧虛到降來的成就和失敗。這其革命勢力破壞

的徵候。這便是革命勢力直綫進行的一個例證。因為革命勢力缺少了領導的中堅人物。不是陷於漫無擇別的處於被動，便是使氣高傲的不顧環境，結果是陷革命勢力於分散，反予舊勢力以勝利的機會。

第六章 非正義的不合作與正義的合作

正義二字。原是一種相對的名詞。但限於某一種範圍以內，便含有絕對性。譬如我們講民族的生存這個範圍，則凡屬於本民族的一切人們所有言論行動，皆當不違反本民族生存的這個原則。以個人為本民族內在的細胞之一，民族的生存，即是個人的生存，世界上決無有人肯反對自身之生存者。故一個適合於自身生存的條件，而不將全民族生存排除在外者，在全民族各個分子之間，彼此相互承認以為正義。這與由甲民族與乙民族兩個不同的立場，來觀察同一事實，因為立場的不同，其認識或是或非是不同的原是兩樣。由前者的觀察，這個正義是絕對的，由後者的觀察，這個正義便屬相對的了。

一個民族問題，是不能同異族人來詳細推勘的，尤其是一個民族的生存問題，其內在的實質，有許多與異族的利害相衝突，謀之不惟無益而且有害。因為他們所認識的正義，往往陷於錯誤。故一個民族的生存問題，是限於民族內部的分子來討論切實的。這種範圍既有一定，則屬於維護民族生存的正義，自有其絕對性。只要備具普通常識的人們，大概不至有錯誤的認識。

一個甘心違反民族生存的分子，是有他既成條件的存在，必是他的勢力和享受，高過民族中的一切，他本身既受了這種物質條件的包圍，他便認他自身的生存，便是民族的生存，本身起了錯覺，所以不辨孰為正義，孰為非正義。更由左右逢迎的結果，漸覺己心之所好惡即為正義，與非正義。愚者習焉不察，漸成迷妄，並非是他對於正義的認識有不同。

民族中的其他分子，如果不將此層認清，而是以有勢力者的認識為轉移，從而趨本附和，以希圖享受的分潤，以訛傳訛，人們都不肯用他們的直覺，這民族便有顛倒是非

的危險。

附論 六 非正義的不合作與正義的合作 三二二

在本章的題目，是要民族內在的分子，對於正義的認識，並要他有所主張。前面說過，凡是備具普通常識的人們，對於正義，是不愁他不認識的，只愁他認識了正義以後，便顧慮到自身衣食住行的需要，是正義未必肯去擁護，不是正義未必不去屈從。中國自辛亥革命以後，正義的銷沈，即是由於握權力者自身的迷妄。具普通常識的人們，又明知政治本源之不清，一切發號施令，大率皆不軌於正義。但因自身衣食住行的需要，目覩此執手可熱之勢，不免由旁觀而生豔羨，終於拋棄本能認識之所謂正義，以求滿足衣食住行之需要。凡非正義的畸形存在，或係一種動亂勢力，都不惜與之合作，以作分贖的企圖，一倡百和，於是是非黑白，樊然淆混。一般無識之徒，遂以具有普通常識的人們之所嚮附者為正義，緊隨其後，不惜向着民族死亡絕滅的道路奔馳。民族這種危迫的情狀，雖由火山爆發所加於四周居民的危險，都不足以形容的。

望具有普通常識的人們，來維持正義，就要他一面貶損自身的衣食住行，一面參加

國內的生產競爭，斷絕他傾慕權力的病根，使他對於正義的認識和擁護凝成一個。這使是王守仁知行合一的學理，這學理的根柢，是栽培在勤儉二字上面的。因為人類生活，原有積極和消極的二方面，勤於生產，是屬於積極方面，儉於消費，是屬於消極方面。二者互相補助，以保持物質與享受之平衡。使個人生活時常不感威脅，精神思想，時常有整理的機會，始有知識某種屬於正義，即進求行為合一之可能。

題目所舉正義的合作，與非正義的不合作，是一體的二面。凡能認識正義的人，都能認識非正義，於正義既肯合作，他的精神必然是興奮，他的思想必然是清澈，他遇着非正義的事實，必然是不肯與之合作的了。

這般具有普通常識的人們，他們的行為是為一般民衆所注目的。他們如果得到正義的合作，則一般民衆必然擁護，公理遂以獲伸。另一方面是非正義的不合作，則必為一般民衆所攻擊，少數握權力者出軌的行動，自必斂迹。本章最後的一個希望，就是要少數握權力者出軌的行動的斂迹。

第七章 時空交會線上的政治對策

一個民族國家，是有做蕃衍過程的史實，演變到了現在，牠究有幾多適應性，這是須得加以檢討的。這些歷史和時間的向後延續，民族國家的勢力，有無再行展開的可能，又須得加上一番的估計。我們知道這個社會是前進的，如果要適應的話，那一個民族國家，便不止是時間和歷史的前進，而是要物質和文化的繼續前進。有了這個繼續前進的因素，這個民族國家始有蓬勃興起的氣象。

一個民族國家，又有他居住和所在的地盤，這個地盤的四周，又各有他接觸的民族國家。那些民族國家，都有他現代物質和現代文化。因兩個民族國家以上，彼此人民往來接觸的關係，這些現代物質和文化，就發生彼此交換的形態。就地接觸的民族國家如此，即是羅布於全地球表面的一切民族國家，因人民交通往來，所發生的關係無不如此。

這種交換形態，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自然現象，因這種交換的結果，對於民族本身，就發生有利和有害的兩種形勢。這利害二字本是相對的兩個名詞，交換以後，如何爲利，如何爲害，這是要看民族國家固有之物質，和本身的文化，對於外來的物質文化能否相當容納，或部分採取，或全部拒絕，然後才能加以判斷的。但一般人民總是喜炫新奇的，把外國的物質與文化盡量搬移到本國來，有時對於民族國家伏下了很大的禍害。這是由於一般人民對於民族國家已往的歷史未能考究。當前的環境不加分析，盲目的，替亂的，造成一種錯誤事實。

一個民族國家成立在地球上，是有牠存在的特質和當前的環境。環境譬如是一個模型，特質譬如是一種鎔液，納鎔液於模型之中，器具之形體始備。如果一個民族國家，能將本身特質加意鍛鍊，使之如有遷就性的鎔液一樣，或方或圓，無不隨着模型的形式以爲轉變。則當前環境無不應付裕如，似此始合於一個民族國家競爭生存的方式。

一個民族國家，既成的特性，不消說是由他既往的歷史演變而來。但所謂特性，亦非是一成不變，亦因歷史之遞嬗，無疑地要移步換形。如變換之徐疾，有時與歷史的遞嬗不相適應，這國家便要發生一種病態。在病態既發現了以後，我們想要來對於這種病態加以挽救，第一先要明白歷史的演進性。即是一個民族國家的前進線上，時間和環境相互演變的連鎖。由此便知道一個民族國家，所有時間的歷史的「物質和文化」走入枯萎的途徑。是要取世界的當前的「物質和文化」來相補足，使成爲一種容易納入模型的溶液，以求與當前環境適合。反之如因過度吸收世界的當前的「物質與文化」致發生一種畸形時，亦須回索本身過去時間的歷史的「物質和文化」來相與糾正。這便是一個民族國家時空交會線上，所設的政治常軌，即是民族生存的條件，與應付環境的對策，亦即當前民族國家應該講求的真理。

第八章 資財與人生

人們在草昧時代，資財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東西，但自物質漸進文明以後，種類繁多，交易頻繁，人們對於資財，就有重視的必要。但屬於錢幣或珍寶的一部分，只適用於交易場合的媒介，取捨的輕便易於行使，過此以往，都未有重要的價值。這種錢幣，無論屬於金銀銅三品中之任何一品，牠在交易上的效率，可說都是一樣，不過在比較上有便利與不便利的分別罷了。

至於將錢幣珍寶，認爲是人生的無上至寶，這是因爲他們的習於所見，只知牠能換得錦衣玉食軒車華屋，欲羨他在社會上魔力的偉大。不知道這些錦衣玉食軒車華屋之外，還有我們講享受根本的身體，及寄寓在身體當中，而使之靈活運用的生命。假定一個人因身體受病，失掉了生命，則錦衣玉食軒車華屋一切一切都是幻妄。從這樣說來，以身體和生命，來比較錦衣玉食軒車華屋，不但有雲泥霄壤之分，真是主之與客，各異其位，是不可同日而道的。不過愚蠢的人們，注意於五官有骸的對象，而不注意於五官百骸的本體。但知錦衣玉食軒車華屋足以逸身榮身的可貴，而不知身體生命爲意識的泉源

，享受的主體之尤足貴。蠢愚之人，只知外觀而不知內照，只能知顯而不能知微，所以不惜勞形役心，而惟錦衣玉食軒車華屋之是務。這好比是捨却手中拱壁，來爭他人眼石一樣，只要他一明白物之與我，有客主之分，打破忽略自身的迷妄，這物之與我，孰遠孰近，孰輕孰重，便不難判若黑白了。至於專事居積，務求豐盈，終日奔走不遑，雖殘生損命而不惜，這不僅是心志的迷妄，因為耳目為錢幣所桎梏，熱中之極，發為精神上的瘋狂了。

屬於非錢幣珍寶的一部分，或是由於自身生產而來，如農之於穀物，工之於器具，雖有暫儲久享的不同，牠都是帶有若干的消耗性。並且牠們在空間上所占的容積很大，對於人們個體的享受是有一定限度，超出限度以上的數量，是令人不感愉快，只感麻煩的。況生產本於勞力，個人所有的勞力，本來也就有限，即是個人由生產所得到的非錢幣部分原來有限。因為個人成一個生產單位，這生產的方法縱有優劣的差異，技術上縱有純熟與非純熟的不同，然究為個人的手足和時間所限制，所生產的物品只能說有數量

上的差異罷了。是這屬於非錢幣珍寶一部分的資財，生產在個人方面既屬有限，而消耗亦屬有限，這是不易誘人入於迷妄的根原。但是牠在個人生活方面，却是非常之重要，這些東西，簡直可以說是片刻都是不可離的。這不可離的東西，與個人的關係不過如此，不必不可離的東西，——錢幣珍寶——人們反瘋狂似的追逐如彼，個人實不解所為，只好叫做是他們的愚蠢。所以人生的正義，就在各個人於民族國家保護和支配之下，盡力從事直接和間接的生產，以交換得充裕的直接享受的物質，使本身精神感到愉快，這便是人生的無上至樂。這便是至樂要從勞力中去尋求的一個定義。無論一切男女老幼都是應該如此，這便是衰世末流移風易俗的一個鐵律，更不勞政府來提倡所謂禮義廉恥了。

煞尾應再聲明幾句，就是資財對於人類集團——民族國家——的關係，是否如個人一樣的屬於錢幣珍寶的一部分，仍然認牠是個客體，以牠為無足輕重呢。此層就有個根本上的差異，這國家與個人是不同的，個人是統於國家的內部，是要讓國家成一個資財單位，來與世界上各個民族國家相互對抗。因為有了相互對抗這一個條件，便不能不把自國

境內所有的物質，一齊集中起來。這金銀銅等五金之屬，是地之寶藏，無國蔑有。這是應該開發儲蓄，與他國交換由科學產生的物品，以謀國防上的安全。因為有了各個民族國家的對立，這國家便不能不集中資財，以為國防上的應付。雖則對於人民可以用別種方式替代錢幣，「通貨」但對他國則非用錢幣和珍寶不可，此即資財在民族國家方面內在的一項重要性吧。

附刊

上蔣座委書

頃讀感電，敬悉我公外感時局之艱難，內稔復興之不易，呼籲和平，以求統一，精誠團結，號召國人，此實政治思想之進步，亦即民族再造之先聲，邊省愚民，私用自慰。

惟是中國社會，早成痲痺，人民大難當頭，熟視無覩，縱有賢哲，末可如何，汪院長對人發言，說中國民氣銷沈，殊為可慮，此破的之言也，雖然，凡人染病，必有其致病之由，醫者探其原委，察其病狀，投以藥石，斯無不濟，國亦猶之，第視乎當國者之觀察，是否無誤，療治之法，是否適宜，今之國難，誠為空前所未有，然禍自我招，實難為諱，自辛亥鼎革以迄今茲，民力之消耗於內戰者不知凡幾，居領袖之位，不能代表全民利益，阿附者引為腹心，異己者視同敵國，由猜防而浸成嫌隙，加之誅戮，甚或見

以兵戎，豈知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在政教兼修之國，四境以內，固無事乎戰爭也。夫逞強於內者，必示弱於外，空隙來風，勢所必至，且夫今日之領袖，其地位即往昔之人君，則政教兼修，仔肩綦重，防民之淫，啓民之智，斷非示人以不廣者之所能勝，讀黃梨洲原君一篇，則知漢以後之人君，不稱其職，不足以爲法也允矣，在猶欲以孔學支配社會人心之中國，居領袖之位，而先反孔子無我之教，致全國人心，頓生反感，強者則嫉視其隳斷營私，積極抵隙蹈瑕，欲取而代，此內戰之所由起也，弱者則冷覷其政之不正，懷刑畏禍，消極不肯合作，此民氣之所以銷沈也，二者之病，異流同源，救治之法，惟在領袖之反求諸己，痛悔前非，昭告國人而已。

古語曰，民雖愚而實智，不可以詐僞欺也，溯自秦漢以來，開厥之君，求其所大欲，純恃武力以爲統一，所以內戰頻仍，不得已而施高壓政策，則又養成民族痿痺之性。二千餘年政治之根本一貫錯誤，文化學術，皆成畸形，所謂孔學者，直襲其皮焉而已，此即今日國家民族難於統一復興之癥結，今欲民族復興，則排除武力統一，若祇能武力

統一則民族不能復興，二者實相矛盾，而不相融合。

爲今之計，莫要於正身率下，革除中古英雄式，及秦西自由式之陋習，力爭上游，向堯舜湯武之程塗邁進，負其責而不利其位，以仁義代殘忍，以廣大代陰鷙，以高明代苛察，以敬畏守法，代恣情任意，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我公苟有必爲舜堯湯武之志，以復興民族爲己任，力可有國，而矢志不與，則精誠所到。金石爲開，如此，則目前之矛盾可除，來風之空隙可塞，國是可定，外侮內患，均不難平，彼日本在滿洲之標榜王道，以圖淆惑世界觀聽者，直蒙馬虎皮之類耳，一遇我王道之真，感吾民以內嚮，彼日本者不且望而卻走哉。

雖然，當昏墊之世，而忽談二三十年素不經見之王道，高岡鳴鳳，無識者或且認爲鬼車，然而東魯之麟，自經仲尼之鑒別，無敢否認其爲仁獸也。

夫中國人心之壞極矣，自蕭曹爲苟簡之政，禁犯上作亂，而不防偷惰奸欺，導以柔媚，誘以貪縱，民族內腐，實由釋政爲之種因，以迄遜清之末，不聞有正本清源之治也

，則民德之即於卑下，而不思振作以有爲也，其習然，其性亦然，其陶醉於歷史之薰染者深矣，自私之癩疾既深，則政治之能力淺薄，所以趙宋以降，始見逼於契丹，中屈辱於女真，終滅亡於蒙古，衆明崛起，無能改於其轍，享年二百，而復失於東北之滿洲，消滅以後，歐風東漸，新奇之物質，尤足以鉤引自利之人心，迄於民國，貧風大肆，癩之痼疾，竟成癱痿，當民國成立之初，推諉自利之君主，本應上承堯舜，重覩休風，顧當國者無肩荷復古改革之勇，而拘牽於近代德謨克拉西之制，徬徨眩惑，舉棋莫定，致失組織訓練生產建設之機會，若長此因循，猶然再誤，則最近角秦之鹿者，恐不僅一日本也，危乎危乎，千鈞一髮，時乎時乎，稍縱即逝，人身癱痿之疾，非扶陽獨到之藥不能生，民族偷惰奸欺之風，非聖人之精誠不能格，今日苟無聖人，不掃除稗政之根蒂，恢復王政常軌，則民族之癱痿莫治，終被列強宰割，爲猶太人，甚至吉卜賽人之續也必矣，此國家與民族存亡之關鍵，非敢固言高遠，勗我公以所難能，私心以爲救亡圖存之機，僅此一線。他皆緩不濟急，且夫非常之變革，必賴大有力者以爲之主持，今之奮路

，尙未見有雄偉堅忍如公者，而嚴整之士，不曾得政治上之修養，固不勝領袖之任也，則艱鉅之任，舍我公殆莫屬焉，因欲我公突破環境，以成不朽之名，此孟子所謂故齊人章如我敬王也。

今夫王者之迹熄固已久矣，雖然，欲於此時給國人以王道之印象，蓋亦不難，苟我公一言一動，無不以國利民福爲依歸，置個人利害生死於度外，汲汲皇皇，終日以爲天下得人爲務。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此孔子所謂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也。如此，則國人雖不遠信王道之可復興，然究不能否認治績之日趨顯著，勢必泯滅其偷惰奸欺之心志，而增加其奉法惟謹之精神，則社會進步之效率，必因此而加大。況王道自有其經濟之基礎，弘廓之規模，非後儒空言泛論所能淆混者也。

唐虞之世，洪水甫平，曠衍之土，隨地而是，人民耕稼，自屬容易，各視其力之所及以爲多寡，無煩政府代爲分配。及夏后氏之世，人口漸繁，政府有代爲制定生活水平之必要，商周因之，孟子所謂五十而貢，七十而助，百畝而徹，卽此稅率，以爲當代

民之生活水平，孟子之必欲規復井田者，以其爲王道之基礎也。由今日而欲恢復王道，必師井田遺意，變而通之，斟酌國內生產狀態，先制定人民生活水平，嚴厲壓抑豪侈，使之俯就，以人民同等生活，建築社會同一心理，以求全國精神上之統一，大量移民西北，從事農耕畜牧，使貧民生活升上水平，土地收歸國有，但農人在一定期限內，得充分利用，并享有生產之蓄積，鑛山大工廠收歸國有，但工人得分贏餘之利潤，向國家銀行儲蓄，對外商業國營，但商人在小規模範圍內，允許在國內貿易，并通計國富，由國家明定私人保有積蓄之最高額，如超出定額，國家得以累進所得等稅節制之，此卽我先總理澈底之民生主義。建築八德之根本，上承王道而舉者也。

若空言八德，使人民片而負其責任，此後世君主之故智，在此思潮涵湧之日，可斷其收效絕鮮，尤願我公身爲之倡，效令尹子文毀家紓難，不使餘財超過平民定制，以立共信互助之基礎，將四子六經反復玩誦，涵養其慈祥愷悌之念，充實其安人利人之行，然後次第推行於政府要人，及國民黨人，有不奉法者嚴厲處置，如遇貪汙，則盡法懲治。

，政治之本源既清，則民心嚮善，如水就下，此王道推行之結果，不惟足以遏止每年國際貿易八萬萬現金之流出，且可以滅殺共黨之凶鋒，側聞今日共黨宣傳之口實，即以政府要人及國民黨人之腐化貪汙奢靡爲之資料，今一概自行剔除，則釜底抽薪，共黨雖欲爲之揚湯，而勢有不能，以其情平，其氣自餒也。

推此道也，則政府對於共黨，不難以王道馴而服之，卽二分軍事亦可不用，往昔大禹之徂征有苗，非其前例乎，禹則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僅七旬而有苗降服，孔安國爲之注曰，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可味哉斯言乎，况共黨於我之非異族而爲同胞乎，苟我之政教組織，於國利民福，視彼有加焉，彼之心先已折服，和平以求諒解，奚所不可，而必出之一戰胡爲哉，知鈴之所以繫，則知鈴之所以解，順其理而解之，吾未見其能和平於西南，不能和平於共黨也，舍寇仇而從事鬩牆之爭，豈抱復興民族之志者所忍出此哉，第恐自身之利害，不與民族共其立場，姑執是以爲非，文非以爲是，以圖饒倖於一時耳。

如是，則民族一線之生機絕矣，且不惟實力消耗於內戰，無以應付一九三六年之危機，祇一內戰不停，從事生產建設之罷滯，國家基礎不能於大戰前達到鞏固，似此組織疏鬆之弱國，欲以抵禦移山倒海之強鄰，不且如千鈞之壓蠶卵邪，求不亡而不得，且恐有時被壓迫，而走寄敵人財賄之下，而何雪恥復地之可言。

兵家之言曰，兵貴精，不貴多，政治家之言曰，國貴強，不貴大，紂之億萬，不敵周之三千，明甚，我公苟能切實依經濟基礎，建築社會同一之心理，恢復王政常軌，則雖僅據長江流域七省之地，擁二萬萬之人民，何嘗不可抗拒東鄰，爲民興復興之根本，而況益之華北數省乎，視之湯武，則大且數百倍焉，若不先致力於改善貧民生活，奠定國基，乃爲握資自利，睨拜強權，準作漢奸者所利用，而徒事奮武，恐統一未成，政治成績毫無，大戰卽行爆發，國內廣大鳩形鵠面之民衆，反爲雪恥復地之累，跋前疐後，徒喚奈何，卽欲隱忍苟存，宣布中立，效滿清對日俄戰役故事，然形勢已非，無論勝負之誰屬，皆要爲我國領土之掠奪，袖手旁觀，在理亦決不容許，恐現有之區域，尙且

爲日人弔民伐罪之資，乘除以後，則今日之奮武爲徒勞矣，傳曰，國無其人，誰與俱守，東北四省，可爲殷鑒，民心不固，雖鐵路之密如蛛絲，工廠之大如遼瀋，胡爲哉，明建國之必以衆民爲本也。何如未雨綢繆，就現轄各省，急謀上下一心，力加整頓，嚴密組織，使日人懼我而不我犯哉，願我公之熟計之也。

墨翟之學，有甚焉於大取，當此戰機日迫，大難當前，曾無萬全之策，則兩害相權，取其輕者，假使集中民力，將來可以奪回東北四省，雖西南數省未隸中央，固無妨也，其量之於我則同，其失之在人則異，是可取也，以日人爲我寇仇，藉復仇以增高民族之地位，固結國內之人心，一舉而兩得也，反之奪日同胞，而失於寇仇之日人，則萬萬不可也，違強陵弱，偃戈內向，世人之所鄙棄，非墨子之所謂大取也，況保存於同胞之手，日後儘有其謀統一之機會，十九世紀之意大利，不可以爲法乎，失之異族，則將來民族之紛爭，常爲國際戰爭之導火綫，今之巴爾幹半島是也，苟明乎此，則內政之方針定，而外交之方針亦定，夫是之謂國是。

國是既定，舉國上下，同向組織訓練生產建設之道前進，以年餘之時間，依力之所能及者，從事整理，雖不能遽然獲巨大效果，最小限度，亦可使國人瞭然民族生存之正當途徑，於不求統一中，以求統一，此孔安國不討自來之說也。

方今東北外交，迄無對策，屈已不得，恃人不能，內既不能組織民衆，外又不能結納善鄰，由孤怯而演為推委趨避，民族根性之劣，由此暴露無遺，日人譏我外交方策，不脫以夷制夷之窠臼，即是斥我無屹然自樹之外交，此後允宜守定自身之立場，積極準備雪恥復地，充實思想戰與經濟戰，外交辭令，則以信義出之，決不可追逐國際之波濤，以為大戰投機之抉擇，自見絕於國際也，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說，應付日本，可謂允當，方針確立以後，內外聯為一氣，如彼恃其縱橫，則事至而戰，國人無不服從領袖之指導，勇赴前敵，以捍衛民族國家者，必如是全體動員，戰爭乃可持久，以待敵人之崩潰，此兵家所謂務求我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必可勝也。

抑猶有言者，我自九一八事變以後，非不刻苦自勵也，但以國是未定，奮治則舍

法從人，側重軍事，日人至日我爲非近代國家，皆繫對此而發，譬之出軌之車。縱使開足馬力，進程終屬有限，且有顛覆之虞，日本軍部小冊，以武力戰殿於思想戰經濟戰之後，彼行伯術，猶不狃於武力，考二南之詩，知文王之化，先及於江漢之間，此王道不重武力之明徵也。近代戰爭，是兩國人民間互鬥團結力之強弱，恃武力，遠民衆，尤畏懼民衆之團結，根本上已不能對外作戰，此其所以被敵輕視也，亦即智不周乎世界，激悟人類進化之理，而依其地域歷史之觀感，以謀實現所謂國家之雛形，結果被人暗算，以致失敗，此卽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根由，欲除此弊，莫如集思廣益，虛懷若谷，善善從長，力事屏絕詭譎之聲音顏色，使賢明者有進言効力之機會，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也。我公果能聽謬謬之言，勃然虎變，一端制定國人之生活水平而擁護之，身爲衆倡，次第推行於政府要人，及國民黨人，務使收益俯就生活水平，藉以領導民衆，一端停止一切內戰，以確保政策，封鎖共黨於一隅，裁溢額之兵以歸農，隨即武裝民衆以固國防，并廢除一切苛雜，使國人確知此後政府政治之動向，若感電所列五款，不過

中央與地方行政之調和，并非與民更始之表示，尤願我公斟酌於緩急輕重之際，加以矯正，果能兩端并舉，則全國視線，集於雪恥復地之一點，此曹劌所謂忠之屬也，可與一戰。

如此，則國內賢明特達之士，將接踵而至國府之門，切思有以自効，勝過千百乘安車蒲輪，廣爲招致多矣，夫如是則人材可以集中，某雖不材，亦當脫穎而出，以自比於曹劌，長勺之戰，勝算未始不在魯也，齊雖強大何畏哉。

某賦性迂拙，棲遲衡門，置身事外，越分言事，尤所不安，近爲我公感世所刺，頓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使我公而不徵求民意，一意孤行，馴至顛覆社稷，使民族不得政權之保障，次第漸滅，公之過也，既徵求民意矣，人民有見而不以貢之於公，視國之危亡，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民之罪也，某固不安越分言事，亦不敢知而不言，忍受此坐視國亡之罪，姑冀幸而見用，不惟可以復興民族，抑且可以拔蘇俄之轍，而爲世界革命之前驅，卽不幸而不被採納，則與日本軍部小冊之對立，亦可留作將來事實之印證。

謹抒管見，伏惟亮察，幸甚。

公 民 陳 至 言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由中央軍校轉（航空）

汪蔣通電五項建議

各報館轉全國同胞同志均鑒，今日救國之道，莫要於統一，而實現統一，端在乎和平。吾人當此歷史上空前未有之國難，若非舉國一致，精誠團結，避免武力為解決內政之工具，消弭隔閡，促成全國真正之和平統一，實無以充實國力，樹立安內攘外之根基。本此信念，而定救亡圖存之方策，治標則莫急於剿除赤匪，治本則莫急於生產建設，去歲七月儉電，今歲二月真電，曾剴切言之。兩年以來，本此方針，繼續努力。現在江西股匪已次第消滅，積年巢窟，完全克復。而其殘餘，或零星潛伏，為患地方；或四散逃竄，野心未已，善後及追剿，實為當務之急。對於生

附 刊

產建設，雖以財力支絀，未能普遍施行。而交通，農業，亦日有進步，循此不懈，貫徹可期。惟欲求確實之進步，以因應時勢，解紓國難，則必須全黨同志。全國民衆。明國家環境之艱難，堅和平統一之信念，下更大之決心，相見以誠，確立共信互信之基礎，以發揮分功合作之效能，始克有濟。五中全會開會期近，謹將所欲建議，以期採納而見實行者，披瀝以告，幸垂察焉。數年以來，救亡圖存，雖有方策，而推行之際，動多窒礙。分工合作實效未覩者，最大癥結，則以中央與地方間之權責未能因應時勢，明晰釐定。致隔閡未盡消除之故。夫和平統一，固爲全國今日共守之方針，而欲其實現，則必須中央對於地方解除其牽掣之慮。消釋其疑難之端，同時地方對於中央亦必須本休戚與共之真誠，遵國家整個之政策，守法奉令，一掃昔日割據或形同對立之形勢。期於一致努力，蛻變中古時期封建之遺風，以造成三民主義新時代整個之國家。倘中央與地方之負責者，皆同心一德，本此而行，不僅黨國所利賴，實亦自救之良圖。伏查總理建國大綱規定中央與地方採均權制。凡

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此爲劃分中央與地方權限之最高原則，依此原則，以定綱要，使中央地方共同遵守。在今日實不容再緩。蓋以中國幅員之廣，人口之衆，交通猶未畢張，教育猶未普及，若拘泥劃一之制度，必無以應複雜之情況，將恐致愈求統一，愈滋紛擾。故挈持大體，使得均等發達，實爲必要也。列舉如下：（一）關於法制，中央祇宜規定原則大綱，富於伸縮力，其實施辦法及詳細條理，則由各省市自行釐訂，以期因時因地因人，各得其宜，而無削足適履之病。（二）關於用人，任命之權固操之中央，而人選則應由各地方主管長官就法定資格者選擇保薦，至於任期則以三年一任爲原則，且明訂保障，任期中不應無故撤職，任滿之時，其成績優良者并由中央重加任命，予以連任，以期收人盡其才之效。（三）關於地方行政及經濟設施，應由地方斟酌實情，擬定計劃，編製預算，呈請中央核定施行，中央於核定之後，但須按其期程，考其成績，而不必預事干涉，使得自由發展。（四）關於中央

與地方之財政，應明確劃分，凡屬於全國性質之國家財政，由應中央統支，例如對外有關之關稅等，其稅則與收支尤應絕對歸中央管理，地方固不得干涉，其他國稅亦應遵中央所頒布之規則與稅法辦理，至於地方財政，則由地方管理，其過渡時期中地方財政確有不足者，則由中央酌量調劑。(五)關於國防軍及地方兵警之區別，應確定標準。國防軍為捍衛國家之武力，故關於國家之正規軍，其管轄指揮，須統一於中央，但在過渡時期得依其統屬關係，對於部屬之任免，得由其最高主管長官呈准中央任命。至於地方兵警及保安隊，保衛團，警察隊等，除編制數額須由中央核定外，訓練調遣之權概屬於地方長官。無論國防軍或地方兵警，若有向外國購買武器之必要，呈請中央代為訂購，以求品類之均一。以上五條條條大者，實為釐定中央與地方權責最切實際之標準，亦為增進中央與地方關係，以共同努力推進政治之方法。倘得五中全會予以通過，其關於現行法規者，分別釐訂，或加以修正。關於行政方策者，則切實推行，敢信中央與地方之扞隔必日臻消融，而和平統一之實

效於茲可獲。抑尤有進者，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不取決於武力，不獨中央，地方間對此原則應恪守弗渝，即人民及社會團體間依法享有言論結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動爲背景，則政府必當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蓋以黨治國，固爲我人不易之主張。然其常道在以主義爲準繩，納全國國民於整個國策之下，爲救國建國而努力。決不願徒襲一黨專政之虛名，強爲形式上之整齊劃一，而限制國民思想之發展，反失訓政保育之精神。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義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也，以上所陳，於培養民力，發揚民力，所繫至大。願與同志在決議之前，集思廣益，以折衷於至當；在決議之後，則精心竭力，以鼓勵於實行。庶幾民困可蘇，國難可解，和平統一之途徑，復興民族之基礎，胥在新乎，掬陳惻忱，惟共鑒之，汪兆銘，蔣中正感（二十七日）印

再上蔣委座書

二十三年十一月於威電發出後，曾以陳至言名義上我公一函。航由南京中央軍校轉交，計當達覽。今復於五月一日，讀川報新新聞記載漢口航訊：「記者在貴陽曾謁蔣委員長，叩詢關於國民經濟改造之意見。蔣委員長答：本人對於此問題，極為注意，邇來接到各方寄來此項改造國民經濟之方案頗多，擬加研究，斟酌一適當辦法，惟本人以為推行此問題，必有一前提，即先應集中人才；其次在訓練人，俾將來得向民間廣為宣傳云。」不知航訊與該報記載文字是否無誤？然其中意義相信不差，可知關心國民經濟者不僅至言一人也。今姑就報端所揭我公談話之意旨，願與我公再一商榷之。

我國自井田制廢以後，對於國民經濟素來放任。又因條件缺乏，形成不健全之自由資本主義。清季海禁大開，外貨侵入國內市場，明知為害而無法統制。釀成國家絕大漏卮，馴致今日金融之極端枯窘。國內社會，又復藉政治經濟權力之簸揚作用，判成貧富

懸殊之兩大階級，相衝突而不相維繫，國勢危如累卵。然富者猶以充塤慾壑之故，將其不勞而獲——壓榨取來——之金錢，由滿后向外國注射，此種趨勢，民族終必有枯竭以死之一日，是國之將亡，直不勞而獲之階級亡之也。今幸我公注意及此，擬對於各方國民經濟改造方案加以研究，此民族更生之機會，因此種改造運動，非用政治力量決不能克奏膚功。我公為政治動力之中心？果有鑒於國民經濟之危機，知建設國基，當從改造國民經濟入手，則大本既立，後此一切政治自有逐漸走上軌道之希望。

惟個人於此有不能已於言者，改造方法之推行，誠如公言應以集中人才為前提，但須用者為何種人才，與人才集中之方法，正自有研究之必要。於此又有一前提，即是當此民窮財匱之日，此後國民經濟，應當如何改造，——方法——與改造成如何之形式，——目的——後來建設一切，始有暢利進行之可能，目前一個量雖不足而質極充分，——人心自利——不健全之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其放任之形勢，能否任其繼續，第一應該明白。如果對於民國二十餘年政治混亂所養成之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與少數統籌等，

不能從生產取得資本，專營私人過分享受，不加制裁，而欲保留現狀，一政治動向一擬由危塗棧道仍向歐美資本主義之臂尾追逐，則我國國民經濟自無改造之必要，但得向國際營求數十萬萬元不損權，不辱國，不遺害人民之借款，以作國內一切建設開發之用，解救人民倒懸。消納過剩人口，提高國民生活，將來但用俄國騙債手段，本利一齊停付即告終結，此種公私兩便之計，國人無不歡迎。如果自滿本身不能仿效俄國出此騙債手段，而是要交出抵押品以作担保，此種借款，便無異自身政權之分割，完成次殖民地之一種勾當，飲鴆止渴，大可不必，恐借款愈多，則國力愈微，去民族復興之道愈遠，是借款以救眉急，欲達復興民族之企圖之不可恃也明矣。

由此以觀，民族復興之道，惟有倚靠自身糾正走入危途之資本主義。使社會上之生產力平均發展，以爲國民經濟之改造。今日舉國之財富，數有限也，人民之生產力亦至低也，財富既無術以使急驟增加，生產力亦無法以使突然加大。則改造國民經濟之方案，勢必從消極方面向軍閥，貪官，汗吏，土豪，劣紳等取其權取所得，用於生產，以

資調節；再輔之以移民西北，開闢荒土；繼之以講求科學增加工廠提高生產技術，而尤須強力制裁惡劣分子之過分享受。換言之，卽是以國家力量統制人民生活，使無餘錢再由漏卮向外國注射。就形式論，此無疑是走向社會主義之道路，不過推動之力，發於政府，達於社會，成爲一國家社會主義而已，此與冒牌之三民主義，實際爲自由資本主義者，立於極端相反地位，不識我公是否有此愛護民族之仁，競爭生存之智。不計利害不顧一切之勇耳，在未着手改造國民經濟與集中人才以前，須先行確定此改造之原則，使國人認清此改造之目標，各依其抱定之主旨以爲走集。則在一定標準之下集中人才，始不至有以耳司聽，以目司聽，人不得用，用非其人之譏，是於我公集中人才一前提之外，尙有確定改造國民經濟方針之一大提前在也。

茲再以集中人才論，民國二十餘年來，才智之士往往因貪財縱欲以致敗德而不可復用，使國家蒙莫大之損害，惟得天獨厚質樸無華者，乃有廉潔之士焉，而又不樂趨承，與世乖忤。若我公略不加意，蕪猶雜陳，而於往古堯舜進賢退不肖之德，謙謙未遑，

則本身即不免有破綻，與日伺其旁者以抵隙蹈瑕之機會。譬如性屬腥羶，則飛集者即爲蠅蚋；性多暴厲，則招致者即爲虎狼；性偏陰險，則契合者即爲蛇蝎，無他，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是故古之君子，貴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延其所受教以救己之失。謙衷怡色，貴德尊賢，此周公所以吐哺握髮以迎國士也。方今國體雖更，而執政之爲用則一，况社會猶未脫封建之餘習，不舉直而錯諸枉，使國人瞻視一新，有所矜式，以畜移風易俗之漸，而切盼施行新政之有效率，不受受乎其難哉，前此施行新政之效率，可覆按也。彼以金錢收買而來者，皆冀滿其大欲以去者也，故非先行決定改造國民經濟之方針，以樹吸引人才之中心不可。

惟是此種大規模之改造，事前無精密之計畫與充分之準備不爲功。故必豫期開始改造以後，民衆卽有明確之認識，使推動力逐漸加大，阻礙力漸次減少。當政者再以強毅不屈之精神赴之，身爲衆倡；又以光明磊落之態度出之，如見肺肝。則一倡羣從，事未有不底於成者。歷史上王莽王安石之從事經濟改革而失敗，乃事前無精密之計劃與充分

之準備，濫用夾持舊觀念之人才，——至少是不明白改造之意義——以使行新方法。動作既不能滿人期許，私弊更足以貽人口實。於是阻礙力逐漸增加，而推動力遂因之式微矣。此歷史上改革失敗之昭示也。

方今共產黨非以改造國民經濟爲職志者乎？然因全國人心之便私而利己，故畏之如虎，來則趨避，措置不當，阻礙橫生，固是由於另有原因，然亦可知國人於財產自私之機會尙未絕望時，則其自私之觀念根本不能剷除，不惟不能勤奮生產，且時有發生反動之可能。商鞅徙木立信繼之以嚴刑峻法即是發矇振聵鞭起頹廢之惟一方法，政府如欲改造國民經濟走向國家社會主義之途徑，必先顧及此點。個人以爲必先使國人生活有所保障，而嚴厲以除去倚賴財產私有之條件與機會。使知經濟現狀若不改造，則國亡而自身亦必隨之消滅，公財產於社會，卽所以延血族於將來，示以經濟改造與個人生命之關係密切如此。

尤切要者，此後政府對於人民所有之命令與宣傳，應立在民族復興立場，作忠實之

指導。萬不可因鞏固少數人之地位，欺國人之愚而顛倒播弄之，是黑白是非淆然莫辨。益陷人民於愚昧童昏之境，希圖個人智巧之制勝，是無異阻塞國人之耳目，禁其搏擊馳驅，而任異族之縱橫出沒，跳踉大噉，直逼民族走入死亡之路。如是而曰復興民族者，不過醉夢中之囁語而已。盼望當政者化私爲公，選賢與能，虛衷受益，和平以求國內勢力之完整。使是非黑白昭然若揭，假之與瑜不相掩飾。消滅國人僥倖之希望，與偏激之情感，斷絕國人苟免之企圖，使全國上下明瞭民族生存之正常途徑。然後合全國新興勢力——集中人才——以從事改造國民經濟，自無不水到渠成也。

又我 公所謂事前之宣傳固不可少，然亦非僅恃一途宣傳工作可告成功者。蓋宣傳者以言教，遠不如當政者以身教之切直有效也，苟政府要人，不攬權勢，不執己見，不閉賢才，不樹私黨，不專名利，又能減低其過度生活，儉樸耐勞，與齊民伍。則本一身所踐履以爲宣傳之材料，則如響斯應，國人未有不俯首聽命者也，記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非論語所謂「公則說惠則足以使人」之明驗歟。

過去國民黨人有一絕大錯誤，即是認總理所手創之國民黨，爲少數先進黨人之產物。中華民國爲國民黨人之勝利品，一固是未可概論總占絕對多數。只此雙重錯誤足以亡國滅種而有餘矣，爲噉飯而革命，是革命之觀感既錯，決無犧牲一己捍衛國家民族之精神，隱忍苟容受人指責，又何怪國內之紛如亂絲內爭不息哉，不知革命云者，必先有其對象，中國革命之對象，帝國主義其尤也，苟遇帝國主義之壓迫，而一味趨避，直謂之曰不革命可耳，以爲人言可畏，又從而壅塞之，是本身適成爲革命之對象矣。國民黨要人果能糾正已往錯誤，後此行政一以開明公正爲原則，政府已往之所視爲敵對者，今應翻然改圖，從長計議，明告國人，一概赦免不問，但以化除黨見，一致拯救民族爲條件。如此寬大爲懷，培植國家再生之元氣，采敵人之長以爲己用，赦敵人之罪以弭內患，以加強自身禦暴之能力，結納平等相待之善鄰，以爲收復失地之準備，此大智之用，拯國人於水深火熱之中其功固不在禹下也。

抑猶有進者，當此民窮財賈國民經濟未能改道之秋，所有一切非生產之設施，應顧

念民力，略形式而注重精神，孟子所謂「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乃今者川西一隅，竟成四郊多壘，禍僅徧於原野，膏血刮自民間，當局惟知注重形勢，爲我公明察之所不及。雖不視爲在位者之恥辱，無乃與古人「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之訓相刺謬矣乎，不求人和而專重地利，猶是自由資本主義者所挾持之伯術，斷難收效於民窮財匱之日也。審矣。其結果將令窮者益窮，亂者愈亂，以是已亂。個人認爲決不可能。

似此設施，是國內人才已往不惟未能集中，且恐因政府之負名者未有其實，務實者不循其名，名實不符，綱紀不立，外形閃爍，內包隳隳，賢者不肯孟浪自獻，恐蹈荀文若進不保其身，退不全其節之覆轍，無以自白於天下後世。以後政府如猶不綜覈名實整飭綱紀，使權限責任釐然不可淆亂，賢者必且望而去之，人才何能集中，惟願我公昭大義於天下，効忠貞於民國，指示江河，使國人如見其心，應事必準乎法律，對人皆蒞以忠誠，則日久而我不虞人者，人或亦能諒我也。

今夫詭譎之行，習之市井，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古之賢王，苟非遇元兇巨惡

欲掩其不備以誅之，必不肯捨經從權輕於一試，誠以詐術之不可習用故也，易經爲我國哲學之鼻祖，上經始於乾坤。而萬類以生，下經始於咸恆，而人事以始，咸感也，恆久也，持之以恆，則感如神。人不僅爲理性動物，而又爲感性動物，故爾詐則我虞，心契則情親，蓋惡意以相激盪，則機陷愈深，紛亂愈甚，自古之專務以智巧勝人者，不轉瞬而禍敗及之矣。無他此因果之相爲倚伏也，今日歐美人嗜利不厭，絕不知有所謂感應，然能尊重他人自由。關心民族利害，故禍雖伏而猶待爆發，然亦決無幸免之理，此孟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中國自海禁開放以來，民族本身自利之習性，遭遇歐西機巧之智術，移膏近火，其僥益張，爲已往造成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之好機會，於是國人漸次棄髦周代以上固有之文化，認爲桎梏身體，而鄙不屑道，視人類誠信相孚之哲理，爲未進文明階段之狀態，而不復措意，全國四百餘萬方哩之地域，幾爲此種紕繆觀念所瀰漫，對於往古聖哲之行誼，則無人掛之嚮類，有之則惟科舉人物，或冬烘先生始盲目而稱道之，初不知上古

與哲所述，與乎今日社會國家關聯之重要性。輕肆者又從而譏評之，此種新舊不相融合已往之社會錯誤觀念，正是今日國家瀕於危亡之絕大原因，以求新者適得其病，守舊者只抱其缺，兩者皆不足以應付我國空前未有之環境，以致國難常頭，人皆束手，個人以爲此後國人，當以聖賢之志願存心，「是整理儒墨而非圖圖讀經」以科學之方法治事，「否認盲目歐化」完成美滿優越之人格，担任目前艱鉅之國難，始能勝任而愈快。

雖然，我國當此教育幼稚時代，國人貪而且愚，而欲其具聖賢之志願，知科學之方法，不恭難乎。言醫治之術者，不外於注重社會教育，與政治教育。然寬假之則效緩，急迫之則未能，皆非救亡有效之方法，個人以爲莫如用感化教育以樹其基，先將國人渙散之精神吸聚，然後再用社會教育與政治教育以輔之，效率必然顯著。所謂感化教育者，即是政府要人可法可則之言行，大公無私之意志，前此一再申述者。此急時敏捷有效之法，乃文王撲棗作人鸞飛魚躍之術也，個人且以爲感化教育，急時固易生效，平時亦不可忽視。一國之當政者，果能至誠積於中，公忠著於外，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行

政悉依系統組織，則朝發一令，夕徧全國，影響之速，捷於桴鼓，更何慮效率之不大乎？倘欲復興民族，而無整個之計畫，未能決定經濟改造之方式，又茫然於行政系統之組織，與人才之集中與分配。惟知頭痛醫頭，直接行動，不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縱使埋頭苦幹，夜以繼日，亦僅局部工作，不能普及全國。縱能普及全國，亦為一種畸形發達，不能持久。似此組織不健全之國家，而以當一九三六年之國難，欲其幸存，何可得也。

當此國家與民族之存亡在千鈞一髮之際，伏冀我公放大眼光，環觀宇內。痛河山之淪為異域，憫同胞之儕於牛馬，大發慈悲，停止內戰。化干戈為玉帛，古非無徵，收異己為同袍，操之自我，但求誠之不至，無虛金石不穿。況既依民族更生之立場而改造國民經濟，則敵我雙方之政治前途，益有交會融合之趨勢，所有作梗於其間者，只雙方要人自身之存在問題耳，但亦不妨劃邊區以供其主義之實驗，而以中華民國之名義統一之，如歐西各國允許公開之例。使國民稍事休養，移轉目標以共同對日。如此則相信大

戰爆發，或有收回失地之可能也。

夫拯救民族之危亡仁也，弭內爭以禦外侮智也。爲人之所不敢爲勇也，三德俱備，成蓋世之功名，此亙古一時之機會也。昔項城乘可以爲堯舜——終身總統——有天下而不與之勢而不爲。洪憲之詔一頒，至言深爲惋惜，竟以此招致失敗。無他，以有子孫帝王之慾憧擾於心，而逢惡長奸之宵小因以乘機作祟故也。幸我 公於堯舜與項城之間，爲之三致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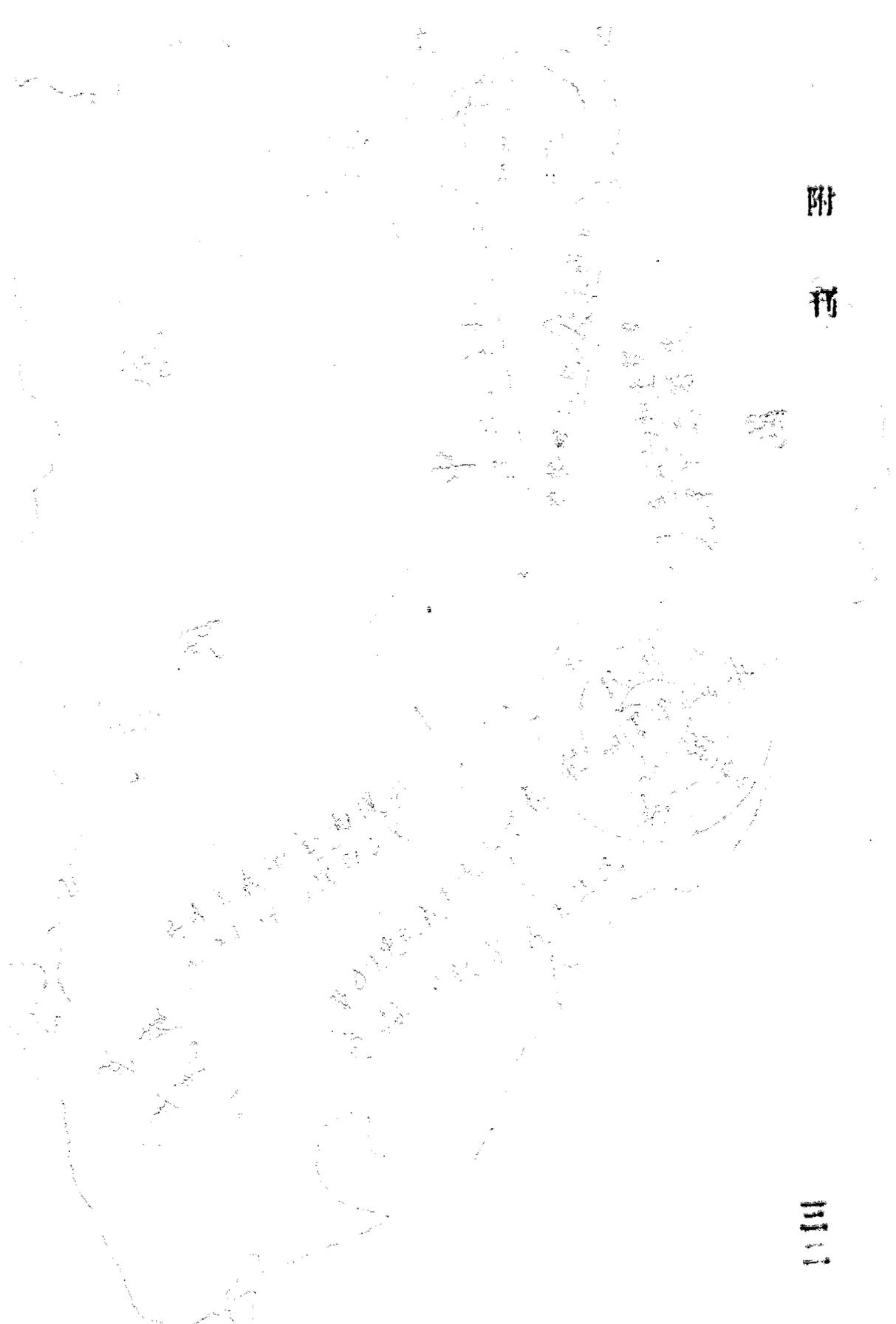
公民陳至言

再前後兩函，簽名之陳至言，本非實有其人，謂所陳者至言也。昔賈山上孝文帝書，敷陳治亂之理，時人以至言目之。竊取其義以爲名耳。負責者爲周列三，寓守經街第一號，因痛國勢之阽危，憫民族之危殆，稔知東鄰之見逼，非屈已求和所能寢事，彼既視我爲侵略之對象，則我之啼笑聲效，固不得咎，目前滄井高橋之責難要求，不過整個侵略計劃中之一種過程而已。不使中國無寸土一民不止也。加緊侵略中國，使無寸土一民，以遂其冀予毒也之必願，足見東鄰慮患之深，手段之辣，直令人背裂。

髮指。故不禁大聲疾呼，語無擇別，垂涕而道，超越當今陳述常軌，倘以爲罪，欲置於法，敢不避也。

二十四年七月三日交由成都陝西街軍事委員長行營

中國國勢與線路圖



附
刊

關於華族生存絕滅的三公式

△中華民族現階段之生存絕滅公式

準確勞力×準確時期=一定物質生產量

強健者的準確勞力×八小時的準確時期=一人一日物質平衡
生產量=一人一日生活素

【理由】人類為消費而生產應該是生產=消費

∴ 最小限一人一日物質生產量=一人一日物質消費量

而一人一日物質消費量=一人一日生活素 生活素充足即是
生存條件具備

如果全國人民物質消費量<生產量 表現的是國富兵強

反之個人物質消費量>生產量 跟着就是個人絕滅

全民如此 跟着就是民族滅亡

【注意】這平衡是以家或國為範圍而是加入老小消費在內以
求平衡的平衡

又原料是該為人類利用的所以公式不加入原料

世界資本主義先進國經濟現狀不準確

的現行公式

進步機械×準確時間×人力=高速率物質生產

若干進步機械×八小時間×相當部分人力=全國物質平衡生
產量(足供全國人需要)

若干進步機械×八小時間×大部分人力=全國物質超需要生

產量(積下剩餘貨物)

從表面上看來是富強 實際是生產物質的分配不均

剩餘貨物之唯一出路是向國外傾銷這中國便是傾銷的尾閘
這剩餘貨物便成了中華民族的嗎啡白面

△中華民族目前之經濟現狀用公式表明

中國少量之機械其效力=○

依照第二個公式即○×時間×人力=○ 即是機械生產=○

依照第一個公式解答

一人一日應有物質消費量=一人一日需要生活素 即是一人
一日維持生存的必要條件

今準資本主義先進國人民的優裕的生活素無着

而現刻一般優裕生活者對機械物質的消費是事實

換一個方式說明

機械物質之生產=機械×時間×人力=生活素

今機械=○

即是機械物質之生產量=○×時間×人力=○ 即是生活素
=○

而生活素為維持生存之必要條件 生活素=○ 即是生存
=○

即是民族中準資本主義先進國人民的優裕生活者之生存=○

但眼前準資本主義先進國人民的優裕生活者之生存是事實

(日吸嗎啡白面)

這種歪曲得以暫時生存之方式也就不必再往下表明了

勘 誤

『弁言』

五，一二落，垂涕談何多「談」字

條例

八，一，顯示誤顯「乎」

八，二，喚醒民族誤喚「民族

正文

一，六，蓋藏誤蓋加「藏」

一，七，加，多「，」

五，二，九一八事變脫「變」字

六，一，諸種原因脫「原」字

六，一，為民族爭生存脫「族」字

一一，一，當權然的多「然」字

一七，二，馬力一動誤馬力「動

勘 誤

一八，九，前章誤前「節」

三一，四，雖然，生產多「，」

三三，六，政變不是誤政「，不是

四三，五，蠶的後面脫「蠶」字以免倒置脫

「以」字

四四，五，五運誤五「運」

四四，六，醫治之術誤醫「之術

四五，二，作罷旒脫「旒」字

四九，一〇，設學校自多「自」字

五二，三，「」按周禮多「」

五三，一二，當權誤「當」權

五八，七，岐陽誤「岐」陽

六〇，五，（檢查多「」）

六四，三，發政施令脫「施」字

- 六四，六，後誤世後「氏」
- 六五，一，以伐有遺誤以伐「其」道
- 六七，七，情感誤「感情」
- 七一，一，牧場裏誤牧場「裏」
- 七五，四，鬻子誤「鬻」子
- 七五，七，或使之誤或「是」之
- 八〇，四，都是一些誤都「是」些
- 八〇，一一，應該來誤應該「未」
- 八二，一一，懲殷之失誤懲殷「失」失
- 八三，一，盟異姓誤「異盟」姓
- 八四，一一，利用厚生誤利用厚「牛」
- 九〇，二，執中誤「執」中
- 九〇，一〇，根本誤根「木」
- 九〇，一二，培壅誤培「雍」
- 一〇六，八，所以能成脫「以」字

- 一〇一，八，仁，義多「，」
- 一一四，一二，當時實亦誤當「是」「是」亦
- 一一六，一，條條件多「條」字
- 一一六，六，太信任誤太信「任」
- 一二七，九，不以纏索誤不以「纏」素
- 一三〇，一〇，一般胡虜誤一般「虜胡」
- 一三一，一，片面之解釋脫「片」字
- 一三三，一，註姑督樓頭脫「樓」字
- 一三五，三，至塞，外多「，」
- 一四二，五，壓榨誤「厭」榨
- 一五〇，七，及肩之牆，盜賊誤及肩之牆
- 「，」賊「脫盜字」
- 一五〇，八，一點輩盜也多「輩盜」字
- 一五〇，九，加在此輩的身上脫「輩」字
- 一五三，四，兒戲然多「然」字

- 一六三，三，學理很少誤學「埋」很少
- 一七〇，九，只須要誤只「需」要
- 一七三，六，弱者震駭誤弱者震「嚇」
- 一七九，二，時日過久誤時日「過」久
- 一七九，五，強暴行爲誤「暴強」行爲
- 一八二，二，祇有太平洋誤「紙」有太平洋
- 一八二，六，歷史上的關係脫「的」字
- 一八三，九，戰爭「文化誤戰爭」，「文化
- 一八五，九，越分高漲誤「趣」分高漲
- 一八六，一二，民族自身誤民族「目」身
- 一八七，七，的觀念誤「觀的」念
- 一九四，九，將被征服誤將「征服」服
- 一九六，六，君主誤君「王」
- 一九七，一二，揮霍誤「輝」霍
- 一九九，一一，「標題」滅亡性誤「滅」亡性

- 二〇九，二〇，直接影響誤直接影「響」
- 二一〇「邊行」最近以前政治誤「現」政治
- 二一〇，六，既無有能誤既「有無」能
- 二一四，一〇，無疑地要避開脫「要」字
- 二一七，二，力惡其誤力「其惡」
- 二一八，九，狼多了誤「狼」多了
- 二二〇，八，以求緩和的脫「緩」字
- 二二〇，九，強權是狠誤強權「避緩」狠
- 二二〇，一一，拾開誤拾「開」
- 二二三，八，全數百分誤全「數」百分
- 二二四，六，物質的誤物「資」的
- 二二四，一〇，一朝開國誤「朝開」國
- 二二五，一，如果不誤如果「」不
- 二二五，一，則因欲望脫「欲」字
- 二二六，八，汗更豪士豪多上「豪」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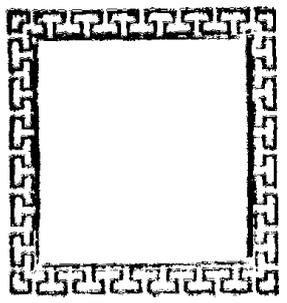
- 二二七，二，鄉愿這三個多「這」字
- 二二七，二，社會上這三種人脫「這」字
- 二二九，七，樁木死灰誤「稿」木死灰
- 二二〇，七，對於政府不誤對於政「不府」
- 二二〇，九，干政「劉裕誤干政」，「劉裕
- 二三四，四，利益，不斷脫「，」
- 二三五，六，中國革命的國家脫「的國」二
字
- 二三七，一，又要採一誤又「要」採一
- 二三八，一二，滲雜其間誤滲雜其「間」
- 二三九，四，重要性誤重「要」性
- 二四〇，一，才智之士誤才智之「士」
- 二四〇，六，嬴秦誤「嬴」秦
- 二四一，三，共黨未免誤共黨「未」免
- 二四二，一一，貧苦民衆誤「貧」苦民衆

- 二四六，一，政權如為多「為」字
 - 二六〇，「邊行」演變誤演「雙」
 - 二六〇，一〇，潰圍突出誤潰「圍」突出
 - 二七二，六，本人自身誤本人「目」身
 - 二七七，八，眼光銳敏誤眼光「脫」敏
 - 二八八，六，一點希望誤「希望點」
 - 三〇〇，一一，弱的不同誤弱「病」不同
 - 三〇〇，一二，心病狂的誤心「的」狂的
 - 三〇一，七，推動力誤推「力動」
 - 三〇四，一，尙有更誤「倘」有更
 - 三一〇，二，政府要人誤政府「要」人
- 『附刊』
- 一九，五，中心，果誤中心「？」果
 - 二一，九，大前提在誤大「提前」在
 - 三一，二，不敢避也誤「敢不」避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廿二日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華族生命論 每部實售法幣壹圓

特價每部 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周列三

發行者 成都少城洞堂街四十二號 新智書店

印刷者 成都梓潼橋正街三十七號 維新印刷局

本書讀法

本書共分七編，第二編第二三章，內容枯燥無味，令人不能卒讀，不過爲華族歷史演進之一環，勢難割捨。又以非本書問題的重心，不能在此處多費詞句，只好把牠作爲一個砲擊，當要樞是本書的一種參考，這一點是當求讀者原諒的。

附論，原是題外的一種材料，用來顯示民族生存的軌，和補充前六編之不足的。

編後附刊，原爲本書的一個縮影，作者不過認牠是時間上的一種證明，使讀者知本書結論內容，不是事後的種種語吧。